

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经济改革

邹至庄先生访问纪录

邹至庄、刘素芬

访问时间：一九九六年六月至七月
一九九九年五月
二〇〇六年七月

访问地点：台北市南港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

访问次数：十八次

访问者：刘素芬

目 录

序

2007年再版序

前言（一）

前言（二）

一、家世与环境

（一）家世

（二）广州的童年

（三）港澳求学

二、负笈美国与学成任教

（一）康乃尔的大学生活

（二）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三）教学与研究经历

三、台湾经济发展经验

（一）推广经济学教育

（二）担任政府经济顾问

（三）台湾与中国的关系

四、推广中国经济学教育

（一）一九八〇年重返中国

（二）一九八二年中国之行

（三）推广现代经济学教育

（1）缘起

（2）一九八四年

（3）一九八五年

（4）一九八六年

（5）其他

（四）留学生与现代经济学

（1）选派留学生出国

（2）经济学教育现况

（3）中国留美经济学会

（五）岭南（大学）学院成立

五、中国经济改革

(一)经济改革与政策建议

- (1) 一九八四年
- (2) 一九八五年
- (3) 一九八六年
- (4) 一九八七年
- (5) 一九八八年以降
- (6) 其他

(二)担任中国经济顾问

(三)六四天安门事件

(四)中国经济研究

- (1) 一九八一年至一九九六年
- (2) 一九九七年至二〇〇七年

六、香港现状与未来展望

(一)香港前途研究会

(二)香港—美国经济合作委员会

(三)香港九七回归

(四)香港的大学及其他

七、学术生涯回顾

(一)研究领域与成果

(二)近期研究成果

(三)教学相长

(四)近年学术活动

八、家庭生活

附录一：邹陈国瑞女士访问纪录

附录二：邹至庄先生年表

附录三：邹至庄先生著作

附录四：经济学留学生名单

附录五：留学生申请入学推荐信

索引

序

我很感谢刘素芬、樊沁萍两位教授愿意访问我和花了不少工夫记录整理。对我个人而言，趁此机会把我一生至今她们认为有趣或重要的事情回忆一下，以之反省，对日后的生活及工作必有裨益。有些事情或想法，读者或许感兴趣。我说话很直，要说就说，想了就说，若有些地方对别人不客气，还请他们原谅。

访问从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六日，共十二次。正巧是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在南港中研院举行，同时我也是经济研究所的访问研究员，与该所同仁常谈论研究问题。在此十天除参加会议各种节目及研讨之外，没有太多时间接受访问，所以很多纪录不够详细。包括早年在台湾，近年在中国大陆，以及在美国研究与教学的工作，每一件事都可以加一倍以上的篇幅来详述，只能留待日后想起来再补充。

在学术界，每位同仁写一本书或一篇专题论文，都有故事可说。A. Pagan 教授访问了我研究计量经济学的经过，刊登在 1995 年的《计量经济理论》（*Econometric Theory*）第 597 至 624 页，可供读者参考。又如我因为主持并参加动态经济与控制学会年会，在七〇年代后期与八〇年代初期常到欧洲各国进行学术活动；许多在美国经济学会和计量经济学会（*Econometric Society*）的趣事；在学术上，许多朋友、师长、学生对我的影响等。以上都没有包括在纪录内，也很难用简短的篇幅补充。

刘、樊两位教授又以书面方式问我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估与看法，我觉得诺贝尔经济学委员会选择的得奖者从 1960 年开始大致都很有水平，选得不错。有些是大家一致公认对经济学有很大贡献的，如 Arrow、Friedman、Samuelson、Tinbergen 等。但约有三分之一至半数的得奖者，大家（指世界第一流经济学系的教授，或某些重要经济学会的全体会员，或包括曾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或硕士学位者）不一定同意。虽然没有太不够水平的，但亦不乏众人认为相当平凡的。得奖是一种荣誉，但没有一般人想象中的这么重要。经济学界是相当有判断能力的，一位有贡献的经济学家，一般同行都认识，对他或她的贡献都有评价，不用诺贝尔委员会去评断。换言之，如果经济学界承认你的贡献，不需要诺贝尔委员会来肯定；如果经济学界不承认你有重要的贡献，他们不愿意读你的作品，连研究生也不读，对学术研究没有影响，就是得了诺贝尔奖，也都没有大作用。充其量只有一天的报载，数日后大家都忘记了。试问经济学研究生，他们能记得多少位经济学的诺贝尔得奖者？大致想不出六位，更不用说一般不专攻经济学的知识份子了。

上周 1996 年的经济学奖公布了，其中之一系 William Vickrey，我觉得

选得好，虽然事前我没有猜到他，因为我认为很多人都有资格。但选出之后，我是同意的。他是哥伦比亚大学已退休的教授，六〇年代我当该校兼任教授时，他是系主任。他在上星期二（十月八日）得奖，我十分高兴。次日，星期三，我去上博士生二年级计量经济学时间序列（time series）的课，共有十九位学生。我问：「有谁听过 Vickrey 教授？请举手！」只有三位学生举手。获奖者的知名度由此可见。数年前计量经济学前辈 Trygve Haavelmo 得奖，我也曾问选修计量课程的二年级博士生十数人，只有两人举手说认识他。Vickrey 教授的际遇令人既喜又悲，得奖三日后的星期五，他在晚上十一时许独自开车外出，因心脏病发而去世。医生说他在这三日内忙于接电话、接受记者访问等事，过于操劳，可能影响心脏的运作，以致有此悲剧。

我今早（1996 年十月十六日）在普林斯顿家里写序，因为要回答访问人的书面问题，而刚巧今年的经济学诺贝尔奖在上周揭晓，所以顺道在这里一并叙述，或不免有些突兀。如果是当面访问，我会说下面关于 Vickrey 教授的一些掌故。数年前他当选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在此之前我已当选为该会理事（Council member，共有六位，三年一任，一年选出两位）。有一次在华盛顿召开理事会会议，当然由会长主持，订于三月份的某一天上午八时半或九时在一所饭店开会。理事同仁都投宿该旅馆，唯有主席从纽约乘半夜开的火车，早晨七点多钟到华盛顿来开会。在火车上睡觉当然没有旅馆舒服，而且要等到半夜才能上车，很早就要起来准备下车，为的是节省一晚的住宿费（按该旅馆因为欢迎年底经济学会会员订房，数目多达数百或上千的房间，所以优待理事们免费住宿）。这还不算，下午散会后，会长和我同去火车站搭车，普城是从华府到纽约必经之路。他不肯花五美元的计程车费，一定要走十分钟的路到地下铁车站，再花一美元乘地下铁去火车站。我只得陪着去。到火车站后，我看见四十分钟后有一班车要开，当然想搭这班车。先生却不肯，说要坐等（不坐在舒服的餐厅而坐在公用的硬椅上）两个多小时后的晚车，省下十八美元左右！我实在不能再奉陪了。Vickrey 先生惯于节省的程度有如此者。他对经济学的贡献之一，系设计在不同时间收不同的路费。他的主张在美国应用不广，但在星加坡市中心的汽车交通费上实行了。从华盛顿到纽约的火车，在下午下班时间收费比晚上高，因此他可能是个实行自己交通收费理论的消费者。上周我知道他电话忙，所以想过几天再恭喜他得奖，不料却已失去机会，现在只能缅怀他的旧事。

我今年足六十五岁，要做的事还很多。现在正是美国总统竞选最热闹的时候，共和党候选人杜尔生于 1923 年七月，现年七十三岁，比我长七年多，他正在寻求自认为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可知我离此刻还远，需要继续累积经验和学识，才有资格做我认为最重要的工作。如有进展，日后将向大家交待，谢谢读者的关注，并请指教。

1996 年十月十六日于美国普林斯顿

2007 年再版序

自从 1996 年《邹至庄先生访问纪录》出版以后，我继续致力于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经济改革的工作，在此向读者报告，书名也因此由《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播种者：邹至庄先生访问纪录》改为《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经济改革：邹至庄先生访问纪录》，还请读者指教。

再次感谢刘素芬教授愿意访问我和花了不少工夫记录整理。刘教授的观点是「深入研究台湾经验，进而传递到海峡对岸，乃至东南亚以及其他开发中国家，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她又说：「先生将 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的台湾经济发展经验，成功的传递到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的中国大陆经济发展之上。从而具体说明台湾做为一个人类学的实验室，对于人类文化和广义的国际交流合作可能具有的价值与贡献。当然，我们深知要达到此一结论，仍有一段艰辛漫长的路要走，但相信在先生的访问纪录基础之上，我们的步履将更加踏实与坚定。」虽然我很佩服刘教授的理想，的确台湾经验是我在 1980 年回到中国大陆之前累积的重要经验之一，此外还包括我对经济学的学习，以及在 IBM 公司担任高级副总裁的顾问等经历。1980 年以后我开始学习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其中也不乏可供现在的台湾学习之处，从本书第二版的新内容可以发现这些例证。

有些中国朋友问我为何不找一位国内学者替我写传？其中一个理由是很难找到有像刘教授水平的人合作；另一个理由是本书的部分内容恐怕不容易在中国大陆出版。即使在国外出版以后，能否进口中国大陆，可能也有问题。

2007 年五月十六日于美国普林斯顿

前言(一)

1994 年秋我赴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访问研究，时值海峡两岸关系紧张，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哈佛人文荟萃，许多海内、外中国人汇聚一地，每为此展开激辩，然而终难有所定论。在繁忙的课业与研究之余，两岸关系问题成为我最沉重的负担。

在此背景之下，有幸旁听哈大历史系入江昭（Akira Iriye）教授的「国际关系史」和「美国外交史」，毋宁是自然而又顺理成章的选择。入江教授是研究国际关系史的巨擘，他最重要的学术论点是在传统的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研究取向之外，另辟蹊径提倡文化研究取向，强调国际合作与文化交流。他的主张恰能为两岸轳轳的政治、经济问题，提供另一类思考的空间。

1978 年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美国社会各界掀起中国热，在学术界亦历久不衰，中国研究成为显学，哈大自不例外。相形之下，有关台湾的研究可说凤毛麟角。除了经济发展课上偶一提及之外，唯有人类学系张光直（K. C. Chang）教授开有「台湾研究」课程。张教授认为尽管没有外国学生选修，显见台湾研究尚未能唤起国际学界的充分注意，但是面对来自海峡两岸的学生，得以英文、中文、台语交互使用，大为提高上课的自由度与乐趣。张教授当时兼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且健康情形日趋恶化，在于公于私几近不可能的情况之下，仍愿为台湾研究贡献心力，他的执着与付出，令我深为感动。他认为台湾拥有丰富的自然与人文资源，堪称学术研究的微实验室，鼓励学生以科际整合的角度研究台湾学。因此，结合入江教授与张教授的说法，我认为将台湾定位为人类文化的实验室，深入研究台湾经验，进而传递到海峡对岸，乃至东南亚以及其他开发中国家，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

在此同时，位于台北南港的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在顾应昌院士的建议之下，推动「台湾经济发展决策研究系列」主题研究计划，研究 1949 年以后的台湾发展经验。其中我与同事樊沁萍博士合作的「美援时期的工业政策」研究计划，正符合前述尝试摸索的新方向。基于此一精神鼓舞，回国之后的研究工作更能顺利进行。1996 年夏初我们得到初步的结论，认为 1950 年代中美双方的政府官员与经济学者的互动，在台湾的经济决策上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至于此一台湾经验的结论，对于其他的社会经济体有何意义，我们尚不敢妄下论断。

1996 年六月适逢邹至庄先生来台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在经济

所发表公开演讲，提及他参加海峡两岸经济发展的经验。我们猛然醒悟邹院士本身就是传递台湾经验的鲜活实例，遂引起我们进行此一口述访问的动机。承蒙先生慨然允诺，在百忙之中抽空接受访问。在访问进行中，先生的做事效率与精神毅力，令我们印象深刻。限于时间迫促，访问纪录只能略尽先生生平之一二，但已足以说明借着欧美现代经济学的媒介，先生将 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的台湾经济发展经验，成功的传递到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的中国大陆经济发展之上。从而具体说明台湾做为一个人类学的实验室，对于人类文化和广义的国际交流合作可能具有的价值与贡献。当然，我们深知要达到此一结论，仍有一段艰辛漫长的路要走，但相信在先生的访问纪录基础之上，我们的步履将更加踏实与坚定。

我们感谢邹至庄院士接受口述访问，并细心审阅初稿。我们也感谢钟杏珠小姐不惮辛劳帮忙记录、输入电脑及校对的工作。承蒙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补助经费；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小组召集人张力先生和曾金兰小姐提供协助；以及世界科学出版公司（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答应出版本书，在此一并致谢。谨以此书献给为人类未来与和平努力不懈的伟大心灵。

刘素芬 谨识

1996 年秋于台北南港

前言(二)

2006年四月接获邹至庄先生来函告知，有意修订十年前出版的口述访问，我欣然从命。因为在过去十年之间，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现代经济学教育已经有了非常可观的成果。先生身为一个播种的园丁，一方面感受到收成的喜悦，另一方面也关切未来的发展及相关问题。以上均在此一十年回顾中充分表露无遗，既创造历史，也见证历史的发展，先生可谓当之无愧。

更重要的是，先生凭着敏锐的观察与犀利的专业判断，使他得以见人之所未见、勇于言人之所未敢言。这些当前中国迫切需要的诤言谏论，未必尽是人所未见，却往往是人所未敢言。先生的杰出成就，与其说是所谓传统中国知识份子的风骨或理想，毋宁说是时势造英雄。其中一部份原因固然可以归之于先生的人格特质，可是最主要的原因恐怕与全球化带来的市场机制有关。「我相信亚当斯密所说，在追求个人自利的同时，也达成社会利益。」经济学的陶冶和训练，既是先生立身处世的信念与原则，也造就先生成为一个跨国界的专业人士。当年轻资浅的归国学者，徘徊在泛政治化的学术环境之下，对于个人的行止进退无所适从，更忧虑学术专业的落后，诚如先生所说：「学术成就必须通过市场考验。」「经济学的就业市场有了国际竞争，也是一件好事。」无疑给年轻人指出了一条明路。

先生是世界知名的计量经济学家，1960年即以Chow Test的成名作著称于世，时年三十岁。其后担任台湾和中国的经济顾问，更将计量经济应用到两岸的经济改革与发展之上，成果斐然。特别是将欧美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引进中国，并协助中国教育部选派学生出国留学攻读经济，培养人才，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既深且巨。然而在光环的背后，先生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压力很大，一方面同事不承认我做的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经济改革有学术价值；另一方面我教书也必须全力以赴，因为我是计量经济学的教授，而非中国经济的教授。我有时候觉得研究中国经济是牺牲计量经济学与动态经济学研究。」充分反应出知识份子的良心挣扎与学术市场竞争的铁律，并无资深、资浅的差别。

先生自言深受童年教育的影响，也认为人才培养不限于学校教育，肯定家庭、社会、文化对于人力资本形成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先生说：「这是中国的传统，非常注重教育。」而且身体力行，从自己家里做起。长年担任普大国际中心主任的邹夫人说：「现在我们的家庭成员包括中国文化、台湾文化，还有中南美洲的拉丁文化。我们相处得很好，

十分融洽。在美国，这样的多元文化家庭很普遍。」可见家庭是传递文化的基本单位。

身为计量经济学的泰斗，先生对于数字的敏感可说是一种天赋，对于精确的追求也就成了一种执着。在整理口述访问稿的过程之中，先生字斟句酌，甚至连接词、形容词、标点符号也不放过。也让共同参与工作的我得到最好的学习，深深体会到学术求真的精神，在经济学与历史学并无分轩轻。单就这一点而言，我相信先生的口述访问已成为弥足珍贵的历史一页。

刘素芬 谨识

2007年五月于台北南港

一、家世与环境

（一）家世

我于 1930 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出生在广州郊区的东山槟园。护照上记载我出生于 1929 年，这是登记时弄错了。1982 年我曾和朋友一起旧地重游，那栋老房子槟园还在。先父邹殿邦；母亲罗氏，闺名佩莲。我排行第七，是家里最小的，上有两个哥哥四个姊姊，依次是大哥（至强，比我大十三岁）、大姊（令华，大十一岁）、二哥（至毅，大十岁）、二姊（令昭，大九岁）、四姊（令宪，大七岁）、五姊（令辉，大一岁）。三姊是我二叔的女儿，因为按祖父派下大排行的缘故。

我的父亲出生于 1895 年，前两年 1993 年才去世，高寿九十有九。他是广州商业界的闻人，担任商会会长多年，俨然是同业之间的领袖。先祖父静存公，是个生意人，事业经营不算太成功，年纪不大很早就退休。当时父亲只有十六岁，他在家中是长子，上有一个姊姊，下有二个弟弟和三个妹妹。祖父叫父亲去钱庄做管理，以负担家计。父亲不愿意做，他想要继续念书。祖父说先试着做做看，如果真是不行的话，就可以不做。父亲做了不久，赚了许多钱，才二十几岁就成了百万富翁。先是从事广信钱庄的生意，后来营业范围越来越广，包括盐业等，无所不做。当我出生的时候，他的产业已经非常庞大。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我们迁到香港；1942 年日本进占香港，再迁澳门；1945 年迁回广州。1946 年我的二哥邹至毅自美学成返国，他是念建筑的，便帮忙父亲整理房地产。他在墙上挂了一张广州地图，用小针标示房地产，针头密密麻麻布满了地图上，可见父亲产业之多。因为战争的关系，1945 年广州的房地产大致与 1937 年相同，没有太大的变动。

父亲年轻的时候认识不少政界要人，如胡汉民、廖仲恺等人都是他的朋友。胡汉民当时是孙中山先生之下的第二人，与汪兆铭并称，他们两人在国民党内的资格都比蒋介石老。胡汉民看中我的父亲，推他做商会主席。当时父亲只有三十多岁，而即将卸任的商会主席有七十多岁，两人年纪、资历相差悬殊，所以其中胡汉民出了不少力帮忙。以后父亲

连任商会主席多年。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廖仲恺，他与胡汉民两人不太对。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建立黄埔军校，不久之后廖仲恺遇刺身亡，而主谋凶手是何人，一直未有定论，但一般认为与胡汉民派有关。

廖仲恺常常告诉我父亲说他不要钱，要钱不好。他叫我父亲多赚点钱，钱赚得多了，可以帮忙国民党做事。父亲帮孙中山先生做事，但没有加入国民党。父亲说胡汉民和廖仲恺都教导他很多事情，他们两人派别不同，他和各派的人都合作，自己没有什么派别。父亲是个商人，他知道廖仲恺亲共，告诉廖仲恺共产党做事不可靠。廖仲恺不同意他的说法。即使如此，他们两个人还是很要好的朋友。廖仲恺遇刺前一两天还和父亲谈过，他自知身陷险地。廖仲恺死后，父亲和廖家仍有来往，他看着廖承志长大。

父亲是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典型，整天在外面忙自己的事业，不管家里的事情，但很重视子女教育。家里的事，都由母亲一个人在打理。父亲与子女们不亲，唯有和我及五姊较亲近。这是因为1942年我十一岁的时候，为躲避日本人，小家庭（两兄已赴美，三个姊姊进入中国内地）从香港迁到澳门，时值中日战争期间，避居澳门横竖无事，父亲整天带我去游泳，得他亲炙不少。所以我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很亲密，和两个哥哥不同。

父亲教导我不少事情，使我受益良多，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教诲是：易地而处和有恒。所谓易地而处，就是从对方的观点和立场看问题，不要只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与人谈话的时候，要注意对方的观点。我自己另外从经济学学到一种体会，就是和别人一起做事，一定要诉诸对方的利益，所以我从来不求人做事。这个道理可以替父亲的训示做个补充。和别人合作，除非是对别人有利益的事，否则不会去推动，所以成功的机会很大。与别人对话要察颜观色，也就是从对方立场出发。如果自己打定主意去找别人谈事情，必须注意观察对方的情形，如果发现对方心不在焉或有其他心事，没有什么兴趣，就暂且搁下不提。等以后时机成熟，再提出来讨论。第二点，做事情要有恒心。父亲自年轻时起练太极拳，历时数十年从不间断。我这一方面的工夫就比父亲差多了，近年稍好，尽量保持每天练习一个多小时高尔夫球或游泳的运动习惯。

在为人处世方面，父亲有他的道理，他的教诲我到现在仍然受用。我觉得自己很年轻，过去累积的经验很有用，每天不断学习新的东西，使自己做事能力越来越高。不过，这种能力若用在复杂的数学研究之上，就不一定管用了。

（二）广州的童年

我记得小时候常常搬家，有时候住在广州，有时候住在香港。有一段时期父亲精神不好，经常去旅游，也在北京住了半年。我三、四岁的时候，父母去日本将近半年，我和五姊就住在上海舅母家里。放暑假的时候，常常全家去青岛游泳。虽然常常搬家，印象较深的还是广州的两个房子。一个房子较大，后来被广州军方占用；另外一个房子较小，但也有五、六个睡房。房子建在珠江之上，下面就是水，因此胡汉民命名为「海屋」，并亲自题字。

1936年我开始念书，那时候只有五、六岁，在家里的私塾启蒙。这件事情与我的三个姊姊有关。我的四舅父是罗仁伯先生，他曾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后来回香港办教育，是个教育家。现在香港有一个仁伯学校，就是纪念他的。我的母亲当时也随他赴英国念预科，所以英文很流利。我的父亲向四舅父请教子女教育问题。四舅父说先念英文，再念中文。这个建议可把人害惨了！父亲便送三个姊姊去香港念英文，后来看他们连中文都不会写，所以叫他们回广州，请个女先生曹老师每天在家里上课。我和四个姊姊一起上课，我做班长，负责上下课摇铃。我住在瑞士的大姊，当年是十六、七岁，她到今天仍然耿耿于怀曹老师对我偏心。其实不过是老师看我是小孩子，很好玩，所以比较喜欢我。念书的时候，每个人一张桌子。老师一走进来，我们必须起立致敬。这样前后念了约一年之久。小时候的事情都忘了，只记得海屋旁边的珠江每年五月有赛龙船等小事。

（三）港澳求学

1937年七月中日战争爆发，八月我们从广州搬去香港，印象很深刻。因为家里买了两部自行车，我刚学会骑，正觉得很得意。本来家里住在广州好好的，战争突然爆发，必须坐火车搬去香港，好像难民一样，对我的心理是很大的打击。全家搬到香港麦当奴道（MacDonnell Road）三十八号，住得也不错，大概是1920年代买的房子。八、九月开学之后，母亲送我去念圣保罗小学二年级。圣保罗设有中、小学部，现在是香港公认最好的中学，有些学生毕业之后申请去普林斯顿念大学。我念书之时，距今已将近六十年，校舍依然还在。

在圣保罗小学念完二年级之后，母亲想要我转读香港的岭南小学。广州岭南大学成立于1888年，是1930年代人称华南最好的学府。1938年大哥赴美留学之前，先在战时搬到香港的岭南大学念了一年书。后来岭南中学也因避战祸搬到香港，1939年二哥也赴美留学，之前就在岭南中学念书。我插班岭南小学三年级，没有考上。我埋怨母亲不先告诉我要转校，没有准备，暑假天天去游泳，从前学过的东西都忘了，所以考不上。母亲托人向校长陈汝锐先生关说，我的两个哥哥都是念岭南小学、中学毕业的，而且父亲又捐钱给岭南兴建十友堂（十友堂由十个人共同捐建，一人捐一万元，我的父亲是其中之一）。于是校长让我重读二年级。我在圣保罗念书之时，成绩大概都在前五名之内，最好的一次是第三名，第一、二名都是女生。我重读二年级，分数近乎全班最高，因为功课都已经学过了。这对我很有好处，从此一直保持很好的成绩。我当时不太用功，对念书没有特别兴趣，只喜欢玩。

我很喜欢岭南小学，特别是其中有些先生很好。岭南的学生活动办得很好。在美国大家公认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友对学校的感情最深，每年订有校友日，校友很踊跃回来参加，捐款也很多。岭南校友对学校也很热心，因为它注重学生生活、运动、打球等。学校要求学生住读，不过我在香港是走读。我有一个朋友邓炽康，他也是走读生。我们两人是邻居，所以共乘车上下学。上学的时候，他搭我的车去；放学的时候，我搭他的车回家。我的足球始终踢不好，就是因为我走读的缘故。因为大家都是每天三点下课之后练习，我没有办法参加。至于其他的活动，如圣诞晚会、演戏等，我都参加。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开始进攻香港，情势很紧张。十二月八日我和五姊刚准备去上学，听到日机轰炸不用上学，两人都很高兴。后来有一个炸弹，炸中我家的房子，房子二层楼的凉台打了一个大洞。

幸好我们都躲在地下室，家里没有人伤亡，运气很好。我们全家搬到父亲的一个俱乐部去住，仍然继续上学。因为日本人占领香港，岭南学校关门，我暂时先念华仁小学。1942年我家搬去澳门，仍然念岭南初中。当时的岭南初中用现在澳门岭南中学松山校址。我从前的邻居邓炽康，因为战争期间局势混乱的关系，一连跳了两级。我受了他的影响，也跟着跳级。我从小学六年级跳读初中二年级。初二读完之后，考入培正高中跳读高一。跳读有利也有弊，其中得失很难说。我在培正念了一学期，又转回岭南中学。1945年战争结束之时，我念高一。

在澳门这段期间，父亲常在家里，教我不少东西，使我一生受益良多。我在澳门念书的时候，自觉待人处事相当幼稚，有些同学比较老成世故。例如刘尚志，他的年纪和我差不多，可能是看多了三国演义，颇懂权术手腕。我常常被他耍得团团转，但我们还是好朋友。他目前在加拿大。另一个同学韦基尧，他的父亲是二天堂制药厂的老板。我们三个人在班上书念得最好，感情也很好。我对绘画有兴趣，水彩、国画都喜欢，三个人常常一起去看画展。那时候国画南派的大师高剑父也住在澳门，开画展的时候，我们也去参观。他是当时仅次于张大千的国画大师。1945年美国投下原子弹，日本人投降，大家都很高兴。学校搬回广州，租了一条船，全部学生都上船，大家很兴奋。终于要回到久违的故乡，我的感情很丰富，也很激动。

在中国，中学生活是一个很复杂的世界，在台湾也是如此，在国外就简单多了。难怪美国人搞外交不如中国人，在美国搞政治，人事方面也不复杂。在中学那几年，刘尚志是学生领袖，担任学生会会长。这其中也有一些政治运作，人事相当复杂。有些人不喜欢他，因为我书念得好，推我当社长。我是一个念书的人，做不来学生活动的事，很怕担任社长，但又不能拒绝，每次主持开会都很紧张，但我也因此学到一些经验。

二、负笈美国

（一）康乃尔的大学生活

1947年我从中学毕业。我的二哥已于1946年自美学成返国。父亲要大哥回来，但是大哥不肯，仍然留在美国。我也申请美国大学，想念工科。二哥说美国好的工科大学有麻州理工学院、康乃尔大学、普渡大学三个学校，于是我就申请这三个学校。其中麻州理工学院没有回信，我以为它不接受我的申请（其实不是这么回事，美国大学做事的惯例，无论接受或拒绝一律会回信答复。大约信在邮寄的途中遗失了。后来我拿到学位之后，也曾去麻州理工学院任教。），康乃尔大学和我通过几回信，1948年接受我的入学申请。

我得到康乃尔大学的入学许可，但是要得到美国领事签证很不容易。本来在此之前有一段时期，要得到签证并不难。但后来就改了，签证需要两封美国公民的介绍信、身体检查、两千美元。介绍信只好请岭南大学的英文老师和另一位美国教授帮忙。身体检查如果有沙眼等毛病必须治好。另外带两千美元做为财务证明。1948年美国大学一年的学费是六百美元，每个月生活费一百美元，房租不到三十美元，所以两千美元一年也用不完。为了办美国签证，我花了不少时间。

我原来想念工科，母亲鼓励我学政治，她说学工的人太多了，而且国家需要政治人才。我本来可以反对，但是母亲对我影响很大，所以改念政治。到了康乃尔大学后，第一个学期有美国政府和西方历史两个课程。每个星期要读一百多页的参考书籍，加上英文又不好，念得很辛苦。我对于美国政府一无所知，专有名词用语既看不懂，对美国社会更不了解，整天查字典。第一个学期除了吃中饭和晚饭的两个小时之外，简直念书念个不停。可是我从来不开夜车，念书念到十点半就去洗澡，然后听New York Times电台的古典音乐，每天一定十一点就寝。因为开夜车不是长久之计。星期六或星期日坐公共汽车进城去中国餐馆吃饭，往返要花一个半小时。

期中考时，美国政府和西方历史两门课程的成绩分别是 50 分和 70 分，到期末考时两科都是 80 分。我向来念数学很容易，基础很好，动辄拿 99、100 分，但念文科很吃力。后来我念远东经济，经济学拿到 85 分，但完全不懂。我的第一个经济学老师是 Don Gordon，他现在虽然已经退休了，仍然还在教书和做研究。他当时是研究生兼助教，把五个学分的经济学课程，微观经济学加宏观经济学，在一个学期之内全部教完。他采用 1948 年史丹福大学教授 Lorie Tarshis 写的教科书。我完全不懂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但念书考试我会。凯因斯（John M. Keynes）的方程式 $Y=C+I$ （所得=消费+投资），我会计算乘数（multiplier），考试做得出答案来。得到 B 或 B+，已经算是中上的成绩，可是莫名其妙。如微观经济学里的总成本、平均成本、边际成本之间的经济意义完全不懂，只是会算数学。不单是我一人如此，现在的学生也很可能如此，真正通经济学的人不多。

举例来说，1995 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中国经济的课程，用我自己写的两本书做教科书。我不能讲一讲毛泽东的故事就算了事，而是用经济学的眼光来看问题。每周一、三上课。另有习题作业，每周一公布题目，周五交回来，由助教带着做习题解答。当时这位助教即将获得博士学位，现在找到不错的教职，但是有时候习题做不出来。我有时候去教室看一下，他的答案做错了，有一些我觉得很基本的问题，他也不一定会应用。

由此又要提到台湾经验的意义，1966 年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邢慕寰先生邀请我来台湾教计量经济学（1996 年七月四日是我来台湾的三十周年纪念日）。那时候经济所刚落成不久，是全中研院最新的建筑。我从台湾工作经验中学了不少经济学，不只是理论，还有应用：如何把书本上学到的理论，拿来实际应用。我在 1955 年拿到博士学位，后来写了一些有名的论文，但是直到 1964 年做了正教授，对于经济学最简单的应用，还是不完全懂。所以来台湾工作对于我的经济学与经济研究受益不浅，只是会写理论性的论文不一定能了解应用。

我本来念政治，后来改念经济，是受到 Alfred Kahn 的影响。Kahn 教授书教得很好，我从此对经济学发生兴趣，于是在三年级转念经济学。我最有兴趣的是计量经济学，当时康乃尔经济系没有这一方面的师资，1951 年我去芝加哥大学念博士学位。1967 年我第二次来台，是应刘大中之邀来参加他所发起的台大经济学讲学班。我向刘大中也学了很多，他年纪比我大，经验比我丰富。当时他还邀请了许多有名的经济学家来台

湾，由Simon Kuznets领队。Alfred Kahn也在内，他当时教国际贸易，现在还住在康乃尔。

（二）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我在芝加哥大学遇到的第一位教授是Milton Friedman（1912-2006），他当时在那儿教书。我觉得他是很好的经济学家，与Paul Samuelson、Kenneth J. Arrow三人并称为当时在美国最先进的经济理论学家。我的同班同学之中，最特出的是Gary S. Becker，他是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那里的师资比康乃尔好，有William Baumol和Jacob Viner等第一流的人物，所以他的水准比我高。

我初到芝加哥就很佩服Milton Friedman，他对我影响很大。几十年来我们一直保持来往，常常互相通信。我觉得他年纪大了之后比较顽固。1970年代他大约六十岁，芝加哥大学有些年轻的教授说他仍在教当年的那一套东西。我念书的时候，芝加哥有全美最好的经济研究院，只要翻一翻历年诺贝尔经济学得奖人的名单即可知。又有Cowles Commission，是一所研究数理和计量经济学最有名的研究所。那些最杰出的年轻学者，如Lawrence Klein、Kenneth J. Arrow等人在芝加哥的时候，我还没去，等到1951年我去芝加哥的时候，他们已经离开了。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去了一个最好的学校，对我影响很大。如果没有和Friedman、Leonard Jimmie Savage（统计学大师）他们学习过，整个做学问的作风将会完全不同。我学习他们的想法，看他们如何思考和讨论问题，特别是在讨论会上受益最多。Friedman对货币经济学有兴趣，组织了一个货币理论讨论会，Becker也参加。我的博士论文研究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也曾在他的讨论会上报告，后来在1957年出版。我认为在芝加哥所受的训练是很难能可贵的。我与Milton Friedman亦师亦友的交情超过半个世纪以上，使我一生受益良多。他过世之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弗里德曼：为学、为人与中国〉表达缅怀之情，刊登在2007年四月的《金融博览》和香港的《信报财经月刊》上。

（三）教学与研究经历

我去麻州理工学院教书，是凭Friedman与Alan Wallis的两封介绍信促成的，也没有经过面试。该校史隆管理学院（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又译作斯隆管理学院）的院长是Pan Brooks，他从前担任过Sears公司的副经理。副院长是Eli Shapiro，他负责管理人事，是Friedman的好朋友，接到介绍信立刻给我教职。当时麻州理工学院有位副教授Howard Johnson，后来成为校长。我在那儿教了四年书，除了教书之外，也有不少其他的事。美国的经济学分成两大学派：芝加哥学派和剑桥学派。我24岁拿到芝加哥博士学位，深受Friedman影响，到麻州理工学院教书，向Paul Samuelson和Robert Solow等大师学习，听到另一派不同的意见。Samuelson现在还写文章，（1995年香港办了一个《太平洋经济评论》（*Pacific Economic Review*）期刊，内容不限于太平洋经济，1996年一月Samuelson仍投了稿，在第一期刊出。）Solow对计量经济学有兴趣，我和他谈得较多。另外哈佛大学也有一批学者，彼此常往来。

1959年三月康乃尔大学要聘我为副教授，麻州理工学院要我再等一年再考虑升级，虽然麻州理工学院比较好，可是康乃尔是我的母校。因此我决定接受康乃尔的聘约去那里教了三年书。我在康乃尔念大学的回忆很美好，那时候自己一个人念书，生活很简单。但成家以后住在那儿，觉得冷清，交通不方便，没什么活动，连个像样的中国餐馆都没有。

1962年我被Ralph E. Gomory请去IBM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国际商业机器有限公司）做事。Gomory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他在IBM主管一个小组，邀请我去IBM设在Yorktown Heights的研究中心当研究员。研究中心的地点靠近纽约城的北边三十英里。我原来不想辞去康乃尔的教职，只是申请去做访问研究。到了那儿三、四个月之后，觉得IBM的环境很好，没有什么责任，光是写文章发表，很单纯。于是辞去教职，在IBM专任。我一个星期工作五天，每天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晚上和周末都不做事。我的工作主要是发表论

文，从 1962 年到 1970 年我写了好几篇重要的论文，就是在这儿完成的。在IBM期间，我从 1964 年起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兼课，他们想聘请有经验的经济学家，原来希望我去专任，不成之后便想聘我为讲座教授，我没接受。1969 年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Stony Brook）也曾想聘我为讲座教授，我也没有接受。

1970 年Richard Quandt教授请我去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他说Oscar Morgenstern教授 1970 年即将退休，我可以去接任。我当时在IBM专职，还兼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不想去普林斯顿，但不好直接拒绝，便说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考虑。一星期之后我还是决定不去。当天午餐时，我告诉同事Alan Hoffman关于普林斯顿的事情。他劝我不要拒绝，去谈一谈也好。于是我和Quandt教授说任教之事可以商量。我先去普林斯顿大学访问，遇到Morgenstern教授，他对普林斯顿不太满意，觉得校方不够重视他。回来之后，我仔细考虑自己的去留问题，在IBM任职很愉快，生活也很好，但是那年我三十九岁，将近四十岁，虽然现在情况很好，将来年纪大了，继续留在IBM可能有问题，所以决定离开。事后证明我的决定是对的，1970 年代IBM的黄金时代过去，股票价格也下跌，成长慢下来，研究也没有那么自由，必须以对公司有利与否来衡量。何况 1980 年代我在中国大陆的工作，若仍留在IBM，受到公司观点的限制，或许不能自由的进行。我在普林斯顿任教，直到 2001 年退休，而当初邀我去任教的Quandt教授早已于 1995 年退休了。

我去了普林斯顿大学之后，1970 年至 1971 年仍在哥伦比亚大学兼职，因为已经答应了对方面。我之所以去哥伦比亚大学兼任，与Becker教授有关，他和Jacob Mincer筹组了一个劳动经济学讨论会，我去参加。林安乐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我指导他写论文，后来也和他合作写文章，他的博士学位是罗彻斯特大学授与的。

我在IBM公司的工作，一方面是做研究；另一方面是担任副总裁的顾问，所以我有两个办公室。我在IBM学到的经验是企业界的想法与学术界的观点不同。IBM在 1960 年代是全盛时期，业务欣欣向荣。

1970 年代我的研究领域是计量经济学与动态经济学，1980 年以后我开始持续研究中国经济，这些相关的研究成果，可以参考附录三所列的著作部分。

三、台湾经济发展经验

(一) 推广经济学教育

1966年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邢慕寰先生邀请我来台湾讲学，因为经济所和台大经济系合办经济学暑期讲学班。讲学班一开始我就来了，顾应昌随后也来。我们住在中央研究院的宿舍里，是一栋日式的平房，很干净整洁。我们请了个佣人烧饭。宿舍屋后是一片水田，田里有水牛耕作，我们出国多年很少见到这种景象，还特地拍照留念。

这是我首次用中文讲经济学，并认识了政府经济行政首长，参加座谈会并交换意见，是刘大中邀请我参加的。1967年我第二次来台湾，也是大中推动的，另外还邀请了其他的经济学者如Kahn、Kuznets等人，来台湾开国际学术会议，由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主办。当时院长是王世杰（雪艇）先生。

1966年中央研究院主办经济学讲学班，透过王雪艇院长的安排，我第一次见到蒋中正总统。由王院长带队，出席的经济学者包括刘大中、蒋硕杰、邢慕寰等，加上国内其他方面的人，包括蒋经国先生，合计约有二十人。蒋总统让我们等了一下，他才出来会客。我们采马蹄型的坐法，一面吃点心，一面谈话。王院长帮我们一一介绍，他说我是会见中最年轻的海外学者，我那年三十五岁。在那之前的两个星期内，大中已经安排我见过不少部长和院士。每次开会，大中都要找经济部长、交通部长等人来参加，并替我介绍严家淦、俞国华、李国鼎等人，这些人和我们交换意见。另外，大中想推荐我当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和院士们素不相识，于是他带我去拜访多位院士，如李济之、劳干等人。李济之名气大，我第一次和他见面，两个人相谈甚欢。各种场合的谈话，我都要动脑筋如何发言。当蒋总统会见之时，我想今天应该不需要我说话，所以很放心。王院长的声音很低，我听不太懂，又见大中在座，有事也轮不到我发言，所以也不注意听，径自吃点心。突然听见邻座的邢先生告诉我说轮到我了，当时我正专心吃点心，毫无心理准备，只好站起来，幸亏走到麦克风之前，还有几秒钟的时间准备。我说第一次见到总统，

觉得很兴奋。他是伟大的民族英雄，我在中学的时候，他正领导对日抗战，1945年抗战胜利，我很崇拜他。还说我1948年出国，1966年这是我第一次回国等其他事情，说完就回座去了。回座之后，我才发现自己剧烈的心跳还一直持续了好几分钟，实在是太紧张了。平日我演讲之时，只要有15分钟的准备功夫，表现就会大不相同。这次是因为心不在焉，毫无准备的结果，我学到教训下次应该专心一些。

王世杰院长很有办事方法。1966年我在IBM做事，同时也去哈佛大学担任客座教授。John Meyer是哈佛大学的博士，他和我同是1955年毕业的。本校毕业后能立即在哈佛任教而升为正教授是不简单的事，按照哈佛大学惯例，学生毕业拿到学位之后，通常要去外面其他学校转一下，历练一番，才有机会回来任教。1966年他休假，请我去客座访问，并代他教课。1966年冬天，王雪艇带一批人去哈佛大学，进行中央研究院与美国的合作计划。当时中央研究院既没人又没钱，如何去和美方合作？王雪艇很聪明，他拿我们这些在美学人当资本，刚巧我在哈佛大学做客座教授，就把我算入中央研究院的代表。哈佛大学经济系很有趣，系里派别林立有如军阀割据，年轻的副教授完全不受尊重，和研究生一样。系上举办宴会，全是教授来参加，从不邀请副教授，仿佛他们不算系上一份子。Simon Kuznets是哈佛的教授，并代表国家科学院。王雪艇派大中和我代表中央研究院，我们三人和Kuznets谈双方合作之事。

我们合作计划的第一个项目，是1967年在台湾开国际学术会议，主题是经济发展。大中因此首开台湾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的先例。1967年的经济发展会议开了好几天，相当成功，台湾的经济学家给外国人很好的印象。会中每人各自发表论文，这是我第一次听李国鼎公开演讲，外人不知台湾有李国鼎这样的人才（他曾留学英国，原来学物理），他的观点与美国人有些不同。会议结束之后大家去旅游，由Kuznets领队，每到一处要听对方做简报，按规矩必须穿着正式。台湾天气很热，Kuznets不太习惯，他说他是牺牲自己，为我们打领带，我们跟在后面的人可以穿得随便一些。1966年我第一次来台湾时，类似的官场规矩一点也不懂。当时李国鼎担任经济部长，请我们去开会。我一去就坐下来，别人告诉我这是刘（大中）先生的位子。我不懂得有上位、下位之分，所以随便坐。再如1968年或1969年张兹闾和主计处张导民处长去美国访问。当时我在IBM做事，负责招待他们，做简报。我们几个人随便坐，张处长坚持一定要张兹闾坐大位。张兹闾说：「在美国没有这种习惯，大家可以随意坐。」而台湾在同样的场合仍保有一些中国人的官场习惯或作风。

Kuznets很热心，对台湾贡献不少。他是中央研究院仅有的两位外籍院士之一，另外一位是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Kuznets善于分析资料，研究各国的经济发展，台湾是其中之一。Milton Friedman在1931年或1932年在芝加哥大学做研究生，没有拿到学位，直到1945年或1946年才得到博士学位。他的成名作*Income from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 Practices*，就是和Kuznets合写的。Friedman擅长将经济理论与实务数字资料结合，他的学生如Becker、Robert E. Lucas, Jr.也都有这种本事，所以使芝加哥学派极负盛名。Kuznets在台湾最想见的人是叶公超先生，我们一同去见叶表叔。他谈笑风生，说到抗日时的经验与蒋介石的政策，谈到Chiang Kai-Shek and his boys，其实他自己也在内。

1967年台湾经济发展会议结束，我要离开台湾前一天，突然接到蒋总统的请帖，宴请刘大中、蒋硕杰、顾应昌、费景汉以及我。我因为要回香港和父亲团聚，所以没去赴宴。我那时候太年轻，居然总统请客也不赏光，实在不懂得处理事情。因为前一年（1966年）也是类似的情形，原来预定暑期班结束之后回香港探望父亲，临走之时突然去赴个重要人物的宴会，所以迟了两天才回香港。害父亲多盼了两天，他很不高兴。第二年我怕旧事重演，所以没去赴宴，直接回香港。回想起来，自己当年不会办事，如果换作今日，我会先打电话给父亲，告知临时总统宴客，可能耽搁一两天才回去。父亲一定能谅解，我也就可以去赴宴。随后蒋总统在梨山会见经济学者，采纳不少建言。后来我也忝为经济顾问之一，参与其事。

刘大中除了推动暑期讲学班、国际学术会议，另外还推动由中研院与台大合作在台大经济系设置经济学博士班。此后续一计划是由1967年台湾经济发展会议建议的。当时有人（例如Walter Galenson）主张这个博士班应设在中研院经济所，虽然与这个提案有直接关系的中研院王世杰院长、教育部钟皎光部长以及台大钱思亮校长都在座，他们却不便发言。在这个尴尬的情况下，邢慕寰先生便站起来向大家解释：「按照中研院组织法，中研院任何研究单位似无职权设置教学部门，所以把经济学博士班设在中研院经济所，将会有许多问题不易解决；而在实际上，中研院经济所目前也没有单独设置博士班的条件。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在美国社会及人文科学院的支持下，由中研院与台大合作在台大经济系设置经济学博士班。」与会人员对邢先生的解释和建议稍加讨论后，即正式决定接受邢先生的建议。在这次会议后，中美双方代表曾数次就经济学博士班具体进行步骤交换意见，后来成立了「中央研究院、国立台湾大学合作设置经济学博士班委员会」，由刘大中先生担任主任委员。从此台湾的经济学博士班就起步了。由于师资不足，必须从国外找人回来教

书。第一年请了Richard Rosett教授，他原来在罗彻斯特大学教计量经济学，担任经济系主任，后来到芝加哥大学当商学院院长。

1970年我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在1966年首次被提名，那一年邢慕寰先生当选；1968年顾应昌先生当选；1970年才轮到我。每一届只有一位经济学家当选。1970年代我来台湾很多次，有时为了暑期讲学，有时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有时为开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我也为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和中华经济研究院合办的中华演讲系列，邀请了几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包括Arthur Lewis与William Baumol在内。我的感想是当时政府对经济学者很重视。

（二）担任政府经济顾问

1960年代后期台湾负责拟订政府经济政策的是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简称经合会），严家淦是行政院长兼主任委员，李国鼎是经济部长兼副主任委员。经合会编列有经费，可以聘请外国顾问。1964年经合会副主任委员李国鼎邀请了刘大中、蒋硕杰担任经济顾问，1965年也邀请我，但那一次我错过了；接着1967年在梨山开会，与蒋中正总统会面，我也错过了，因为我急着去香港看父亲。后来1985年我回中国大陆担任经济顾问，也邀请其他的院士帮忙，1986年一月我先请费景汉去访问；同年七月邀请顾应昌、费景汉、刘遵义三位院士；1987年邀请顾应昌；1989年三月又邀请蒋硕杰、顾应昌、费景汉、刘遵义、于宗先去香港开会。

1964年李国鼎想聘刘大中为顾问，大中无法来，他推荐我来当李国鼎的顾问。我们开始谈的时候，经合会比照我在美国的薪水，一年两万多美元，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本来说好1965年来台，因为美援在该年终止，需要对台湾经济做好准备。尽管待遇不算低，但是当时我还年轻，觉得自己发表的论文不够多，来台湾当顾问对于学术研究是一种牺牲，所以决定不来，宁可留在美国多写一些论文。至于1966年的暑期讲学班则可以考虑，反正只牺牲几个星期，于是答应和大中一起回来。回

来之后，大中拉着我到处拜会，政府官员如严家淦、李国鼎、张兹闯、徐柏园等人都必须亲自登门拜访。如果对方不在，只要留下名片即可，顺利多了。我要印些名片，大中建议我不用写其他的，只要「邹至庄」三字便可，此一建议我到今天还用。

对于台湾经济发展，我的基本看法是台湾经验成功的理由大部分要归之于接受市场经济。政府接受并支持市场经济，给人民有赚钱的机会，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制度。我相信蒋硕杰和邢慕寰可能也会同意这样的看法。美国有些经济学家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认为 1950 年代许多国家都追求经济发展，失败者居多，所以政府如何引导经济发展成功，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其实政府不用多加干预，只要把制度建立好，让市场和人民自己去运作，制度要公平一些，给人民赚钱的机会。经济学家对台湾的贡献在于说服政府采取市场经济的制度。1960 年代到 1970 年代台湾政府的功劳，在于他们比较开明，能接受经济学家的思想，其他国家则不然。至于其他的十大建设等，花了很多钱，反而有不少副作用，未必有成效。经济顾问团由刘大中担任团长，蒋硕杰次之，和其他的成员一起替政府做事，让政府官员了解现代经济学。

台湾政府对于经济学家的意见重视程度相当高，比美国高得多。1930 年代美国经济不景气，战争才把就业率提高，所以战后有 1946 年的就业法案（Employment Act of 1946），解决社会就业问题。二次大战期间，战争提高了总需求，但是战后又怕再度陷入不景气，于是政府成立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设有顾问三人，建议政府刺激总需求。我最早认识的一个美国总统经济顾问是 Arthur Burns，他曾担任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总统的经济顾问。1951 年他到芝加哥大学来演讲，讲述自己担任总统经济顾问的经验。甘乃迪（John F. Kennedy）总统时代宏观经济的稳定政策最吃香。雷根（Ronald Reagan）是最不重视经济学家的总统。他是个右派，是非对错全靠自己主观决定，很武断。他虽然没有学问，可是有些自己的观点，不需要经济学家提供意见。但是既然设有经济顾问，他请了 Martin Feldstein 担任，但事实上大概是既不接见也不听从顾问的意见。Feldstein 是个很自负的人，因为不受重用很不高兴，利用自己的职位在外面乱发言。雷根总统对他很不满意，他只好回去教书。一般而言，美国总统不如台湾政府重视经济学家。

1970 年代台湾政府五人财经小组和我们经济顾问合作的经验，通常是我们到达台湾后的第一周，每天上午财经小组和我们讨论，指出当时台湾面临的经济问题，并讨论解决之道。下午我们自己继续讨论，一部

分是大家共同讨论，一部分是各自分工研究。有些经济问题需要资料分析，经济顾问们会费时两三个星期进行个别研究与共同讨论，之后提出研究报告，由大家分头撰写，再一起具名。如 1974 年的建议，我负责撰写最适控制（optimal control）的部分。研究报告交给五人财经小组之后，再与他们讨论，有必要则进行修改。最后研究报告摘要会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稿也事先让五人小组过目，有些不宜刊登的部分，则删去不登。但这只是手续而已，没有新闻检查的意义。因为如果他们有意愿，我们依照当时台湾国情，觉得研究报告之中有不宜刊登的部分，则进行修改，然后大家具名，由他们交给报社发表。

我们经济顾问六个人之间意见也不尽相同。刘大中先生担任领队时，他做得很好。他有自己的意见，但也听大家的意见，不坚持己见。有时候他也有很强烈的意见，但别人有道理就可以说服他。他是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专断的人。他很尊重蒋硕杰先生的意见，尤其是有关货币政策的建议，因为他不擅长货币问题。刘大中和蒋硕杰两位先生都曾在国际货币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任职。邢慕寰先生非常老道，他待在台湾的时间最长，住在台湾，熟悉台湾的情形，经验很丰富。我对邢先生的学问非常佩服。他有一年去芝加哥大学访问研究，其余大部分靠自学，非常不容易。他不但写经济理论的文章，也研究实际的经济问题，念书非常仔细，看问题有独到之处。费景汉先生的意见常常和邢慕寰不同，但可以互相沟通，其他人则加以调和。顾应昌先生对农业、国际贸易等问题尤有见地。我们大家参与讨论，最后终能沟通，达成共识，六个人常常如此。讨论由刘大中主持，其余五个人发言时间平等，人人都有机会提供意见。1975 年八月十四日刘大中先生去世之后，1976 年起由蒋硕杰先生主持。我在为台湾做经济顾问的工作中学习到不少东西，这段经验对我的经济学很有帮助。

我在台湾担任经济顾问的期间，不觉得台湾有经济发展路线之争。政府各部门之间或有不同的意见，多基于单位不同，立场随之而异的缘故。例如李国鼎担任经济部长的时候，要推动经济建设，需要大量的经费，后来他担任财政部长，唯恐财政收支不平衡，于是拚命撙节支出，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过去我们来台湾担任经济顾问，多是由俞国华先生写信邀请。1980 年代以后没有人邀请我们，也就不再来台当顾问，我想大概台湾已经不再需要我们当经济顾问了。

至于经济主管官员本身懂经济学，反而常有不听他人意见的情形，前述提到的 Arthur Burns 就是其中之一。Burns 后来出任（私立的）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BER）的局长，1968

年他研究景气循环，所用的研究方法较老旧。他来找我和Geoffrey Moore三个人一起合作建构模型。Moore也任职于国家经济研究局，是Burns的副手，我在1972年出版了与他合写的一篇关于经济循环的论文。当尼克森（Richard Nixon）竞选总统之时，Burns参与助选，后来担任总统的经济顾问，并出任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1970 – 1978）。Burns自己是经济学家，所以不听别人的意见。联邦准备理事会设有研究处，在Burns的时期不太受重用。

1970年代我用控制理论来处理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将经济理论做成模型，再分析政策，我不是第一个如此做的人，如Jan Tinbergen（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Henri Theil等人早已写了关于经济政策的书。但把最适控制理论应用在宏观模型上，我是第一人，这篇文章在1970年的*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上刊登。Burns去职之后，John Meyer继任国家经济研究局局长，他很支持我的研究工作，拨给经费开了好几次会议，讨论用最适控制来做经济政策分析。从1972年到1976年之间，在*Annal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Measurement*期刊上，每年都有我和与会者的文章刊登，其中一部分就是开会时发表的论文。在1970年代的美国，很多人用控制理论来做经济政策分析，连联邦准备理事会的研究人员也用。他们向Burns说最适控制如何如何，他听得都烦了。我和Burns的交情不错，后来我们见面的时候，他说谈别的东西他有兴趣，就是不要提最适控制。可见自己懂得经济学的人，别人若要用经济学的方法提供意见，他可能反而不愿接受。

1978年我和蒋硕杰、邢慕寰、顾应昌、费景汉五个人合写的〈经济计划与资源的有效利用〉一文，就是经济顾问交给经建会的报告。我研究经济问题，以兴趣为主，机会为辅。如果没有兴趣，研究一定做不好。如果光有兴趣，没有机会，则或缺经费，或缺人手，也很难把研究做好。例如同一项研究计划，若是别人主动请我做研究，则经费、人手、资料都很方便。如果是我自己主动要来研究，必须认识对方的单位或人员，要自己联络等等，既费时又麻烦。所以研究兴趣与外在环境机会能互相配合，效率就能提高。

1996年四月康乃尔大学举办「台湾经济发展经验研讨会」，并纪念刘大中、蒋硕杰两位先生。大会要求我谈一些当年与刘大中、蒋硕杰两位先生合作的经过，于是我发表一篇文章“Economic advising in Taiwan.”，说了两三件轶事。

1958年刘大中去康乃尔大学任教，1959年我也去了那儿，我听说他曾支持请我去康乃尔任教一事。当时在学校只有我们两个人专门研究计量经济学，所以双方很熟，常常来往。三年后我离开康乃尔，去IBM公司任职。他推荐我来台湾当李国鼎的顾问，皆缘于此。大中的优点很多，我向他学到不少东西。他的缺点是做事很强硬，有时会得罪人。所以他的好朋友很多，但不喜欢他的也大有人在。孙运璿当经济部长时，有一次请我们去开会。大中说太忙了，没有时间，不去开会。我坚持说人家需要我们帮忙，应该要去，终于说服他去开会。我会劝刘大中不要得罪人，我的太太Paula（陈国瑞）倒也常劝我不要说话太直得罪人。

蒋中正总统年纪越来越大，后来我们经济顾问都见不到他。由蒋经国先生担任行政院长，费骅担任行政院秘书长，是他的左右手。有一次蒋经国宴请我们，说蒋总统要他问候大家。刘大中要给蒋经国先生一些建议，用餐完毕之后即席在挂起的图版上，画出需求、供给曲线，讲了25分钟的经济学原理。我看见蒋经国先生不太高兴，会对大中印象不好。大概大中曾经给蒋中正总统上过类似的课，而且奏效，所以对蒋经国也如法炮制。殊不知蒋中正总统年轻之时，曾在上海接触过金融业，所以懂得其中的道理。而蒋经国是留俄的，他对这一套完全不懂，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另外有一回也是蒋经国先生宴请我们。当年因为实行以保证价格收购稻米，订价高于世界市场价格，农民拼命种稻。当天报纸已经登载说明此一保证稻米收购价格，是蒋经国决定的政策。但是从经济学的眼光来看，补贴政策是不好的方法，我们反对这种做法。宴会时蒋硕杰先生坚持不能做，蒋经国没有接受我们的意见。果然第二年稻米大丰收，供过于求，政府的米又卖不出去，收购的稻米无处堆放，只好堆满篮球场上。后来采用限量收购的办法才解决此一问题。

1970年代经济学者都认为政府给裕隆汽车过度保护是不对的。当台湾刚开始创办汽车工业时，有保护幼稚工业的主张，我建议应该要有保护期间的限制。保护措施一般有三种：（1）关税：设定时间表，汽车进口税逐年降低。例如汽车进口税率第一年为150%，第二年降为100%，第四年以后降为50%，第六年以后免税进口。（2）营业税：对汽车工业减税，以鼓励生产。（3）津贴：由政府提供资金补助汽车工业，逐年降低补助额，以利于和外国竞争。我觉得虽然补贴因为经费问题较为困难，但人民因此有便宜的汽车可用而受益。几位经济院士都同意不要长期保护的建 议，但政府基于政治考量未采行。裕隆汽车工业的发展不包括在政府向经济顾问提出的议案，而是属于关税项目之下。新加坡的

汽车关税也很高，采行以价制量的政策，一部在美国值两万美元的汽车，在新加坡的售价是五倍，约值十万美元。不过新加坡与台湾的考量不同，它自己没有汽车工业，不生产汽车，所以用意不是特别保护某一企业，它是为了避免汽车过多，阻碍交通。我参与大陆经济改革之时，有些政策从经济角度考量是好的，但是把政治压力考虑在内就不成了，例如必须考量干部的思想倾向，他们对某种政策能否接受，所以经济政策必须具有政治可行性才行。

（三）台湾与中国的关系

对我个人而言，在台湾担任顾问工作的经验，使我对经济学和实际应用有更深一层的了解。我与大中、硕杰、邢慕寰、顾应昌、费景汉诸位先生，彼此交换意见，互相学习。即使大家原先的意见并不一致，但都一心为公，彼此之间的讨论很开明，没有偏见，逐渐沟通。有如一个团队（team）的合作，不逞个人意气自我辩护。我们好像是一个代表国家的篮球队，不看个人得分，而是看整个球队的总得分数。

1980年代我去大陆担任经济顾问的工作，很多时候都是我一个人单打独斗。我很愿意找海外经济学者参加，也和当地学者、官员交换意见。我对现实的经济问题很能把握，反应相当快，这要部分归功于当年在台湾的经验，这些经验对我很有帮助。

我也邀请海外经济学者担任中国的经济顾问。1986年一月我和费景汉先在香港和体改委会谈，同年六月我和顾应昌、费景汉、刘遵义四个人在北京和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体改委）讨论，每天从早到晚，大约进行四、五天。会谈进行的方式是他们提出许多问题，我们四个人和他们一起讨论，和台湾的情形差不多。但是在中国我们没有时间自己做研究，就和他们直接讨论，虽然在会谈之前，他们事先会准备资料和问题。我们之中亦有人建议，四个人一起先在美国开会讨论，但实在凑不出时间。

比较在台湾和大陆担任经济顾问的情形，两岸的政府官员和顾问们互相交换意见都很开通，双方没有什么差别。当然与会的中国政府官员都是共产党员，我个人对于共产党员没有什么偏见。记得胡应湘曾经说过：「我去了大陆好多次，从没见过一个共产党员。」意思是说中国政府官员与刻板印象中的共产党员扯不上关系。有些中国共产党员曾做过很坏的事，现在改变作风，我能接受。

我在 1994 年的书中提到，台湾经济发展成功的经验，对大陆经济改革影响很大。大陆的经济改革部分学台湾，如果没有台湾的经济发展成功，大陆不会如此热心积极推动改革。邓小平有「实事求是」的最高指导原则，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心想既然人家台湾做到了经济发展成功，我们大陆当然也能做到。比较台湾和大陆的经济的发展，有下列四个共同之处：（1）经济改革都是从农业部门出发。（2）对外开放鼓励出口。大陆比台湾开放得更快，幅度更大。例如台湾对于裕隆汽车工业的保护长达几十年，不准日本汽车进口。大陆开放日本汽车进口的速度很快，1984 年我在大陆旅游，已随处可见日本丰田汽车。（3）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和计划管理逐渐减少。例如台湾的尹仲容一开始也是什么事都管，后来慢慢改变。（4）重视控制通货膨胀。虽然双方都有通货膨胀，但情形不严重，主要原因是受到 1940 年代大陆恶性通货膨胀经验的影响。1995 年前后大陆物价控制得很好，部分是沿袭台湾的同一政策。通货膨胀也已逐年降低，从 1994 年的 21.7% 降到 1995 年的 8.3%。人民币的外汇汇率也相当稳定，1990 年代一元美金兑换八·三元人民币，持续几年没有变动。

1990 年代后期台湾与中国关系紧张，大家最瞩目的焦点是辜汪会谈。两位主角辜振甫和汪道涵都是适当的人选。1966 年我来台湾讲学，首次遇见辜振甫。他担任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理事长，邀请我去演讲。我的讲题是作业研究（operations research），亦即用数量方法进行工业及其他的管理，例如如何控制与调节经过隧道的汽车交通等问题。辜振甫好几次邀请刘大中去他家里唱戏，我也参加。他是有影响力的企业家，能代表台湾企业界与中国商议合作的条件。我对汪道涵的印象很好。1984 年他担任上海市长，我在北京举办微观经济学研讨会后去上海，由他负责招待。我们从下午三点开始谈话，直到晚上共进晚餐，同时在座的还有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我的太太 Paula 等人。我们讨论的范围很广，包括一般性的问题和经济发展等。汪道涵很健谈，脑筋也很清楚。

后来我再去上海好几次，也见到他。其中有一次在 1988 年秋天，因为教委（国家教育委员会）要编新的经济学教科书，找外籍教授来讨

论，我去参加，总共在上海进行了三、四天。会中讨论如何编写经济发展用的教科书，要讨论大纲、内容等。我认为他们应该多利用台湾的教材，这些书台湾都有，而且专有名词也已译出。我猜想他们可能参考过。另外有一次在 1993 年夏天，我率领普林斯顿校友到中国访问考察。经过上海时，汪道涵请我吃便饭。席间他问我是否有 Joseph E. Stiglitz 的教科书，他想找来看一看。我到香港之后便替他购买。1990 年代汪道涵也担任岭南（大学）学院董事会的名誉董事，开会时常常见到他，1996 年一月开会他也出席了。我们见面时没有谈和台湾合作之事。汪道涵有办事经验，在国内也有地位，很适合代表国内与台湾共商经济合作。

2002 年我想促成汪道涵去台湾，可惜没有成功。1998 年十月最后一次的辜（辜振甫）汪（汪道涵）会谈，先在上海举行，会后辜振甫率团赴北京会晤江泽民等人。本来隔年应该是汪道涵来台湾访问，但后来因为李登辉说台湾与大陆是国与国的特殊关系（state to state），大陆不能接受，所以这个会谈就办不成了。

2002 年中央研究院举行院士会议的时候，有一位台湾知名的企业家宴请我们，他希望我们帮忙促进台湾和大陆之间的交流。院士会议结束之后，过了两三天我们就离开台北。我在机场看到新闻报导，前民进党主席许信良率领一个两岸三通访问团去上海访问，汪道涵示意希望有机会要继续改善和台湾的关系，说了几句比较正面的话。我回到普林斯顿，马上打了一通电话，问这位先生是否知道这件事？我有一个想法，就是由他出面，邀请汪道涵来台湾，名义是来台湾参加一个经济发展讨论会，我可以主持这件事情。这位先生的头脑转得非常快，（他不愧是台湾的人才。）几秒钟以后，这件事情他已经考虑清楚，立刻同意，不过如何筹备经济讨论会他没有经验。我说这是很简单的事情，我会去办。于是我请他写封信，用他的名义邀请，由我转交给汪道涵。他做事很有效率，第二天信就来了，用传真寄给我。我收到信以后，就把那封信转给汪道涵的私人秘书，可是汪道涵没有回信。大概过了十多天，我再给先生送了一个传真，说我已经把信转寄给汪道涵，但是没有收到回信，要不要再催一下，探询看看。先生说不必问了。这件事情就到此告一段落。

院士会议是七月的事情，到了十二月，我去广州参加岭南学院的董事会。汪道涵也是岭南学院董事会的名誉主席，这两年因为他身体不太好，没有来参加，过去四、五年他常来出席，但那一年却没有来。当天晚上我就把这件事告诉朋友，朋友说他去帮我打听为什么没有回音。第二天上午开董事会，中午结束之后，朋友的司机送来一封信署名转交给

我。信上说我建议要促进两岸关系，用意很好，但是在台湾没有接受一个中国的前提之下，这件事行不通。后来我把这封信传真给这位先生，对我来说也算是有个交代，他已尽了心，我也尽了力。2005年十二月汪道涵就过世了（辜振甫已先于同年一月去世），辜汪会谈终究没有再办成，非常可惜。

至于汪道涵或中国当局会不会出于政治敏感的考虑而对这件事有所保留？顾虑本来是辜汪会谈，现在怎么变成汪道涵和别人会谈呢？老实说，我连这点都没有想过。而且以先生在台湾的地位，他并不需要以汪某会谈取代汪辜会谈这样的名声。我并不知道他的想法，只是单纯因为辜汪会谈办不成，于是我想促成汪道涵的台湾之行，邀请他来参加经济发展研讨会，这是辜汪会谈以外的非官方会谈，辜汪会谈则是官方的会谈。即使非官方的研讨会能请汪道涵来台，也是好的。

我觉得自己好像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中国，在香港、中国都有很多朋友，也关切中国和台湾两地的发展。包括来台北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同时也和有些台湾朋友一样关切台湾未来的问题。

四、推广中国经济学教育

（一）一九八〇年重返中国

1978年十月中国经济开始改革开放，1980年夏天我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许涤新之邀赴北京讲学。这次讲学是由宾州大学的Lawrence Klein筹办，成员包括刘遵义、Theodore Wilbur Anderson、Albert Ando（宾州大学）、萧政、粟庆雄等几位计量经济学家。我是其中之一，也是离国三十二年之后首次返回中国大陆。在北京每人各授课一至二周，前后持续数周之久。授课内容辑成《计量经济学讲义》出版。我的主要教学内容一部分是普通计量经济学，其他则是控制理论、汽车需求函数，后两项是我的专长课题。Anderson则教数理统计。我用中文上课，若是外国人则用英文，另有翻译。

1980年夏天我总共在大陆停留三个星期，其中两个星期在北京，最后一个星期到上海、西安、昆明等地旅游。我在上海听了京戏，印象非常深刻。从中国大陆出来之后，我到台湾去，刚巧当时的行政院长孙运璿夫妇也邀请我和Paula去听京戏，我向他称赞上海的京戏很好。

在北京的讲学是由中国社科院主办，在颐和园上课。学员约有一百人，来自全国各地，平均年龄颇高，多在四十至五十岁左右，甚至有高达六十多岁者，三十多岁就算很年轻的了。这是因为在文革时期（1965-1975）大陆都没有培训青年学者。可能因为是多年来首次的中外经济学交流，他们都热切希望听到外面的东西，所以争相参加。当时到中国旅游的外国学者时间都被排满，多次讲学，是很普遍的现象。

1980年我第一次回国时见到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他当时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我和他谈中国经济，提出市场经济的看法，主张企业应该拥有自主权，用计划方式管理企业是行不通的。他相当开明，表示大致同意我的说法。九月初我返抵美国之后，在纽约时报第一版读到姚依林八月三十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曾宣布扩大

企业自主权，和市场竞争，把经济搞活。其实早在一个月之前我和他会面之时，他已有了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的想法。

马洪当时是社科院副院长，后升任院长，再任职国务院，住在中南海，担任顾问之职。他与前后几位总理如赵紫阳、李鹏等人关系不错。马洪曾主持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简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林毅夫于 1986 年学成返回大陆之后，曾在此研究中心任职。此外，我还见了于光远与后来升任社科院副院长的刘国光。

1980 年刚改革开放不久，我初次回去，对他们进行的改革所知不多，只知道有农村改革。国家物资供应局请我去演讲，他们请教我如何运用作业研究，使分配灵活些。我告诉他们必须要用市场供求方能解决，用数学方程式来解决是做不好的。

去国多年之后重返大陆，我感觉国内仍然相当紧张。环境不太好，我住在友谊宾馆，既脏也不舒服。浴室的地板总是不干净，有些外宾只好买沙粉自己动手刷洗。有亲戚到北京来看我，不敢在房间内说话，出到花园才敢说。友谊宾馆是招待外宾之处，我有一次穿着和当地居民差不多，就被误认为北京当地人而不让我进入。当时北京的饭店均如此，为阻挡当地人出入，门禁森严。

当时大陆物质环境差，北京天气又热，匆匆忙忙开课，没有更好的地方上课，只好在颐和园。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被安排住在颐和园，上课时没有冷气，房间又挤。他们通常安排我上完课之后，乘汽车回友谊宾馆用午餐。我要求下课之后与学员共进午餐，主办单位不同意。可能考虑我吃不惯他们的伙食，需要准备。只有一次我终于得以和学员一同用午餐，食物与同桌的学员都经过特别安排。餐后我正想和他们互相交换意见，那知大家午餐后要睡中觉，无法聊天，共餐的主意以后只得作罢。

1980 年的中国还不是商业社会，旅游并不方便，我到各地旅游都透过社科院安排，他们在各地有分院负责招待事宜。我在他们建议的五、六个地点中选了几处，广州是一定要去的，因为我从小在那儿长大。我们夫妇与 Anderson 夫妇结伴同游上海、西安，受到极好的招待，住宿与听戏的座位都是最好的，坐在头排居中的位置。离开西安以后，Anderson 夫妇不再同行，招待就差了一些，住宿与戏票虽然还是不错，但已不是最好的，不再坐在头排了。

我的母校岭南大学在 1952 年撤废私立大学之时已被并入中山大学，但有些旧日的老师和同学仍在。有些老同学已成为教授。广州社科院的副院长金应熙先生是我的老师，他负责招待。他从事历史研究，当年我还是学生时，他已是左倾学者，在文革之时受了不少苦，当时知识份子均如此。我和他在旅馆谈至深夜，我说大陆实行的社会主义不是好东西，但他认为不是社会主义不好，而是人谋不臧，实行的方法不好，他仍然坚持社会主义的理想。后来这些年我的想法也有一些改变，现在觉得市场社会主义也有相当的道理，是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

首次回国虽然是贵宾身分，处处有招待，心理上仍然很紧张。离开大陆时，从广州搭船到香港大约要三个多小时，走水路比较舒服。因为我的太太Paula同行，亲友致赠礼物不少，行李过重，需要多付外汇券五元。我身上没有五元外汇券，倾其所有，将二元人民币和三元外汇券杂凑出五元，但是检查行李的干部不肯接受，他只收五元人民币或五元外汇券，我必须到一条街以外的银行去兑换。我深怕付不出钱，赶不上搭船，幸好替我送行的亲友尚未走远，我才用三元外汇券和他兑换三元人民币（外汇券可以购买进口商品，比人民币值钱），解决了难题。直到船出海之后，我紧张的心情才真正放松下来。Milton Friedman在我之后七、八年去中国访问，也有同样的感受，他说离开中国大陆之后才觉得自由了。我觉得收费员很官僚，但事后想一想，他的做法也不无道理。因为外汇券与人民币价值有差异，他怕别人误以为经手之时，他私下兑换图利，所以收款之时必须要求同一币别。

在大陆旅行时，另外一个深刻的感受是飞机不守时。例如我从西安飞到重庆，要转机去昆明，在机场候机。班机临时取消或更动时间也不通告，我们不知飞机何时起飞，只能苦苦等候。一下子宣布要起飞了，我们全都跑过来，等一下又不飞了，再回去等候，数次跑来跑去。这种不能控制的环境，令人感觉紧张。1980 年以后许多初次回国的人，见到国家情况如此糟糕，许多亲人受苦，深受冲击，心里错综复杂的感觉持续好几个月。其实 1980 年已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好几年，比起 1976 年毛泽东刚死之时最坏的情形，已经好多了。

我在 1948 年离开中国大陆，我们这一辈在 1950 年之前出国的人，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时，印象极为深刻。1980 年我首次回国，我的太太Paula是上海长大的，回上海去看她的老家。那是一栋大房子，现在是别人住在里面，以前一家人住的房子现在则有五、六户人家，每一家住两间房，又脏又旧，感觉很不好。回去她昔日念书的学校一看，已经变成上海社科院的一部分。上海原本非常繁荣兴盛，现在举目所见一片残

破，连粮食也不足，令人很伤心。中国搞了几十年，只落得比从前更坏。一位朋友说不知何时上海才能恢复昔日的繁荣。亲友设宴款待，即使在招待贵宾的饭店，水准还是很差。在北京，饭店供应的苹果已经烂了一半，根本不能吃。北京著名的饭馆，很多都已不会做菜，少数还维持的，水准也很差。我们到颐和园去吃名筵，从前厨艺可能很好，现在变得很差，名不符实。当时中国在许多方面都退步了，水平很低。只有两个方面有进步：一是医药方面，穷人也能就医，死亡率大为下降；二是教育普及。因为有统计数字可稽，所以可以采信。虽然当时中国情况很糟糕，可是充满了希望。特别是几位后来与我合作共事的人，如王复孙、王泽农，乃至赵紫阳，大家都有心希望改进，值得我帮助。而且从经济效益的观点来看，我觉得自己在大陆所做的工作很有效益，影响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发展，可以帮助中国发展，所以很愿意回去做事。

（二）一九八二年中国之行

由于 1980 年回去中国的机缘，认识一些朋友，他们纷纷邀请我去演讲，想学更多东西。1982 年我应邀到广州、武汉、北京等地六所大学演讲。这次是由个别单位邀请去讲学，与上次社科院统筹办理的情形不同，我这才发现两地之间的交通行程安排困难，极不方便。第一站我首先到中山大学，系主任请我去演讲，我要求先看场地。管理演讲厅的工友态度很不客气，大刺刺的向系主任要求看申请文件证明，问何时登记的，系主任答说一个星期之前，恳求了好半天，最后终于开门让我们看了一下场地。对我这个外来的人而言，这是很新奇的经验。中国这种财产管理权影响经济行为的现象，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分析。在中国财产属于国有，但需要人来管理，例如直接管理房屋的人因为拥有钥匙，所以权力最大，可以利用职权要求使用者给予好处。再如 1984 年我在北京主持暑期讲学班，教委拨派一部汽车供我们使用，司机的服务态度很差，我就骂他，并且向主管单位反应。教委的朋友也只能向我道歉，说他们自己也管不好司机。这种情形可能持续下去。

第二站是武汉。我必须事先通知对方接待单位何时抵达。我有一位老同学是中大学教授，负责招待，当时广州中山大学派了一部面包车给我，两个人进出使用很方便。我想打电报去武汉告知我的行程，他说我不要自己去，但我坚持亲自打电报。原来打电报必须去邮局，进了邮局，我发现里面挤满了人，大家都不排队，要挤进去必须打架。最后还是我的同学有经验，挤进去帮我打了电报，很不容易。我在武汉大学由外事处招待。按照惯例，大学都设有外事处负责招待外宾，外事处手上拥有预算，权力很大，连校长都要向它低头，俨然主人一般。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和外国大学的情形很不一样。武汉大学外事处负责接待的人，后来和我仍有联络，每年圣诞节都会互寄问候卡。从武汉搭船经长江三峡到重庆，是由外事处张罗。然而因为买不到船票，耽误了一天的行程，抵达时间已晚，原来安排在重庆的演讲也因此取消，让一百多人空跑一趟，随后我就飞往北京。

在北京讲学时，负责招待的是社科院院长马洪。赵复三先生是副院长兼管外事处。从 1981 年起，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成立了与中国经济学交流的委员会，我当主席，共十三年。1982 年到 1994 年间的《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五月版刊有每年的年度报告。这项学术交流初期由中国社科院代表中方，是副院长许涤新出面，美方则由我代表。中方代表团有十人，于 1981 年到华盛顿访问，由我代表欢迎。赵复三早年在上海念教会学校，英文极为流利，每次都随许涤新前来。代表团到了普林斯顿，我请大家到家里吃饭，赵复三曾在我家谈天，我当他是朋友。后来有人提醒我，此人行为难测，要我小心提防，这次北京之行便有一次经验。

事情原委要从 1980 年在 Rutgers 召开的亚洲经济会议说起。后来担任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编辑的 Jan Dutta 想邀请亚洲各国派代表参加，请我提供名单。台湾方面，我邀请蒋硕杰、郭婉容；大陆方面则是张培刚、林少宫。张培刚是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农业与工业化》（*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曾参与武汉市市政，他是国内留美学者之中最好的人才。林少宫则是伊利诺大学的博士。台湾和中国双方的人员不在同一场合碰头，中国反对台湾使用「中华民国—*Republic of China*」的称号，蒋硕杰和郭婉容两个人就在会场自己摆出「*Republic of China*」的名牌。其中有一场讨论会，我是主席，郭婉容是第一个报告人，张培刚第二。郭婉容首先报告台湾经济发展成功的经验。张培刚随后报告，他首先发表一段评语，大意是说他很高兴听到台湾经济发展成功，因为台湾是中国的一省。郭婉容后来发言反击，说：「台湾是中国自由和民主的一部分。」张培刚想再还击，刚一开口说：「台湾.....」，

就被我打断。我说：「身为主席，我必须阻止大家。」张培刚话说一半被我打断，此事有人到领事馆打报告回国内。

1982年我到北京，赵复三和社科院的温志泽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来看我，先是讨论中美经济学交流之事，后来温院长离开了。我住二楼，临走时送赵复三下楼出去，那知他突然警告我在Rutgers开会之事被打报告，说国内有人批评我。我很不高兴，回答说：「在美国开学术会议，台湾和中国两方面我都邀请。如果中国不高兴，以后不要参加算了。」我当晚睡觉时，才想起这是回美国之前的最后一天，万一他居心不良向上面打报告，或说我是美国间谍，说不定就走不成了。我自担了一回心，直到上飞机后才完全放松了。赵复三后来趁着去法国的机会，滞留在法不回中国。

我在社科院演讲了两三次，在座有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陈立。后来普林斯顿大学有计划经济学讲座，我便邀请陈立来教数周的课程。以往中国即使在1970年代最糟糕的时候，仍然卖力表演，展示最好的一面给外国来的访问者看，所以美国人的印象一直认为中国很好。我在1980年代初期曾和Alan Blinder辩论，说中国并没有这么好，内部有许多问题存在，他认为我是代表保守派的国民党份子。1980年代美国一般知识份子还是迷信中国是美好的社会主义国家，普林斯顿大学自不例外。1983年陈立来教中国的计划经济，讲大跃进的种种缺点，学生都不相信他的说法。

1982年我第二次赴大陆讲学，前后约二至三个星期。同年十二月我应中华经济研究院蒋硕杰院长之邀来台。适逢蒋先生的夫人赴美，他雇了一个同样姓蒋的佣人，兼开车的司机和烧饭的厨子，照顾我们的生活起居。我在中华经济研究院除了演讲之外别无他事，开始着手写《中国经济》（*Chinese Economy*）一书，以帮助自己了解中国经济的问题。我想写一本给中国学生用的教科书，介绍现代经济学给他们。我希望用这本书来解释中国经济，而不想用Samuelson的经济学教科书，因为他的书中讲的是美国经济。「现代经济学」这个名称是我开创的，在中国本来都说「西方经济学」，我说：「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也是西方人，这个名称不好，应该叫做现代经济学。」写书的进度很快，1983年一月在中华经济研究院写好大纲，1983年九月全书完成，1984年底之前已经出版，但这本书挂名1985年出版。出版业者惯于将年底出版的书挂名次年出版，其中道理和汽车出厂年分相同。我在1996年年底出版的书 *Dynamic Economics: Optimization by the Lagrange Method*，也是挂名1997年出版。

（三）推广现代经济学教育

（1）缘起

我和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结下机缘是很凑巧的事。1983年十月大陆教育部高教司派两位代表王复孙和王泽农到美国来。王复孙是高教司外事处的主任，王泽农则是高教司之下负责法律、经济教育的处长。这两个人非常能干，肯做事。他们原来是到哥伦比亚大学找法学院的 Randy Edwards 教授，目的是为了中国的法律教育，希望在中国设立法律教育讲学班。他们也到普林斯顿大学来，我和他们并不相识。我的朋友 Judy Bullitt 女士协助 Edwards 教授做事，她也住在普林斯顿。她说有一个中国代表团要来访问，请我安排。我是美国经济学会的会员，从 1979 年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以后，双方重新恢复来往，美国经济学界要接待中国来的人的时候，都是由我招待。例如 1980 年代有中国代表团，团长是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许涤新。中国代表团来的时候，我要代表美国去欢迎他们，所以我常去华盛顿。后来我觉得从中国来的人太多，招待不来，很多时候就找机会推辞。我怕见中国代表团，光是接待许多代表团就把时间耗尽了，所以没有什么兴趣。但因为 Judy 是好朋友，我只好答应了。她特别说明这个代表团和其他假借名目来观光旅游的代表团不同，他们很认真做事。我的太太 Paula 是普林斯顿大学国际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主任，她帮忙打电话找威尔逊学院（Woodrow Wilson School）的行政人员安排接待。

1983年十月二十日校方请这个代表团吃饭，我原来并不想去，因为那天晚上正巧没事，加上太太之劝，于是就去赴宴。这一去被王复孙、王泽农两人拉住，要我协助推动经济学教育。后来在家里详谈，我答应主办暑期教学班，教授经济学的三大门基本课程：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预定在 1984 年教微观经济学，1985 年教宏观经济

学，1986 年教计量经济学，分别进行，经费由大陆教育部负担。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名词，即出自 1984 年在北京举办的微观经济学研讨会（在台湾，两者分别译作个体经济学和总体经济学）。

王复孙很能干，做事效率很高，他负责筹措经费。但是 1984 年一月他写信告诉我找不到钱，暑期讲学班只得作罢。有一天，政治学教授 Leon Gordenker 在我家吃饭，我向他提起这件事。他说这件事太重要了，建议我自己想办法筹经费。我听了以后想一想，筹钱其实并不难。我在美国经济学会之下，曾出任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SCPRC）的经济学代表。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设在华盛顿，包办与大陆学术交流之事，此机构到 1990 年代中期尚存，可是已经没落了。它算是一个民间组织，但与政府有关系。许涤新率领访问团来美之时，美国经济学会没有接待经费，都是由它支付费用。它鼓励美国教授到大陆讲学，诸如签证等行政手续必须透过它办理，此外还负责谈判、协调等工作。我和他们很熟，再加上学术交流素无大事，去中国开经济讲学班是一件很重要而且有价值的事，所以我想他们应该会有兴趣支持，于是向他们申请经费。但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回信拒绝。我后来托了委员之一的朋友打听未获批准的原因。在 1994 年的书中我叙及此事，只简单交待说向「美国的基金会」和「可能有兴趣的机构」申请经费未成，前者是指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后者即为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原先我想向福特基金会申请补助，由 Mary Bullock 总管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福特基金会提供很多经费，做为和中国学术交流之用。我知道他们有经费，就向 Mary Bullock 说：「你们有那么多钱，我现在有一个项目，可以补助我们一些吗？」Mary Bullock 主管的钱是福特基金会提供的，福特基金会竟然反对。后来才知道是 Peter Geithner 反对，不让我们进行培训班的事，他想要我们透过他的管道来做事。

虽然这些机构不核准经费，但其实办讲学班不用花多少钱，即使只凭我自己的力量也做得成，他们不资助经费并没有阻止我。早在 1981 年的时候，普林斯顿大学曾和复旦、北大两个学校建立关系，并签有相关的合约文件。最后我去见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 William Bowen。我早上九点半打电话要求和校长见面，十一点十五分见到了 Bowen 校长，大约谈了十五分钟左右。他当天就同意支持我的计划，解决了经费的难题。Bowen 做事非常有效率，后来他任职美隆基金会的主席（President of 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普大支付每人飞机票和两千元美金，连我自己一共八千元美金。不过，我们的培训班开始进行之后，福特基金会就想来参加，后来我还是和福特基金会合作。从 1985 年开始，福特基

基金会每年提供九十余万美元的经费，举办经济培训班（Economic Training Center）等项目，所以在中国一般人直接简称为福特培训班。

在国际学术交流的场合，双方都可能出问题，但中、美两国的情形各不相同。第一、中国国内不能竞争。中国的决定权都在教育部手里，教育部说要给谁就给谁，其他学校没什么话可说，各单位可以向教育部提出要求，但不能用彼此竞争的方式。第二、美国的情形是福特基金会不让我进行。这个问题出在福特基金会，Mary Bullock 主管一般性的经费用途，她可以决定用在任何一个项目上，但福特基金会却说不能在我这个培训班的项目上。原因是有人想争取主导权。在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的报告中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活动。美国和中国的学术交流都经过这个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我是其下代表美国经济学会的一个主席。该委员会设在华盛顿，由 Mary Bullock 主管，她同时也在普大威尔逊学院任职（Director of the Asia Program at 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1988-1995）。

（2）一九八四年

我所写的《中国经济》一书，1984 年初 Haper & Row 出版公司经过几个月的审查之后，已经决定出版。我又正巧在 1983 年十月答应高教司主持 1984 年暑期经济学讲学班。这两件事时机配合得正好，实在是运气。我想用这本书做为教科书，来改进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到中国的大学里教书正好可以派上用场。1984 年六、七月，我在和教育部合作主办的讲学班上第一次使用初印好的散装版当做讲义。当时我想在大陆出版这本书，讲学班的学员中有一些北大、清华的人来听课，他们的学校都自设有出版社，起初也有意出版，但是仔细看过内容之后，可能发现书中有一些想法和他们的官方说法不符合，所以不方便刊行。

1984 年七月五日我第一次见到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主要的谈话内容有两点：一是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二是经济改革。我提到自己写了一本书，用现代经济学解释中国经济。他立刻说一定要翻译成中文，我说已经有中译本，他马上接着说应该要出版。两三天之后，我应邀到南开

大学演讲，校长滕维藻可能得知赵紫阳的指示，就和我洽谈出版事宜，所以这本书最后由南开大学于 1985 年出版，在国内销售。教委选派留学生出国读经济学的考试题目也就从这本书中取材，所以这本书成了留学考试必读的教科书，很多在中国念经济学的人都读过。这本书在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中扮演关键角色，起了很大的作用，是因为时间配合得刚好，赵紫阳的指示和选派留学生出国二事也是适逢其会。

1984 年秋季开始选考留学生，重点大学都分配有名额，各校多寡不等。例如北大和复旦大学各 10 名，浙江大学只有 1 名。各校先自行考试筛选，最后共约 165 人参加，1984 年底录取 81 人。我安排了其中 63 人出国留学。

1984 年六月十一日至七月二十一日暑期讲学班经过考虑之后决定用英语上课，王复孙决定不用翻译。从全国各地找了四、五十人来上课，因为当时既懂英文，又念经济的人不多。后来出任岭南学院院长的舒元教授也是其中之一，他当时已是助教或讲师。这一班学员都很用功，表现良好。师资方面，我邀请 Sherwin Rosen、Edwin Mills、Marc Nerlove 三位教授担任。Rosen 是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著名的劳动经济学家。Mills 擅长都市经济学。教授们得到的待遇是旅费两千美元，讲学报酬每人两千美元，教两个星期课，另外由教委招待每对夫妇生活费和旅游一个星期。由于待遇不高，我只好拜托朋友帮忙。三位教授都是我的好朋友，但各人想法不同。其中有一位教授有点难对付，他原先答应要去，临行前一个星期突然改变主意，大概是想谈条件，不外乎想少教些课或是多拿点钱。我告诉他大家待遇一致，不能破例，即使我自己身为主办人，待遇也相同，没有另收筹备费与行政费用，最后他还是去了。我主持中美经济学术交流多年，常聘请外国学者去中国，也常碰到有人想要讨价还价，对处理这类事情有些经验。

我抵达北京之时，王复孙、王泽农来接机，当晚教育部长何东昌设宴款待，在座有高教司副司长夏自强。有些中国人乃至美国记者，喜将政府官员分成改革派和保守派，他们把何东昌归为保守派，许多留学生也持同样的看法。事实上，他在教育部长任内好几年，我和他合作很顺利，他并不如外界所说的保守。例如我们谈到岭南大学复校之事，我是岭南大学的学生，有很多校友都希望能复校。何东昌说教育部基本上不反对，只要中山大学（岭南大学被并入中山大学）和广东省教育领导赞成，复校案送到北京，他也不会反对（详后〈岭南（大学）学院成立〉）。

1984年的讲学班设在北京，居住的条件仍未改善。外国教授住在北大的勺园，有一房一厅和浴室，热水限时供应（南开大学外事处的招待人员曾自夸服务优于北大，因为他们是二十四小时供应热水），很简陋。外国教授虽然不习惯，教书都很卖力。一星期上课六天，从九点到十点半，每次一个半小时。课后我和同学们谈论课程对中国经济的应用。其他教授各教两个星期，我自己则待六个星期。上课时，我和同事之间常交换意见。下课后，我也和学员聊天。后来有学员告诉我，我去听其他教授的课很不妥，显得自己没有学问，很没面子。我觉得这种观念没有什么道理，听别的教授讲课在国外是很平常的事。后来我在岭南学院邀请外人来演讲，就推动教师去听讲，开风气之先，因为教师进修，学生可以受益。

这次讲学班期间，主办单位派了一部车给我们，司机很不听话。有一位外籍教授的太太，可能因为出国经验不多，对付不了司机。我出面干涉，才知道司机不好管，这是财产公有制之下的恶果。相较之下，1984年的中国比1980年进步很多，但生活水平仍然很低。我在北大勺园住了六个星期，校园里有一个小湖，景致很美（原来是燕京大学的校园，后变为北大校园）。我早上在校园散步，和学生聊一聊。碰到学经济的学生，问他们念些什么书，有些书真是全无用处。

1984年讲学班结束后我去上海，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与汪道涵一同招待我，邀请我去复旦大学公开演讲，讲题是我当年喜欢讲的〈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介绍经济学的观念。我发现复旦大学学生较北大活泼得多。我在北大时，有一位陈岱孙老先生曾与蒋硕杰先生在北大共事，比蒋先生年长。1984年他已八十多岁，仍然每天上班。我演讲时，由他担任主席。参与讨论的人都是年纪大的先生，年轻的教师和学生都不发问。复旦大学就不同了，年轻的研究生、讲师都发问，而且问题很尖锐，也不管年长的前辈先生在座。我觉得这与谢希德校长的作风有关。她鼓励学生要敢说话，形成学术风气。她是麻州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在1950年代初期返回中国。她走路不太方便，是因文革时被害受伤的。1996年为了庆祝普林斯顿大学成立二百五十周年纪念，我在香港筹办「二十一世纪的亚洲研讨会议」，请她演讲，她讲得很精彩。

我到杭州之后，由浙江薛省长招待，和他谈了不少。我也去参观浙江大学。我们游完西湖之后，去黄山玩，再去广州，由广东副省长王屏山代为招待。次日，他又以岭南大学同学会会长的身份再招待我一次。中山大学校长李岳生是一个数学家，后来我们有很多的合作。我在大陆见过好几位大学校长，如北大的丁石孙、南开的滕维藻、中山的李岳

生、人大的黄达、复旦的谢希德等，他们都很能干。大陆共有三十五所重点大学，校长由教育部派任。其他数千所高等学校的校长则不然。中国的教育制度学苏联，如工业、铁路等部都设有大学，培养训练干部。例如交通大学即与铁路有关。美国只有矿业局（Bureau of Mines）在科罗拉多设有学校。此外，大陆各省也都自设有大学。重点大学校长的产生，先由教育部组成委员会到各校访问，经多数教授投票选出，再由教育部派任，相当民主。普林斯顿大学就不同了，虽然也有一个校长遴选委员会，教授可以提供意见，但没有投票权，校长由董事会派任。

（3）一九八五年

1985年我主办宏观经济暑期讲学班。这一年中国教育部升为教育委员会。在大陆的行政体系中，委员会比部高一级，如计划委员会（简称计委）、体制改革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简称教委），都有很大的权力。我觉得一年之间学生素质有很大的变化，英文程度提高了。

宏观经济讲学班的上课地点也改了，从前一年的北大搬到人民大学。人民大学主要是训练干部，从前的师资多曾在苏联留学。我请了William Branson、Dwight Jaffee、Richard Portes、John Taylor四位教授，连我一共五人，上了六个星期的课。

这一年的暑期班，学生人数较多且程度也好。这是福特基金会所支持的第一期，经费较充裕，招待教授住在西苑饭店，靠近人民大学。西苑住房很干净，餐厅也不错，我很满意。暑期班结束之后，我们去黄山、上海等地旅游。1984年以后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人民大学都聘我为名誉教授，这只是荣誉职，他们希望我有空时可以去讲学。

（4）一九八六年

1986年我主办计量经济学的暑期讲学班，邀请Richard Quandt、Angus Deaton以及Robert Engle三位教授来上课。Quandt教授先来，他和我住在西苑饭店。等到Deaton教授来的时候，西苑已经没有空房，只好住到友谊宾馆去。他很不高兴，认为自己所受的待遇不如我和Quandt，临走之时还在抱怨。他是我在普林斯顿的朋友，但对于这件事不能原谅我。其实住宿的问题是由教委负责，但是它也有难处。大陆开放之后，去旅游的人日多，旅馆房租日贵，政府受市场经济影响想将西苑出租多牟利。由于两方主管单位不同，教委权力管不到西苑饭店而要不到房间。我只能向Deaton教授抱歉。

这一年我除了主办暑期讲学班之外，同时还邀请顾应昌、费景汉、刘遵义几位海外经济学者与体改委会谈，也是在北京开会。与会经济学者都被安排住在北京饭店。于是我决定把西苑的房间让给Deaton教授住，自己去住北京饭店。后来Deaton教授离去，我在西苑的房间便空出来，但我仍然保留这个空房，等于是我一个人同时保有两个房间，从资源使用的观点而言，这种做法是很不经济的。但是我这么做自有我的道理，不用花自己的钱是其一，唯恐以后有需要之时要不到房间是其二。因为这里不是市场经济，不是用钱就可以买到东西。我因此才明了何以中国企业存货很多的原因，因为生产所需的原料是由中央分配，而分配靠不住，所以有机会的时候就多要一些，当成存货以备万一，也因此造成资源浪费没有效率的现象。

我和顾应昌、费景汉、刘遵义四人与体制改革委员会谈体改之事，讨论数日后，赵紫阳设宴款待我们四对夫妇。席间他得知我们将要去台湾，还特别要我们代为问候副总统李登辉和行政院长俞国华。

(5) 其他

我先与教育部合作开办暑期讲学班，1985年以后教育部改为教育委员会，双方继续合作。除了暑期讲学班之外，另外在1985年初由福特基

基金会提供经费，建议成立委员会，对中国大陆进行为期一年的长期经济学培训班。福特基金会支持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它主要的工作是教育和研究。由 Dwight Perkins、Robert Dernberger、D. Gale Johnson、Lawrence Klein、Lawrence Lau、Herbert Simon 和我一共七人组成美中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委员会。我们和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七所大学合作，由人民大学副校长黄达负责，成立培训班。我自己来自南方，建议将中山大学包括在内，但教委没有同意。大概因为资源有限，必须集中使用，以免过于分散。从 1985 年起，在人民大学举办培训班，到 1996 年止，长达十一年之久。复旦大学稍后亦成立培训班，由于经费不足，提早结束，从 1988 年到 1993 年，前后有五、六年之久。我们进行中美经济学教育的合作与交流，美方的机构称为 Committee on Economics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China（美中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委员会）；中方由黄达担任主席，名称为中美经济教育交流委员会（Committee on Economics Education and Exchange with U.S.）。1995 年我们美方的七人委员会已经解散，但中方的委员会仍然维持，继续活动，也请我去参加。和美方委员会合作的是中国教育部（1985 年改为国家教育委员会，1998 年再恢复为教育部），由教育部决定七个大学和美方合作。其中可能有很多学校想要争取，至于如何决定取舍是中国政府内部的事。

福特基金会的经济学培训计划在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举行，两个地方都举办为期一年的经济学训练班，但举办的时间长短不同。人民大学的时间比较长，从 1985 年至 1996 年；后来复旦大学也成立一个类似的培训中心，从 1988 年至 1993 年。我的经济学暑期训练班 1984 年先在北京大学举办，经费由我自行筹措；1985 年和 1986 年改在人民大学举办，经费由福特基金会资助。所以我在人民大学从事两项教学活动，一是 1985 年和 1986 年的经济学暑期训练班，二是一学年的经济学培训班，由人大经济学训练中心主办。人大和复旦这两个培训班请了许多英、美教授来授课，对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影响很大。

从 1985 年秋天开始，我帮人民大学的培训班，每年找四个教授去讲课，通常很难找到肯去一年的教授，只能找到去任教半年的教授。第一年找了 Daniel B. Suits 与 Leonid Hurwicz 等教授去，也有些副教授或助理教授去中国教课。Suits 在课程结束后写了一份心得报告，称为 Daniel Suits Report。这份报告很有价值，因为这是第一次在中国有一年的经济学培训，由美国老师去教书，用什么教材，中国学生有什么反应等。我们邀请的学者水平相当高，Daniel B. Suits 算是有名的学者之一。第一年最有名的学者，就是 Leonid Hurwicz。他们都是第一流的师资。1986 年

我们邀请了 Michelle J. White 和 Roger Gordon 夫妇，都是非常有名的经济学者。Michelle J. White 是 Roger Gordon 的妻子，她的专长是法律经济学。Michelle J. White 是 1970 年我第一年在普大教书的时候，在我班上研究计量经济学的一个学生。后来他们两人结婚，有一天顺道来普林斯顿访问，我问他们有没有兴趣去中国教书？他们答说有。我就马上安排他们去教书。现在他们两人对中国的影响很大，一方面因为他自己从事中国经济研究，当然还有其他的研究课题；另一方面，他在中国收了很多学生，或是从中国去美国的留学生，学生都相当优秀。很多美国学者想要去中国教书，他们知道我们有福特基金会支持的美中经济学教育与研究计划，就来申请。我们挑选其中最好的学者，每年每学期只能选三个人，水准不一定整齐。在培训班教过书的学者，还有 Robert Mundell，他后来对人民大学的发展很关心。另外，Belton Fleisher 也去教过书，他后来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培训了很多中国学生，还担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顾问。

我们这个委员会和教委合作举办培训班，工作进行很顺利。此外，我安排选派中国留学生出国，而且培训班成立之后，也有很多学生利用此一机会结识美国各大学的教授，趁便请他们代为安排介绍出国念书。1995 年人民大学聘我为名誉教授，1996 年人大培训班结束。因为 1995 年是最后一年，中美双方委员开会的时候决定要整理全部的学生名单，中方委员会说福特经济学培训班结束之后将编撰成书，结果到现在还没有出版。当时的培训班主任是黄卫平，他也是黄达校长的助理。黄卫平后来参与我的书《中国经济转型》（*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的中文翻译工作，和我常有电子邮件来往。

这个美中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委员会和经济学培训班，由福特基金会支持，它最大的影响在于改变中国一般人对于念书受教育的看法，使大家认识到在中国会讲英文又念经济学的人，是有学问而且吃香的人。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培训班都高度发挥了此一功效。参与培训班的七个大学，每年可以派一个研究员出国半年，由福特基金会提供经费。很多留学生去美国之后遭遇不少困难，有些基础不好，念研究所课程很吃力。但是这些人已是经过我们严格挑选之后才派出国的。其实有人说中国多派一些人出去，认识外界的情形，有助于改革开放。例如专门训练培养干部的中央党校，它的校长、院长等高级领导人在 1980 年代都没有出过国，如果能够安排他们到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名校的管理学院去访问，一定会有影响，吸收国外知识与经验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除了福特基金会之外，1986 年世界银行也在中国培训经济学人才，在北京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联合举办国民经济管理讲学班。我没有参与这个计划。我进行的项目是从 1985 年起与教育委员会合作，培训经济学的师资；世界银行则是训练政府官员。

1987 年由世界银行提供经费，也在上海举办一个为期两个月的培训班。事后世界银行向教委建议修改大学的经济学课程。教委接受此一建议，现在中国的大学经济系课程，包括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国际贸易、经济发展、金融财政等，一如美国大学的必修课程。过去教授的社会主义课程仍然存在，例如普林斯顿大学亦开有马克思主义的课程，列入经济思想的范畴。中国人很聪明，有用的课程就很多人念，所以念经济学的人越来越多。

首先从复旦大学的经济学教材开始，教育部要把经济学的课程从马克思主义改成新的经济学，先开会讨论由中国自己编写一些西方经济学的教材。我建议改用「现代经济学」一词，教委同仁也赞成，但是仍保留马克思经济学。他们的说法是中国要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只要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都可以拿来利用。经济学教材编写也是由世界银行支持的计划，会议中先决定那一门课要列为必修课，然后讨论由谁撰写，内容如何。福特基金会则支持另外一个项目，经济学培训班计划。他们两者努力的方向都相同，目的在促进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现代化。有人认为 1987 年推动中国修改大学的经济学课程与教材，对经济学教育的影响很大。1980 年代末期读经济系的本科生，就是使用这套教材（「教育部统编核心教材」），只是尚未出齐。这是改革开放以后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从教师层面向学生推广普及的里程碑，它的修订版到目前都还广为使用。

此外，福特基金会的资助范围，包括赞助访问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联合研究计划等项目。至于研究计划，则由美中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委员会与社科院合作，包括它所属的工业经济研究所、数量经济研究所等。有些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经济，透过我们的合作计划申请经费资助。不过我想要保持个人高度的研究自由，不愿意为了经费而加入，所以没有和社科院合作。现在美国有不少学者对中国经济研究有兴趣，毕竟中国人口占全世界的五分之一，相关论文发表日多，参考《美国经济评论》的内容即可知。我相信有关中国经济的研究，未来将影响美国经济学的研究方向与发展。

（四）留学生与现代经济学

（1）选派留学生出国

虽然我在 1983 年十月才开始参与推动中国经济学教育现代化的工作，但是选派中国留学生出国念经济学的构想在此之前早就形成了。根据友人的回忆，早在 1981 年十二月我在家里宴请一些朋友，席间就已提到经济学留学计划。我认为由于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和当时欧美各国颇有差距，以致于经济系的毕业生或研究生很难到国外念经济学，因此我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等单位建议，每年赞助二十名中国理工科毕业的学生到美国各大学改念经济学，并提供第一年预备期间所需的经费。因为一年以后他们成为各校正式的研究生，就可以申请奖学金，经费自然不成问题。不过在座有些人对此抱持保留的态度，他们认为中国与西方分属两套不同的经济制度，因此西方的现代经济学在中国行不通。我却有充分的信心，认为这个计划一定会成功。至于真正付诸行动，要等到 1984 年的夏天。

1984 年我离开上海之后，和太太 Paula、女儿小梅（Jeanne Mei Mei Chow）一起去杭州西湖旅行。在火车上，我写信给高教司副司长夏自强（他也是北大兼任教授）、王复孙、王泽农，商谈与教育部合作选派中国留学生出国念经济学之事，我愿意帮忙。考试题目包括数学和经济学两大项目，数学有微积分、代数、概率；经济学则用我的《中国经济》英文本，由我出考题。有些留学生日后因此戏称之为「Chow test」，与计量经济学的「邹氏检定」（又译作邹检验，Chow test）同名。

直到我抵达广州，都没有收到教育部朋友对建议派遣留学生出国的回信。我想夏自强等人向来办事效率很高，这次迟迟没有回信，可能因为兹事体大，要开会才能决定。我回到美国一个星期之后，收到回信说他们接受我的建议。于是在 1984 年底开始考试，很多人读我的《中国经济》教科书。公费留学生只考两个科目，一门经济学、一门数学，所以报考的人，念数学的比较吃香，很多留学生都是数学系毕业。学生必须两科都在六十分以上，才算及格。因此，1985 年中国开始送留学生出国念经济学。

按照惯例，美国大学研究所的入学申请日期到一月底截止。我负责帮忙安排中国留学生申请学校。对我来说，这件事并不难办。普林斯顿大学有美国和加拿大各大学经济系主任的名单，因为每年经济系约有二十个博士生毕业要找工作，我们推荐他们到各个大学去，在推荐函表格内介绍学生的论文题目、专长学门、指导教授、联络地址和电话等。我利用这份各校系主任的名单，打好一封信，并找 Edwin Mills、Sherwin Rosen、John Taylor 三位教授共同签名，说明我们与中国教育部合作，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学生已通过经济学和三门数学考试，经济学由我们出题，希望他们接受这些学生就读。我替留学生写介绍信给各学校，一个学生可能需要写三封介绍信给三个不同的学校，申请入学。结果收效很大，学生经过安排进入数十个大学就读，而且多半都能得到奖学金。

例如我介绍白聚山去申请史丹福和康乃尔两个大学，康乃尔大学没有收他，史丹福大学则要求他的 Graduate Record Examinations (GRE) 测验成绩，两个学校都有意见。我不记得问题如何解决，不过他最后取得加州柏克莱大学的博士学位。他是一个相当有名的计量经济学家，曾在麻州理工学院教过书，现任纽约大学正教授，住在普林斯顿，写过相当好的文章；还有一位留学生陈晓红女士，同样是纽约大学的正教授，也是计量经济学专家，现在耶鲁大学请她担任正教授。另外有陈松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得了博士学位，现在去香港科技大学任教，也教计量经济学，担任讲座教授。洪永渺是经济学教授，在康乃尔大学教书，现在厦门大学也请他主持一个新的王亚南经济研究院 (The Wang Yanan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conomics, WISE)，担任院长。周林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现在是亚利桑纳州立大学的讲座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派学生出国留学影响很大。大家都想要出国，有些人想要念哈佛大学、麻州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等，即使本来对经济学没什么兴趣，为了出国的机会，也只好念经济学。正如李政道安排学生出国留学，大家都抢着念物理学。刁锦寰在我之后一两年也安排学生出国念统计学，他有时抱怨有些学生并非想念统计，出国之后就转念别行去了，让经手安排的人有受骗的感觉而不高兴。我就不同了，我尊重他们的选择，只要他们自己认为好，转系也无所谓。至于其中是否涉及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人道德观沦丧的问题，就见仁见智了。有人认为这种转系的行为违背承诺，原先答应出国念某一学科，达到出国的目的之后，就转到比较热门的科系就读。我的看法是只要他出国时，不是一开始就存心欺骗的话，我可以接受。例如我安排他来美国留学时，他是真心要念经济学，后来他的兴趣改了，我就让他转行。这是一种自由选择，和一开始

出国的時候，就有心欺騙的情形不同。但是如果一開始來美，就已經存心欺騙的話，就是不誠實。不過，刁錦寰的學生情形就很難說。可能學生一開始要來學統計，但是在管理學院看到別人學金融可以賺很多錢，就改變主意。對刁錦寰來說，他本來想為中國訓練一些統計學的人才，結果訓練不出來，自己也付了經費，學生卻轉到別的學門去，當然很不高興。

對於中國留學生學成之後滯美不歸的情形，我的看法也和他人不同。李政道安排中國學生出國留學在我之前，由他爭取美國各校的獎學金，中國政府可能只提供機票，沒有其他經費，而美國大學學費一年要兩三萬美金，他出了很大的力。至於我個人的看法，我比較相信自由。我遲至 1984 年才開始替中國安排留學計劃，但以楊小凱為例，早在 1982 年我在武漢見到他，他念過經濟學，具備其他人所沒有的條件，于是我替他安排在 1983 年到普林斯頓大學就讀經濟研究所。另一位是于大海，李政道原來安排他去賓州大學物理系，賓州大學的教授們稱贊他是該年最優秀的學生。後來他想轉到普林斯頓大學來念經濟，我也替他安排。于大海到普林斯頓之後表現良好，1983 年和 1984 年是最傑出的學生。第三年開始他參與很多活動，因此論文沒写完，沒有拿到學位，就去 Dartmouth College 教書，當講師。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之後，他也很活躍。

1996 年夏初，于大海打電話給我，想要完成論文，取得學位。我告訴他只要能寫出好的論文，其他都不成問題。我詢問他的研究興趣，他想研究金融問題。我的《動態經濟學》（*Dynamic Economics: Optimization by the Lagrange Method*）一書剛出版，其中有專章討論金融，我先讓他讀了之後，再來和我討論。後來他果然回到普林斯頓寫完論文，拿到學位。他大概六年前畢業，指導他寫論文的教授是 Michael Woodford。Woodford 教授很有名氣，本來是芝加哥大學的教授，Ben Bernanke 擔任普大經濟系主任的時候，把他挖角到普大來。他的專長是宏觀經濟研究，普林斯頓大學的宏觀經濟陣容很強，他是其中之一。可惜兩年前被哥倫比亞大學挖角過去，現在在哥大任教，我一直認為是普林斯頓的損失。于大海的論文也寫得不錯，畢業之後去了波士頓的 Tufts University。他沒有找到一個更好的教職，其實以他的能力和資格夠條件，只是年紀大了。在美國，我想年齡也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因為聘請一個助理教授，希望他以後可以升等成教授，如果年紀太大，就不值得投資，當年紀越來越大，也就是最有生產力的時間已經減少了。他非常可惜，人很聰明，但去參與政治活動（這一點我不予置評）。後來我還和他有聯繫，不過最近沒有他的消息。

有一次香港城市大学的朋友讨论杨小凯和其他同行对经济学有多少贡献，认为学术贡献必须通过市场检验。也就是说国际学术有公认的评价，不是像中国有几位经济学家自我推销。他们城市大学的毕业生如果没有通过市场检验，不但在美国，甚至在香港，也找不到很好的就业机会的话，就可以说贡献有限了。

透过这个经济学的留学计划，中国教育部送公费留学生出国，从1985年到1988年，一共持续三年。后来教育部发现培训学生、举办考试，都需要经费，出国以后由我安排申请学校，出国机票也需要教育部出钱，然而学生一出去就不再回国。一旦知道留学生不会回国，教育部很快就决定终止这个计划，不是我不愿意帮忙。以中国当时的收入而言，一般优秀的年轻人没有能力出国，如果没有这个留学计划，由美、加各大学提供奖学金的话，教育部没有足够的经费送他们出国。以后自费出国留学的人，留学政策就很开放。国外的学校会提供奖学金补助优秀的学生。美国有很多研究生，例如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今年（2006年）一共有二十五个研究生，都要攻读博士学位。其中没有台湾来的留学生。不过有七位是中国人，其中一位来自香港，其他六人之中有两位先到美国，再从其他的学校转学过来。他们先在别的学校取得很好的成绩，再找一个更好的学校转学。有三个人来自北京，其中两个人是北大的毕业生，另外一个人可能是武汉大学或其他学校的毕业生。我有研究生名单可供参考。学生入学之后，除了免学费，学校还提供每人一年两万多元美金的生活费，所以当学生的待遇很好。现在学生已经成为一个职业。

经我选派国外的留学生大多留在美国，别人问我对此有何看法。我认为中国选派留学生出国好处很多。首先因为有出国机会，大家都来念经济学，所以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大陆迅速发展，光是这一点，就已经足够了。其次，栽培留学生等于为世界训练人才，学成之后担任美国教授，或训练人才，或教书研究，两者都很好。我也是美国公民，美国能有杰出的人才，我也很高兴。最后，留学生虽然留在美国，他们也替中国服务，有时短期回国讲学，帮忙训练人才。例如1996年八月人大校长黄达举办金融政策会议，部分经费来自留美学生组成的中国金融学会和中国经济学会。可见他们也帮中国做事，只是不住在国内而已。有些留学生学成之后去香港各大学任教，例如香港科技大学的经济系1994年有十六位教师，其中有六位由我安排出去留学，近年恐怕已不只此数。

关于留学生是否回大陆服务的问题，李政道和刁锦寰等院士栽培中国留学生，也希望他们将来学成回国服务；就我个人而言，则认为应该

由他们自己决定，我不会说服他们回去。我做人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求人做事。合作必须对双方有利才行，对方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做事，这样事情才能成功。不必因为从前替他做过事，后来就要索回报偿。儒家也主张「施恩勿望报」。如果学生来找我谈这个问题，我一定从他的角度出发，替他做长远的考虑，追求他的最大效益。留学生回中国服务，必须要对他们自己有利才行。

尽管我相信自由是个人抉择的重要原则，但是教委从前和我合作送留学生出国，现在他们又想鼓励学成归国。他们的目的是要促进中国发展，所以想法未必像我这么开通，虽然他们也知道留学生在美，仍然对中国提供短期服务。例如中国对外还不太开放的时候，钱宁就办了一个杂志《科技导报》（*Science & Technology Review*），希望引进国外的科技，要求我帮忙。我就邀请比较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替他们写文章，例如Kenneth J. Arrow、Simon Kuznets、Theodore Schultz等人。他们投稿的文件先寄给我。有些文章还不错，他们用英文写，我们再翻译成中文。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台湾也是如此，李国鼎认为台湾为栽培留美学生所付出的代价，由于他们后来多留在美国工作，已足以偿付美援绰绰有余，因此主张制定办法鼓励留学生回国，争取人才归国服务。就李国鼎的立场而言，他想促进台湾经济发展，这种做法毫无疑问。这是台湾政府官员应该做的事，中国也是如此。我没有留意这些做法成效如何，但是中国大陆的情形很分散，各地的做法应有不同，像现在一旦经济条件及其他环境改善，回国的人自然会增加，和台湾近年的情形一样。

台湾早年也有很多留学生不回国，他们担心回国以后再也无法出去，或是回去之后国内的研究环境不好。这样一来，政府就要求他们赔钱，因为他们不回国履行应尽的义务。中国也有类似的办法，可能在出国之前，教育部以国家培养大学生花了很多钱为理由，要求学生先付一笔保证金再出国。将来回国以后，政府就退还这笔钱。现在中国有钱的人很多，付出一笔保证金不成问题。

现在中国的留学政策已经完全开放，办理出国留学并不困难。至于由政府出资送人出国留学，以 2006 年为例，中国决定每年提供五千个留学生名额，如果他们能得到外国学校提供学费，政府将给予旅费和生活费。过去我曾安排许多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由教育部考取之后，我写介绍信，推荐他们申请入学。

早年我在台湾担任经济顾问，也曾安排学者进修。例如现任台湾银行总经理的李胜彦，他本来在经建会从事计量模型研究，1978 年前后我

介绍他去美国留学。我写信给一位匹兹堡大学的教授，他专门研究最适控制，这是我的专长研究领域。后来李胜彦就在匹兹堡大学得到博士学位，再回台湾服务。2006年七月我来台北，他来邀约会面，我们在中研院活动中心一聚。李胜彦夫妇一起来看我们，我们非常高兴。

(2) 经济学教育的现况

最近我在岭南学院做了一个很简单的报告，说明现在中国各大学争相引进经济学方面的人才，他们的待遇不但比台湾好得多，也比香港还要好。香港的待遇曾经有一个时期和美国一样好。现在中国有几所大学（例如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部分经济学教授待遇特别高，有「四五六」的说法，就是助理教授、副教授、正教授的年薪，分别是四万、五万、六万美元。大部分的学校大约以年薪二十万元人民币聘任助教授，其他的职位年薪待遇相当灵活，外人不一定知道。由于中国物价低廉，这样的收入在中国的购买力很高，另外还提供住房宿舍。通常的做法都是找一个在美国或国外比较有成就的学者挂名做院长，这个办法就和当年台湾邀请蒋硕杰兼任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一样，他同时在康乃尔大学担任教授，一年回台两次，大约三个月。中国也是以这种方式吸引国外人才回来。例如上海财经大学，政府拨了好几千万元给它，经费相当充裕，因此它在两年之内聘请二十几个留学欧美的博士回去任教，很不容易。

邀请这些国外著名的教授回来，兼任中国国内的院长，一个最好的理由是他至少知道学术行情，在这个学术圈里每个人的表现如何。例如每年一月美国经济学会开会的时候，他们都去参加，代表学校面试这些刚毕业的年轻博士。他们征才的时候，多希望对方能够用中文教经济学最好，也可以用英文教学，因为大陆学生的英文水平相当高。如果外国学者愿意应聘，也很受欢迎，曾有一些外国人去中国任教。我向岭南学院报告征求师资人才和提高待遇之间的关系，以清华大学的高薪挖角成功为例，说明岭南学院没有足够的经费，所以竞争不过清华、北大，无法争取更好的人才，希望校方能够提高待遇，最后因为没有经费来源而告失败。清华大学争取到两位教授，一位是白重恩，他本来是香港大学的教授，一年多以前被清华大学挖角，去担任经济系主任；另外一位是李稻葵，他也在我开列的候选人名单里，原来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也被清华大学挖角。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同居中国的学术领导地位，北大

成立一个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由林毅夫主持；清华也成立一个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由李稻葵主持。李稻葵和白重恩都是清华大学从香港挖角去的。只要是好的人才，中国可以从香港挖角回去，不一定非要去美国挖角，甚至就连香港也在挖角。中国有利的条件是薪水待遇高，美国有利的条件是环境不同。有些人在美国住了一段长时期之后，不习惯中国人做事的方式，中国的整个社会制度和美国不同，回去之后有些事情无法接受，尤其是官僚作风，不容易适应。

中国从国外争取人才回国，有时要兼任行政工作，不过也有例外的情形。例如清华大学是中国挖角最成功的例子，它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挖角的教授姚期智（Andrew Yao），也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在普大的计算机科学系任教，很有名。他在 2004 年被清华大学挖角，因为杨振宁仿照普林斯顿大学，在清华大学成立一个高等研究中心，吸引国外杰出的研究学者回去。它还附带礼遇条款，就是只做研究而已。从中国的立场来说，姚期智是杨振宁争取国外人才最成功的例子，方闻则是另外一个例子。方闻和我同年，现在还拼命发表文章，也被清华大学延揽回去。他们两人的待遇是一年一百万元人民币。姚期智回去，还附带汽车、司机、助理、宿舍。杨振宁和姚期智的宿舍都一样，房子很漂亮，最少有六、七个睡房，还有一个花园，占地很大、很美，当然有人照顾管理。姚期智长期住在中国，方闻虽然答应担任教授，但不常在国内。他在清华高等研究中心有一个办公室和姚期智比邻，但从来不用，还是长期住在普林斯顿。方闻帮清华大学很多忙，包括指导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或在中国做短期的训练，或在美国接受训练。方闻要做三件事：第一是替清华大学建一个博物馆；第二是帮清华办一个展览，他最擅长办展览，1996 年曾把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运到纽约展览，造成轰动；第三就是成立一个新的艺术史研究所。现在这个研究所已经成立了，虽然在名义上有一个副所长替他负责管理，但是方闻称他为所长，认为自己只是挂名而已。在所内有副所长代他管事，也有一些研究人员，他一方面用电子邮件联络，指导训练他们；另一方面想安排他们去美国接受短期培训，就这样推动中国艺术史研究。

经济学者回到中国，可以成就很多的事业，可是在经济学的专业研究上，可能会落后。选择回中国或留在美国，对经济学者而言，可能导致选择两种不同的事业发展方向。一般来说，我认为如果真有一个第一流的经济学家愿意回到中国，继续做研究，一定会大受欢迎。目前看起来并不乐观，例如清华大学就有好几个特别礼遇的教授名额虚悬，就连年薪一百万元人民币的待遇也请不到人。只要是在美国比较杰出的人才，清华都想争取，但是没有成功。中国现在的折衷办法就是用挂名的方式，当事人并没有真正回去。目前在美国有些金融财务方面的学者表

现不错，例如 2004 年当选中央研究院经济院士的罗闻全（Andrew W. Lo），比较年轻，也相当有名，任教于麻州理工学院的史隆管理学院金融财务系。如果像他这种人肯回去清华大学，可以拿年薪一百万元人民币，纯粹只做研究。不过可能因为中国的研究环境没有国外好，学者难免顾虑一旦到了新的环境，能不能再写出论文来，这点很不容易克服。以我自己在普林斯顿的例子就很清楚，因为自己的同事都是一流的，有什么问题就可以和他们谈一谈，如果在中国要找谁谈呢？当地没有一群第一流的同事。不过，姚期智不同，他可以自己解决，在他的专业领域中国有很多著名的理工人才。他偏好多训练一些比较年轻的博士后研究人员，预备形成一个研究小组，希望成为一个世界一流的研究中心。我认为在经济学领域也可以做到，有成功的可能性。但是目前还没有找到像姚期智这种愿意回去的人。

根据一位年轻学者的现身说法，留美学成返国任教的人现在多面临永续性（sustainability）的考验，他们的前途充满不确定性。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是中国式的政治滥用在美式的学术制度上。学术的泛政治化，使年轻人的升等考评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权力斗争的工具，朝令夕改，以致于年轻资浅的学者无所适从。二是专业研究可能落后。这对年轻的学者影响特别大。因此，中国国内虽然用高薪吸引学者回国，对于未成名的年轻学者大多采取自生自灭的态度，「因为永远不缺想回国的年轻人」。可见经济学的就业市场有了国际竞争，也是一件好事。

谈到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中国缺乏素质良好的师资，最重要是需要大量的人力。中国地广人众，需要很多师资，这个目标不容易达到。现在我们已经训练出一批人才，这一批人回国之后，即可在国内继续培育人才。从前我主持 Chow test 甄试出国留学的这批人，现在已不需要我推动，他们自己会继续进修。他们毕业以后，或选择留在美国工作，或回中国服务，都任凭自己决定。有时候他们很客气，会对我说一声。例如 2006 年出任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院长的周林，他接受这个教职的时候，写了一封电子邮件给我，他说现在已经学成为国服务，至少有了交代。他能想到要告诉我，我非常高兴，但是如果他不说一声，我也不会介意。

现在中国学术界和企业界的人士都能对国家有所贡献。譬如我的父亲对我的期望是在美国念完书以后，能回国替他多赚一些钱，原则上我也不反对。后来共产党建立政权，我就没有回大陆。我的哥哥学建筑，他回国以后也帮父亲做营造建筑生意。我自己后来去教书做研究，比较少见，不是一般人的典型。传统上将商人视为四民之末，是社会最低阶层的观念，即使在我父亲的时代已不适用。我的父亲在广州担任商会会长，他的社会地位相当高，传统的四民观念已经不存在。根据余英时的

研究，传统中国会将家族中最聪明优秀的孩子送去读书、考试、做官。这种传统观念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是过去的历史，如今的社会已经不是这样。

这批通过教委留学考试的人，他们回到中国之后，有机会进入政府机构任职，也有机会去大学教书。如果有机会担任企业顾问，他们也会去做，甚至放弃学术，完全成为商人的情形也有，连我们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也有人这样做。我认为在中国人的观感里，赚钱并不是一件坏事，而是好事。以美国为例，有些麻州理工学院的知名教授，自己研究金融，后来就到纽约的华尔街投资赚钱去了。在中国也没有什么不同，一个人如果有能力就会去赚钱。

在香港尤其如此，虽然香港的情形不能够代表整个中国。香港完全是商业性的文化，财富越多的人，社会地位越高。金钱是唯一的价值标准，对其他方面一点也不关心。中国大陆没有那么极端，但是就现在一般的中国人而言，对于金钱看得很重，从近年股票市场的蓬勃发展即可得知。这是因为在长期的物质匮乏之后，现在有了一些财富，人们就往那个方向发展。不过现在中国的价值观已经多元化，人们可以选择做教授、任官、经营企业，都有成功的机会。我第一次提到中国的「多元化」，但是在美国这种情形很普遍。

在香港有一个中国银行，另外还成立一个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中国银行主管外汇和中国对外投资。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则是一个投资银行，主管利用中国的资金去外国投资。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是李山（2001-2005），也是由教委留考项目送出国。他能够担任这个职位，可能因为他毕业于清华大学。当这个职位出缺的时候，有很多人注意，我有时候也看中国的报纸，有一些相关的报导。他们开始审查候选人的时候，正好朱镕基担任清华大学管理学院的院长，即使担任总理的期间，也没有辞职，还一直兼任院长。他一方面做总理，一方面做院长，至于院长是不是他在做事，是另一回事。不过他对清华的学生相当关心。我从来没有见过李山（这些公费留学生我都没有见过），有一次我去香港，他宴请我们，这是我第一次和他见面。他写过不少书，在麻州理工学院拿到博士学位，毕业之后在美国一个相当有名的金融管理公司做事，后来中国请他回去任职。所以公费留考项目培养的人才，各方面的人都有，不只是学校的学者而已。

有些在美国相当有名的学者，一部分时间在美国教书，另一部分时间在中国做事。例如周林，他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2006年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一个经济学院，从经济系扩编分立出来，由周林负责；另一方面

他也在美国亚利桑纳州立大学担任教职。2006年六月我在香港城市大学见过他，七月四日我在台北，他也来参加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周林本来在美国任教，毕业以后去耶鲁大学教书，也在杜克大学教过书。后来香港城市大学提供他一个教授职位，待遇相当好，所以他回到香港教书。教了几年书以后，香港还是留不住他，他又回美国任教，同时也在上海交通大学任职。梅建平也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在纽约大学任教，常回国在清华等大学担任教授。另外，李龙飞也是香港科技大学从美国聘请回来，教了六年书以后（1994-2000），又给美国的大学争请回去。

（3）中国留美经济学会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hinese Economist Society, CES）刚成立时，称为中国青年经济学会（Chinese Young Economist Society, CYES）。这是1984、85年之时，由还是研究生的杨小凯、于大海和一些朋友在普林斯顿创办的学会。1983年我安排他们来普林斯顿大学念书，两人说要办这个学会，我说：「不要用“young”这个字，因为过不久，你们就不再是young了。」大约过了八年、十年之后，学会才把“young”字删去。第一次开会是1985年在纽约总领事馆，全美国从大陆去的经济学留学生一起开会，大约有四十至五十人，我也参加和他们一起开会。在美国纽泽西州，任何结社或立会要合法登记，于大海没有找律师，他自己上图书馆，研究法律条文，并完成登记，我很佩服他。后来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差不多有一千人，其中很多会员现在已是正教授。这个学会每年在美国开一次会，也在中国开一次会，等于一年两次分别在两个地方开会。在中国开会的地点每年不同，譬如2004年在杭州，2005年在重庆，2006年在上海，2007年在长沙。在杭州举办的会议主题是中国农业，发表多篇论文，会后他们选出比较好的文章，编辑成一本书出版。我认为这可能是关于中国农业研究最全面的一本书，因为作者都是专家。陈锡文也在书里有一篇文章，原来以中文发表，再翻译成英文。2006年六月，因为我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会议，他也来参加。

当年参与中国青年经济学会的人，现在都已经很有成就。例如张欣是人民大学1985年第一届经济学培训班的助教，现在担任美国University of Toledo的正教授；陈平也在美国奥斯汀的德克萨斯大学担任正教授；

樊纲是中国相当有地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钱颖一毕业于哈佛大学，但他不是公费留学生；李稻葵也是哈佛大学博士，他透过我的公费留学项目出国，原来是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2005 年开始兼任北京清华大学的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原先可以在香港处理所务，后来辞去科技大学的教职，从 2006 年下半年起改到清华大学专任；易纲担任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助理，着有一本关于中国银行业的书，他也在我为岭南学院开列的争取人才名单上；周林是上海交通大学的经济学院院长；朱民是中国银行的副行长。

利用 Google 搜寻引擎在网路上很容易找到这些人的资料，他们现在已有很大的影响力。这个学会是全国性的团体，不像岭南学院是一个很小的机构。他们曾经一起在美国留学，有不少人后来回到中国大陆发展，形成一个学术社群团体，这次在上海一起开会的人都是老朋友。他们自己也会安排各种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或进修机会，例如这次在上海举办研讨会。会议的论文按主题排列，包括中国银行业改革、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经济成长和土地发展、中国经济学教育改革、全球化与劳工关系、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创新，很多内容连我都没有看过。我曾提过最后一个主题，经济学原是外国发明的理论，中国先采用这个外来的研究方法，慢慢的我们希望有朝一日中国研究出自己的经济理论。

比较历年与会人员的名单，可以知道他们的职位升迁异动情形。其中田国强在上海财经大学任职，这个会议是由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主办，上海财经大学合办。很多重要的人物也从北京来参加，例如杜鹰是国务院的发改委（发展改革委员会，由从前的计划委员会和体制改革委员会合并而成）副主任，其他与会者还有上海市长韩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国家统计局局长丘晓华，还有接替戴相龙担任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等。从这些与会者名单可以看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在中国的活动和影响力。开会当天我们一起同桌聚餐，其中有些人也在座，我认识他们有不少方便之处，因为去中国做研究的时候，若需要资料，就去他们的单位机构参考。台湾早期发展经济的做法是结合产官学，也就是企业家、政府官员、学者三方面的合作。不过上海会议没有太多企业界的人士参加。

现在我自己也开始赞助一些访问访问学者短期回国任教，这种做法比较方便灵活。我在中国的联系是多方面的，不只限于中国留美经济学会而已。

我的老师 Milton Friedman 教了我许多事情，有一次有人对他的贡献

有如下的评论。在此之前，我要先交待引起此一评论的背景原因。普林斯顿大学有一个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Woodrow Wilson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有一位罗伯森（Robertson）先生在1960年代捐了六千多万美元给它，现在捐赠的基金已经增值为八亿多美元。1988年威尔逊学院还因此将一栋以精美著称的建筑命名为 Robertson Hall。该学院的财源很宽裕。例如它开了一门大学生选修的课，有一次为了研究中国如何利用能源的问题，全班学生和老师一起去中国访问两个礼拜，学校支付所有的费用，包括飞机票、旅馆等。所以就连学生上课也可以去中国访问，由此可见经费的充足。如果学生要写论文，要求去中国做调查，学校就提供飞机票，因为经费实在太多了。我们经济系常常和威尔逊学院合聘一些教授，实际上由他们出钱聘请，所以连经济系也搭便车，沾了光。一些比较有名的经济学教授，都是威尔逊学院聘任的，他们教该学院的学生，也教我们的学生。最近罗伯森先生过世了，他有两三个儿子提出意见，认为罗伯森家族捐款给威尔逊学院，目的不是为了学术研究，而是要对美国公共与国际事务有贡献，捐款却被挪用到经济研究和其他的用途，到现在这个官司还没有打完。后来我们有一个教授说，要对美国有贡献，不一定要去华盛顿担任政府官员，对美国经济最有影响力的人是谁？是 Milton Friedman。他根本没有长期担任政府工作，但是对国家的影响却很大。他对货币政策有意见，就写成书发表出来。另外，他也提出很多教育政策的意见，影响很大。

所以说影响人们的思想可能比做官更重要，我的老师 Milton Friedman 有这样的看法，我也认为如此。当然中国和美国不一样，因为中国政府的权力很大，即使在现在的中国，也流传一个说法：「中国表面上是政治决定一切，实际上是从政者听了知识份子的一句话。」例如马克思就很有影响力，他没有中国观，即使是错误的影响，对全世界也影响很大。我认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成员，无论做官与否，他们在中国的经济建设或政治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我自己的心得是，有些问题不一定要找政府官员谈才能解决，有时候写一本书、参加开会、做一场演讲，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由中国经济学者组成的学会，也很欢迎我参加，每一次开会都邀请我去演讲。我参加了历年在重庆、上海、长沙举行的会议。开会之时，政府官员也来听讲。他们欢迎台湾的学者参加，例如钟经樊、林正甫等人参加上海的会议，也有一些欧美学者参加。中国留美经济学会除了举办学术研讨会，还讨论该学会的活动，包括举办一个短期的教学课程；也举办优秀论文的征选，以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名义办了一个刊物《中国经济评论》（*China Economic Review*），现在在学术界的排名地位越来越

越高。

我的书《中国经济转型》对于中国经济研究也有影响力，因为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对中国经济很有兴趣。我可以说不久之后，中国大陆在经济方面会赶上美国。就总生产来说，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98年中国的总生产等于美国的一半，但即使从一半开始，中国每年的经济成长率以6%、6.5%来估计（其实中国真正的成长率都高达9%以上），美国每年成长3%，这样推算起来，到2020年中国就已经赶上美国。这是就总生产而言，至于中国的人均（每人平均）所得当然还不能和美国相比，但是很多事不是人均所得的问题，总量也很重要。例如最好的人才可以影响彼此的竞赛，就像两个学校比赛篮球，不是用人均来比较学生篮球技术的优劣，而是每个学校挑选十多个人来比赛，只要代表该校的十多个人球技高超就赢了。

我认为中国在其他方面的发展比较缓慢一些，例如现在美国在经济学研究方面是世界第一。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助研究员的升等，要看论文发表成果，这些论文都是在海外投稿，由美国人控制决定期刊的排名高低。这些期刊的排名次序有其道理，因为它确实在研究上领先。现在关于亚洲的经济研究也有期刊出版，这些期刊慢慢地也会形成学术市场。虽然这些期刊部分也在美国出版，但是读者不同。因为研究中国经济的人越来越多，他们自成一派，有一些自己专有的问题要研究，例如《太平洋经济评论》。我的书《中国经济转型》也是其中之一。我鼓励他们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希望以后亚洲的日本、韩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的学者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学术研究中心，有我们自己的学术市场，不要完全由美国人来决定论文的好坏。对美国来说，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是一个比较边缘的学会。因为在美国有美国经济学会，还有金融财务、会计等其他的各种学会。再就会员人数而言，也是一个比较小规模的学会，不过人数越来越多，以后也可能成为一个主流力量。这是就未来的学术发展而言，不过现在还言之过早，因为论文的水平还不够好。

我们可以比对两份名单。一份是1986年留美学生的中国青年经济学会的名单，另一份是2006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国经济学会的出席名单。前后相隔二十年，2006年参加上海会议的人，很多已拥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我同意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中国的经济学留学生可能改变未来的经济学研究，至于具体的转变方向，我还没有定论。我自己没有继续深入研究从前提过的四个研究方向，但是别人可能有研究。一般来说，当年的那批留学生表现都很不错。

现在中国已有一群经济学家，彼此可以建立紧密的联系，可能有别人愿意担任他们的领导者。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做这种事，既没有兴趣，也可能没有能力。所谓没有能力，是指要运用这层关系也不容易。我几十年前曾帮过他们一些忙，但是不能因为这个理由就要求他们跟随我，让 Chow test 的留学生自由发展最好。他们选择留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一定是经过衡量以后，对自己最有利的决定。即使是最简单的问题：要留在美国？还是回去中国？我都不参与意见。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有些人认为留在美国对自己好，就应该留在美国，有些人则认为应该回中国去。我不参与意见，因为我对某个人的了解，绝对没有他自己多。我向来尊重个人追求自利的动机，并认为唯有双方互利的事才能成功。我现在仍本着此一互利的原则，和这些经济学者或政府官员共同合作，继续推动促进中国发展的计划。

一是联合邹至庄项目的留学生，推动中国现代化。2007年七月十二日我和通过「邹至庄项目」出国留学，而且现在任教于香港的七位朋友，在香港城市大学晚宴。其中包括香港大学的宋敏、陶志刚、张俊喜，和香港科技大学的陈松年、丘东晓、王苏生、张处。大家讨论如何把参加过这个项目的人士联合起来，替中国做点事。我们三个初步计划：（1）我们将出版一套论文集。选出各人最具代表性的论文之一，每篇加以附注，说明研究心得或个人经验，按论文的研究领域分组，做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生和青年学者的示范。（2）集合一群会员（即组织或联系参加项目的人士），透过适当机会参与某个中国大学的经济、金融或管理学院，共同任教，包括非全职在内，以建立一所国内最好的经济学院。（3）他们建议本书出版的时候，大家共同开会庆祝，并举办相关活动，希望影响中国经济学与经济发展。总之，我们秉持团结就是力量的原则，希望促进中国的现代化。

二是我和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海外中国青年论坛（The Overseas Young Chinese Forum, OYCF）合作，由我捐款成立基金，选派国外师资（他们多半也是会员）到中国任教。这两个单位组织也同样致力于中国经济学与其他人文科学教育，其中有许多成员来自教委主办的经济学留学生及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的福特经济学培训班。三是我推动普林斯顿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共同合作，进行一个中国与全球能源和环境的研究计划，由双方对此一课题有兴趣的教授和研究人员参与。这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型计划。2007年六月在北京举行筹备会议。四是我协助人民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推展学术活动。该院刚于2007年三月正式成立，我将透过人民大学的梁晶教授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熊伟教授，促成双方更进一步的合作。至于我个人的活动，则包括透过和中国领导人与政府官员的沟通，致力于消除农村贫穷和改革医疗制度；参与各种学术

演讲，如中国留美经济学会 2007 年七月在长沙举行的年会、八月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的首届国际会议；为中文期刊写文章，包括中国科学院的《管理评论》、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博览》、香港的《信报财经月刊》等。

（五）岭南（大学）学院成立

1952 年私立岭南大学并入国立中山大学，中山大学是中国的三十五所重点大学之一。早期中国的大学教育和现在的台湾一样深受美国影响，但后来则采苏联模式成立分科大学，如华南农业大学、工业大学等。不过现在这种做法慢慢矫正过来。1984 年我向教育部长何东昌提过岭南复校之事。1980 年代我去广州好几次，1985 年中山大学授予我名誉教授职位。我和中山大校长李岳生谈岭南大学复校之事，他说对岭南没有什么认识，不了解这件事。1986 年中山大学再颁赠我名誉博士学位，这是教委批准的，并非校方所能决定。我是中国第十一个名誉博士。中山大学曾颁赠两个名誉博士，分别给我和霍英东。霍英东捐助不少钱给中国，在我之后数个星期，他也获颁名誉博士学位。

中山大学特别举行一个名誉博士学位颁赠典礼，这与美国和毕业典礼同时举行的做法不同。香港岭南校友会会长伍沾德和数位校友赴广州观礼。礼成之后，我和李岳生、伍沾德同一桌酒席。我向李岳生说在中山大学之下成立岭南学院，对中山大学有好处。我的这一番话他听进去，想了几秒钟，然后点一点头，同意此举对中山大学有利。后来便由李岳生和伍沾德继续进行这件事。接着中山大学的党委书记张幼峰也参加讨论。张幼峰、李岳生、伍沾德和我四个人开过数次的讨论会，讨论出来的草案必须经教委批准。伍沾德在北京有一些管道，可能也去活动。我自己则写信给赵紫阳要求批准岭南复校，至于成效如何就不清楚了。后来李鹏兼任教委主任，批准岭南（大学）学院成立。

1988 年是岭南大学成立一百周年纪念，李岳生校长在庆祝典礼上宣布教委已经批准成立岭南学院。1988 年秋天董事会成立，每年开会两次。这是中国大陆唯一的大学董事会，其中有不少外来的香港人担任董

事。由王屏山担任院长，我担任名誉院长。我每年至少回广州两次，因为岭南学院的董事会在一月、六月召开。此外，我也是科技大学或香港城市大学的兼任教授。因此，我每次回香港可说一举数得，顺便为母校做些事。中山大学的领导以及国内和香港双方的董事都要我担任名誉院长。

岭南董事会捐助很多钱，帮学校建不少校舍，都很漂亮。其中尤以「岭南堂」为最，即使在普林斯顿大学也很少见到这么好的建筑，William Branson教授即在此上课。在中国大陆，由于管理费用很高，岭南堂平日关闭，有活动之时才开放。

广州岭南学院董事会的合作很难得。香港的岭南校友多是企业界人士，很多人捐过上百万港币给广州岭南学院。董事会有三分之二的董事是外来的人，三分之一是中山大学的人，开会之时，双方的观点未必一致。首任院长是王屏山，他原来念电机，也是我的学长，比我高几届。他曾经担任广东省副省长，在校友之中地位最高。1994年他退休的时候，必须找新的院长来接任。校董们希望从外面找人来接任，好不容易找到复旦大学经济系主任舒元教授出任院长。伍沾德和汪道涵熟识，请他当名誉董事，再由伍沾德邀宴汪道涵和舒元，商议请舒元担任院长之事。中国的人才流动不易，也是经济发展的一大问题，现在情况已经改善很多。

广东人不一定习惯和外省人相处，而外省人去广东也确实有些不方便。舒元教授原来在上海，上海人与广东人的语言和生活习惯不同。广东人聚在一起都说广东话，而且速度很快。我的太太Paula也生长于上海，她虽然学会广东话，也承认别人说话很快时，只能听懂百分之五十。从前国民政府想要统一全国语言，但没有成功，广东人还是讲广东话。后来人民政府终于做到，广东省境内各大、中、小学一律讲普通话。在中山大学开会一定讲普通话。岭南学院董事会在大陆开会，从前刚开始时都讲普通话，后来香港校董觉得不方便，就讲广东话。现在毕业典礼校董致词，也有人用广东话。这是香港人对广东的影响。在瑞士有三种通行的合法语言，即法、德、义语，在政府或议会开会时，各自发言。这个办法也不错。

在美国纽约有一个岭南基金会，长期资助在岭南大学教书的美国教师。例如1947年教我化学的老师Dr. Frank，便是由基金会提供薪资。他的儿子已经退休，在纽约的岭南基金会担任董事，他也出席开会。1995年舒元院长到美国、加拿大各地访问两三个星期，也去纽约向基金会董

事演讲。1995年我从岭南基金会申请到一笔钱，每年可以请人去教两个星期的课，向系上同事征求有意任教者，当时就有五个人表示愿意去。例如顾应昌去教一门国际贸易的课，他说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教授名单可以查阅美国经济学会的报告。1996年William Branson也去过，他原来研究宏观经济和国际贸易，后来转而研究经济发展，去开这门课，很受学生欢迎。此外，有一位校友林思齐，曾在温哥华担任副省长（Lieutenant Governor），也捐一笔钱给岭南学院教师做为研究费。我觉得未来广州岭南学院很有希望。

香港岭南学院与广州岭南学院没有正式关系，不相统属，实际上两者仍有合作。1938年我在香港念岭南小学，日本占领广州之后，岭南中学也迁到香港。1945年以后岭南大学迁回广州，在香港设中、小学分校。一九五〇年代初期岭南大学被并入中山大学，一九六〇年代校友想重建岭南大学，于是在香港设岭南学院。香港的私立岭南学院开销大，很难维持。利荣康（J. K. Lee）是香港岭南学院董事会（称岭南机构）主席，他在1980年代补贴所有不足的经费（利荣康是岭南中学兼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友）。现在香港的岭南学院是香港的大学之一，广州的岭南学院则已成为中山大学的一部分，但两者均有校友会在活动。1986年初利荣康邀请我去香港，由两个美国人、两个英国人、两个香港人共同组成一个六人委员会，我当主席，花了一个星期访问香港岭南学院，提出各种建议改良方案，办学情况改善。1987年以后香港高教委员会逐渐将岭南学院编入官方教育体系之内，由政府补助，从此经费充裕。1988年是广州岭南大学建校的一百周年纪念，经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成立岭南（大学）学院。香港的岭南学院和广州的岭南学院虽然是独立的两个机构，香港有几位校友身兼两校的董事，出力很多。我是广州岭南学院的名誉院长，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香港岭南学院的院长也来参加。

1996年七月一日我们几位经济院士去拜访李登辉总统。其间谈到教育问题，我们赞成Milton Friedman的办法，鼓励私人兴学，无论大、中、小学都可以开放。政府鼓励教育，不等于政府要自办学校，可以用补助学费、由学生或家长自选学校等办法来增加各校竞争，以改善办学的品质。中国现在办教育很灵活，岭南学院董事伍舜德在广东台山办了好几所学校，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到专门学校都有。他还捐助五邑大学，这所学校不是教委直辖的重点大学，但办得很好。另一位董事黄炳礼也捐了很多钱在台山办教育。华侨对于中国的教育贡献很大。

岭南学院成立的时候是1988年，由中国政府批准成立，那时候中国还相当穷。香港的岭南校友捐款要用自己的名义，一共捐了十多栋大

楼，但是他们不太愿意捐钱做学术研究，例如设立讲座教授。岭南学院董事会一年开两次会，我在 1998 年就以名誉院长的身份向董事会提出报告，说明有一批留美的经济学家在学术方面比较有成就，都是很好的讲座教授人选，并列出了他们的名单。可惜我的建议没有被接受。因此，在研究和教学方面，校友没有捐太多钱。直到 2007 年初董事会才通过募捐五个讲座教授，每个捐助两百万元港币，以十年为期限，学校和学院也给予相对的资助，以后可以更加强学院的师资阵容。

岭南学院不是完全独立，而是比中山大学开放一些。现在岭南学院的情形已有不同，可以分成两方面来说：一方面现在中国在教育方面投入大量的经费，这些经费集中分给三、五个学校，例如清华、北大，还有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也得到一些经费，可能其他的学校也有，但是不如他们那么多。岭南校友的捐款和这些学校分到的经费无法相比，他们的经费比岭南学院更多。另一方面岭南学院开办企业管理硕士班（MBA），赚了不少钱。岭南现在最有名的是培训企业管理硕士人才。中山大学本来设有一个管理学院，岭南学院也举办企业管理硕士班，因为岭南也算是中山大学的一部分，等于是中山大学内部互相竞争。管理学院的人认为岭南既然办了企业管理硕士班，自己也来办一个培训班，而且要比岭南办得更好。所以中山大学就给管理学院很多经费，盖一栋大楼，大概三、四年前已盖好，比岭南学院的大楼更大。现在岭南学院拥有校友基金的优势已经所剩无几。我是中山大学的第一个名誉博士，中国的第十一个名誉博士，也是中山大学的校友。

关于现在岭南学院的情形，我有两点可以报告：一是培训企业管理硕士的项目，二是举办研讨会。岭南学院和麻州理工学院的史隆管理学院合作，举办企业管理硕士班，非常成功。这个合作项目要追溯到六、七年前，史隆学院的副院长 Alan F. White 预备和清华、复旦两个学校合作，帮他们建立一个国际企业管理硕士班（international MBA）。训练的教材是为了适应全球化的需要，利用麻州理工学院自己编的教材。史隆学院的人来中国的时候，途经香港，岭南有一位校董郭志权（Philip Kwok），也是麻州理工学院的校友，就宴请这些人以示欢迎。（当时我不在岭南，而在美国。）郭志权表示岭南也有意加入合作计划。麻州理工学院的人就以岭南学院并不在原先的合作计划之内为理由，要求支付五百万元美金，就可以合作，替岭南培训师资。每一年岭南学院可以派几位教师赴美，一个人来一个学期，选一门课，吸收麻州理工学院的教材，临走之前再写一个报告，说明这门课如何在中国应用，等于培训一个教师。这个人选当然英文要好才行。麻州理工学院的人说他们提供教材，也提供图书，所以学生毕业的时候，可以拿到麻州理工学院史隆管

理学院的证书，表明其参加的是史隆管理学院和岭南学院合作的企业管理硕士班。在中国的岭南学院培训，念了两年书以后，可以取得麻州理工学院的证书，比起国内其他的企业管理硕士班更吸引人，所以这个项目办得很成功。现在中国有一个统计，比较进修各大学企业管理硕士的附加价值，根据学生在入学之前和毕业三年之后收入差额的高低，来看教育投资的报酬。根据富比士杂志最近的调查统计，岭南学院和麻州理工学院合作的国际企业管理硕士的项目，在全国排名第三。

另外，岭南还举办一个项目，就是现在中国很流行的高阶企业管理硕士班（EMBA），采为期两年，每个月集中四天上课的方式。岭南也和明尼苏达大学合办一个EMBA培训班。早期纽约州立大学对中国的管理学教育做了不少工作，在大连设有一个培训班，派了很多人来参加。后来岭南学院和明尼苏达大学合作，一半的师资由岭南提供，一半是明尼苏达大学的师资，每位教师到中国来十天，连上两个周末的课。三年前举办第一届企业管理硕士班，可以取得明尼苏达大学的硕士学历证明，这是有史以来中美合办的高阶企业管理硕士班第一次颁发美国文凭的项目。他们上课用英文，中国大部分这种硕士班还是用中文上课，岭南学院的国际MBA项目则用英文讲课。先是明尼苏达大学来中国，到北京、上海等地寻找一个合作单位，选中岭南。因为岭南的环境很好，校友捐建十多栋大楼，建筑很漂亮，而且够水平。他们看中岭南的好处，愿意和我们合作。每个学生的学费是三万多元美金，岭南和明尼苏达大学各分一半，不过岭南学院还要给中山大学抽取一定的百分比（不同的项目，学校抽取的百分比不同，明尼苏达大学项目大约是8%）。这样一来，学校可以开办各种培训班营利，岭南办了两个企业管理硕士的项目，获利颇丰，学校的经费来源很充裕。另外，有一部分企业管理硕士的课程是经济学，如果经济系的教授愿意去教课，还有额外的收入。

清华大学也举办了好几个企业管理研究所，其中有一个是专门为南方的深圳、广州、东莞几个地方的经理们开办，因为清华大学的名气大，很有号召力。清华企业管理硕士班的学费是四万多元美金，岭南学院和明尼苏达大学合办的企业管理硕士班收费较低，大约三万多元美金。因为清华收费较高，获利更大，设有好几个分部，在北京、深圳都有开办。人们想要取得清华大学硕士的名义，于是清华就到南方来办分部。传统中国的文凭主义还是存在，清华大学的名号比较响亮，就最后到手的文凭而言，清华大学比较值钱。不过各个企业管理硕士班之间有评比。资料显示岭南和明尼苏达大学的企业管 理硕士班在有些项目的评比是全国第一。其中一个理由是用英文上课，水平比较高。清华硕士班的学员，有些人没有受过很好的大学教育，很多企业人士做生意有经

验，开工厂、办企业很成功，赚了很多钱，也想开一开眼界。因为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深圳，在附近上课，每一个周末去听课，对他们很方便。2006年六月学校安排他们来美国哈佛大学十天，参观美国的公司，看一看美国的情形。另外，在毕业之前他们还要去北京，在清华大学上课一个礼拜。他们在美国时，也来普林斯顿大学，由我替他们上课，用中文讲课。这些学员给我名片，每一个人都是公司的总经理。我准备了一些用电脑软件 Power Point 做成的简报，内容是英文，但我用中文解说，因为大部分的人连英文都看不懂，播放英文简报毫无意义。我以为他们的英文不一定能流利的对话，至少可以阅读，事实上有些人根本看不懂英文。岭南和明尼苏达大学合办的培训班水准可能高一些。

来进修企业管理硕士的学员，有些来自私人企业，有些来自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人员，当然由他的单位支付学费。到普林斯顿大学我那儿去的学员，大部分还是民间企业人士。至于中国政府送官员到国内外进修，也有一些这种课程。例如哈佛大学的甘乃迪学院（Kennedy School）和中国有一些合作项目，设有短期的讲学班，欢迎中国官员去参加。普林斯顿大学的威尔逊学院也有一些课程，训练外国人士。普林斯顿大学不只限于中国，他们最近也邀请日本大藏省的次长来教一门有关日本财政的课。

另外，政府官员在国内的培训也很有意思。例如最近的农村改革，他们成立不少干部人才培训班，也称为干部学院。中国的干部学院设在浦东、延安、井冈山，可以找些国外的人来替他们上课训练。2006年六月三十日我在上海参加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因为经费不足，他们在当地和上海财经学院合办。我们开会时住在浦东干部学院，它是政府高级官员在上海的培训学校。我们进去住宿的时候，检查很严格，因为里面有很多政府官员。我第一次去浦东干部学院，设备都还不错，我住的是部长级的房间。我去之前，先在交通大学演讲，由交通大学派车送我去，要事先联络打电话，安排一个人来接我，否则一般车辆不能进出。这种情形和我去拜访安志文相同。安志文担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名誉会长，研究会是政府机构，门禁森严，必须有人事先安排联络。在美国外交部，一般人随时可以去，但进入室内以后，不能直接上去，必须先经过里面一个接待处的安排。台湾的情形是到了外交部，除非有人引介安排，否则进不去。这种官场作风观念在中、美国情各有不同。

早期送政府官员到国外受训，主要的目的是让中国官员开拓眼界、提高行政效率等，不属于经济学的专业训练，也可能有部分经费来自美国的民间公司提供。另外一个例子是中国国内经济学师资培训班的费

用，由福特基金会出资赞助。中国政府对于接受美国民间公司的经费培训他们的官员，没有所谓和平演变的疑虑。因为大家都知道要向国外学习。现在中国的官员大部分都到国外去过，他们从 1980 年起就希望做短期的访问学者，例如去某大学访问半年，学一些东西，回去以后很吃香，升迁很快。当然，这需要英文能力，除非去欧洲访问。中国很大，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出国，即使没有出国进修，总是有机会去国外访问。

我有一个朋友，他在美国成立一个公司，可以制作电视广告，替美国药厂在中国促销产品。他希望和中国的关系弄得更好一些，就安排山东省人事处一百多人来美国访问，名义是和美国交流。他们是人事单位，不是外贸单位，人事就是管人的，有什么理由去外国呢？其实他们只是借名义到外国去，一方面旅游，另一方面学点东西，利用政府单位的经费向外跑。有一个普大校友，为了帮助一个在中国比较贫穷地方的学校，安排他们的校长、副校长、书记都来普林斯顿大学访问，要求我帮忙他们的学校。后来有一个中国朋友说：「你捐给他们的钱，都让他们旅游花掉了。因为捐款已经变成学校的经费，就随便他们用了。」那也是一个公立学校。政府机构的人到处跑，也是好的，开一开眼界。这也可以说是另一种变相的贪污腐败。不过我们很难定义什么是贪污腐败。例如我们教授有研究费，我也可以用来旅游，借口自己去开会，要求校方帮我买机票，当然我可能真的去开会。这很难划清界线。

政府官员出国也和外面进行交流，不是完全不做事。基本上中国政府和民间都不再像过去文革之时忌讳和国外的往来关系，而是鼓励发展国外交流关系，他们现在的态度是向外开放，没有意识形态的限制。不过，中国的干部学院各有不同的特色，上海浦东的设备很好，很现代化。可能延安和井冈山两个干部学院就不一样，因为训练的方式和目的各有不同。

第二，我鼓励岭南学院举办研讨会。我花了不少时间，每一次去参加研讨会的时候，先要求每一个人用很短的时间介绍他自己的论文，要求其他的同仁一起研读。这些年轻的教员所写的论文，我都看过，每一篇都有评论，这样办了好几回。过去岭南缺乏经费，有钱的校友指定捐款用于兴建大楼，而不是用在学术研究上，因此无法设立讲座教授，也不能聘请国外的教授。我每年都要回香港两次，自认为可以帮助岭南学院，训练他们的师资。在我去香港之前，他们将现在的研究课题和论文先寄给我，我事先做好书面评论，等我到了学校之后，再进行研讨会。等于是我用个人的力量提供他们一些帮助，无法扩及全国，只能在小范

围内进行。因为我要经香港参加岭南学院的董事会，一般会在香港停留两、三个礼拜，董事会开会期间可以抽出一天去岭南开研讨会，也很方便。2006年六月下旬我在香港城市大学访问，该校对访问教授有一些限制，规定访问期间每天都要上班，和美国不一样（在美国，访问期间随个人安排时间，很自由。），所以只能利用星期六去岭南学院开研讨会。

因为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我认为在岭南学院的工作受到一些影响，由于没有充裕的经费，只能从如何鼓励、提高教师们的研究水平着手。我提出两点做法：一是鼓励举办研讨会，二是鼓励教师出国或在香港短期进修。例如安排几个教师去香港城市大学进修。最近岭南学院有一位博士生，我安排他到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生。普大的访问学生有两种，一种是一般访问学生，需要教学费，等于一年要四万多元美金，一般人付不起。另外一种就是参与合作研究的访问学生，用这个名义，普大一个月只收七百多元美金，很便宜。如果一个访问学生来三个月，一共十二个礼拜，普大一学期只上课十二个礼拜就结束了。访问学生可以一面听课，一面做研究。我就用这种办法安排一位研究生去美国。学费的部分由岭南支付，剩下的旅费和生活费就容易了，他们可以自己付。

至于全国性的经济学教育要如何进行，现在中国每个地方都想办学，但有些地方有经费，有些地方却没有。有经费的学校会自动聘请知名学者来任教，例如上海交通大学聘任周林的情形。厦门大学也聘请康乃尔大学的洪永淼教授担任王亚南经济研究院院长，他也是中国教育部的「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他的任职方式就如同从前该校的蒋硕杰教授在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兼职的模式。近十年来我们岭南董事会常讨论如何改良岭南学院的教学环境，这不只是待遇高低的问题。例如1980年代林毅夫在北大成立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争取国外八个博士回去。即使待遇高达年薪一百万元人民币，外加北大提供宿舍，但是如果有人发现中国的研究机构很官僚，同事之间大家谈不来，研究环境不好，也不会决定回去。岭南学院可以提供类似的待遇条件，但工作环境必须良好，这是很重要的条件。岭南学院的舒元院长为人很公道，认为凡事做得好就要鼓励。不像其他有些领导人是非不分，与自己有交情的就升官发财，赏罚完全与学术无关。这种靠人事关系升迁的现象举世皆然。

研究中国近代史，常发现地方主义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人们对于地方的认同超过对国家的认同。例如顾应昌先生是上海人，他曾向中国政

府建议，中央政府不应该从上海收取过多的税收财源，并建议让外资流入上海。当他考虑赠书中国时，他的助理毕业于南开大学，希望他把书送给南开大学，顾应昌先生却因为有同学任教武汉大学，自己也和武汉大学有点渊源，所以送给该校。可是他保留了最好的书籍，一套完整的计量经济学期刊，预备如果有一天圣约翰大学复校时，可以捐给它。中国人这种传统的社会关系、校友关系、籍贯地域关系，有很大的影响力。不过我没有这种想法。例如 **Chow test** 的留学生经常邀请我，到各地参加学术活动。如果有时间，我会去帮忙捧场。如果有机会到他们任教的学校附近，我会顺道去看一看。我参与这些活动，可以增加自己的一些认识，了解现在每个大学的研究方向和内容。岭南学院也是如此，他们的研究领域和现在年轻的助理教授在研究什么问题，我也必须了解。因此，在岭南开研讨会，一来可以帮助他们，二来我也想了解他们现在的研究课题。

五、中国经济改革

（一）经济改革与政策建议

（1）一九八四年

1984年七月我和赵紫阳见面，一如1980年见姚依林，也是透过招待单位的安排。王复孙与王泽农是和我接洽的人，何东昌是教育部长，所以陪同会见（可能北大校长丁石孙也去了，丁石孙后来因为在天安门事件之时，压不住学生闹事，受到责难）。在中国与领导人见面时，主客相对而坐，互相交谈。其他的陪客，包括我的太太Paula，都坐到一旁，一言不发很安静。台湾的情形可能不同，我和李登辉总统见面，与会者大家相当平等，在中国则上下主从之分很明显。

第一次见赵紫阳，我的印象是觉得他脑筋很灵活，答问之间反应很快。1988年Milton Friedman见赵紫阳之后写信给我，也觉得他很灵活，对他印象非常好。他很通晓经济实务的概念，因为他在四川农村待过，很有经验，虽然没学过经济学，一样有经济学概念。我认为做行政的人能有这种水准，很不容易，在美国也不多见。

我们的谈话内容有两个重点：一是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二是中国经济改革。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谈话内容已记不清。1980年我和姚依林谈过的企业自主权，已在进行当中，所以这次谈价格问题。我认为用苏联计划经济的方法行不通，当时社科院的马洪、周叔莲等人已经批评苏联计划经济的毛病。中国虽然已承认企业应有自主权，不能完全由中央控制，不过物价仍由政府控制。事实上，在价格机能之下，以价格做为市场讯息指标很重要。然后我也问他对于香港问题的看法，我很关心这件事。我们大约谈了一个多钟头。

次日（七月六日）《人民日报》刊出我和赵紫阳见面的消息，我们会谈的照片登在第一版，提到邹至庄主持微观经济讲学班。此后「微观经济」成为官方用语，使这次会面对中国发展现代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

讲学班结束后到各处去旅游。我去上海，由上海市长汪道涵招待；到杭州，则由浙江省长薛驹招待；我到广州，广东省长叶选平没有亲自来，由副省长王屏山代表出面。我到各地时，事先有国务院的人打电话，关照省市市长招待。可能赵紫阳希望各地方的领导与我多谈谈，多了解外面的想法和事务。这些谈话对我也增加不少见识。

我和赵紫阳、江泽民的沟通方式，除了见面会谈之外，还采通信的方式。有些事情双方见面之时并未谈到，而是靠事后写信来交换意见。有重要的事，我才写信给中国领导人，一年写个一两封信。1984年七月五日第一次和赵紫阳见面之时，我保留一些事情没有说，过一两天之后才写信给他，我建议取消外汇券，汇率由市场决定。中国外汇不足，就是因为把美元的汇率订得太低，政府不应该把人民币汇率订得太高。在1984年时，国内的观念仍然很保守，因为有其他许多人在场，我没有谈这件事，而用事后写信的方式建议让美元和人民币自由兑换。即使到1986年，国务院想要取消外汇券，也因为兹事体大而未实行，很多人利用持有外汇券图利，反对取消。可见即使政府愿意让汇率自由化，也不容易推行。汇率自由化终于在1993年开始推动。

1984年我和赵紫阳见面，曾谈到香港问题。我离开大陆之后去香港，想找人谈一谈香港的前途。招显洸医生介绍我和李柱铭（Martin Lee）在Court House见面会谈。李柱铭是香港民主派的重要人士，他和招显洸曾任职行政局，由港督派任。他们两人未必能代表香港，但在香港很活跃，是举足轻重的代表性人物。我们三个人会谈互相交换意见，都认为许家屯很不错。事后我写信给赵紫阳，说明我对香港的看法。

（2）一九八五年

1985年七月十五日赵紫阳请我全家人吃饭，包括次子善智（James Chow）和女儿小梅在内。我一向旅行都带着家人同行。美国人的习惯是子女至上，在家里人人平等，所以我到欧洲、中国、台湾等地旅行，他们都跟我一道。我的小儿子善智和我们同到大陆，他在人民大学当助理，帮忙做些翻译、助教、改卷子、跑腿的事。一则他有机会向去中国教书的美国名教授多学习，再者也可以帮忙我的同事解决问题。人民大学付他薪水一个月六百元人民币，与教英文的美籍老师相同。一个大学教授薪水不到三百元人民币，六百元人民币大约等于二百元美金，在美国不算什么，在中国可说非常宽裕，因为二百多元人民币就可以养活一家人，房租每个月只要几块钱。但是如果去中国饭店，一顿饭就可以吃掉二百元。1966年我回台湾讲学，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的邢慕寰所长请我吃饭，一顿饭就吃掉他一个月的薪水。他有中国人好客的习惯，而生活在美国的人一般不会这样做。他在经济所和台大合聘，中央研究院没有给他接待费用，无法报销。我知道他在台大的月薪有多少，请一顿饭就吃完了，觉得很过意不去。

那一次请客，赵紫阳的左右手鲍彤也在座，我原以为赵紫阳请客只是聊聊天，没有预备题目和他谈，其实他别有目的。我喝了几杯茅台之后，脑筋不太清楚。突然听见他问可否请几位海外的经济学者对我们大陆的经济改革提供建议。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但我从来没有想过，不知怎么回答。于是我转个话题说研究中国经济不能没有资料，数天前我去过统计局要资料，有一部分没有要到。他回答说统计局或许不会把我需要的资料全部给我。其他的谈话内容都忘了，只记得谈到文革，他说文革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经验，把旧的思想框框打破。

在我和赵紫阳见面之前，陈一谘和宫着铭两人来找我，说赵总理要了解通货膨胀，想请我做个估计。在中国进行经济改革有两个最重要的单位，一是体改委，二是体改所。他们似乎各自从两个不同的角度看改革问题。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体改委）是1982年成立的，权力极大，由赵紫阳兼主任，安志文是副主任。刘培英担任我和体改委的联系人。体制改革研究所（简称体改所）的所长是陈一谘。两者的体制不同，体改委是国务院之下的国家机构；体改所是赵紫阳的智库，帮他出主意，成员都是一些知识份子。这些人进行中国经济改革，他们的长处是广为采纳各方面的意见，不管是美国、日本、东欧都可以。他们不问理论，只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这种态度与邓小平说过「实事求是」有关。体改所有一些意见，体改委不一定赞同。六四之后，鲍彤是唯一被关入监牢的高级政府官员，于1996年获释出狱。陈一谘则去了普林斯顿。那儿有一批中国异议份子，其中五、六人较著名，他是其中之一。柴玲后来

也到普林斯顿，读了学位，在美工作。陈一谔和余英时常来往，我们最近一次见面是在杨小凯去世的纪念会上，他来主持，我去致词讲话，于大海也来参加。

陈一谔和宫着铭两人帮赵紫阳做研究。1984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当年货币供给增加50%，所以1985年初首次出现通货膨胀问题。他们要我帮忙估计通货膨胀率，我在北京做了研究，写成一个初稿，后来改成我1994年*Understanding China's Economy*书中的第十八章和2002年《中国经济转型》书中的第七章。货币与物价之间的基本关系是 $\ln p = + \ln (M/y)$ ，亦即物价变动是货币供给与真实产出比率的变化、需求之间的相互关系，加上反应所需的时间，由此做出估计。我利用他们提供的资料，用自己带去的电脑（由福特基金会出资购买，后来捐给暑期班），做出回归结果。我估计1985年一两年内通货膨胀率大概不超过7%-9%，事后证实果然如我所料。后来赵紫阳请我吃饭，他说已经看过我的报告。谈到中国经济改革问题，他问我通货膨胀有无危险，我说不致于有大问题。此外，还提到李政道，他也在同一地点接待李政道。

关于中国经济资料的问题，第二天我和人民大学副校长黄达（后来升任校长）商量，我建议由政府官方提供资料，在人民大学成立资料中心。他欣然同意。于是我写信给赵紫阳，请求拨派资料给人民大学。我派司机把信送去，两天之后赵紫阳的秘书来电告知已获同意。现在人民大学设有资料中心，规模不算太大，有发行通讯介绍各种新资料给学者应用。

1985年暑期讲学班结束后，我到各地去旅游。其中一站是大连，我带儿子和女儿同行，我们一起去游泳。大连市长招待我们，乘车途经造船厂，他说数月之前赵紫阳总理曾来此参观，指示造船厂进口技术未成熟的产品，不要硬是全部自己生产。我觉得赵紫阳的说法很有道理，过去中国有些人主张凡事都要自己制造，不肯从国外进口，因此赵紫阳的这番话不是一般经济管理者说得出来。我去过中国很多地方，许多人都很佩服赵紫阳，说他领导有方。

对于赵紫阳建议请国外学者专家研究中国经济改革之事，我当时未做正面答复。1985年回到美国之后，我对于中国的金融等问题有意见，所以在八月十三日写信作复，算是迟来的回应。后来他在八月二十四日给我回信，认为银行制度、金融市场、股票证券市场、外汇市场等问题，都可以邀集海内外学者共同研讨，并要我和安志文、刘鸿儒联系。安志文是体改委的副主任。他曾经做过党委书记，我后来才从李志绥的

书《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得知他在 1960 年代曾帮邓小平办事，是老资格的党员。刘鸿儒为人很灵活，曾在苏联研究银行制度，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他是真正做事的人。我和他们联络之后，他们寄来一批资料，数量不多。我建议大家在香港会面讨论，主要理由是蒋硕杰先生在台湾担任半官方的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不方便去大陆。我希望他能来香港参加讨论，他终究没能来。另外，我原先曾建议请刁锦寰院士担任国家统计局的顾问，他甚至表示愿意捐赠电脑给国家统计局。后来取消了，可能因为时间、地点不合适，他没有参加，不过他自己在中国的活动很多。

(3) 一九八六年

1986 年一月十五日至十八日，我和费景汉在香港与中方人员展开会谈。他们由安志文和刘鸿儒率领，共有六、七人。我们的会谈都做了记录，讨论的范围很广，主要在于银行制度的改革与物价水准的控制，这也是同年六月我们第二次会谈的主题。我们从早上九点开始讨论，吃过午饭之后继续讨论到晚上。会议一共进行四天，结束之后众人到各处参观访问。

第二次会谈在六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举行。当时我正主持暑期讲学班，主题是计量经济学，邀请Richard Quandt、Angus Deaton来讲授。参加会谈的海外经济学者，除了我之外，还有顾应昌、费景汉、刘遵义，蒋硕杰仍未参加。中方人员仍由安志文、刘鸿儒安排，主要是体改委的人，由于不去香港而在中国本地举行，参加的人更多，发言者有八、九人，另外有十人左右旁听。印象之中议题范围极广，无所不包，思想观念很开放，没有框框的限制。安志文认为经济改革需要具备政治可行性。苏联的政治改革开放速度很快，中国则进行缓慢。因为思想改革很难，过去一直要求干部往左，现在忽然改成往右，容易引起干部不适应的反弹情形。所以制度不能说变就变，需要时间调适。会谈结束之后，赵紫阳宴请与会学者，并且要我们代为问候李登辉、俞国华。他的态度很诚恳认真，但是到了台湾之后，我并没有这么做。这件事在当时太敏感，我如果代为致意，可能被认为是赵紫阳的代表，我不愿意做他个人

的代表。如果换成是 1990 年代，我大概会说也不一定，但在当时太敏感了。离开大陆之后，我们几位院士就一起前往台湾。抵台之后，我和蒋硕杰先生谈过在大陆开会的情形。

(4) 一九八七年

1987 年我和顾应昌再度参与中国经济改革会谈。体改委之下有中级干部，包括来自各省的人，我们大约讨论了一个多星期。中方的负责人说：「凡是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我们社会主义都可以学。」我听了印象很深刻。1987 年以国有企业的改革最为重要。其中之一是杨培新主张将承包责任制推广到国营大企业之上。从前承包制只限于农民，他们将劳力投入在土地上，交纳固定税额，包产到户，多劳多得。后来这种制度推广到小商店的经营之上。至于大型国有企业的盈余利益是否归管理人，则有两点值得商榷：一是社会主义是否容许管理人由利润中多得好处？二是农业生产不需要太多的原料，主要靠劳力投入，所获不多。但是大企业需要大量的原料投入，成本受价格高低影响，所以获利多寡不见得代表效率高。最后仍对国营大企业采承包责任制，由企业与企业与政府签订合同，每年上缴政府一个固定金额（比方说五百万元），多赚的盈余企业可以保留使用。但管理者不能自取太多，因为其他人不容许此事发生。在美国亦有类似的情形，1990 年代经济不景气，企业不断亏损裁员，管理者却不断自我加薪，因此大受抨击。在中国就不行，大家不容许这种情形发生。1987 年一年之内，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有企业加入此一计划，所以是这次会谈的主要重点。国有企业采承包制之后，经营效率没有大幅提高，反而产生许多问题。国有企业的管理迄今仍然问题重重，例如劳动市场不自由，企业不能裁员，因为这关系社会安定问题。

现在中国的劳力市场已经灵活多了，大量工人从工资低廉的内地流向工资较高的沿海各省，显示劳动力的流动性很高。过去国有企业雇用工人等于是社会福利制度，不能随便解雇工人。1990 年代开始试验实行一种变相的解雇办法，由企业支付员工四分之一的工资，使其不至于挨饿，迫使员工出去寻找新的就业机会，称之为「下岗」。饶是如此，国有企业仍有许多不易解决的问题，劳动力就业只是其中之一。

(5) 一九八九年以降

1989年三月中旬我与中国体改委官员再度在香港举行三天会谈。海外学者除我之外，还包括蒋硕杰、顾应昌、费景汉、刘遵义、于宗先。中方仍由安志文、刘鸿儒率员参加。会谈的主题是如何控制通货膨胀。1988年中国的货币供给大约增加百分之五十，所以解决通货膨胀是最迫切的问题。蒋硕杰主张提高利率。会谈结束之后，中国随即大幅提高利率解决了通货膨胀问题。另外，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通货膨胀，后来通货膨胀问题终于解决，部分原因即可能与六四事件导致有效需求降低有关。

我们和中方代表会谈之后，三月十六日利荣康宴请与会经济学者，由香港前途研究会会员作陪。包括利荣康、陈坤耀（Edward Chen）、招显洸、李鹏飞（Allen Lee）、李福兆、倪少杰、谭惠珠、董建华、黄宜弘（Philip Wong）、胡应湘、伍沾德等人。席间我预测一年之内中国政府将能有效控制通货膨胀。陈坤耀当时是香港大学的经济学者（亚洲研究中心主任，1979-1995），他不认为大陆能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不同意我的看法。顾应昌则支持我，说我素有铁口直断的记录。事后证明我的预测完全正确。Milton Friedman 的看法也和我完全相反。1989年六月二十二日他在天安门事件之后不久写了一篇短文，预测中国将陷入经济混乱与高度通货膨胀之中。此文后来收入《佛利民在中国》一书中。我收到这本书之后，在1991年一月二十二日写信给他，指出他在1989年六月二十二日的看法稍嫌悲观，特别是有关预测中国未来的部分。1991年二月七日他回信说我完全正确，他在天安门事件之后所做的预测，何止「稍微」简直是太过悲观，尤其是关于通货膨胀的预测。这件事让他学会他对中国所知有限，最好不要随便预测。他不吝大方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实在是个令人敬佩的学者。可是言犹在耳，他又预测1997年之后中国不能同时使用港币和人民币两种不同的货币，忘了前车之鉴。

1993年中国再度发生通货膨胀，1994年一月十二日我在香港演讲〈一九九〇年代中国是否能免于严重的通货膨胀？〉（“Can China avoid

serious inflation in the 1990s? ”)。我的看法大致是乐观的，中国曾经在1985年、1988年、1993年发生通货膨胀，最后都能加以控制。

(6) 其他

关于政策方面的建言，我也利用通信的方式向赵紫阳、江泽民提供意见。我曾写信给赵紫阳讨论住房问题。1980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各方面进步很快，唯独城市住房问题没有起色，各处的房子破烂依旧，没有改进。大陆的工作单位如学校、工厂等，必须为员工准备住房，每个月房租只有四、五元人民币，等于是变相津贴。至于如何增加房屋的供给，我建议利用市场机制，只要有钱赚，供给自然会增加。前提条件是必须允许房屋私有，这点非常重要。我在书中也讨论住房问题，应用简单的柏拉图最适理论（Pareto Optimal）的观念来说明我的论点。我认为现行的房租只有四、五元人民币，必须逐渐调高，但也不能骤然提高，否则会招来民怨。而且在房租调高之时，薪水也必须随之调整。一部分房子以较低价格卖给现住户，鼓励各单位出售住房，价格由市场决定，从一千元至数千元人民币。如此一来，各单位至少不必再负担维修费用。至于员工有现成的便宜房子可住，为何要自己花钱买房子？这是因为如果房子是自己的，可以花钱维修，也可以搬家，如此一来换屋会形成房屋市场。这些建议后来都付诸实行，至于我这封信在其中发挥多少影响则很难判断。1993年七月十日我在广州见到广东体改委主任易振球，他说广东省的城市住房已有65%卖给住户，房屋大部分已经商品化，而且成交的市价远高于当初我建议的价格。

现在大陆的房子可以拥有私人所有权。例如我的父亲在广州有一个大房子，原来被军方占住，1990年代要赔我们三所公寓外加不少钱，还不足以抵偿。我当时在广州还有两所公寓，其中一所要捐赠给岭南学院，另外一所要出售，签了合同委托他人代为出售。我不确定购屋者是否拥有房子的土地所有权。据我所知，在香港房子和土地的所有权分开。因为我的父亲曾经卖了一栋房子，仍然保有土地所有权，所以后来自己想要用地再盖房子。这与台湾的情形不同，台湾的购屋者与其他住户共同持有土地所有权，大家依房屋面积比率分配土地持分。

1990年或1991年秋天我写信给江泽民，说明六四事件之后由于货币供给控制过严，造成经济不景气的情形，建议放松货币供给。当时我在上海帮教委编经济学新教科书，这是1987年世界银行的计划，由教委组织委员会编写教科书，并请外国教授审查讨论，聘我为顾问。我有一位朋友邹剑秋先生，是复旦大学的副校长。我请他帮忙将这封信发出去，传真给江泽民。过了几个星期之后，我已经返美，邹先生来信告知货币供给已经增加。这也未必是受到我的建议影响所致。

1996年人大的福特基金会经济培训班结束之后，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和经济改革仍继续进行。1996年七月二日我收到人民大学校长黄达给我的传真信函，邀请我参加他们即将在八月二十三日举行的金融政策会议。我参加开会讨论并且提供意见。会后我与朱镕基副总理会面，谈金融制度改革。八月二十四日的 *China Daily* 第一版有报导。1999年三月朱镕基总理在他的工作报告中谈到金融改革的方向，要点和我在1996年提出的意见大致相同（参见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第二版，2007年，页252）。但也不能据此断定他受到我的影响。

台湾的经济政策分析，有利用宏观模型进行研究。中国虽然也有一些长期的宏观模型，但是在政策分析上的应用情形我不很清楚。马洪主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底下的研究人员做了一个宏观模型，曾经给我看过。宏观模型可以用在长期经济发展计划之上，但是目前中国的模型还不太理想，因为计量经济学的专家不多。1990年左右有一个大型的多国宏观模型研究计划（Project Link），估算1991年、1992年的生产函数。成员包括台海两岸的经济学者，他们与宾州大学的Klein教授合作。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所长李京文也是成员之一，时常赴美交换意见。刘遵义等人也常去费城参加讨论，我因为分不出时间而没有去。

在中国推动改革开放，1980年代最重要的人物是赵紫阳，一直到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以后他就失去影响力。后来江泽民出任总书记，因为他不是主管经济事务的人，我和他没有太多的接触。不过我写信向他提出的经济问题，譬如放松货币供给或控制通货膨胀，他会交给别人处理。一般来说，中国的经济事务由总理管辖，总书记则负责管理党和政治事务。中国是以党治国，总书记就是党的最高领导人，权力最大。后来总书记也兼任国家主席，过去有一段时期是由两个人分别担任。1980年代初期国家主席没有什么权力，是一个虚位元首，只是开会时的一个主席，如同英国女皇。后来国家主席由总书记兼任，这个职位才真正掌握实权。

至于赵紫阳的幕僚机构，本来国务院设有体改委（原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1982年五月成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体改委。），他个人又另外成立体改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1989年一月解散，1991年七月改名经济体制暨管理研究所，1994年十一月结束。前后均直属于国务院体改委。）。体改所和体改委是原先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的两个单位。其中体改所在六四之后停摆，体改委仍负责中国经济改革。体改委与马洪主持的「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简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毗邻，我去北京之时，也常顺道和他们谈一谈。前任教委主任李铁映，后来担任体改委主任。原来担任体改所所长的陈一谔等一批人，后来流亡美国，在美国他们也有自己的活动。陈一谔和我有一些联络。赵紫阳设立智库的做法其实有历史渊源，譬如清朝的李鸿章拥有自己的一批幕僚，专门替他办理对外交涉、出谋划策等，当时人称之为北洋幕府，因为李鸿章担任北洋大臣。除了赵紫阳之外，后来没有领导人再做这种事。后来中国的改革已经没有过去重要，虽然名义上还要说改革，其实大部分的改革已经完成了。

（二）担任中国经济顾问

1960年代台湾请海外经济院士回国提供意见，多由俞国华出面邀请。先后由经设会（经建会的前身）、中央银行提供经费和办公室，让我们进行研究工作。对我而言，俞国华是个为中华民国服务的人。他认为到大陆去做事，就好像帮敌人做事，是不对的行为。他知道我去大陆之后，就改变对我的态度。中华经济研究院初成立，俞国华担任董事长，蒋硕杰先生担任院长。蒋先生和我一同去请严家淦先生担任名誉董事长。有一天我收到一封信，是俞国华邀请我担任中华经济研究院的董事。大概是信发出之后数日，他发现我去大陆之事，后来我在报上看到董事会的成员名单发表，我不在其中。我想既然如此，也就算了！这封信到现在我还保存着。因此我有中华经济研究院董事的聘书，但始终没有做过董事。后来我仍然继续来台，其中我最佩服的人之一是孙运璿先生，他对我的态度始终如一没有改变。他为人很老实，肯做事，一点也不官僚。

我很佩服李登辉先生的政治手腕。1986年我和顾应昌、费景汉、刘遵义去大陆见过赵紫阳，然后来台湾，一起去见李登辉先生。他是副总统。我们提起大陆的情形，想和他谈一谈，他没有什么兴趣。倒是中国大陆的政府官员都很愿意听一听台湾发展的经验。

1996年五月俞国华有一篇文章在《中国时报》发表，叙述当年台湾五人财经小组与经济学者院士们共事的经验。中华经济研究院的林安乐先生将剪报寄给我。五人财经小组包括李国鼎、俞国华、费骅、周宏涛、孙运璿。经济学者包括刘大中（1975年之前）、蒋硕杰、邢慕寰、顾应昌、费景汉以及我，也是五、六个人。我们的讨论一般持续五天，每天早上从九点进行到十二点，双方交换意见，互相沟通。下午则是我们院士自己进行研究，或在经设会或在中央银行的办公室，有时是一起讨论，有时则是分工研究问题。最后沟通的结果，形成双方都有共识的意见。

中国大陆的情形也是如此。1986年我开始替体改委当经济顾问的工作，以后陆续邀请蒋硕杰、顾应昌、费景汉、刘遵义、于宗先等人，或在香港，或在北京，进行数次会谈。1986年一月我和费景汉首次去香港和体改委会谈，由中国方面提供商务舱的机票和住宿旅馆（利荣康家族开设的Lee Garden，中方人员也同住于此），还有每日的顾问费。海外经济学者与中国体改委会谈，并提出政策建议，效果良好。我们彼此交换意见，互相沟通，互相学习，俾能使双方达成一致的看法，才有效果。体改委的权力很大，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沟通意见，使他们了解，得到他们的同意，然后做成政策实行。

在意见沟通之时，如果他们的意见和我们不同，就会说明他们的理由与想法，我们可以因此知道对方了解与否。一般而言，体改委相当开明，他们肯采纳我们的意见，也会自行思考。我认为如果体改委要找国外经济学者当顾问，最适当的人选还是我们，他们有要事或许不会也不愿意找外国人。理由有二，一是语言不通，二是安全顾虑。有些事情可能不愿意告诉外国人。我至少算是他们工作伙伴的一份子。台湾的情形也是如此，我也算是台湾的一份子。

比较台湾与中国对于外国顾问的态度，台湾的外国顾问介入较深，大陆的体改委从未邀请外国顾问做如此深入的研究。他们间或邀请外人演讲，例如世界银行就曾举办三天的长江三峡之旅，邀请国外学者讨论经济问题。另外，中国参加国际货币基金后，就有资格派人去参加，每个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都派有代表。在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货币基金对

韩国提供建议，引起韩国很大的舆论反弹。我们担任顾问，给赵紫阳总理提建议；国际货币基金也可能透过中国的代表，提供中国改革的建议，似乎没有太明显的意见冲突，因为中国的态度很开放。我认为这是好事情，中国政府应当多听一听各方面的意见。

台湾可能在美援时期必须尊重外国人的意见，但美援停止之后仍有外国人说话较受重视的情形。例如台湾曾邀请一位普林斯顿大学的副教授，此人的学问不怎么样，也不是一流的学者，来台之后大吹大擂，收取高昂的顾问费用。中国大陆则没有这样的情形，政府官员不觉得外国人特别好，赵紫阳对中外学者的态度都很平等，我常担任外国代表团的团长，陪同会见，从未见他对外国人假以词色。反观台湾在美援停止之后，仍有重视外国人意见的倾向。

至于在台湾的顾问工作内容与大陆的不同之处，在于台湾以研究个别政策为主，如外汇政策、利率政策等；也有制度变迁的例子，例如证券市场的建立。中国大陆则是偏重制度改革，当然也会涉及政策问题，以下分别以外汇政策和人口政策为例，加以说明。

有关外汇贬值的问题，早年在台湾担任经济顾问的工作，提供的意见包括外汇政策和外汇制度改革。中国则始终以汇率政策调整为主。在一个国家刚开始发展经济的时候，常把自己的汇率提高，低估外汇美金，无视于外汇的供求平衡，以致于兑换的时候，由于美金官价订得太低，使美金的需求大于供给。台湾过去也有类似的问题。1984年我第一次见到赵紫阳，建议他把美金汇率提高，人民币贬值，但是因为中国人的观念不同，没有采行。不过从1985年一月至十月，人民币开始从二·八元兑换一美元逐渐贬值为三·二元兑换一美元。1986年七月中国采纳经济顾问建议，外汇大幅贬值，人民币从三·二元兑换一美元贬为三·七元兑换一美元。当时我与费景汉等四人正好在北京与体改委会谈，星期六我们主要谈外汇贬值的问题。第二天（七月五日）是星期日，我的儿子来西苑饭店看我，他当时在人民大学做事，每个月薪水六百元人民币，可以兑换成外汇券。我想起前一天讨论外汇的事，知道他手上持有太多人民币和外汇券可能不妥，不如换成美金。我自己身上带有二百多元美金，于是主动建议兑换给他。那知我们喝完咖啡之后，赫然发现旅馆所挂的外汇牌价汇率已经贬值，我现成地吃了亏。可见在我们开会之后二十四小时之内汇率已经变动。以后人民币兑换美元的重大汇率调整，包括1990年十一月的五·二二元、1993年二月的八·二元、1994年一月的八·七元。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外贸体制与物价的变动，出现了双重汇率，直到 1986 年、1994 年中国才调整人民币汇率制度。在经济转轨期间，除了政府订有官价汇率之外，民间另有通行的市场汇率，可以兑换外汇，这就是双轨制。1984 年的时候还没有双轨制，1985 年十二月在深圳开始成立外汇调剂中心，1986 年才出现这种官方汇率与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双轨制。

1994 年一月一日中国取消人民币双重汇率，改采所谓的管理浮动制，并逐渐转为钉住单一货币的固定钉住制。事实上并不是进行制度改革，仍是以调整汇率为主，让人民币贬值 33%，因为人民币的官订汇率太高，因此改成均衡汇率，使人民币的供需近乎均衡。不过到了现在 2006 年人民币的汇率反而低估了。虽然 2005 年七月二十一日外汇制度稍有更动，放弃钉住单一货币美元，改为参考一篮子货币，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制度慢慢朝向自由化，其实大部分还是由政策决定。名义上汇率变动比较有弹性，仍然不是一个机动的、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至于汇率制度是否能够彻底转变，由于牵涉的问题很多，仍在讨论之中，直到今天还是没有进行制度改革。

前面曾提到外汇券，外汇券在 1990 年代初期取消（1980 年四月中国银行开始发行外汇兑换券，1994 年一月停止发行，1995 年一月停止流通）。也可以说此后中国的汇率制度没有太大的改变，只有政策的调整。至于外汇政策，要求中国完全开放人民币汇率，目前仍无法做到，这是政府的基本态度。对于明知做不到的事，我就不会再说，因为不可能做到。如果基于政治上的理由，使中国的领导人对于一件事情的看法无法改变，我就是和他说了，也没有用。没有效果的事，我不会建议。如果他们愿意考虑改变，我才提供意见。

再以人口政策为例，我在书中只是提出自己对人口问题的看法，从经济立场来分析。我的目的并不是建议中国应该怎么做，写书和担任政府顾问提意见不同。不过我对中国人口的意见也不是完全没有影响，可能对于人们思维的改变会有一些影响。我提到国外或西方反对中国的人口政策，多从人道方面着眼，认为国家控制人民的生育行为太严格，而且手段过于残忍。从人权的观点而言，中国的人口政策不妥当。我则从人道和经济的观点出发，在两本书里提到中国的人口问题。很多人认为中国的人口是一个问题。中国政府的态度也认为人口过多，不只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乃至对全世界、全球都有影响。有些美国人也这么认为。我的看法不同，如果说中国的人口太多，那么适当的人口数目是多少？其实中国人可以多养一些孩子，人口就代表国家的影响力。

2006年七月五日我和台积电的董事长张忠谋一起共进晚餐，他说台积电要去中国设厂。我问他为什么要去中国设厂？是不是因为人工便宜？他说不是因为人工便宜，而是因为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可以在中国的国内市场行销。在台湾生产，虽然名义上可以进口，但是产品从国外进口，在市场上竞争的时候总是吃亏的。所以人口多，自然形成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这一点很有利。因为中国人口多，本身的国内市场很大，就能发挥规模效果。如果在中国发明一个产品、写一本书，就可以销售很多。相对于一个小的地方，市场很小，例如在台湾写一本书，没有多少人会买。任何一个创新，光是中国的市场就足以吸收。

另外，我谈人口问题的时候，还提到人权问题。这个观点很重要，因为我的说法连中国人本身都未见得同意。我批评中国的人口政策有问题。第一、从经济观点而言，长期来看，未来需要人力资本。现在不生小孩，未来那有人力资本？现在看起来生养一个小孩可能很昂贵，可是十八年之后他就有生产力。生育等于投资，现在要付点代价，就好比盖房子，现在要花成本，但是不能只计算它的成本，还要包括它以后的报酬回收一起考虑。第二、会摧毁中国的家庭制度。因为一个小孩会被四个祖父母、两个父母宠坏。第三、人口政策干涉人民的自由。这点就牵涉人权问题，为什么政府要管人民生小孩？古今中外都没有政府决定生育子女数目的例子。中国现在也开始调整人口政策，如果双方的父母都只生一个小孩的话，这对年轻夫妇就可以生两个子女。因为最近发现中国的人力不足，人口政策从1980年开始推行，经过了二十几年，现在要找二十几岁的人工作已经不容易，因此中国必须改变过去劳力密集的成长模式。

就经济学立场来说，中国的人口问题在于全世界担心中国消耗全球资源过巨，因为中国国内市场太大，例如石油消耗。我在美国和别人讨论这个问题，他说中国人用石油太多，我说别的国家的人难道不用石油吗？中国人也是人，为什么中国人多用石油就不可以？每个人都有用油权，凭什么说中国人用油太多？其实平均来说还是美国人用石油比较多。我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谁付钱就归谁使用，不能用人种、国家做为判断的标准，这些说法完全错误。身为美国的消费者，被迫付出很高的费用，而归罪于中国人抢着用石油；反之，中国人也可以用同样的说法，如果不是美国人用太多石油的话，油价也可以便宜一些。美国人认为过去中国人还没有使用这么多石油的时候，油价可能因为阿拉伯国家的策略性提高油价而上升，最后还是会降低下来。因为石油输出组织是一个垄断性的组织，油价可以调升，也可以下降。可是一旦中国人养成大量消费石油的习惯，油价就只会一路升高，不会再下跌。现今世界经济发

展的情势如此，例如印度所用的石油也越来越多，这种趋势一旦开始就不会改变。

我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有下列五点值得重视：（1）中国先从农村改革开始，到 1983 年农业部门已获得相当成功。台湾早年的经济改革也是从农村开始。（2）城市改革从计划经济逐渐演变成市场经济。1980 年我首次去中国时，官方尚未宣布放弃计划经济，只说全民企业（后来称做国有企业）要扩张自主权。1984 年我和赵紫阳谈市场价格机能，主张价格要放松，不要管制。同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央委员会宣布物价改革，主张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双方要平衡。此一物价改革极为重要。1992 年十月中共党中央宣布说中国是市场经济，更可说是一大进步。可见中国改革开放之始，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再演变成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者并重；最后是以市场经济为主。经济改革的脚步是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演变的结果。（3）产权问题有待解决。过去中国政府不主张私人财产权，从来不谈私有化问题。但是产权问题与企业经营效率密切相关，关键在于如何使重要国有企业既不私有化，又能有效率的经营。1996 年七月一日我和太太 Paula、张忠谋、刘遵义谈到大陆的产权问题，他们主张政府不要拥有财产权，我不完全同意这种看法。产权不一定要私有才好，中国有些乡镇企业经营效率也很高。可是十年后的 2006 年我也同意政府拥有财产权，常常是造成贪腐的来源。直到 2007 年三月十六日物权法通过，才解决产权私有化的问题。

（4）必须注重宏观管理。例如银行制度不健全，没有现代化的银行。此外，外汇、进出口国际贸易等问题均有待解决。1986 年十一月我和体委会开始讨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问题，目的是要建立中央银行体制，由一个中央银行结合其他的商业银行，形成金融体系。中国从前没有这种金融体系，只有人民银行和全国各地的分行，改革之后现在已有新的银行，也利用中央银行控制金融政策。我们开会之前先由中方体改委提供资料，介绍 1985 年和 1986 年两年的经济运行状况及银行面临的问题。资料利用外交管道传送，先寄到中国驻美大使馆，由驻美大使馆交给中国驻国际货币基金的代表，再转交给我。这是为了方便。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派驻有代表，他也是一个中国官员。中方也要求我用合适的管道将资料转交给其他的顾问，等于是要求保守机密。在当时的中国任何文件都是机密，直到最近也还是如此。例如纽约时报的记者被逮捕，就是因为报导关于金融、外汇的问题，中国认为这是涉及国家机密的两大重要问题。

(5) 财政赋税问题日趋重要。改革开放之初，多由中央政府计划经济分配生产任务，有国营企业提供政府收入，所以不谈财税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开放，乡镇企业、国有企业自主权日益提高，政府税收财源相对缩减，经费短绌，因此财税问题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必须想办法解决。虽然 1995 年订了新税制，仍须继续改善。台湾有些制度也值得中国参考，例如 1970 年代初期财政部长李国鼎实施国库集中支付制度，1998 年中国透过世界银行邀请台湾的人帮忙，去中国介绍这个制度，提供他们参考。2007 年三月十六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物权法和企业所得税法，对于政府的财政税收也将造成重大的影响。从中央政府的观点而言，现在看来 1995 年的税制改革非常成功。从 1990 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的财政税收相对于国内生产毛额迅速成长，足以支应教育经费和其他政府支出的快速增加。

有人比较中国的经济发展与苏联、东欧国家的不同。当苏联、东欧国家进行经济改革时，学者在华盛顿举行研讨会，提出「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他们认为经济发展有一个模式，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等国都遵循这个模式进行改革，立刻进行私有化、自由化。可是中国没有这样做。我认为经济发展成功与否，财产权私有或公有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国有企业需要竞争，也可以变得有效率，赚钱营利，所以政府需要提供国有企业竞争的环境。共同持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也不一定是有效率的经营模式，股份制未必是企业经营成功的答案。目前中国的国有企业大部分的股权还是归国家所有，其实控股权只要有百分之二十就已足够，其他的股权可以分散出去。

1999 年我在北京主办「科教兴国国际研讨会」，邀请 Ralph E. Gomory 参加。他担任过 IBM 的资深副总裁，退休以后担任史隆基金会的主席 (president of the Alfred P. Sloan Foundation)。当年我在 IBM 公司工作时，他是该公司的一个小经理。他做事非常认真，说开会之前要先用两三天的时间来了解中国企业，在没有了解中国企业之前，他没有资格参加会议发表意见。我答应带他去看一看中国的企业如何管理。中国的小型企业多是私有企业，大企业的股份还是政府所有。1997 年江泽民说国有企业要改成股份制，1999 年我陪 Gomory 参观中国的企业，就问他们改成股份制以后有什么差别？其中一个经理告诉我改成股份制以后，其实没有什么改变，过去是党委书记管理他们，现在党委书记变成董事长，还是同一批人，和从前一样，只是开会多了一些。也就是花更多的时间开会，完全没有什么效果。表面上看起来中国的企业制度改变了，但实行起来没有成效。2006 年七月四日我在中央研究院用晚餐时，有一位研究政治的学者在座，我问他台湾现在的民主政治如何？他说台

湾的民主政治，表面上有成文宪法、有选举，但是很多地方根本没有遵守法律、制度。所以不能只从文字表面上改革制度，行为却没有改变。中国的国有企业也是如此，只是改了外观样子，行为却没有两样。

有关政府拥有财产权的问题，在 1996 年时经济学家认为政府不要经营国有企业，但是我认为政府还是可以拥有财产权。我认为国有企业不一定不好，重要的是看制度如何。国有企业在下列前提之下，经营也可能有效率：第一、要竞争。有竞争就很难贪污，无法图利自己。因为如果经营没有效率，别人在竞争，收钱贪污的企业就无法生存。所以企业要自负盈亏，而且要有竞争，这很要紧。我在书里也提到一个印象最深刻的例子，1985 年时我去广州，教委招待我住中国的东方宾馆，一样经营得很好。可见广州市政府给旅馆的企业管理人自主权，即使是公共事业，但经营效率很高，因为有其他的旅馆业者在竞争。第二、要给管理人多劳多得。如果管理人经营得好，要多给他一些报酬，就不用贪污腐败。在很多情况下，贪污腐败是因为只能做事，不能拿钱所造成。因此可以学私人企业采取奖励的办法，给管理人员更多的报酬。我和其他的经济学家不同，很多人认为要私有财产权才能维持经济运作，我赞成私有制，但不一定是必要条件。公有制未必不好，如果提供适当的环境条件，公有制也会有好的经营效率，这是我十年前的观念。可是十年之后的现在，我也同意政府拥有财产权常常是造成贪污腐败的来源。这个观点我在《中国经济转型》一书中讲得很清楚，这是研究中国经济所得到的一个教训。

中国自从推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已经了解到过去几十年所走的计划经济路线行不通，邓小平很清楚这一点，所以我提供的建议他们大多都能接受。至于计量经济学的应用，我认为利用经济模型的推估来观察经济现象，肯定有它的作用，可以用来参考，但是不见得能够用来制定计划或做经济决策。无论是台湾的经济发展或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都是如此。

（三）六四天安门事件

1989年三月我邀请海外经济学家和中方人员在香港讨论通货膨胀问题，三月十八日安排香港前途研究会的成员去北京会见赵紫阳。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赵紫阳。

第二天（1989年三月十九日）我去人民大学向经济学培训班同学演讲，顺道带胡应湘的第二个女儿和她的同学（冯国经的女儿）去参观访问（她当时还是高中生，现在已经毕业于哈佛大学）。演讲之后，我和学生谈话，通货膨胀已经开始恶化，也有贪污的情形，很多学生对这些现象极为不满。到了四月胡耀邦死后，学生借集会纪念为名，趁机表达不满，一如周恩来死后的情形。最后事态恶化演变到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因而爆发天安门事件。我当时的印象是1988年和1989年的中国大陆相当自由，年轻人可以随意发表意见。我去演讲的那一班有五十个学生，原来的主题是谈经济学教育，后来变成无所不谈，学生趁机批评政府，言论非常激烈，若是在从前一定会上报成为新闻。我说：「中国政府未必这么差劲，他们也做了不少事，例如教委主办你们参加的讲学班等。」离开人大之后，印象深刻的是那两个香港高中生问我，为什么中国学生对于政府反感这么深，令他们不解。

自从1989年三月和香港前途研究会成员一起去见赵紫阳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不过我曾写信给他。五月苏联总理戈巴契夫访问中国大陆，因为学生的示威活动，造成接待不方便，中国官员觉得很没面子，情势越来越混乱。有一次我取道旧金山和Milton Friedman见面，他请我在史丹福大学的教职员餐厅吃自助餐，内容丰盛，包括主菜、饮料、水果、甜点，不过索费美金六元，价格低得令人难以置信。饭后我们一起看电视报导，讨论中国混乱的局势，谁也没想到后来竟发生六四天安门事件。

六四事件发生以后的第二天，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教授聚集在我家，包括余英时、项武忠、方闻、林寿海等。大家群情激动，一起讨论，认为中国政府做法失当，我们要建议美国政府召回派驻北京的大使以示抗议，并推派我为代表向校长反映，要求校长打电话转告美国国务卿。近年普林斯顿大学连续有三位校友出任国务卿，当时在任的国务卿舒兹（George P. Shultz）即是其中之一，校长去打交道有其便利之处。接到我的电话后，校长很冷静，说：「我们对于外交事务不清楚，召回美国大使的做法，不知对美国外交是否合理？这不是我们学者意气用事可以决定的。」我想一想一群大学教授也像大学生一样慷慨激昂，聚在一起讨论，认为凭自己几个人的冲动，就可以决定天下大事。过了两三天，我逐渐冷静下来，我只能说六四事件已经过去。赵紫阳不做总书

记，大家都说是中国的损失；对我而言，即便如此，我在中国的工作仍要继续进行。很多人对于六四事件不能释怀，每年举办示威游行、演讲等纪念活动。我尊重各人的自由。一如经济学研究，尽管别人的意见和我不同，我仍然鼓励他写出来给大家看，最后一定会有公正的评断，这样学术研究才能百花齐放。

六四之后，普林斯顿有大陆民运人士活动。我尊重每个人都有行动的自由，但认为此举没有什么价值。我有一位朋友，也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他说这些民运份子是不相干的，先是六四事件之后示威抗议喧腾了一阵子，但后来的一些活动就不相干了。我也同意他的说法。他们所举办的六四事件的后续活动，对于美国、中国大陆、台湾都不会有积极的贡献，或有可能提醒中国领导人应多尊重民意。我仍然尊重别人有权利去做他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我也认识一些民运人士，和他们间有来往。我的太太Paula因为职务的关系，对普林斯顿的学者和学生提供服务，所以和民运人士接触较多。

在美国有个公共电视台十三频道，它有一个以讨论经济为主的节目“Adam Smith”，每星期五晚间有半小时节目，主持人是Jerry Goodman。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他邀请David Lampton（中美企业交流会主席）、Jinny Kamsky以及我，三个人谈六四对于中国前途的影响。我们三个人的看法都相当乐观，也没有趁机大骂中国政府。Jerry Goodman觉得有点不妥，请其中一人加了一两句批评中国的话。

六四之后两个星期，我在香港普林斯顿校友会上演讲。胡应湘是校友会主席兼介绍人。在场有八、九十人参加。我的讲题是「中国经济发展趋势」，题目是六四之前决定的，六四之后仍维持不变。我认为六四对于中国经济影响不大，若以十年来计算，可能使经济成长率降低 5%，亦即每年降低 0.5%，且集中在最近一两年之内下降较多，亦即 1989 年、1990 年经济成长较慢，以后中国经济仍然将持续成长。我认为经济体系自有其运作的力量，其他因素对于经济的影响不会太大。在座的人很难同意我的看法，即使是担任主席的胡应湘也不高兴。离开香港之后，我去了中国大陆，再回美国。招显洸寄来那次演讲的剪报，报导说我的演讲代表中国官方的立场，是一种拍马屁的说法。

1992 年普林斯顿大学校长Harold T. Shapiro首次来台。他先去日本，再来台湾，然后去香港。来台之时，我约他会见李登辉总统，以及李国鼎、于宗先、郭婉容等朋友。香港的校友会也欢迎校长来访，开欢迎会之时，他们都向我恭喜，说 1989 年我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判断完全正

确，亦即中国经济继续成长，改革不会因六四事件而中断。我写成〈中国未来成长的展望〉，收入 1994 年书中第六、七章。然而我的说法当时在美国也不受欢迎。Milton Friedman 在六四之后预测中国经济会崩溃，他后来写信给我承认自己过于悲观，但他又对 1997 年之后的香港采取悲观的态度，因为他不相信港币能独立。我却认为 1998 年香港局面依然会稳定，两人为此打赌，输的人做东道主请客。

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八月我再去北京，一到北京就问起赵紫阳，过去常陪我会见的教委官员则回答说现在不是适合见面的时机。六四之后，虽然赵紫阳不再是总书记，国务院还是同一批人在办事，部会首长大部分仍是赵紫阳的班底，只有少数官员如鲍彤被撤换下来。关于赵紫阳的下台，众说纷纭。有人说赵紫阳分裂党，我认为这很难说，因为各人想法不同。另外有人说赵紫阳对邓小平估计错误，自以为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当天安门事件之时，邓小平要赵紫阳出面说话，赵紫阳不肯答应。实际上邓小平仍然是最高的决策者，所以他只好下台。

我虽然不是赵派，但是和赵紫阳合作良好。1994 年我的书出版之时，我把赵紫阳给我的信附在书中。虽然中国政府方面有人觉得他做错事，我确实和他一起共同做事，不能抹煞事实。六四之后，我自认为该做的事仍然应该继续去做，一如从前我在台湾工作，即使行政院长换人，我的工作也不因此而中断，必须再去中国大陆。先是六月中旬，我在香港普林斯顿大学校友会上演讲。七月初岭南大学开董事会，经常有十二至十五人从香港去广州参加，因为六四事件的缘故，只去了五个人。八月福特经济培训班的美国委员会和教委要在北京开会，美国友人叫我不要去，例如 Frank Press 是美国科学院（Academy of Sciences）院长，他说中美之间不要再交流。Stanley Katz 则支持我们去北京开会，他在美国科学院很有地位，写了一封信给我，他说：「教授西方经济学的计划就像一部车可以帮助中国走上现代化之路。这将是一个很好的尝试，我们是否有能力在中国学术界以非意识形态的方式争取胜利，并开始恢复真正的开放和具体的合作。如果不履行这个尝试，则无法评估成果。在尝试过程中，我们建议和中美经济教育交流委员会进行密切的商讨，并得到福特基金会的经费协助，希望你们赞同此一意见。我们也赞成你们强烈支持中国人权的立场。」即使他不写这封信，我们也会去。

我是美方委员会的领队，美方委员原有七人，Lawrence Klein 和 Herbert A. Simon 有事不能参加，只剩五个人前往，包括刘遵义、D. Gale Johnson 等。我们本来预定八月要去中国开会，六四事件发生之后我们还是继续原定的行程，但在美国备受舆论批评，因为美国人反对与中国来

往。中方委员会非常感谢我们，他们说此举对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向很有影响。当时在中国中央政府，六四事件给了他们一个很大的冲击，连未来的方向都搞不定，所以中方委员会说因为我们去了，他们才能够继续原来的开放交流政策；若是我们不去，以后会怎样发展就很难说。原先他们主张要和美国合作，如果因为六四事件，我们这些美方委员就不去，他们可能无法持续开放政策。这次美方委员会去中国发挥很大的作用，就是在这一次会议上双方再度签订合作契约。

1989年八月我和江泽民见面，报纸和电视都有报导。福特经济培训班美方委员会有七人，每年和中方开一次会，开会地点采轮流制。中方的负责人是黄达教授，他是人民大学副校长，后升任校长，兼负责人民代表大会金融小组，制定金融法律。1988年中方委员赴美开会，1989年轮到美方委员到北京开会。由教委负责招待我们五位委员。有一天，教委的一位同事来电告知，他与江泽民的秘书联络过，江总书记想要见我。我答应了。第二天早上，我和其他四位委员共进早餐，问他们要不要一同去见江泽民，他们都拒绝了。除我个人之外，过去我们这个委员会也从未见过赵紫阳。

我和江泽民见面谈了一个多小时。他说他读了我写的《中国经济》，大概别人告诉他有这本书。他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有些数学基础，他看了我书中第六章简单的宏观模型，我们讨论了一下。从前我和赵紫阳见面，每次都谈经济。这次我和江泽民没有谈太多经济，我们谈话的重点在于六四天安门事件，坦克车没有压死在天安门广场聚集示威的学生。他向我解释了半个钟头，当时北京宣布戒严，军队欲从长安街进入天安门广场，被民众阻挡不得进入，双方发生冲突，军队与民众互有不少死伤。当军队突破民众封锁之后，坦克车开入天安门广场，学生开始从广场撤退，所以在天安门广场没有冲突与伤亡。这种解释在美国人看起来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杀人就是杀人，在长安街杀了人而在天安门广场没有杀人，这并没有什么差别。江泽民说学生不守规矩。我听了他说的话，没有表示意见。对我而言，天安门事件已经过去，我对这件事没有太大兴趣。但是他一心牵挂着这件事，谈了很久。

我觉得他对于天安门事件的说法，我都听清楚了，不过我不能代表中国官方向美国友人去解释。大陆的电视新闻主要报导政府首长接见某人的消息，他们也报导我和江泽民见面的新闻。不久之后，美国大使馆约我见面，问我对江泽民的印象观感，我也据实相告。江泽民原来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外界对他了解不多，故有此一问。后来有人告诉我，江泽民当总书记之后，我是他的第一位美国外宾。

1996年六月二十二日我从广州到香港，再去台湾。在广州之时，岭南（大学）学院董事会开会，友人送了一卷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录影带给我。恰巧我在中央研究院活动中心与两个外国朋友聊天，他们两人来此地参加学术会议。我们谈到天安门事件，我说：「手上正有一卷录影带，何不放映看看？」于是拿出来播放，大家一起观看。在美国另有一卷电视台拍摄的天安门事件录影带流传。这个新的版本与美国版有部分内容重复，他们的重点都在说明军队进入天安门广场之后并没有杀人。我认为用「屠杀」一词有待商榷。

1989年八月我的北京之行，长远而言，对于我在大陆的工作颇有帮助。我与教委以及黄达等人合作进行经济学教育，如果我不去北京开会，中方的委员会可能因此解体。因为如果别人攻击他们，说美国朋友因为六四事件而不来，或许会影响我们日后的合作。所以他们见到我们来北京开会，等于有美国朋友支持，都非常高兴。我们双方本来签有三年的合同，这是第二年，尚未期满，应该到1990年暑期再续合同。但是我们提前在1989年十一月续约，再订三年合同，共计从1990年到1993年。因此为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的两个培训班多争取到三年的时间，对我们的工作很有帮助。离开北京之后，我去广州岭南学院。岭南学院是中国大陆唯一设有董事会的大学学府，而且其中多位校董是从香港来的外人。有人持反对态度，认为办教育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掌握，不要外人参与。所以岭南学院的人也说我去北京对于大家办事都方便不少。

当然，也有许多人对我的北京之行持负面的看法。例如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同事（他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打电话给我的太太Paula说他以后要和我断绝来往，但现在我们仍有来往。

1988年我去了很多地方，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东京等。我去深圳参加「中国经济改革十年回顾研讨会」。在开会之前，我曾和赵紫阳谈过政治改革。我在会议上发表〈中国的政经改革和香港前途〉（“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Hong Kong.”）一文。我离开深圳之后，去了香港。在香港时，我再说了几句关于政治改革的话。我认为民主制度对于经济发展并非必要，例如台湾有很长的时间没有民主，仍有经济发展，很多人都同意这一点。韩国也是如此。重要的不是民主，而是基本人权和尊重法律。中国自1950年代初期就已通过宪法，其中保障国民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然而众所皆知过去三十年来这些基本权利并未得到尊重，甚且屡屡被严重违反。中国的宪法规定有各种自由，即便如此，中国人事实上并未享有，所以我说：「宪法重要的是实践对法律的尊重」，光写出法律条文来是没有用

的。台湾也是如此，有很好的法律，但同样有守法的问题。2004年七月，我和二十位经济学者在台湾开一个三天的会议，我们向台湾政府提出的第一个建议就是：「政府和全国都应该尊重法律。」

2005年十二月中国经济学年会举行第五届年会，这个学会和留美派的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不同。这个年会刚开始的时候，仍以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为主，但不是传统派（马克思经济学），而是现代化派。由北大的林毅夫和海闻倡立，每一年的开会地点不同，2005年第五届年会在厦门举行，邀我去做主题演讲。厦门大学的大礼堂可以容纳五千人，按座位来看大约有三千人出席。参加开会的成员大概有五百多人，其他有些是厦门大学的学生，有些是附近大学的学生来旁听。第一天开会的时候，很多人来参加，等上午开完会，开始讨论经济论文的时候，人数就减少一些。我讲完以后，大家讨论问题，有人问我：「你对中国以后推进民主制度有什么想法？」我说：「我不住在中国，我在国外居住，这件事还是由你们决定。」很多人对这个答案给予鼓掌。可能因为国外去的人常给他们提供许多意见，我却对中国民主这件事不太发表意见。有人认为我的态度不对，应该要对这件事多发表意见。我即使说了，也没有用。我做事讲求效率，如果我说的话有影响力，我可能会说。至于中国要不要推动民主改革，我不能发挥任何影响，就不用多考虑。

（四）中国经济研究

（1）一九八一年至一九九六年

在1980年回大陆之前，我已对中国经济有兴趣，但没有进行研究，因为资料难以取得。当时研究中国经济的人，只能从报章杂志找资料，没有多大意思。改革开放以后情况就不同了，一方面是我可以取得资料，另一方面是我对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学教育有兴趣，所以做中国经济研究。记得1980年我第一次去上海，参观复旦大学，想找一些有关中

国经济的书籍。在图书馆里找不到一本这种书。因为经济系所教授的并非中国实际的状况，纯粹是空的理论。1950年代初期做过一些统计，有统计数字，后来也停止出版。复旦大学负责招待我的一位先生，不肯老实说没有谈中国经济实况的书，只说替我找。我等了一个钟头，再去催问，他又说在另一个图书馆。我说我自己跟他去找一找，找了老半天，查遍好几个图书馆，才知道一本也没有。我心里很气他不肯明说，但事后想一想自己太不懂事。中国人做事比较拐弯抹角，我在国外住久了，在国外办事，说一是一，所以参不透其中的玄机。难怪说外国人为人处世头脑简单。同理可知，我在台湾也有一些适应不良的情形。

中国统计年鉴从1981年开始出版，在此之前没有统计资料。据我所知第一本关于中国经济的书是马洪送的。在大跃进之后，党想知道大企业如何运作，由他担任副团长，去调查北京的一个工厂，有工人、工资等资料。所以他的这份报告有确实资料做根据，1960年完稿，1980年出版。这是我写书之时，有关企业方面唯一可以参考的材料。1983年我写《中国经济》时，已经有统计资料，虽然没有每年国民所得（GNP）的资料，我还是发现加速原理（acceleration principle）在中国也能成立。投资是所得变化的函数（ $I=F(\Delta Y)$ ），亦即前后年所得差异的函数（ $I=F(Y_t - Y_{t-1})$ ）。在解释净投资的估计式中，第二年和前一年的所得系数分别为正、负，但绝对值相等，故两者之和为零，证实加速原理的存在。另外，我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来估计大陆国有企业的投入（ X_1 ：劳力， X_2 ：资本）和产出（ Y ）的关系，证明 $\log(\frac{Y}{X_1}) = \alpha + \beta \log(\frac{X_2}{X_1})$ 的回归式成立，并画成图形。虽然1983年写书时，只有1952、1957、1965、1975、1979、1980、1981七年的资料，后来再补上1982至1984三年的资料。资料不全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其他年份的数字不规则而不用。这说明Cobb-Douglas生产函数可以解释国有企业的经济行为。

1984年的暑期班举行时，这本教科书的英文版即将出版，已有初步印就的散装页，而且中译本已由杨小凯和于大海翻译，全书一共有八章，每人各翻译四章（大部分是他们自己翻译，杨小凯将其中一部分寄回大陆请朋友帮忙译完）。后来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位副教授将此书重新编辑出版，版本和大陆版不同。大陆版没有编者，也用了一些大陆习惯用语，印出来的书品质也没有香港版好。南开大学出版一万本，我按照美国惯例，作者每本抽15%版税。每本书定价人民币二元，版税约三毛钱，合计人民币三千元。若以后再版，条件仍不变。不过后来并没有是否再版的消息。南开大学版只限于在大陆发行，但我在旧金山也看到这本书，可见有外销。事实上，在大陆签合同，若无人事关系，很难追诉

出版公司。即使在美国出版书，作者和出版商之间也是采诚信制。过去台湾大量翻印盗版书时，许多人来台湾也采购大量的书。现在盗印问题在大陆很严重，版权是中美两国贸易谈判争论的重要议题之一。我曾在1996年六月的报纸上撰有专文讨论。

我认为把现代经济学理论用在中国大陆上，这一点台湾经验很有用。因为早年台湾的社会国情与美国不同，有些人也怀疑用经济学理论来分析台湾的经济政策能否适用，从1960年至1990年一直有人抱持这样的看法，现在还有这种人，只是人数很少。从1960年代到1970年代我常来台湾，也参与设计经济政策，我认为经济学最重要的是活用，只要观念正确即可。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是追求最适化（optimization），中国企业的目标函数可能与西方社会不同，不过追求限制条件下的最适化观念仍然适用。例如我在书中讨论中国国有企业的例子，他们在改革之前追求产量极大化，而非利润极大化。改革之后企业的目标函数不同，其他相关的经济行为也随之而改变。尽管企业的目标函数不同，最适化的分析方法都可以适用。

1996年七月我去新加坡演讲，主题是中国的经济制度，后来在美国经济学会上正式发表为〈中国经济制度对经济学理论的挑战〉（“Challenges of China’s economic system for economic theory.”）。我在文中提出四个问题：（1）私有制与集体公有制；（2）西方法制与东方法制；（3）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4）多党政治与一党政治。上述议题的答案，在西方早有定论，在中国持论都站在与西方相反的一端。中国虽有私有制，但比例很小；大部分人不绝对守法，和西方社会的法治不同；个人主义即使在台湾也不至于像美国如此极端；一党当政的情形亦与美国不同。这样是否一定不好？倒也未必。李光耀等人对我的看法大概会有同感，他们对新加坡的成就很自傲，外人不能因为新加坡是一党政治就横加批评。其实经济学理论不只限于西方的那一套，以为放诸四海皆准，全世界都应该如此运作。现在亚洲经济相当进步，从日本开始，接着是亚洲四小龙的香港、新加坡、台湾、南韩，后来是中国大陆，先后陆续发展。西方人无法视而不见，亚洲的经济力量已等于美国，这有助于开拓美国人的眼界，对于未来美国的经济理论研究产生影响。经济学理论从前都是学西方的那一套，以后可能会改变，至少很多基本概念应该更客观一些。例如多党政治未必好，一党政治未必坏。

1996年四月宾州大学有「经济学之日」（Economics Day），每年订有题目，该年是「亚洲经济发展」，邀请我讲中国经济。我本来打算讲刚完成的〈如何计算大跃进对中国经济之损失〉，可是一看听众大多为

企业家，对这个计量经济专题没什么兴趣，于是临时换个题目，改讲中国的市场经济，听众反应非常热烈，未来十年至二十年其中有些观念会对美国经济发生实际影响。我在 1997 年一月美国经济学年会上正式发表这篇文章。香港科技大学每年有七、八人去参加美国经济学年会，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也有人参加。

亚洲经济中有一些独特的现象，值得深入研究，特别是中国的人口与产权制度。有人认为现在中国的一般教育水准不够高，同时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力投入生产建设，因此主张等教育资源较为充裕以后，再多生育人口。不过我认为中国已经有足够的资源来培养人力资本，学校的数量已经足够，尤其在已经发展的地方。另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人力资本并不是光靠学校培养。例如为什么上海人比香港人优秀？这不一定是因为上海的学校比香港好，而是上海在各方面有自身的文化传统，如家庭教育等。一个文化整体是由很多部分共同组成，就中国整体而言，训练人才所需要的教育资源绝对足够，并不是要将每个国民都训练成最顶尖的人才，例如也需要培养工人。

我在香港城市大学教课，有些研究生向我请教，讨论他们的研究项目。有一个研究生想要研究中国的教育投资报酬。众所周知，中国在文革时期关闭了很多学校，使学校教育失去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一般人计算生产函数，产出是由实质资本和劳力两个生产要素决定。研究人力资本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实质资本必须将人口中各种不同的人力资本素质列入计算。例如用教育程度来加权，如果小学毕业的人算一个单位，中学毕业的人可能算一个半单位，大学毕业的人算两个单位，也就是必须按接受教育的年数来做加权计算。我从前也做过生产函数研究，在《动态经济学》一书的第五章就是讨论生产函数，用新的研究方法，也更新生产函数的资料。我和林安乐合作研究，用劳力计算，得出不错的结果。我建议该名学生用人力资本来计算，结果应该会比劳力更好，因为将工人的教育程度也列入计算，可以显示人力资本对于产出的影响。

这个研究生想证明文革对教育的影响，造成人力资本很大的损失。文革对人力资本有不利的影 响，因为人力资本的时间序列资料一定会受到影响。虽然我建议他可以尝试用人力资本来解释产出，至于结果是否比用劳力解释较好？我认为不一定。文革的时候因为政治运动的影响，中国的年轻人无法受教育，使得这一段时期人力资本的衡量和前后期不同，因此人力资本不见得是一个很好的解释变数。虽然个人不能代表全体，我还是要举谢宇院士为例，现在他的研究很优秀，可是他在文革时

期根本没念过书。现在中国有很多人文革时不曾读书，他们出社会以后做事的表现，却不太容易看出其中的差异，可见他们能在学校体系之外得到培养和训练，学校并不是衡量教育的唯一指标。

中国庞大的人口是一个很大的优势，而且中国有一些文化观念有助于人力资本的养成，亦即每一个社会文化训练出的劳动力不同，各国的劳力不同质。现在经济学流行一个观念，文化的社会规范是影响经济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有十三亿的人口，它的市场经济运作法则和社会文化密切相关，这样的思考方向可能开创经济学研究一条新的道路，以中国文化思想形成的市场经济学。我主张各国的人力资本素质不同，也同意这个观点，但是具体来说，中国的人力资本和韩国有何不同？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我没做过研究，还不能提出什么观点。

另外，有学者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住房的私有化和交易买卖，促进了消费的活络，使上海等城市非常繁华热闹。如何促进中国西部发展的问题，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考虑。例如香港的繁荣，早在 1960 年代就已经促进房地产的扩张。很多香港的有钱人，都是从不动产交易起家，累积了雄厚的资本。社会上也有这种实际需求，很多人需要住屋，使从事房地产的人大发利市。房地产也是投资的一种，经济发展与此有关。

在香港，土地是否私有无所谓，只要取得一份长期租约，便可以在土地上建屋或做其他用途，已经形同购买土地。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有两种住房，就和物价一样，也是采行双轨制。一种是政府公务员和大部分平民的居住方式，住在便宜的风子里；另一种是有一些人已经富裕起来，容许一些房地产以市场价格出售，这种住房越来越多。大约十年前（1996 年），在北京、广州等地，我亲眼看见公寓住宅开始兴建起来。

过去人们常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私有财产权缺乏保障，这是理论性的说法，事实上人们已经不用提财产权的问题。很多人知道自己有钱，而且他们的财富不可能被政府剥夺。人们如果没有安全感，可以将一部分的钱存到国外去。有一个说法认为中国人的储蓄率非常高，是因为他们不肯用来购屋，纵使有住宅私有化政策，也担心政府政策随时会改变。这种顾虑可能会造成一些心理影响，也只是次要的影响，不会改变人们赚钱的意愿。如果有这种疑虑，他们赚到钱以后可以转移一部分到国外去，分散风险。即使中国实行外汇管制，还是有办法可想，政府管制不了。

经济学不断发展，中国有各种新的课题，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之下，必须用革命性的新观念来研究。例如私有财产权，就是一个很好的研究题目。从写博士论文起，我的习惯就是先花很多时间把经济理论弄清楚，再接触实际资料。例如计算大跃进对中国国民所得的影响，也有经济理论做基础。再如研究中国大陆的通货膨胀，先用简单的货币数量理论，写出几条数学式，与同事讨论，接着再找资料，用电脑计算回归结果。至于研究中国经济，目前经济学已有的方法和理论大部分都适用于中国，日后将会有更适当的新理论或新方法。

我做研究，最重要的出发点是自己的兴趣。环境也有关系，例如我到台湾来和经济研究所的同仁讨论，回到普林斯顿大学则和同事讨论，都有影响。我对于研究中国经济有兴趣，这方面的著作始于 1985 年出版的书《中国经济》。在《动态经济学》一书中也曾估计大跃进对中国经济的损失；另有《中国经济转型》一书专门讨论相关问题。至于未来做研究写文章，开辟新的研究题目，端视自己的兴趣而定。例如我提到中国市场经济的四个主题：财产公有制与私有制、东方法制与西方法制、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一党当政与多党政体。若有适当的人选，也可以合作研究。这都要看机会而定，我不给自己订进度。一般人参加学术会议，都在赶最后截稿期限，我向来不这么做。我去参加开会，一定要手边有现成的文章发表或是很有把握才答应，不用担心文章赶不出来。

(2) 一九九七年至二〇〇七年

近年我继续研究中国的产权制度与贪腐的关系、宏观管理、农村贫穷问题以及医疗体制的改革等，分别说明如下。

一是产权制度与贪腐问题。关于贪腐问题，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中国政府的态度。2005 年九月我去北京，有机会和前体改委主任安志文见面。他担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已是老前辈，还是每天去办公。我正在研究贪腐问题，于是请教他，中国的贪腐问题比起过去如何？他说比过去更为严重。我再问他有什么证据？他说没有统计上的证据，而是就一般来说，因为整个制度和从前不同。我说明自己对贪

腐的看法，原因是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由政府控制所有的经济资源，如果政府没有资源可以控制，也就没有贪腐的可能。因为政府官僚控制资源，拥有权力，人们有求于他。土地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例如北京的土地由北京市政府管理，香港富商李嘉诚要去北京开发，需要土地建立购物中心，一定要去北京进行，得到相关单位主管的批准，不管有没有贪腐，李嘉诚最后成功了。关于土地公有，在城市是政府所有，在农村属于集体所有，即使是集体所有，仍旧由政府管控，我认为这是导致贪腐的一个重要原因。我问安志文这个意见如何？这位老前辈说：「这是一种政治方面的改革，我们还要探讨。」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得体。因为财产所有权的公有或私有，是一个政治课题。我挑战中国的所有权制度，安志文没有说我对或错，既没有批评我的说法，也没有表示赞同，他说这是一个中国在政治改革过程中，还需要探讨的问题。

2005年十二月我应邀去厦门大学演讲，题目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回顾与展望〉。回顾很容易说，只要说明过去改革为什么成功，展望就不同，因为中国现在还保有很多的国营机构，银行还是国家控制，土地、银行等大量的公有财产种下贪污腐败的诱因。

二是宏观调控问题。1980年代经济顾问反对台湾的外汇存底过多，主张拿来投资利用；可是却主张中国的外汇存底不可以全部拿来投资，应该要保留大部分，因为开发中国家最常出现的危机就是外汇不足。这种差异可以分成国内和国外两方面的因素来解释。1996年八月我赴北京参加「中国：迈向现代金融体制」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者包括戴相龙（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黄达（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人民大学教授）、刘国光（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陈佳洱（北大校长）、刘鸿儒等人。另有美籍教授、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人员参加。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会见外国学者，由我领队。1996年中国的外汇存底是两千多亿美元，已经相当多（2006年中国的外汇存底高达九千亿美元），我问他打算如何利用这笔钱？朱镕基说：「很多经济学家问过我，他们认为应该把一部分外汇用掉，但我认为我们的外汇存底还不够。」他认为中国的外汇存底不嫌多，应该继续累积。他的看法也有道理，亦即自由贸易的观念未必对，重商主义的观点也未必错。从经济学家的观点而言，赚钱是为了消费，事实上不尽如此。例如日本人为工作而工作，导致贸易顺差，累积外汇存底，而持有大量美元。中国的巨额外汇存底可以鼓舞国民精神，凝聚国民力量，在工作过程中得到成就感。

朱镕基在1996年说中国外汇存底还不够，结果他说对了，第二年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风暴，中国幸亏有这些外汇存底，所以金融比其他

的国家稳定。朱镕基不一定能预料到 1997 年会发生金融风暴，但是他认为中国需要有一些外汇存款备用，果然派上用场。

现在中国的外汇存底太多，需要加以利用，不过大部份还是没有善加利用，很多外汇拿去购买美国债券，收取很低的利息，很不合算。中国想要改为采购，可是美国政府限制有些交易不许中国购买。例如中国想要购买石油的探勘开采技术，用来开发东海海底大陆棚的油田（春晓油田），没有成功。由于中国还没有开采能力，希望把拥有开采技术的美国公司买下来，再利用它的技术来开发海底油田。美国却希望垄断控制全球的石油生产，而限制出售这种技术和公司。甚至连中国想要购买 IBM 公司的手提式电脑技术都成问题，其实手提式电脑没有什么。我相信到目前为止，有些美国的高速大型电脑或相关电脑科技，中国还是无法买到。一方面因为中国希望利用外汇存底在美国多采购一些高科技产业没有成功，造成外汇存底越来越多。

另一方面在于中国政府的外汇政策，造成汇率低估的问题。因为人民币的汇率低估，导致外汇存底增加太快，兑换成人民币以后，增加货币供给，以致有「傅利曼效应」（Friedman Effect）。Ben Bernanke 有一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如果要减缓外汇累积的速度，最好的办法就是调整汇率。我有两篇文章〈中国宏观经济中的货币、物价、产出〉（“Money, price level and output in the Chinese macro-economy.”）、〈从历史上回顾 1840 年以来的中国与全球化〉（“Globalization and China since 1840.”），都是谈外汇问题。2005 年九月我在中国银行演讲的时候，就是谈这个问题。大意是说人民币的汇率低估，导致外汇流入，一旦外汇兑换成人民币，将导致中国的货币供给增加。根据傅利曼效应，货币供给增加首先导致实质产出的增加，不过效果短暂，稍后却将导致物价的长期上涨。前述提到自从 2002 年以来由于人民币的汇率低估，而出现宏观经济过热的现象；加上公有土地制度使政府官员借由控制土地进行大量的都市开发和营建工程以图利自己，均造成推波助澜的效果。我在 2007 年五月的《金融博览》上有一篇文章〈汇率、货币供应与中国宏观经济的过热〉也讨论这个问题。

另外，外汇管制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以人民币和港币的比较为例，港币在香港可以换取任何一种外币，人民币在香港也是如此，但是在中国国内则不然，虽然现在的情形比过去好一些。其实中国外汇管制的做法没有道理，现在中国有这么多外汇，为什么不允许人们兑换外币自由流通？譬如台湾虽然使用新台币，但是可以随时在银行兑换外币。至于中国是否因为担心财富外流或影响金融稳定而进行外汇管制，这种观念

不用讨论。

1998年三月朱镕基接任国务院总理，他召开一个记者会，说明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划，必须加强科技与教育以发展经济。可是一方面刚巧在此一时期，亚洲金融风暴还没有平息，中国大陆又发生大水灾，这是他一上任就必须解决的两个问题；另一方面他也想改革政府部门，裁减多余的人力，「下岗」也是他的当务之急。结果一年以后下岗的问题解决了不少，中央政府在北京市的员工数目一年之内锐减了一半，然而当初他对科技和教育发展的承诺反而没有完成。1999年八月十八日至二十日，他支持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举办一个「科教兴国国际研讨会」，其他协办机构有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工程学院以及教育部等单位，邀请相关机构的人员、北大和清华大学的校长、大企业的董事长以及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家等五十人参加，其他各国的专家学者大概也有十五至二十人。这一次的主办人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周光召，他曾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科教兴国会议的筹备会由他担任主席，副主席有两位，一位是黄宜弘，他是香港立法局的委员，也是人大代表；另一位是我。我的任务是邀请国外专家与会。

1999年五月十四日，我应中华开发信托公司的邀请，到台湾参加庆祝成立四十周年而举办的「跨世纪国际金融展望研讨会」。我的论文题目是〈二十一世纪金融业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归纳成七个重点：第一、世界性的资讯革命；第二、金融业务范围的扩大；第三、金融机构的并购整合，以美国为例；第四、金融全球化的巨大影响力，资金流动带来高风险；第五、如何改革金融业，包括监督、管制、加强竞争力等问题；第六、金融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关系；第七、培养人才是根本解决之道。我认为中国的金融人才不足将会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障碍。

1959年中华开发信托公司成立，可能类似大陆后来设立的中国投资信托公司，就是要筹集资本去发展投资事业。广东省的投资公司资本来源很多，例如有日本和法国的银行。它的性质和中华开发信托公司一样，可以贷款融资，也可以投资。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它无法偿还贷款，有些债权只能获偿16%，后来朱镕基总理就让它破产。不过也有人认为如果让它改组或许还有希望，把债权转为股权或许还可以维持。

中华开发信托公司也处理过类似的情形，只不过破产的是民间企业。唐荣铁工厂案就是例证，它因为经营不善导致周转不灵，政府从中介入，引进中华开发信托公司去接管，由政府规定贷款折抵股款，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债权转换成股权，唐荣公司因此转入政府之手，变成公营

事业。原本唐荣公司和民间的借贷关系属于商业行为，由于政府顾虑破产会影响社会安定，而介入干预。

美国也是如此。像 1980 年代克莱斯勒（Chrysler）汽车公司现金周转不灵，也是政府帮它解决。1998 年美国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 LTCM）也发生可能倒闭的情形，它原本的资本额只有几十亿美元，却买了三千亿美元的资产，数目很惊人。这么庞大的投资，如果公司垮掉后果很严重，它的财务出现一些问题，迫使联邦银行找来各银行召开协调会议。政府并没有出钱，只是运用影响力去协调解决。我认为这种金融事件如果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话，政府偶尔应该介入，原则上还是以不要介入为宜。

国家安全顾虑和国内利益团体的垄断，是影响台湾金融对外开放迟缓的原因，大陆也是如此。中国允许外商来投资，用中、外合资的方式发展产业，不过不允许外国银行来设立分行。朱镕基总理的路线是朝向比较开放的做法，欢迎外国银行设立。台湾应该开放多设立民间银行，民间投资是私人行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只要有利可图，投资报酬率高，负担得起利息，银行自然就能生存下去，对整个社会经济也有好处，应该多鼓励设置银行，没有必要禁止。

三是农村贫穷问题。现在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三农」，也就是农业、农村、农民。我在 2006 年三、四月时曾写过一封信给中国的温家宝总理，讨论农业问题。温总理批了几个字，要陈锡文和我讨论。陈锡文得知我六月要去上海开会，他也来上海参加会议，于是我们相约见面。我和陈锡文讨论，其中之一是中央政府想要简化中国的地方行政制度。现有政府组织分为五级，包括中央、省（市）、县、乡（镇）、村，太过复杂，中央政府经过几年的考虑，想要在五年之内把乡镇级取消，把五级简化为四级。

这不是容易的事，因为乡镇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从前中国实施公社制度的时候，公社就等于乡镇，包括教育、医疗服务、公共服务（如造路等），都由公社负责。公社消灭之后，从 1980 年代中后期，尤其在 1990 年代初期以后，中国有所谓的乡镇企业，政府利用农村的劳力来从事工业生产。人们知道中国人的生活逐渐改善，对于日用品诸如脚踏车、电冰箱之类的货物有很大的需求，就自己开设工厂来生产。因此有人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并非来自国有企业，而是乡镇企业的贡献。过去地方政府成立很多乡镇企业，现在中央政府要求他们在五年之内停产，不要再经营，而要帮助农民，提供他们良好的投资环

境，让农民自己投入工业生产。

我认为简化地方政府层级不容易做到，原因是此一改革对于乡镇政府本身没有利益。过去他们经营企业，可以维持乡镇政府的收入，当然个人也有收入。中国人很有意思，例如经营大学，政府鼓励各学校可以自己经营企业。公立学校也是中国政府的机构，可以办分校，也可以经营其他的事，赚了钱以后学校抽取一部分的收入，经营者自己也可以得到收入。例如大学开办一个中国现在最流行的高阶企业管理硕士班，每一个学生一年大约要缴三到四万元美金的学费，收费很高。只要相关科系有能力举办，学校可以收取一部分的收入，所属的学院再收取一部分，去教书的老师也有收入。乡镇企业也是如此，所赚的钱一部分交给乡镇地方政府，另外一部分则是经营者的收入。我认为如果未来乡镇地方政府不再经营这些事业，影响相关利益者，恐怕会有问题。

现在中国政府想要取消乡镇企业，一个理由是全国各地情况虽有不同，很多乡镇企业已经私有化，属于政府的企业不多。即使数量不多，在地方上主管这些事业的人一定会反对。在五年内要取消一整个层级的地方政府，我认为恐怕会有一些政治问题。我在上海的会议上发表文章，说我们还要观察中国政府的行政效率究竟如何，看他们推行各项措施有多少成果，在五年之内就可以看出成效。其实中国有些省分的情形较好，有些地方较差，不同的地区还要看地方领导而定。这就和企业改革一样，例如国有企业能找到好的经理，也可以做得很好，找来的领导人不好，也就做不好。中国很多情形因人而异，得看省长如何，领导人能不能做事。我也和陈锡文谈到人治的因素，必须观察后续的发展。

另外，我的文章也提到三农问题，包括三方面：一是贫穷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中国贫富不均，贫富不均并不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而是有钱人越来越有钱，不过穷人的收入也增加相当快。如果将中国分为城市和农村来看，最近十五年城市居民收入每年平均增加 7.5%，农村收入才成长 5.5%，即使 5.5%的年成长率已经相当高，其他国家的经济成长率还不到 5.5%，例如台湾。所以中国农村一般人的生活有很大的进步。再进一步观察收入最低的、最穷的农民所占的比例逐年降低。以收入而言，中国平均收入最低的穷人也越来越少。所以三农问题用财富分配来衡量的话，上述的贫富不均是第一个特点，但还不算是大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中央对城乡资源的分配不公。城市得到国家分配的资源较多，譬如教育、医疗各方面都得到很多资源，而且许多基本建设也集中在城市里。反之，对农村的教育、医疗、基本建设等方面，没有给

予足够的资源。这是不合理的现象，也是错误的做法。

第三个问题最重要，就是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没有保障。中国农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而不是私有，但是农民个人有使用权。所谓的集体所有，例如以一个镇、一个村为单位，土地属于村，既经分给农民，农民就等于拥有一个合同。农民可以使用，也可以转让，政府不可以再收回，这是不合法的。很多人认为现在的中国农村，农民最不满的一点就是他们的土地被政府官员接收。他们取得土地之后，却交给农民以外的人开发，转手之间赚了很多钱，这也是不合理的事。

2006 年三月温家宝总理也对三农问题发表意见，他说：「我们应该要维护农民对土地的基本权力，这个政策没有落实，我们一定要将其落实。」在中国，很多时候领导人说政策要如何，但具体成效未必如此。我认为要执行政策要有两个办法，一是明确地落实政策，对于违反农民利益的官员一定要公开严格处分。但是中国这么大，如何得知官员违法？因此另一个办法就是开放言论自由，运用报纸、记者发挥监督的力量。中国政府对于新闻媒体控制相当严格，可以放松一些，容许记者就全国各地农民不满的问题，多写一些文章报导，自然会对官员造成压力。

陈锡文是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这个小组隶属于国务院，权限很大。另外，他也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担任副主任。领导小组负责执行政府政策，必须研究三农问题，包括与农村问题相关的许多部门，有农业部、国土资源部、卫生部等，是一个跨不同部会联合组成的小组。我本来不认识陈锡文，在上海和他见面谈了一个多钟头，才知道财经小组也是归他领导，可惜很多问题来不及和他详谈。陈锡文带了一位秘书随行，他从前是我的学生，参加过 1987 年或 1988 年人民大学的经济学培训班，后来取得国内的博士学位。

我在 2006 年一月取道芝加哥，先到韩国，然后去香港。在芝加哥我有一场演讲，讨论中国的教育问题。Gary S. Becker 教授在芝加哥大学从事人力资本研究，我应邀在他主持的研讨会上报告，并得到一些评论意见。在当天的晚宴上有一位退休的 George Tolley 教授，他教过 Becker 和我，年纪至少长我们五岁。1951 年我们两人同时去上 Tolley 教授的宏观经济学，后来他的兴趣转向农业经济，也升为正教授。近年他转而研究都市经济学，因为中国西部开发的问题也属于都市研究的领域，他正指导一批中国学者进行研究。饭后 Tolley 教授送我回招待所，这时候正值隆冬，他没进屋里，就在车上问我：「现在中国的西部在发展之中，有

些地区十分贫困，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我开玩笑说：「你提出的是一个大问题，在汽车上怎么解决？」我研究中国，一向抱持比较乐观的态度，可能因为我的研究内容多半是中国比较先进的部分，至于中国比较落后的部分，我没有注意到。我以后必须好好思考中国的贫穷问题。

我认为自己后来之所以研究中国的贫穷问题，便是发端于 Tolley 教授的大哉问。尽管当时我并不很了解中国的贫穷问题，也在车上和 Tolley 教授谈了半个钟头。我讨论中国经济的各个层面，其中之一就是人力资本。我强调一个观点：一个国家能否进步，取决于各国的人力资本不同。我认为同样的观点也可以用来推论中国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差异。导致一个地区贫穷的原因固然很多，例如地形、交通、气候等不利的因素都有可能。可是在天时、地利、人和之中，人的因素最重要，只要有人就可以突破困境。可能在贫穷的地区和富裕的地区人们的文化有所不同。人力资本很重要，可是发展人力资本需要很长的时间。例如盖一间房子很快，只需要两年的时间，培养人力资本却需要几代人的投入。又如经济学教育，训练一个博士生需要若干年才能完成，而且仅仅成为博士还不够，一个博士生毕业最少需要十年的磨练和经验，才能成为一个成熟的经济学家。如此一来，培育一批可用的人才，至少需要十多年的时间，接着透过这批人建立一些经济学系，再去训练更多的人才。中国这么大，要训练出足够的人才，至少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同理可知农村的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教育的水平、训练中国西部的工业人才，都需要很漫长的时间，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我认为劳力、市场、科技三个因素都很重要。中国要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本，才有庞大的国内市场，才能利用世界的先进技术。贫穷的地区因为经济落后，人力资本不足，即使提供他们先进的技术，连如何利用可能都有困难。中国的发展优势在于「后来居上」，至于要利用现代化的科技帮助农村发展，并不容易。

四是医疗体制改革问题。现在中国在医疗方面仍有待改进。大家公认中国过去实行计划经济的时候，在医疗方面有很大的进步，有很多数据可以证明，例如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开始建立的时候是 45 岁，后来提升到 60 岁；还有死亡率，50 年代初期是每一千人中大约有十五、六人，后来下降为六、七人。可见中国在卫生、医疗方面进步很大。在农村，通常是用集体的办法来改进医疗，相当有效率。例如在农村集体化的时代，人力由公社负责调配，公社可以运用部分的人力和资源，若医疗方面需要设备，就由公社去安排。公社解散之后，医疗变成一种市场经济，农民若是生了病，得自己解决，看医生拿药。这种情形和过去有两个差别：第一、没有集体保险。从前大家的资源都交

给政府，等于参加保险，现在已没有保险的机制。第二、政府也没有资源去设置医务所等，所以没有足够的医疗设备。政府希望最快能在五、六年之内，将过去的集体保险制度重建起来，农民却不肯参加。政府要农民出钱，由国家替他们办医疗保险，但农民既不相信，也不乐意，于是收不到经费，政府也莫可奈何。

前几年政府用补贴的办法，实行部分负担制。例如保险费一共五十元，愿意参加保险的人，由政府补贴每一个人十元或二十元，其余的部分由个人负担，结果参加的人仍然不多。几个月前中央政府决定补贴每一个人四十元，个人只需负担十元，总共五十元就可以参加保险。政府收取这笔保险费，可以发挥两个作用：一是以后农民生病就可以上医院就医。现在很多穷困的农民，生了病也只能放任不管，疾病越拖越严重，一旦有了保险就可以就医，及早治疗较好。二是现在农村有很多医疗设备不如从前，政府收取保险费，可以增添设备。

另外，医疗资源的分配在城乡之间的差距和区域之间的不平衡，也需要考虑。现在讨论的医疗保险制度就是针对比较贫穷的省分或地区，至于城市里的人们比较富有，政府也有比较充裕的经费，可见不同的地区医疗情况也随之不同。我向陈锡文建议，中国对于比较贫穷的地方必须另订政策，对于最穷的人们必须给予最低的生活保障，也就是生活补贴，当收入低于某一标准时，应该给予补贴。目前的医疗制度没有考虑到这些，我认为对于一部分最穷的人们，政府连个人应该负担的十块钱保险费也给予补贴，免费提供医疗保险，不用选择是否自付经费参加保险。因为即使政府已经付了四十块钱的保险费，许多贫穷的农民也不愿意付十块钱去参加政府的医疗保险。他们既不信任政府，也不相信政府已经付了四十块钱，只担心受骗上当，付了十块钱以后，却一无所获。

医疗保险是为了解决医疗需求面的问题，而现在中国医疗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医疗供给不足，近十多年来中国人均医疗供给没有增加，原因在于由政府提供医疗服务的公立医院政策，可是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力来提供。我认为解决之道是鼓励人们多设民营医院，可惜目前中国政府还没有接受这个意见。

我对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关切，起源于有人向我邀稿，于是开始研究，撰写成一篇文章〈中国医疗的经济分析〉（“An economic analysis of health care in China.”）。该文内容多只限于学术观点，一旦研究有心得之后，就可以做成政策建议，再和中国政府有关方面联系。普林斯顿大学有一个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Studies, CEPS），

专门研究经济政策，由 Alan Blinder 和 Harvey Rosen 主持。Blinder 曾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副主席；Rosen 研究公共财政，曾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该中心有刊行系列论文，也向我邀稿。关于中国医疗的这篇文章，我先在上海交通大学报告，参考他人的评论意见，予以修改之后，再收入 CEPS 的系列论文中。

除了上述四大问题的相关研究之外，我还出版了两本英文专著，《中国经济转型》和《认识中国》（*Knowing China*），并先后译成中文出版，分别介绍如下。2002 年我出版了《中国经济转型》的英文版，其中所用的经济学不算太艰深。我从 1986 年开始教授「中国经济」这门课，不一定每年开课，有时候两年开一次，是本科生大学部的课，并非研究生课程。这本书一共有二十二章。首先从历史谈起，第一章说明中国历史对认识现代中国经济的意义，每一个朝代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主题，按朝代先后次序，只花十几页就把中国历史交代完毕。第二章讲中国大陆过去实行的计划经济。第三章谈经济改革。第四章介绍现在的情形如何。第二部分谈经济成长，许多重要的课题都有提到。个别章节包括国有企业、私有企业、金融体制等比较政治性的课题。起初别人要求我写这么一本书，我认为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在经济学上并不能有什么创新发现。后来我觉得虽然书中使用的经济学比较简单，若能利用经济学做为工具来了解中国经济，还是可以发挥一些作用。用这本书做为大学教科书的人不少，只是现在美国专门教中国经济的课程不多，不是每个大学都有开这门课。

《中国经济转型》的书评很多，甚至有人还给了五星的最高评价。我在《中国经济转型》一书中提到民族主义。书中第一章讨论中国的历史，借以了解历史对中国的影响，最后讨论中华民国从 1912 年以来的历史，得出下列三个教训：第一点是我认为即使从 1930 年代起，日本已经占领东三省，中国内部也不统一，这个时期的中国经济仍然有进步。近代的中国社会即使政局不稳定，经济上还是能够持续进步。第二点是关于建立民主制度的问题，我的态度比较保守。我认为中国不能贸然实行民主，中国还没有足够的历史传统来实施民主。第三点，我说：「国家统一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民族主义也是中国经济和政治政策背后的重要力量。」我们要了解中国，就必须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中国人的思考和行为多从这一点出发。

《中国经济转型》的中文版由人民大学出版社，中文翻译由黄卫平和他的同事一起合作。1980 年代我在人民大学举办经济学培训班，培训班主任黄卫平后来出任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他和几位同事把这本书翻

译成中文，2003年已经把稿子交给人民大学的出版社，可是迟迟未出版。2004年我在北京，党委书记宴请大家，我提起有一本书人大出版社是否要出版，他请人大出版社的负责人来和我谈一谈。我问出版社负责人进度如何，他说稿子已经交来，应该几个月之内就可以出版。几个月又过去了，书还是没能出版，我写信询问黄卫平，他也没有清楚地说明为什么书没能出版。2005年九月我忽然得到他们告知该书已出版的消息，虽然较原先预定的时间晚了一年多，终于还是出版了。我一收到书，首先查看索引，因为我在书中有八处提到赵紫阳，这些部分有没有被删掉，结果参考索引都还在。后来再看内容有关赵紫阳的部分，也没有被删节，还保留着，但是他的名字不见了。这本书的出版经过有些曲折。九月书出版，十二月我去厦门开会演讲，人民大学出版社送来一大批书，要我签名，有一位人大的教授也随行，我问他这本书怎么拖了那么久？他告诉我这本书的内容有问题。我没有追问究竟是什么问题，总之人大出版社把问题解决了。

《中国经济转型》2005年九月才出版，到2006年一月的时候，第一刷的五千本几乎快卖完了。我按每本人民币30元收取版税，每出版五千本，版税按6%计；超过五千本以上，按7%到10%计算。美国的版税大约是12%到15%。我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应该可以借此发挥一些影响。书中有些观点和中国政府的官方观点不太一样，第一点就是肯定赵紫阳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贡献，第二点是反对中国的人口政策。

关于赵紫阳的贡献，其实政府官员都很清楚这一点，只是他们不说而已，我就很老实地指出来。对于赵紫阳的评价，大家公认他很能干，不用我吹捧。当时在赵紫阳底下的很多人都很佩服他，例如温家宝总理以前曾和赵紫阳共事，相信他也很尊敬赵紫阳，不必我多说。至于我和中国领导人之间的互动，因人而异，很难说。例如后来继任的江泽民，我曾写了好几封信给他，据我所知曾发挥作用。不过江泽民本人对经济方面没有太大的兴趣，他主要负责对外的事务，主管全国党政和外交等方面，等于现在的胡锦涛，他们两人都是中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赵紫阳则对经济较有兴趣，继他之后的朱镕基、温家宝也有兴趣。其实我所写的相关文章，偶尔他们也会看一看。

体改所在赵紫阳下台之后，不复当年的重要性，可是除了鲍彤以外，其他的人并没有受到六四事件的影响。鲍彤是赵紫阳的亲信，六四之时他写了一篇文章〈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肯定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归咎党和政府的决策失误。我认为他这样做一定会出问题，其他的官员则没有受到牵连。赵紫阳不做总理之后，李鹏接任总理，大部分的

部长都没有撤换，赵紫阳时期所任用的部长大多留任。六四事件之后国务院的官员还是赵紫阳从前所用的人，体改会的同一批人也都在。例如现任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他原先担任体改所的副所长，后来接替戴相龙担任行长一职。（戴相龙可称得上是中国的 Alan Greenspan，Greenspan 原任美国联邦银行主席。）

第二点是人口问题。我一向反对中国政府对于人口控制过于严格，认为没有道理。中国政府提出的理由，第一是人口太多。至于什么是多或少？很难说。中国这么大，客观说来，和德国、法国、日本相比，中国很多省分人口并不拥挤。根据统计，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也就是耕地面积和人口的比例，等于台湾的一倍。当然台湾的耕地和气候较好，中国许多耕地的土质可能不如台湾。我在 1985 年的书中比较中国与台湾的人口与耕地各有多少，才发现中国的每人平均土地面积是 0.27 亩，比起台湾的 0.12 亩，多出一倍，可见中国的人口并不像一般认为的那么拥挤。而且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政府希望每人平均所得成长更快一些。当一年的国民总所得增加 9.5%，或人均所得增加 8.3% 的时候，经过严格的人口控制之后，或许能减低人口成长率 0.3% 到 0.5% 左右，进而使人均经济成长率也降低 0.3% 到 0.5% 左右。其实所差无几，只要整个中国的经济成长够快，每人平均所得的成长率不会因为人口增加而受到不利的影 响。反之，如果经济成长率只有 2%，而人口成长率是 0.5%，经济净成长率就只有 1.5%。但是现在中国的经济成长率是 9.5%，所以人口增加对每人平均所得的影响很小。

现在看起来，人口是一种成本，将来却是一个资源，等于是一种投资。例如盖一个房子，如果现在因为价格太贵而放弃不盖，将来就没得住。房子是一种实质资本，人口也是，将来中国需要工程师、企业家、工人，都是从孩子长大变成的，没有下一代，那里有人才？中国最重要的还是人才。我提出这样的意见，反对人口的严格控制。中国从 1980 年代开始实行人口控制，到现在已经有 26 年，现在二十多岁的人口已经有劳力不足的情形。然而政府最近才开始考虑这一点，已经有点迟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几乎等于一整代人缺乏人力资本形成。

Bert Horwitz 用《中国经济转型》当做教科书，每教一章就替我写一个评论，一共写了很多页的评论。我参考之后，有需要改正的地方，就在第二版修正。该书的第二版已经在 2007 年一月出版。主要的变动是更新了很多数据和图表，至于内容方面，从前第一版偏重谈如何发展，第二版就讨论发展之后出现的一些问题，例如前述提到的农村问题、医疗问题、贪污问题等。

我最近写的第二本书是《认识中国》。这并不是是一本学术性的著作，在这本书里，我没有做任何研究，只是叙述而已。书中分为九章，分别讨论：（1）中国历史的承传、（2）文化与日常生活、（3）中国经济、（4）中国人及其人口问题、（5）教育、科学及科技、（6）政府系统及政绩、（7）香港、上海—中国两个闪耀的城市、（8）旅游大国、（9）中美关系。我也讨论中国和台湾的关系。我去过中国很多次，有关观光旅游的部分向来没有多说。我每年去中国两三次，这样持续了二十多年，在旅行的时候，有些地方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我所谓的旅行不是指看风景，而是观察所到之处，和一些有意思的旅行经验。我第一次去中国，非常紧张。那是 1980 年的时候，文革才过后不久，我们探望亲戚朋友，他们不敢说话，我的太太 Paula 有些父执辈想要跟我们说话，怕有人窃听，不敢在我们的旅馆房间里说，要到花园里才敢说。前面提过当时中国的情形相当紧张，例如出境的时候，我们搭快船从广州到香港再转机的经过。

我在这本书里也说了一句推崇赵紫阳的话。2003 年我在芝加哥和 Milton Friedman 谈到赵紫阳，我们简单地回顾他的政绩，我说必须给他一个 A。Friedman 不同意，称赞他是 A+。我同意他对于经济了解的睿智是 A+，不过赵紫阳也有一些毛病。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形成，有两大原因：一是通货膨胀，二是腐败问题。中国的通货膨胀，赵紫阳要负责任。他是主政者，当然主张要改革，其实体改所的很多幕僚人员不懂通货膨胀的厉害。我没有提醒他们通货膨胀的问题，是我疏忽了。前面提过 1985 年我去中国的时候，体改所的宫着铭来找我，他说赵紫阳总理对通货膨胀的问题很有兴趣，我就做了一个简单的计量分析，说 1985 年不会有大问题。我没有再推算 1986 年和 1987 年的情形，而且我也不知道 1985 年以后中国每年都增加很多通货发行，高达 30-40%，因此没有再提醒他。1986 年我再去中国，和赵紫阳谈了别的问题，但没有谈货币增加的问题。1987 年和顾应昌一起去，谈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等其他方面的问题，也没有说到货币。因为货币供给的多寡是政策，而不是体制改革，当时我自己也没有注意。等到 1989 年已经出现通货膨胀的问题，体改委才邀请我们这些顾问去讨论，蒋硕杰也一起参加。主要是在六四事件发生的前一年，1988 年秋季之时通货膨胀已经相当严重，等到 1989 年三月我们在香港开会讨论要如何解决的时候，时间上已经太迟了。中国政府在 1985 年至 1987 年之间不应该将货币发行政策放得过于宽松。可是在 1989 年三月之前，我自己完全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认识中国》已经有中文译本，2004 年繁体字版在香港由世界科技图书公司（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出版。该公司和北京

大学出版社有合作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同意出版其他的书，却不肯出版我这一本书。这本书在国外得到很多人的支持推荐，例如 Milton Friedman，能够得到他的推荐很不容易，他向来不轻易写书评。另外，还有著名的建筑设计师 Robert Venturi、前美国国务卿 George P. Shultz、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兼中央研究院院士丁肇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Gary S. Becker 等人。其中有一篇很长的书评，是 Dan Blatt 在 *Futurecast Online Magazine* (www.futurecast.com) 上所写的。我认为他是美国人，用美式观点来评述这本书。就像有时候我谈论自己的著作不一定客观，同理可知他的观点也未必客观，至少表达出另外一个观点。我自己研究经济学，这是一门西方的学问，加上长期住在普林斯顿，和外国人相处往来，恐怕不免也有美国式的想法。到底我介绍的是美国人眼中的中国，还是中国人眼中的中国，当然要取决于读者个人的看法而定。如果我没有住过美国，我不会知道要如何介绍中国。我对中国的认识是我从前在中国成长的时候，还在中国念过一年大学。后来 1960 年代我常去台湾。从 1980 年以后，我开始对中国有兴趣，几乎每年去中国大陆两三次。我究竟是用中国人的立场或是外国人立场来看中国，就很难说了。韦钰曾担任中国教育部的副部长，她的书评说中国人都应该读这本书。

可能由于这两本书的出版，2006 年四月我应邀出席美国国会举行的听证会，它有一个中美经济安全调查委员会 (U.S.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召集人是 Daniel Blumenthal，他很注意中美之间的经济与国防安全关系，安全问题很重要，就邀请我出席做证。世界贸易组织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有一条规定，国际贸易要公平竞争，不能由政府补贴生产来出口。现在美国从中国进口太多，有人说中国出口不合法，很多产品有政府补贴，违反 WTO 的规定。这种情形引起美国的密切注意，国会的这个调查委员会就要找出证据，调查中国工业各方面的生产，是否有产品接受政府补贴，如果不合法，就可以告发。这个委员会的召集人邀我出席做证。我事先提出一个书面报告，当场做证的时候有七、八个委员轮流发问。那天共有两个人做证，和我同时出席的一位女士，不是中国人，可能是印度人，写了一本书，内容是如何和中国人打交道。那本书比较流行，可能卖得相当多。因为我写的书不是通俗读物，和她不同。第二回问到她，她和我的意见不同，她对中国的看法是因为中国独裁，不会有什么创新，创新需要思想自由，中国人没有思想自由，怎么可能有什么发明？因此中国在技术创新方面绝对赶不上美国。我不同意她的看法，对委员会说：「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他们不乐见中国兴起。我知道虽然中国在政治方面有一些控制，但是在研究科学技术方面绝对自由，不要认为中国赶不上美国。而且民主和创新的因果关系并不确定，从前苏联有史达林专

政，中国在过去那么专制的时候，还可以造出原子弹来，现在的中国比从前自由多了，更不能说未来中国赶不上美国。至于美国一向担心中国的科学家窃取国防科技机密，这完全没有道理。其中最离谱的就是李文和案。他根本是从台湾出去的人，甚至还是一个美国人，也没有什么证据证明他窃取机密，这完全是美国人的偏见。

六、香港现状与未来展望

（一）香港前途研究会

我小时候在香港长大，可以算是香港人。在我七岁之前，家里有三分之一时间住在香港，三分之二时间住在广州。七岁以后刚好相反。1937年到1941年我在香港念圣保罗小学后转岭南小学，1942年到1945年去澳门念岭南中学，1945年回广州念岭南中学和大学，放假就回香港。1948年出国留学，1958年首次回香港，当时父母都住在那里。1993年先父在香港去世，享寿九十有九。所以香港一直是我一生活动的大本营之一。

中国的经济发展受到地理因素的影响，例如北方和日本、韩国的关系比较密切，华南和广东则受到香港的影响。至于韩国、日本和中国的东北、山东等地区的未来关系如何，我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不敢随意议论。几年前我去山东，在青岛看到许多新的公寓，都是韩国人投资建造的，公寓外形看起来非常美观。我认为韩国和中国将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即使两国真的有事，不论中方也好、韩方也好，他们为了彼此的利益，都会设法互相了解，解决问题。中国希望韩国在大陆多投资，韩国也希望在中国多得利益，如果发生任何问题，双方都会谨慎处理。1997年的香港回归就是很好的例子。

香港在中国的投资也被归类为外资，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引进的所谓外资，一半以上都是来自香港的投资。按外资金额排名，第一是香港，第二是日本，第三是台湾。就中国的外汇管制而言，外资赚取的财富不能汇出，只能继续在中国投资，香港人自有办法解决，而且对香港人来说，这些资产不一定要汇出来，他们更希望赚钱以后可以继续在中国发展，赚取更多的利益。虽然其中有一部分港资可能来自外国，主要还是香港人在中国投资。他们一有机会就去发展，例如陈启宗（Ronnie C. Chan）就是其中之一；还有黄宜弘，他曾带我参观他的工厂。1999年我和黄宜弘两人一起在北京主办「科教兴国国际研讨会」，他负责在中国安排，我负责邀请一些外国代表来参加。当会议在北京举

行的时候，由于我和他是领队，所以分配到一组更宽敞舒适的套间，其他的代表只有一间单人房。我没有接受特殊待遇住进套间，而是和其他来自欧美、日本的朋友一样住单人房。他认为没有关系，就住了套间。

1984年我第一次见到赵紫阳，就向他表示我很关心香港问题。1985年我在岭南中学的同窗招显洸替我介绍李柱铭，有些朋友说他是最足以代表香港民意的人物。我们三个人谈了一整个下午，后来我写信给赵紫阳，谈到一些香港人的观点。1988年我和赵紫阳谈政治改革，我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比苏联快，政治改革则反之。赵紫阳向我解释，并同意中国也需要政治改革，不过必须一步一步去做。我们也谈到香港问题。

1988年十一月在深圳召开「中国经济改革十年回顾讨论会」，邀请了三、四十位国外的经济学者，加上国内派来的代表，共计一百多人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和袁木都在其中，马洪的演讲题目是「十年后有什么需要我们去改革」。他想举办华南地区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原定在深圳举行，要我代表去台湾找些人来参加。我对他说：「你的情形我很了解，原来商定的会议恐怕行不通。」原先的构想是邀请台湾的朋友去开会讨论，后来会议开不成，取消了。另外，中国大陆也曾邀请中华经济研究院参加在香港举行的会议，也告失败。

正好岭南学院的校董会也在深圳召开，我同时参加两个会议。讨论会在新华社派驻香港代表许家屯住的旅馆召开，这是我首次见到许家屯，他请我吃中饭，谈论香港问题。会后我宴请校董，也邀请深圳市长李灏。适逢李灏与中方官员共进早餐，于是我顺道一起邀宴马洪、袁木等人。袁木后来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之时担任发言人，颇招物议和反感，成了在香港不受欢迎的人物。

1989年一月我倡议筹组香港前途研究会，由陈坤耀担任联络人。每次开会都有人轮流做东请客。我打算成立香港前途研究会之事，在第一次开会之前曾与许家屯谈过。许家屯是新华社派驻香港的负责人，有人戏称为中国的港督。我也曾和当时的港督David Wilson（卫奕信）谈过，并将十六位参与宴会和开会的成员名单提供他参考。他说：「名单上这些人我都认得，其中只有邹小梅不知是何许人物？」我回答：「她是我的女儿。」卫奕信想要听一听我的意见，我和他谈了很久。我认为香港需要民主改革，但是进行民主化的脚步有人说可能太快了。他说我是第一个对他提出这种说法的人，其他的人都嫌民主化速度不够快。卫奕信从政之前是教授，曾在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我在IBM公司工作时，也在哥伦比亚大学兼课，但和他访问该校的时间不同。

香港前途研究会的成员包括在香港很活跃的人物，例如陈坤耀是香港岭南学院院长（1995-1999；岭南大学校长，1999-），招显洸是名医，李鹏飞是自由党领袖，他们也都是立法局的资深成员。李福兆创办了香港证券交易所。传言说英国人对他很眼红，就以违反公平交易的名义，把他下监坐牢。我个人认为证券交易程序是否公平很难判断。董建华是当时传闻 1997 年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最热门的人选。此外，还有倪少杰、谭惠珠、黄宜弘、胡应湘、伍沾德等。他们都是对于香港未来有影响力的人物。

香港前途研究会在 1989 年一月、三月间开过几次会。三月中旬正好我们这些海外经济学院士刚与大陆体改委在香港会谈。会谈结束后，利荣康设宴款待蒋硕杰等诸位先生，也安排研究会会员一起参加，大家互相交换意见，主要是探询与体改委会谈的内容。我曾写信给赵紫阳，建议他和这些香港朋友见面，所以三月十八日我安排会员赴北京见赵紫阳。我和胡应湘一起去北京，适逢霍英东也同机，他们是政协委员，要去北京开会。

三月十八日早上董建华的夫人乘汽车来利园酒店（广东话指旅馆），接利荣康和我同往机场。在机上向我说她也要一同去见赵紫阳。我答复说这次没有安排夫妇一同会见，没有准备。但是下机时，因为我们是总书记的客人，有人来接机，顺道一并邀请太太们参加。所以董太太、胡太太也一同前往。早知如此的话，我的太太Paula也会去北京一同会见。

那次赵紫阳和大家见面相谈甚欢。胡应湘于 1983 年开始修筑香港到广州的高速公路，这是中国的第一条高速公路。原订四、五年之内完工，但是直到 1989 年与赵紫阳见面时，仍未完成。因为外人与国内人士打交道时问题很多，过程不是很顺利。赵紫阳很了解这种情形，因此两人见面之时，赵紫阳说他知道胡应湘为中国做了许多事。胡应湘在广州兴建的中国酒店，生意很兴隆。董建华经营船公司，在全球有分公司，常与中国合作。黄宜弘在大陆投资工厂。利荣康是在中国捐了不少钱的企业家。伍淑清（伍沾德的女儿）在国内做了很多事。大家边喝啤酒边谈香港的事情，太太们也加入谈话，气氛很融洽，大家谈得很高兴。会谈结束之时，我说：「这次没有带秘书同行，可否给我们一份会谈记录以便发表？」赵紫阳点头答应了。

三月十九日我返回香港，和利荣康、黄宜弘同一班飞机。这是香港的重要新闻，十多个记者等在机场，一拥而上问个不停。电视台也来采

访。次日香港有十几家报社都登载此一消息，各家新闻报导的观点和立场各有不同，可以互相参照比较。

六四事件发生之后两个星期，我去香港为普林斯顿校友会演讲，说大陆经济发展将持续，天安门事件对其影响不大。香港前途研究会仍然如期召开，由于受到六四的影响，大家意兴索然，出席的人不多。以后就不了了之，前后为时不长。

1996年十一月我再提议发起「香港发展议事会」(Council for Hong Kong's Development)，成员包括香港各界杰出的重要人物，例如胡应湘、冯国经、张信刚、李鹏飞、黄宜弘等人。本会以促进香港发展为目的，以与香港发展有关的议题为主，举办公开演讲、座谈会、讨论会等活动。我也告知江泽民总书记、朱镕基副总理以及人民银行戴相龙行长。Milton Friedman教授于本会成立时，也写信来致贺。另外，由Gary S. Becker、Merton Miller、Paul Samuelson、Robert Solow等国际知名学者担任本会顾问。该会于1996年十二月十四日在香港正式成立，举办开幕会议，希望借此对香港未来发展发挥积极的影响。第二次会议于1997年一月二十七日举行，以香港工业发展政策为主题，由科技大学吴家玮校长做简短发言，张忠谋博士介绍台湾的经验，然后进行讨论。

至于我担任中国的经济顾问，又和香港工商界人士关系密切，是否引起中国政府的疑虑，担心有人趁机牟利，我想不存在这种问题。试举两个例子来说明：第一，1986年七月我们建议体改委调整汇率，将人民币贬值。这是我们的讨论建议，但是他们采不采行，我并不知道，而且我只跟儿子提过，没有和外人谈论汇率问题。七月五日中国官方宣布人民币贬值15.8%。第二，1989年三月的货币政策。我们在香港和体改委研究通货膨胀的问题，我说这有办法解决，在台湾有经验，只要提高利率即可；蒋硕杰也主张提高利率。中国随即提高利率。就在开会之后第二天，我们和香港前途研究会的人见面讨论开会情形。中国的体改委知道要把国内的存款利率提高一些，但是也没有答应一定会照做。即使如此，对在香港的人而言，怎么赚钱呢？在中国国内行不通，根本没有赚钱的机会。

我有自己的一套做法。虽然政府官员是决策者，我可以说出自己的意见，这种经济政策大家都可以讨论。不过我和香港前途研究会的讨论也不公开，只是一群人聚在一起讨论，他们问我通货膨胀能不能解决，我说可以解决。在场的香港大学教授陈坤耀则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无法解决（他也是一位经济学家）。

至于利用内部资讯进行股票交易，内部资讯的定义很广泛，例如我对中国政府的认识，很多都属于内部资讯，我是利用这点赚了一些钱。我看好香港九七之后的前景，别人却不看好，因为他们对中国政府的运作没有我了解。我和中国政府官员很熟，知道他们的想法如何，也可以说是一种内部资讯。至于香港企业人士，他们不看好香港回归以后的情势，我认为没有问题，不用担心。很多香港人不相信我的说法，先把香港的房子卖掉，移民去加拿大，以后再回香港来，房子却再也买不回来，吃了大亏。我认为香港回归，中国政府不会胡乱草率从事，这也可以算是内部资讯吗？因此当大家悲观的时候，我很乐观，去香港买股票，赚了一些钱。

（二）香港—美国经济合作委员会

1991年美国与香港经济合作委员会（U.S.-Hong Kong Economic Cooperation Committee）请Paul Volcker担任主席。他邀请我参加，成员还包括许多大企业的总裁或高级副总裁，如IBM、AT&T、Boeing、Sunkist等。香港方面也成立对等委员会（Hong Kong-U.S. Economic Cooperation Committee），成员分成两大类：企业家和政府经济部门的相关官员。委员会的活动方式与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相同，一年在美国，一年在香港，两地轮流召开会议。1995年五月委员会在香港开会，会议结束之后去北京见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其他有关的政府官员。Paul Volcker讲话很率直，李鹏的脸色好像有点不满意，双方仍和谐地交换意见。有人认为我们这个委员会代表双方工商业界的利益，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必须注意整个香港的发展情形，因此邀请一些议员与外交官员参加会议或发表演讲。

香港与美国经济合作委员会得到美国政府人士与企业界的支持，由香港贸易发展局（Hong Kong Trade and Development Council）协助。该署在纽约和华盛顿都设有办事处，提供对外贸易、经济发展、外交等咨询服务。委员会成员主要是双方的企业界人士。美方企业家参加委员会的目的，其一是美国企业家去中国大陆投资多透过香港，委员会可以帮

忙他们寻求与香港人互相合作的机会；再则也有助于寻找商机，因为委员会有香港和美国双方的报告，可以收集市场讯息，对于美方企业很有帮助。香港方面则利用委员会发展在美业务，并影响美国对中国与香港的商务政策。

1996年三月香港与美国经济合作委员会在华盛顿召开。美国对中国大陆的最惠国待遇，始终是每次开会的重要议题，因为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对于香港的经济有负面影响，大家都很关切这个问题，常邀请美国政府相关部门的官员或国会议员来说明。这次邀请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罗德（Winston Lord，前美国驻中国大使，1985-1989）来演讲。美方代表和香港代表分坐两边，我也在座。他问众人关于1997年以后的香港，美国应当帮忙做些什么事？大家都不答腔，静了些时，我说：「美国不用插手，不用说话，才是上策。」他很意外，这和他的想法不同，他说可以考虑一下。美方其他代表对此没有发表意见，香港代表则有三位同意我的说法。我在会上加以解释，我认为北京政府和香港的中国人目前谈判进行得不错，不必美国来插手多事。因为我了解双方的态度，一方面是1997年以后香港有影响力的人仍然会留在香港，例如他们这批企业家；另一方面是北京的中国官员也不会破坏香港繁荣的局面。虽然香港有些人责备这些工商业者过于亲中，我认为香港的企业家在九七之后与中国合作，正如过去他们与英国合作一般，其中并不牵涉道德的判断。

1996年七月三日，我们几位经济学的院士一起去拜访副总统连战。我们谈到美国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外交关系，费景汉说罗德过于亲中。我曾经见过罗德几次，他到普林斯顿大学来的时候，我们也曾一起用餐。我的印象是他未必对中国有好感，甚至于有些负面看法也说不定。罗德主要是执行美国对中国的政策而已，表面上看不出来他对中国的个人态度。

1996年初美国和中国关系很紧张，一般美国人不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态度，认为中国大陆有一个邪恶的共产党政府。一旦抱持这种观点，中美两国之间就生出很多事端。我倒认为现在的中国政府是一个开明的政府，与中国历史上的政府比起来，「开明」之称它确实当之无愧。理由有二：一在经济方面，它做了许多事改善人民的生活，而且做得很好，很多人给予一百分的高度评价；二在政治方面，有些人批评它在人权方面做得不好，然而从1976年迄今三十年之间，已经有大幅的进步。现在优秀的学生随时可以出国留学，很自由。例如1996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加上访问学者，总计约有一百余人。早期在1948年

的时候，普林斯顿的中国学生只有两三个人，方闻是其中之一，他毕业于 1951 年。我在康乃尔大学念书时，中国同学会也只有六十多人，现在中国学生有三倍之多。中国政府并没有美国人想的那么糟糕。

中美关系紧张与双方猜忌疑虑的心态有关。我认为在 1980 年代中美双方确实有合作良好的关系，尽管中国政府内部有些人说这是美国包藏祸心，进行和平演变的阴谋。学者不一定支持这种说法，而且民间大致抱持友好的态度。1990 年代局势改变，中国有人认为美国害怕中国进步太快成为强劲的对手，所以刻意打压不希望中国再发展下去，甚至再度采取过去冷战时期的围堵政策。这种想法在中国相当普遍，连开明人士乃至有些留学生都这样想。至于美国是否确实采行围堵政策仍有待商榷，内部意见分歧不一是主要原因。美国立国传统素有传教士心态，一直延续下来，迄今不衰。美国人是好意，总想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如基督教、民主等传播出去，并不是要把对方政府搞垮。中国政府不欢迎这些东西，认为是和平演变的阴谋。双方立场不同，看法也随之不同。有些人想要争取民主，如学者和年轻人就认为和平演变也很好，没有什么问题。中美双方互相猜疑的心结不解开的话，将来还是会有问题。

1998 年一月一日，我回美之后接受由普大国际中心举办的国际论坛电视访问，介绍中国经济近况。在此之前我去山东担任顾问，结束之后给香港写了一个简单的报告，不久 Paula 找我，请我接受电视台访问，谈一谈中国的经济情形。在座谈会里，主持人郑宗美很担心因为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的经济是否会崩溃，因为人民币可能贬值、企业亏损累累、失业和人口问题不断浮现，显示中国大陆已经走到穷途末路。我说中国经济并没有什么大问题，很多改革都在进行，不用过于担心。我知道美国一般人的看法比较悲观，我却始终不这么认为。

1999 年一月，美国国务院讨论世界经济，请我主讲中国的经济近况和政策。国务院里也有人专门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只不过他们的看法正好和我相反，他们的意见比较悲观，总认为中国经济就要垮台。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其实这很平常，因为我对中国经济的看法本来就是一般美国人的看法很不同。例如 1999 年二月，韩美学会（Korean-American Society）与宾州大学举办讨论会，我的演讲题目是〈中国经济：改革与展望〉（“China’s economy: reform and perspectives.”）。Lawrence Klein 也来参加。我的评论人是《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的一个女记者，她很悲观的预测 1999 年中国的经济成长率将下跌为 4-5%。我问她资料从何而来，有何根据，她听了很不高兴。刚好 Lawrence Klein 有一篇文章谈东南亚的经济情形，包括中国在内。根据他的估计，中国 1999

年的经济成长率大约是 7.5-8%。这个数据和我估计的 7-8%不谋而合，于是我就对她说至少 Klein 的看法和我很接近。可是为什么她的资料和估计却偏低很多呢？Klein 做了一个解释，他在这个公开场合说：「这是因为很多美国人不喜欢中国，希望中国经济恶化，就把他们自以为是的想法认为是事实。」

我对中国计划经济的看法，可以参考我的文章〈中国市场经济中的计划角色〉（“Role of planning in China’s market economy.”）。文中讨论实施五年计划在中国的作用。我写这篇文章时，正当中国推动第十个五年计划。2003 年中国取消计划委员会（1980 年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成立，1982 年改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2003 年再合并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改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改用发改委的名称，政府不希望人们认为中国还实行计划经济。

2006 年提出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简称十一五规划），内容包括十多个要点。我将每一个要点列出来讨论，对中、美双方人士都曾谈到，只是对美国人的说明较简略。前面提过我在 2006 年四月去美国国会出席听证小组，提出的书面资料也提到十一五规划。我向他们介绍中国的五年计划如何产生？有什么作用？他们感兴趣的是中国在五年计划中，是否对某些工业或企业有任何补助，此外对其他的内容不感兴趣。后来听证小组委员提问时，我的意见和另一位证人的证词不同，她是一位印度裔的女士，她对中国的观点和我不同。这也可以佐证美国国会议员对于中国的看法如何。

中国领导人出访各国，是从江泽民开始。他到美国访问时，表现不错。这不完全是他的功劳，因为中国逐渐强盛，领导人出访时外国都很尊重礼遇。我认为现在中国外交做得不错，比较中国和美国的对外国际关系，美国可说居于劣势的地位。美国总统去各国访问，总是要求别人必须服从他。中国对于国际外交的处理，至少有两点不同：第一、中国非常尊重小国，至少在表面上中国认为小国和自己同处于平等的地位。小国的领袖到北京访问，中国的礼遇和对待其他国家的元首一样，给这些国家很好的观感。第二、中、美两国和这些国家讨论问题时，美国的态度是摆明「我要什么」，只谈自己关切的题目。中国和别国会谈，则会考虑对双方有利之处，态度是「我们可以帮你们做什么」。因此中国和美国相比，在世界上的地位一天天高涨起来。美国到处不受人欢迎，尤其在中东地区。帝国总有没落的一天，美国的国际地位已经开始走下坡。我认为布希（George W. Bush）总统要负相当责任。

（三）香港九七回归

我个人对于香港前途的看法颇为乐观，因为有些香港人相当能干，办事能力很强，可以解决问题。这些人包括教育界、专业人才、工商业人士、政府官员，1997年以后也仍是这些人在主导香港，不会改变。很多人不明白1997年之后的香港，其实具有相当独立的地位。因为决定香港未来的两大基础是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基本法等于是宪法，既已写成白纸黑字摆在眼前，很难否认它的存在。一般人不了解基本法，它规定1997年之后的香港有独立的护照，拥有独立的货币港币，还有自选的行政首长。我曾和一位院士谈过，他拥有香港护照，他不相信我说1997年之后香港护照仍然有效。Milton Friedman也不相信港币可以成为独立的货币。至于行政首长的产生，许多人更是颇有疑虑。

基本法规定未来香港特区的行政长官是在当地选举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但不是普选，而是由四百个代表组成的推选委员会投票选出。这四百个代表人的产生，则由筹备委员会决定。筹备委员会成员大约有两百人，其中中国约有九十人，香港有一百多人。这一百多位香港人都是社会上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包括香港七个大学之中的六个校长。七个大学是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科技大学、城市大学、理工学院、浸信会大学、岭南学院。有人认为这些成员的立场有偏颇不公正的嫌疑，因为这些人大多亲中，不是亲中的人士不能入选，至少也必须是不反对中国的人。因此筹备会不包括民主派人士在内，例如李柱铭。四百席选举代表由筹备委员会选出。

在香港特区的行政首长人选尚未确定之前，我很关心这个问题，常常征询朋友的意见。很多人对此一职位都有兴趣，包括民主党人士和工商界人士在内。我认为呼声最高的人选是董建华，理由有三：一是他没有不良记录；二是他待人很客气，这点很不容易；三是1996年一月霍英东说他是理想的人选。霍英东是政协副主席，此话虽说是他的个人意见，如果一年半之后的行政长官并非由董建华出任，他会没面子。若

无北京部分领导的同意或其他的根据，他不会随便乱说。根据朋友告知，江泽民曾邀请董建华夫妇去北京，谈了大半天话，还设宴款待。看来香港似乎找不出比他更适任的人选。此外，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与台湾有很深厚的关系，这点在中国官方看起来也是一个有利的因素。

呼声次高的人选是陈方安生。她原来担任香港布政司（Chief Secretary），地位仅次于港督，是香港的第二人。她很有办事能力，很多人希望由她出任，呼声也很高。倘若董建华出任行政长官，仍然可以请陈方安生继续留任（陈方安生于九七之后继续担任政务司司长，1997-2001），正如九七之后其他的司长也会留任。在香港担任司长，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一旦移民到其他的地方，因为过去没有累积这种特殊的人力资本，不可能得到类似的殊荣，所以他们都不会外移。对中国而言，这当然再好也不过，亦即九七之后香港的局面大致不变，其他的公务员也都留任，继续管理香港，只是港督换成特区行政长官而已。

我在 1996 年的时候，就已听说董建华将成为香港特别行政首长。董建华这个人非常好，只是不适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后来董建华先做满第一任任期（1997-2002），一任是五年，然后又当了三年特首（2002-2005），还有两年任期才届满。可能北京政府认为他做得不很理想，因此他在 2005 年时，托词自己健康不好辞去职位。很多人的共同想法是中国找董建华担任这个职务，目的就是不要他做事，中国想要自己管理香港，否则不会找他。但我认为中国并不想管理香港，而要实行一国两制。因为香港相当繁荣，中国的目的就是继续维持香港的繁荣。

关于香港的问题，根据 2003 年的民意调查，香港人对政府不满意，其实有些政府政策也受到港人的欢迎与支持，只是对特首董建华不满意。以 1997 年七月一日他宣布增建公寓的政策为例，当天晚上庆祝回归的盛会有两千多人参加，座位不太多，可是很多人想要参加。我也在座，我的邀请函是中国国务院发出的，座位安排和一批台湾人坐在一起，有一些台湾人也在受邀之列。董建华当场宣布他要提高政府对公寓的供应，一年要增加 85,000 个单位。他做这个决定没有经过仔细的考虑，因为住房供应一旦增加，房价一定会跌下来。后来香港的房价果然下跌，很多人就埋怨他。在香港九七回归的那天晚上，他的第一句话就说错了。根据 2003 年的民意反应，他不受港人欢迎，理由是他犯了不少错误，不应继续担任特首（2005 年三月董建华去职，由政务司司长曾荫权署理，同年六月正式接任。）。中国的态度是：「只要不出大乱子就好。」中国政府并不愿意管理香港，香港做得好，对中国才有益处，它希望香港继续繁荣。董建华担任特首的时候，香港不够繁荣，他要负起

责任。

在美国很多人认为 1997 年之后香港会有很大的改变，然而香港也有不少人认为九七之后会更好。例如伍淑清等人代表妇女界成立庆祝回归筹备会，她就持正面看法。伍淑清出生在香港，长大之后赴美留学。她为中国做了不少事，包括训练旅游、商业服务及管理等专业人才。

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1930 年代我在香港念小学之时，很多香港居民不喜欢英国人。香港是鸦片战争失败后，1842 年中国订下不平等条约，才割让给英国，这是中国人的屈辱。收回香港，象征近代中英关系改变的分水岭，意义非常重大，当然值得庆祝。在两个前提之下，会认为香港回归中国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一是凡自认为是中国人者；二是凡认为现在大陆的政府是代表中国政府者。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的人，一定会为香港回归中国一事大肆庆祝。若是两者缺一，就不会庆祝。香港就有一部分的居民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我向来主张自由主义，只要当事人认为自己不是中国人，那么他就不是中国人。大约半数以上的香港人自认为是中国人，虽然对大陆的政府有些不满意，但仍然承认它代表中国。对这些人来说，香港回归中国是一件喜事。

1996 年七月一日，有一位院士在香港参加提前庆祝回归的活动，在中国银行举行。他说在中国银行大厦设立一座饭店，所有的装潢设备完全模仿 1930 年代上海外滩的情景，很有意思。

1997 年之后威胁香港前途的阴影是言论自由没有充分的保障，有些人的发言方式可能会改变。其实早在香港回归之前就已经如此，人都很聪明，见风转舵，许多话自然就不说了。我同意言论自由可能会受限的说法。不过在 1980 年代之前，香港也没有公开发表反对英国女王和英国统治的言论。至于限制言论自由对于香港有何影响，众人说法不一，我自己持比较中立的看法。例如 1948 年以前蒋介石在中国大陆担任总统，也不容许别人公开反对他，也没有人会如此做。美国式的言论自由近乎儿戏，例如美国人爱看 Johnny Carson 等人主持的脱口秀电视节目，每天晚上拿总统来消遣开玩笑。这是美国才有的风气，欧洲和日本都没有这种做法。就拿最重视言论自由的大学来说，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留美回来的，九七之后他们仍然留在香港。按理说他们可以自由决定去留，他们自己选择从美国到香港，并决定待下来。可见九七之后的香港没有太大的变动。

有些人则认为九七之后的香港会更好，因为再也不受英国人管，又

可以和中国合作，只会比过去更好。这点我就不敢说了。我认为九七之后对于经济成长不会有很大的影响，虽然 1996 年香港的经济不如过去，年平均经济成长率大约是 5-6%，比台湾略高。1997 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使香港经济大受打击，后来也逐渐复苏。

我认为香港的问题主要在于这批执政的新班子没有充分的经验。1997 年以前亚洲经济情形良好，香港经济持续繁荣，一旦出现问题，中国政府决定不干预，实行港人治港。我从香港到台湾，曾说过台湾的施政水平比香港好得多，亚洲金融风暴台湾可以安然渡过就是一个明证。香港执政者缺乏做决策的经验，只有执行政策的能力，这个问题一时无法解决，也不能靠中国解决，因为中国不会插手香港事务，以免授人以柄。朱镕基对于香港外汇问题，只说：「如果有需要帮忙之处，一定尽量帮忙。」他希望维持港币汇率，这是最大的关照。香港经过这些年已经学到不少经验，以后的决策应该会比较适当。我的文章〈亚洲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经济政策〉（“China's economic policy in the context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最后一段就是讨论香港问题，1998 年八月台湾的《工商时报》曾翻译刊登。

1997 年七月香港回归，由 Stephen Smale 教授主办「一国两制」演讲会，我也举办工业政策讨论会，邀请张忠谋、吴家玮等人与会。1998 年一月我前往中国讲授金融数学，行程包括上海、北京、山东、广州，主要目的是到山东担任经济顾问，讨论企业改革的问题。我写成一篇总结报告，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和宏观经济调控两个重点，并据此写了一个备忘录寄给香港发展议事会会员。后来我离开广州抵达香港时，由钱果丰（Raymond Chien，曾任香港行政局委员）先生邀请成员聚餐，出席的人并不多。香港有不少问题，除非他们有兴趣和我共同讨论如何解决，否则我不会主动参与。

1998 年十一月初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刚好两岸金融界在台湾举行「亚洲金融风暴会议」，我也参加。我发现中国学者对台湾的金融政策大多持批评的意见，他们认为新台币不应该贬值，也坚持人民币不应该走贬。两岸的学者对这个议题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我的观点是赞成人民币不应该贬值。台湾的学者则认为中国在亚洲金融风暴发生以后，对人民币的管制增加，造成外汇兑换的不便，没有以前自由，中国学者则辩称他们的政策没有改变。究诸实际中国在执行上确有延宕，手续比以前麻烦。

1999 年一月我参加美国经济学会的例行年会，其中一个主题就是关

于亚洲金融风暴的问题。开会期间因为气候恶劣，芝加哥机场关闭，飞机不能起飞，刁锦寰无法赶来，要我代替他兼任主席。我原来担任评论人，评论 Jeffrey Sachs 的文章。Sachs 曾经担任过俄国、波兰等国的经济顾问，对经济改革的主张属于震荡疗法（shock treatment, shock therapy）一派的想法。会议进行到第二天，刁锦寰赶来，我已经开完会回到普大。他打电话告诉我这次会议很成功，感谢我帮他主持会议；同时他想将 2000 年的北美中国经济学会和美国经济学会的年会同时举行，请我帮忙转告 Dale W. Jorgenson（2000 年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以便列入议程。可见亚洲金融风暴已成为热门的学术研究课题，香港和亚洲的经济研究也日益受到经济学者重视。

1996 年十月三十一日香港恒生指数创下 12,400 点的新记录，我预测两个月之内会达到 13,500 点。1996 年十一月十四日股市收盘时，指数已升到 13,005 点。十一月十五日我进一步修正预测，告诉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的师生，在几个月之内将会达到 14,000 点。此一论点后来我在十二月十三日香港的公开演讲上发表。次日香港的英文报纸对于演讲内容有详细的报导，要点大致如下：我认为香港的股票被低估了，它的本益比只有 15（当八、九年前日本的经济成长率与香港差不多的时候，日本的股票本益比是 35）。香港股票被低估的原因，在于投资人认为 1997 年香港回归中国，将对股票市场造成相当大的风险。这种看法并未经过证实，大多是传播媒体散布的，他们对于中国和香港情形并不很了解。基于我个人对中国政府和香港的了解，香港未来的前途相当乐观，后来我也投资香港股票赚了一些钱。

香港回归中国至今已经九年了。在回归三年之后的 2001 年，香港有五十万人上街头抗议。其实上街的人群里面，持正反两方意见的人都有，有一部分的人庆祝回归，另外有一部分的人则主张香港要继续推动民主。到了 2006 年，游行人数减少不到五万人，从游行示威的人数减少，可见香港这两年的经济情况有好转一些。陈方安生说：「经济好，不代表什么都好，我们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她未必对中国北京政府不满意，她所领导的示威游行可能想要表达自己的意见，继续保持她在香港的影响力。一般的香港人很重视经济，对香港人来说赚钱最重要，其他的事就不太管了。

先前我谈到基本法，曾说基本法已经制订，就一定会实行。其实未必如此，虽然基本法有明文规定，至于制度要如何落实就不一定了。不过香港人尊重法治，例如我们可以批评董建华的政策有何利弊得失，可是他很守法。香港人有法治的传统，香港的官员很守法，和台湾不一

样，也和中國大陸不一样。基本法的落实与否，和香港人对政府的满意程度关系不大，大致上只要经济繁荣，香港人就满意，尽管其他方面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不过最重要的还是经济景气。

（四）香港的大学及其他

香港科技大学成立于 1991 年，由吴家玮担任校长。吴家玮当时在美国，到任之前先去全美各校网罗人才。他找我谈了两次，后来我去科大当兼任教授。每年六月到七月，我有六个星期的时间，可以去教几个星期课。项武忠也是该校数学系的兼任教授之一，他整个暑假都在科技大学，时间比我长。

我从 1993 年开始去香港科技大学，到 1996 年发现它办得很成功，很不容易。它最大的影响是带动香港各大学的研究风气。例如从前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各校的教授多不做研究，现在非做研究不可，对学术研究风气的提升很有帮助。在我看来，科技大学比一般美国的州立大学还要好，可以排入州立大学前十五名之内。科技大学的经济系每年邀请十多个教职候选人去面谈，提供机票，停留三、四天，最后决定聘任三到五个名额。每年美国经济学会召开年会，1996 年初在旧金山举行。科技大学全系二十多位教师之中，就有七、八名去参加。

科技大学经费充足，提供的待遇很优厚。它当初请我兼任时，待遇比照普林斯顿大学。后来普林斯顿大学调整待遇每年增加 3%，而科技大学每年调升 9.5%，几年下来科技大学的待遇比普林斯顿高，即使助理教授或副教授也是如此。除了薪水之外，还有房租补助。学校提供宿舍，只扣薪水 7.5%，补贴很大。例如我在香港的时候，早期科技大学给我一个公寓住，扣 7.5%的薪水。后来改住旅馆，每天房钱将近二百元美金，仍然照扣 7.5%的薪水，多出来的部分由学校补贴。1995 年一个刚毕业的副教授待遇，连补贴在内是一年七万美元，而在美国只有五万五千美元，差距很大。有些人担心 1997 年之后这种情形会改变，因为科技大学的待遇与北大有天壤之别。1996 年香港议会质询，已经提出香港各大学

教授薪水太高的质疑，以后不宜再继续提高。这是香港内部自己提出的问题，与九七无关。

1998 年我开始在香港城市大学兼任教授，最近这几年因为香港经济情形不好，我在城市大学三年来（2002-2005）每年薪水调降 3%，不过 2006 年似乎没有再减薪。香港拼命减薪，而中国则是拼命加薪，很多人可能因此受到影响，从香港被挖角到中国去任教。对教授减薪没有问题，因为教授不能罢工，无可奈何。薪水是政府决定的，个人可以不接受，回美国去教书。1990 年代我曾问香港的朋友，谁的学术地位最高？很多人都说是 Steven Smale，他是一个跨领域的著名数学家，在城市大学任教。2002 年开始有减少教授待遇的说法，他觉得待遇条件变差，就离开了，回到美国加州教书，还不及在香港任教的薪水。减薪是因为香港政府的财政有问题，有人认为是中国想把香港和中国的待遇制度统一起来。其实不是，中国并不想干涉香港，只要求香港不要乱搞民主。中国政府最关心的是香港搞民主，可以慢慢来，不要太快。其他的问题对中国没有影响，中国就不管了，不会干涉。1997 年江泽民发表演讲时，他说：「香港的政策、香港的事情，我们不会管、也不要管。」这句话他重复了两次，态度很诚恳。基本上中国落实一国两制的说法，只要香港不闹革命，其他的事无所谓。

1998 年十月至十一月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三个星期，大部分时间都和年轻学者讨论他们在研究上所遇到的难题，这也许是对他们最有帮助的方式。香港城市大学也邀我去担任讲座教授，我认为开内部研讨会，让大家互相交换意见，对自己也很有启发。

香港热心国事的李绍博士及其夫人，捐钱在香港举办一个征文比赛，主题是「市场经济的社会因素」，包括中国、香港有几百个学生参加比赛，由香港浸信会大学举办，邀请香港岭南学院院长、北京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和我三个人担任最终的评审。我们只读最后晋入决赛的十六篇文章，主办单位最后还要求我们三位评审写一篇文章说明评审心得。我在文章里面针对征文的问题提出三点意见：第一、有些作者认为市场经济需要民主政治做为基础，我不同意。我认为没有这么简单，例如台湾早期也是走市场经济的发展路线，但是政治并没有高度民主化，数十年来香港的经济发展也是另一个明显的例子；第二、学生们提出许多市场经济带来的弊病，例如贪污等。我认为社会问题很复杂，市场经济并不能解决其他许多的社会问题；第三、我认为中国一流大学的学生在数理、自然方面的素质较好，但是在经济学方面的水准不如美国一流大学的学生。主要是教学体制的问题，既有的训练方式不够灵活，影响学生

的学习方法，使他们普遍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例如以前我在岭南大学读书，后来去康乃尔大学就读，才发现自己也有这个问题，可能和中国整个教学制度有关系。这是我的一点感触。

现在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很多大企业的规模超过国家，甚至有「企业并购国家」的说法。只要世界贸易组织坚持开放国际市场，国家对跨国企业根本无法限制，特别是全球性的资本流动。例如产业政策，有人主张国家不应该干预某一种工业的发展，应该由市场决定，当企业家认为有前景，自己就会去投资，用不着国家制定计划来发展。

市场万能是我毕业后的第一年遇见 Jan Tinbergen 时的想法，现在我的立场、看法已有不同。我年轻的时候认为，只要按照经济学的说法，市场会自动达成均衡，现在却未必这么肯定。我刚在芝加哥大学拿到博士学位，是芝加哥大学的自由派，主张无论什么问题市场都可以解决。我在 MIT 教了四年书之后，对芝加哥学派的想法已经有点保留。过了几年以后，有些芝加哥的同学对我说：「我们不承认你是芝加哥大学毕业的，要把你的博士学位收回来。」因为我和他们讨论的时候，有些意见和他们不同。从中国的角度而言，政府在中国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1960 年代我在台湾担任经济顾问，已经有这种感觉。2006 年是我来台湾的四十周年纪念。我第一次来台是 1966 年，那时候台湾是一个很小的地方，而我在一个大公司 IBM 工作，为什么 IBM 公司可以做计划，台湾政府就不能做呢？从经济学的立场来说，每个企业要竞争国内市场，甚至要竞争世界市场。对一个国家而言，国内的企业要互相竞争；对世界市场来说，一个国家要用计划来和别的国家竞争。所以一个国家的政府就像 IBM 公司一样可以做计划。台湾是我的第一个学习机会。

另外一个因素是文化的差异。好比在台湾，李国鼎会留在政府服务，而他的眼光可能比其他的人更好。这是因为东方的文化不同于西方，日本、韩国、台湾、中国会有一些头脑聪明的人，却不一定追求市场的利益，也许会选择留在政府部门里服务。李国鼎担任政府官员要决定产业投资的方向，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而不是他个人投资营利的問題。在美国，并不是由政府部门决定企业投资，但在台湾就可以。因为在中国传统里政府有很多参与发展的机会。例如清末 1907 年梁士诒（燕孙）先生担任邮传部五路提调处提调（后改为铁路总局局长）兼交通银行帮理，推动成立交通银行。我也同意给政府官员额外的报酬，如果他比别人更努力的话，不管是国有企业或是私有企业，只要员工努力付出，就应该多得报酬。

以我个人的经验而言，毕业之后我先到麻州理工学院、康乃尔大学教书，再到 IBM 公司工作。后者对我的影响是让我不像一般纯粹的学者，因为我待过企业公司，知道要求工作有效率；有些研究题目的着眼点也不同，例如企业主管要考虑某些问题，需要顾问的研究成果提供参考，和纯粹做学术研究不同。我可以说自己在 IBM 公司任职的经验很有价值。Ben Bernanke 在华盛顿担任过美国政府顾问，也担任总统的经济顾问（2005.6-2006.1）、联邦准备银行顾问、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2006-），他也学到不少经验。不过，这是另外一种能力。有些人擅长研究写论文，但是学术论文写得好的，思考经济政策未必灵活。对市场经济建议灵光的人，也未必是论文写得最好的人，这两种天赋不同。现在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也不断进入政府部门服务，例如回国服务的公费留学生就有很多人提供意见，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就是其中之一。

七、学术生涯回顾

（一）研究领域与成果（1951-1996）

我很高兴有机会回顾自己对于经济学研究的想法，并借此进行自我反省，以确定未来的研究方向。内容大致可分成两大部分：一是不同时期进行的不同研究主题；二是对研究成果的自我评估与省思。

我做经济学研究是从找博士论文题目开始，这段过程很不容易。1951年我去芝加哥大学，第一年就通过学科考试（一般学校称之为general examination，芝加哥大学称为preliminary examination），1952年就取得硕士学位。Becker是我的同班同学，他说第一年参加学科考试恐怕有风险，后来他在念了一年半的时候才通过考试。我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去佛罗里达旅游度假。第二年既不用上课也不用念书，我打算两年之内可以完成论文。那知花了一年的时间，找不到合适的论文题目，心里挫折感很大。我到处翻书找题目，有些题目太难，完全想不出头绪，做不出来；有些题目太容易，以自己的能力，两三个星期就解出来，没有什么学术价值，这也不成。我在芝加哥大学的第二年就这么过去，可见找论文题目之难，相信别人也有相同的经验。

其实计量、货币、价格理论方面的题目我都可以研究，折腾一年，我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题目，研究美国的汽车需求。因为修过Hendrik S. Houthakker的「消费需求的理论与计量」（Theory and Econometrics of Consumer Demand）课程，他请我帮忙做笔记，我自己也有兴趣，于是选择耐久财的需求做为研究对象。后来Arnold C. Harberger回到芝加哥大学当副教授，他支持我写论文，薪水每个月二百美元，足够做生活费，直到写完论文。Harberger在1950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他很有办法，直到1990年代仍然很活跃，1997年当选美国经济学会会长。Milton Friedman的评语是：「早该轮到他了！」其实够资格担任经济学会会长的人很多，至于轮到谁也是凭运气。

我的论文指导教授有三位：Harberger、Jacob Marschak、Allen Wallis。Wallis是统计系系主任，后来担任罗彻斯特大学校长。他说：「有他们两位教授指导就够了，用不着我来！」所以他对我的论文没有太大帮助。Marschak看了三章的稿子之后说：「够了！够了！」他也没什么看，不太管我。Harberger是真正的导师，我每写完一章给他看，他差不多都接受。Milton Friedman则和我辩论几个要点。当时在芝加哥经济系，他主持一个货币理论讨论会，有五、六个人参加。他和助手David Meisselmen两人合作，用回归方法研究凯因斯学派和货币学派的理论，何者较好。检视究竟是凯因斯理论的自主性支出（autonomous expenditure）或是货币学派的货币供给，何者对于国民所得的解释能力较佳？1954年Friedman有一回在讨论会上报告他们的研究，随口说了一句话：「把这个称为M1，那个称为M2。」货币供给M1、M2的名称，就从那时候开始。

我在Friedman的讨论会报告汽车需求函数理论的演算结果。他和我辩论得很厉害。他当时正在进行恒常所得（permanent income）的研究，想推广这个观念。他很坚持，逼我用恒常所得的观念。我在讨论时站稳立场，不为所动。他很老练，经验多；我对这个问题想得更多，了解透彻，两个人辩成平手。辩论过程很激烈，Friedman直嚷：「不对！不对！」好像要骂人的样子。事后他和我说：「要是你写的东西没有价值，我不会和你辩。正是因为你写得好，我才和你辩。」

我在1955年写完论文，1957年出版。先是Henri Theil读到我的论文，推荐给Jan Tinbergen。Tinbergen将其收入《经济分析文献》（*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Analysis*）系列第十三本，由North Holland公司出版。

我将毕业找工作之时，Friedman写推荐信给麻州理工学院史隆管理学院的副院长Eli Shapiro，聘我担任教职。另外，Wallis也帮我写推荐信。我觉得去麻州理工学院很好，因为他们和芝加哥学派的训练很不相同。我开的课程包括「行销与需求分析专题讨论」（Seminar on Marketing and Demand Analysis）、大学部的「计量经济学」。我在那里教了四年书，第一年教书很困难，教三年级的课程，即使很简单的计量经济学，也需要花很多时间准备。

1955年到1956年Tinbergen在哈佛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他知道我的博士论文，邀我见面。他告诉我一个构想：美国有许多旧汽车，而欧洲有些国家没有汽车，他想把美国的旧汽车运销到欧洲去。我回答说：

「如果有利可图，市场自会进行。」他笑一笑，回答说：「那只是一个想法。」他的作风四平八稳，不像我久受芝加哥学派的熏陶，作风很冲。芝加哥大学的讨论会辩论非常激烈，好像要打架一般。

我最常被引用的一篇文章是提出所谓的「邹氏检定」。论文写作的缘起要回溯到 1958 年，Harberger 要编一本关于耐久财需求的书。我的论文讨论汽车耐久财的消费，在我的论文写完之后，芝大几位同学接着研究耐久财的消费，包括房子、冰箱等。Harberger 要求我加入写书，我的论文已经交给 Tinbergen 出版，不能再用，必须写些新的东西。我想知道耐久财的需求函数经过几年以后会不会改变，所以用检验方法加上实证资料，求证我估算的耐久财需求函数是否改变。这篇文章后来在 1960 年发表，题目是〈检定两条线性回归式的系数是否相同〉（“Tests of equality between sets of coefficients in two linear regressions.”），一般简称为「邹氏检定」。1958 年我还写了另外一篇文章〈股票价格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stock prices.”），我自己觉得这篇文章也有影响。Myron Gordon 专门研究股票价格，有些想法是从我这篇文章开始的，他后来出任美国金融经济学会主席。

我在麻州理工学院四年之后离开，回到母校康乃尔大学任教。在那儿认识刘大中先生，教了三年书。我对康乃尔的生活环境不太适应，那里静若止水，不像麻州理工学院充满活力。

1962 年我离开康乃尔大学，去 IBM 公司任职。我在 IBM 时写出几篇重要的文章：1964 年的〈联立方程式估计方法之比较〉（“A comparison of alternative estimators for simultaneous equations.”），是讨论联立方程式的估算办法。1966 年的〈长、短期的货币需求〉（“On the longrun and shortrun demand for money.”），Blinder 说这篇是我最有名的文章。1967 年的〈乘数、加速数、流动性偏好对于美国国民所得的决定〉（“Multiplier, accelerator, and liquidity preference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national income in the United States.”），是讨论宏观经济的文章。上述几篇文章都是以后数年学生的基本必读之物。

关于〈长、短期的货币需求〉一文，其中我有些意见和 Friedman 不同。他请我去他在芝加哥大学的货币理论讨论会上讲这篇文章，我觉得反应还不错，所以向芝大出版的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投搞。期刊主编是 Harry Johnson，评审人之一是 Friedman，他说这篇文章不能刊登，并提出两点理由。我觉得他的说词是强辩，写信给 Johnson 表示评审的第一点说法全无道理，建议找第三者再审。Johnson 很公平，也就这么

做，文章最后仍得以刊登。Friedman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他的缺点是过于偏执，不太宽容别人的意见，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1967年我写了另一篇文章〈技术变迁与电脑需求〉（“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the demand for computers.”），帮我赚了不少钱。在我离开IBM公司去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之后，有两家电脑公司为权益纷争进行诉讼，必须找学者专家提供证词，我和George Joseph Stigler代表其中一家公司（Stigler是芝加哥大学的八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他们请我担任顾问的理由，就是因为这篇文章。我必须替公司去加州准备出庭，从出门那一刻开始计费，搭飞机、到达旅馆前均计入，每小时以二百美元计。晚上在家阅读文件、书籍等时间，同样计费。以1970年代的美元币值计算，待遇极为优厚，可是到后来我不想赚这钱，因为就学术研究而言，这件事没什么意义。前后进行一年多，总算官司完结。

1968年写了两篇重要的文章：〈随机联立方程式的充分讯息最大似估计法之两种计算方法〉（“Two methods of computing full-information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es in simultaneous stochastic equations.”）和〈加速原理和景气循环的特性〉（“Acceleration principle and the nature of business cycles.”）。

上述从1964年到1968年所写的几篇文章，奠定我在经济学界的地位，成为计量经济学会的荣誉会员（fellow），各大学纷纷提供任教机会。我觉得自己那一段时期的研究相当公式化，亦即我需要写文章发表，只要有兴趣的题目就写，没有大方向。看到Friedman关于货币需求的文章，我想自己可以比他写得好一些，于是写了〈长、短期货币需求〉一文。我对经济模型有兴趣，当时经济学界最热门的题目是联立方程式，我有方法、工具，一定可以写得更好，所以写了有关联立方程式估计法的文章。撰写关于电脑需求的文章，则是因为我任职的IBM公司有资料。那个时期写的论文，不算很有原创性，都是做经济学界主流时兴的研究题目。

我在IBM的工作环境很好，研究时间很多，除了研究之外，没有其他的事，我在晚上和周末都不工作。1966年开始来台湾工作，但所花的时间不多。我开始新的研究方向，就是动态经济学，大致可以包括两方面：一是解释景气循环的经济波动。亦即应用计量经济模型来分析景气循环的动态性质。二是应用最适控制理论来做政策研究。这是我自己新开辟的研究领域。

此后我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下列三大项：（1）计量经济学。包括理论与实证应用，例如研究货币需求函数与加速原理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等。（2）动态经济学。这是我 39 岁时开创的研究新领域，我是先驱领导人。 （3）中国经济研究。

我具有原创性的研究，始于 1970 年发表的〈线性经济体系的最适随机控制〉（“Optimal stochastic control of linear economic systems.”），迄今仍然有影响。1997 年循此一思路进一步深入研究，完成《动态经济学》一书。

1970 年我离开 IBM 公司，到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主要的课程是计量经济学和动态经济学。国家经济研究局拨经费支持我，每年开一次动态经济与控制理论的讨论会，持续数年之久。例如 1972 年的〈最适随机控制政策的成效如何〉（“How much could be gained by optimal stochastic control policies?”）和〈介绍随机控制理论与经济体系之关系〉（“Introduction to stochastic control theory and economic systems.”）。这两篇文章都是会议论文，由我和麻州理工学院电机工程系的控制理论专家 Michael Athans 合着。这种由经济学家与工程学家合作组成的研究群，在经济学研究上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陆续有不少论文发表。如 1976 年的〈非线性计量经济体系之回馈控制研究（“An approach to the feedback control of nonlinear econometric systems.”）〉，1977 年的〈不完整模型在形成稳定政策上的效用（“Usefulness of imperfect models for the formulation of stabilization policies.”）〉。这些会议论文陆续发表在《经济与社会评量年报》（*Annal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Measurement*）上。研究群的合作从 1972 年持续到 1978 年，我们在 1979 年成立经济动态与控制学会（Society of Economic Dynamic and Control），我担任第一任会长。

我在 1975 年出版的《动态经济体系之分析与控制》（*Analysis and Control of Dynamic Economic Systems*）一书，是这个学门的基本教科书。例如 Thomas J. Sargent、R. King 等人对我说，他们从这本书上学到动态经济学。史丹福大学的 John Taylor 也是如此，他采用这本书做教科书。他们现在在学术界都很有影响力。我从 1970 年开始，在动态经济学和控制理论这个研究领域投入了十年之久，1991 年以后再继续深入研究。

自 1980 年起我开始研究中国大陆经济，包括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经济改革，花了许多力气。我不只是暑期的时候去中国，平日的准备工作也花很多时间。在此一时期对经济理论没有什么研究，只有 1981 年出版

《以控制方法进行计量经济分析》（*Econometric Analysis by Control Methods*），是第二本有关控制理论的书，和1983年出版的《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教科书。对于前两个领域，计量经济学和动态经济学，1980年代我写的文章不多。有一段时期我觉得很吃力，因为中国经济改革与计量经济学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压力很大，一方面同事不承认我从事的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经济改革有学术价值，只用很狭隘的眼光来看专题论文的发表篇数，我必须追上学术研究潮流；另一方面在教学上也必须全力以赴，因为我是计量经济学的教授，而非中国经济的教授。

我有时候觉得研究中国经济是牺牲计量经济学与动态经济学研究，前者与后两者之间互相冲突。另外，我在香港参与许多活动，也牺牲了研究的时间。直到1990年代以后，彼此之间的矛盾才得以调和，其中的重要关键是六四事件。六四事件发生之后，赵紫阳不再担任总书记，我也不需要再花太多时间在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经济改革之上。中国经济改革初期比较需要学者专家提供意见，后来已经发展得很好，就不需要我再去了，一如台湾后来也不再邀请国外学者担任顾问。同理可知，中国可能已经没有这种需求，经济学教育和经济改革都可以自己进行。我仍然继续帮一些忙，但所花的时间比从前大为减少。

除了外在环境变化引起研究方向的改变之外，自己心态的调整也很重要。我的经验增加，信心增强，现在对三个研究领域都相当有把握，自知处在开拓者的领先地位。1980年代初期我刚开始研究中国经济，没有一点底子，只能拚命学习，在压力之下很难兼顾各方面，所以在动态经济学的研究就落后了。现在我知道自己在每一方面都已成熟，累积不少资本，处于领先的地位，要继续跟上研究潮流并不难。另一方面，从前对自己要求很高，年龄渐长以后变得不计较，没有追求特定目标，因此容易满足。自我要求降低，比起从前的眼高手低，心态平衡许多。

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1990年我想正好回头研究动态经济学，暂时抛开中国经济的问题。1995年到1997年时，我教授研究生的宏观经济学和金融财务。Nancy L. Stokey和Robert E. Lucas, Jr.写过一本宏观经济学的教科书*Recursive Methods in Economic Dynamics*，很多人使用。他们用动态规划做为宏观经济理论的基础，因为经济理论主要追求最优化（optimization），动态的经济是长期的、有计划的，以一套最适的行为解释经济现象。我一向不用动态规划，因为自己发明了一套方法，从1970年的一篇论文开始使用拉氏方法（Lagrange Method）。这是一种很基本的办法，比动态规划容易。我觉得自己的方法又简单又好

用，所以教了两年宏观经济学，用Stokey和Lucas的书做为教科书，但书中他们用动态规划来求解的时候，我都改用拉氏方法。后来我的上课讲义就成为《动态经济学》书中的第四章。《动态经济学》一书的内容包括宏观经济学、金融财务、投资、实质景气循环等好几个主题。我也用在金融财务方面，有一篇最重要的文章是Robert Burton和Paul Samuelson写的，他们也是用动态规划解决订价的问题，而我则改用拉氏方法求解。Avinash Dixit和Robert Pindyck合写的*Investment under Uncertainty*，是一本相当有名的投资学的书。他们也是用动态规划的办法，我也改用拉氏方法。Dixit是我的同事，Pindyck是麻州理工学院的教授。

《动态经济学》写完以后，我很有自信，认为这本书应该可以取代动态规划，但是结果似乎不如预期。有人使用我的这本书，但还未成为主流，也就是说拉氏方法可以用，至于有多大的影响，要看以后的发展情形如何。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先入为主的观念，因为很多人做研究生的时候，已经学过动态规划，他们教书以后，也是照本宣科，不会改动讲义内容。Robert Shimer 就是一个有意思的例子。他是麻州理工学院的毕业生，专长是宏观经济学研究，五、六年前已经去芝加哥大学担任教授，现在相当有名。1998年我的书刚出版时，他在普大教书。普林斯顿大学在研究生刚入学时，和其他学校一样，都有一门经济数学的课，因为刚入学的研究生每个人接受的数学训练不一样，所以有两个礼拜的密集课程教授必备的基础数学知识，每天都要上两三个钟头的课，每一年最后的一部分课程就是动态规划，Shimer 负责教这个课程。我把我的书影印了大约七页给他，并说：「你的授课内容都包括在这七页里面。」过了几天，我问他我的说法对不对？他说：「对。这七页就包括了全部的讲义内容。」但是他第二年再教课的时候，并没有采用我的书中那七页的内容，还是继续用他以前的讲义，所以后来我就放弃了。因为他认为自己从麻州理工学院学到的是动态规划，就再也不会更改他的上课讲义。

近五年来，在普林斯顿的经济数学课最后讲到动态经济最适化的部分，研究所里会要求我去讲一堂课，专门介绍拉氏方法。这节课很受欢迎，每一年学生都大力鼓掌。因为这堂课正好排在他们学习动态规划的方法之后，可以比较两者的难易。我对他们说：「你们都学会了动态规划，相当辛苦，但是我教了拉氏方法以后，大家就可以很轻松容易的解决。」尽管如此，拉氏方法还是不太能推广，因为他们看文章、写论文的时候，必须遵循别人熟悉的格式方法来撰写。所以拉氏方法能否在经济学上普遍应用，还要看以后的发展情形而定。《动态经济学》一书有一些书评，其中一篇是 Paul Samuelson 写的，他同意我对动态规划的批

评，认为我的拉氏方法比较好，也是第一个引用的经济学家。他比较客观一些。

我自认为在学术研究上最得意的发现，就是这个拉氏方法的应用。至于其他的一些研究成果，例如邹氏检定，虽然对学术研究发生很大的影响，但我只不过是用一个很简单的统计学方法就解决了，并不是一个有深度的数学构想。拉氏方法虽然简单，但是很多聪明的学者都没有想到，发明动态规划的 Richard Ernest Bellman，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数学家，为何连他也没有想到呢？所以我认为自己的研究发现很杰出，但不是一般人都能欣赏，不过也无所谓，因为我已经完成了。

回到中国经济上，1986年我自愿教这门课，那是系主任给我个人方便，因为我有兴趣，他就让我开课。如果我不开中国经济的课，校方绝对不会邀请别人来教课。现在学校的态度稍微改变了一点，校方很乐意我每年讲授中国经济的课程，有愈来愈多的学生选课。因为有这样的需求，也有很多人想教，学校可能会认为这门课比较重要一些。但是如果我不开课，经济系也不一定会专程找人来教。他们可能会找人来开这门课，但绝对不会为这门课聘用一个全职的教师，除非这个人在经济学上另有比较重要的贡献。所以普大经济系还是用主流与否来定义经济学，学者除非在他们设定的所谓主流经济学上有贡献，否则对于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研究不能算数。

在美国，一个大学的经济系可以不开设中国经济课程，但仍然保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尽管中国经济不被视为主流，但是现在许多学校都开有这个课程，例如哈佛、耶鲁、哥伦比亚、普林斯顿等最好的大学都有开课。中国经济研究也出了不少杰出的学者，一些从中国出去的学者表现很不错。不过我不好举例，以免挂一漏万、厚此薄彼。

我对这三个领域的研究态度，也因时期不同而异。我年纪大了，经验丰富，对事情的看法也不同，进而影响研究方向。目前的研究态度是以自己的兴趣为主，选择研究题目很重要，必须有经验才能找出重要的问题，否则写再多技术性的文章也不能产生大的作用。至于重要的大问题，必须研究者对整个经济学这门学问有完整的看法，知道何处有漏洞，就加以补上。在计量经济学、动态经济学、中国经济三个研究领域，都各自有大小不等的问题可以继续研究。

在普林斯顿大学，大家的生活都很紧张，即使正教授也是如此。但我依然维持在IBM时养成的生活习惯，一天有三、四个小时保持头脑清

醒，全力思索研究问题。如果很认真思考，两个小时也就足够。以思考富于原创性的问题而言，三至五个小时已能兼顾最适化和极大化的原则。很多时候我不能事先确定自己当天该做什么研究，每天早上起来先想到那一方面，就立刻去做，随兴之所至。退休之前我每天早上打高尔夫球，先仔细思考一个小时，虽然不一定有结果，比未思考之前已经进了一步。如此每天思考就更深入一些，累积起来，可能几个月后问题就能迎刃而解。我对上述三个研究领域都有兴趣，也不着急。在三个领域之中，仍以动态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制度优先，因为可以开创新领域。至于计量经济学，我认为很难再创新领域。

（二）近期研究成果（1996-2007）

1996年以后，初期主要的研究方向有二：一是研究中国市场经济的运作；二是研究经济景气循环。我认为中国经济制度的特色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讨论：财产私有制与公有制、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法制与人治、多党政治与一党主政，这些题目均值得深入研究。我目前的构想是利用产业组织（industrial organization）的观念研究财产权，将国家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处理。法律制度的研究也是如此。上述四个题目都可以做比较研究。如有合适的人选，我也希望能和各地的学者合作研究。例如我和香港的关任强教授合作研究动态经济学，已发表四篇文章。我提供研究观念构想，他有娴熟的经济技巧，彼此配合无间。我们主要集中在经济景气循环的研究，现有的景气循环理论用动态最适模型得出实证结果，但解释能力很差。尽管理论高度发展，但与实际资料不能互相印证，其间必然有问题存在。可能是计量方法有问题，也可能是景气循环理论与实际经济行为之间有差距。这是值得深究的大问题。

经济学研究与世界潮流有关。例如凯因斯理论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解决当时世界经济不景气的问题，所以经济学必须与历史结合。何者是经济学研究的大题目，与社会大环境有关，例如Friedman的货币理论日形重要，是因为大家不再相信凯因斯的理论，故Friedman起而代之。现在大家都认为二十一世纪是东方和西方交会的时代，二十一世纪虽然未必

是亚洲人的世纪，至少亚洲可以和美国、欧洲抗衡。过去经济学是欧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产物，但以后不得不重视亚洲的发展。研究亚洲经济很重要，要用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或新的方法来研究。过去美国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大多不是第一流的人才，学术地位也不高，他们不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大部分时间耗费在学习中文上，只能视之为中国专家而已。

1985年我的《中国经济》一书，完全是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但使用的方法还是旧方法。我提出有关中国经济制度的四个问题，可能对于美国经济学研究有一些影响，是未来比较重要的研究方向。我一直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但不限于从某个角度出发。其中一个重点是市场经济的运作，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我后来研究中国市场经济的运作，近十年来发表的很多论文都与此有关。关于财产私有与公有的问题，我最近出版的一篇论文〈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经济改革与贪腐〉（“Corruption and China's economic reform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讨论公有制和腐败的关系。贪污腐败与公有制有关，尤其是土地，因为政府官员拥有很大的财产支配权，否则就没有机会贪污。另外还有三篇文章，分别讨论农业与农村、教育需求、医疗制度。

回顾最近十年的研究与当初的构想未必相同，因为我做事向来不预订计划，如果问我有何计划，我可能无法回答。例如前面提到景气循环研究，后来写成一篇讨论中国宏观经济的论文，也就是货币、物价和产出之间的关系，这也和我原先的构想不同。我以前研究美国的计量经济学，现在没有继续研究。过去美国经济的波动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影响很大，现在则是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很大，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成长很快。例如中国从东南亚进口很多原料，推动了全球的总需求。中国也从台湾进口很多货物，台湾本土没有的产品，也需要从别的地方进口，再转口到中国。因此，中国的总需求会影响世界经济的波动。最近中国景气过热，一方面是汇率的问题，因为人民币的汇率太低，外汇增加很快，外汇增加就造成人民币货币发行增加，货币发行增加就导致中国的景气过热。虽然用行政手段进行调整，但是并没有做得很成功，根据新闻报导中国的宏观调控没有多少成效。关于汇率的问题，中国早晚必须解决。如果不改变外汇制度，只靠外汇政策调控，最后会失效。景气循环和宏观调控必须从制度上找出一个解决的办法。

关于近十年来的学术研究成果，按发表时间的先后依次介绍如下（请参考附录三所列的著作目录）：

(1) 〈中国银行体系的运作成效〉 (“How well does the Chinese banking system function?”) 「中国：面向现代金融体制」国际研讨会是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筹办的，他建议召开这个会议。会议由黄达主持，当时黄达担任中国金融学会会长，本来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向来由人民银行行长担任，那是唯一一次由教授担任会长。他邀请我参加，我说自己对中国的银行制度不了解，需要一些参考资料。后来我收到黄达寄来的资料，就写成这篇文章发表。

在这篇文章中，我建议未来金融改革的可能方向，共有五点。朱镕基在 1999 年也提出银行改革的四个要点，和我的意见大致相同。虽然他不一定受到我的建议影响，也可能因为我们的想法相差不大。我与中国接触多年，颇有学习心得，对于中国问题的许多看法和中国领导人没有太大的差别。

(2) 〈中国的改革过程及其对住房政策的启示〉 (“China's reform proces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housing.”) 关于中国的住房改革，我在《中国经济转型》的第一章里解释中国的改革，有一部分内容即是取材自这篇文章。原书的编者 George Tolley 是芝加哥大学教授，已见前述。

(3) 〈理性预期在计量模型未必成立〉 (“Rational expectations is not necessarily valid for econometric models.”) 本文与关任强合着。我的研究和主流派有两个不同的看法：一是大多数人运用动态规划来计算求解；二是很多人相信「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s) 的说法。我却认为理性预期在很多时候被统计的数字证据推翻，而无法成立。本文就是运用拉氏方法来阐述这个观点。

(4) 〈何以基本的 RBC 模型无法解释美国的时间序列资料〉 (“How the basic RBC model fails to explain US time series?”) 本文也与关任强合着。宏观经济理论有一个「实质景气循环模型」(Real Business Cycle Model, RBC)，它与原先的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不同，两者的基本差别在于后者主要着眼于总需求。后来芝加哥学派和其他的学者，如 Charles I. Plosser，用生产来解释商业交易，称为「实质景气循环」，主要运用生产函数来解释实质的交易。我研究他们的理论模型为什么不能解释美国的景气循环现象。本文分别从两方面来说明：一方面将景气循环进行经济分析；另一方面，很多人主张 RBC 模型所得出的参数不是用计量估算，而是假定一个数字，再观察经济现象能否符合 RBC 理论。我认为这种做法很离谱。

(5) 〈用现值模型决定的上海股价〉 (“Shanghai stock prices as determined by the present value model.”) 本文研究上海的股市，我用「现值模型」(Present Value Model)，就是将未来股价折算成现值的办法，来解释上海的股价。主要的想法是很多人认为上海的股市从 1991 年才开始(1990 年十二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幕)，中国人买卖股票的行为没有一定的模式，不能用经济理论来解释。但本文最主要的结论是中国的股市照样可以适用现值模型来解释。我曾用这个模型解释过美国道琼指数、香港恒生指数等各大公司的股票价格，现在同样的模型也适用于上海的股市。

我第一次运用这个理论是在 1958 年，使用这个模型尝试分析道琼股市，我的样本是不同的公司，公司的股息和实质成长率是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可以用一个方程式推算出股票的价格。推算的结果大部分都成立，但是股票的真实价格和我用方程式估算出来的价格当然有出入，如果我推算的价格比实际的股价高，而且高出很多的话，这个股票就值得购买。我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是在 1950 年代，利用自己的方程式推算这些股票应该值多少钱，如果他们低于这个股价，就可以断言这个股票的价格偏低。不过我的方程式只能解释决定股价最主要的因素，股票真正的价格或高于或低于这个价格，是因为有其他的影响因素，不包括在方程式之内，所以这个现值模型不能用来决定投资与否。简而言之，现值模型可以解释股价，但有些随机的变数无法估计在内。我不去预测股价涨跌，但可以解释股价如何形成，为什么有高低的不同。

(6) 〈用拉氏方法复制条件产权〉 (“Duplicating contingent claims by the Lagrange Method.”)；〈金融经济专号导论〉 (“Editorial note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Financial Economics.”) 在 1997 年和 1998 年，我担任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的顾问，这个基金会经费十分充裕。中国政府支助自然科学研究的经费十倍于社会科学，但是金融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当时基金会请我做顾问，希望我替他们推动金融物价研究的活动，因此我在 1997 年十二月寒假之时，在岭南学院进行为期两个礼拜的金融讲座，大约有三十六个人来听讲。有些人来自外地，其中最有一个有名金融研究学者彭实戈，他在法国得到数学博士学位，用数学来研究金融方面的订价问题。

后来我在岭南学院举行一个全国性的金融会议，将其中较好的论文集到期刊上发表，编成一个金融专号，也包括我这篇文章。在股权认购的订价公式中，Black-Scholes 模型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条件产权(contingent claims)比起选择权(option)更为普遍，于是我用拉氏方法

求出一个订价公式。同时因为自己担任编辑，另外再写一篇导言介绍该专号的相关内容。

(7) 〈亚洲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经济政策〉 (“China's economic policy in the context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本文讨论中国的经济政策。因为当时亚洲发生金融风暴，大家对这个问题很关心。

(8) 〈计量经济学与经济政策〉 (“Econometrics and economic policy.”) 本文回顾计量经济学与经济政策的关系。我以自己的经验从头说起，包括在台湾的经验。先是 1999 年六月十九日，泛华统计学会 (International Chinese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邀请我发表演讲，这个学会的成员包括全世界的华人统计学者。我就以〈统计学与经济政策〉 (“Statistics and economics policy.”) 为题发表演讲。本文则从 1950 年代谈到最近的计量经济学基本而重要的发展，计量经济学于 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在台湾经济政策上的运用，1980 年代到 1990 年代在中国经济政策的应用及其在美国应用的情形。

(9) 〈中国的经济成长 (1952-2010)〉 (“China's economic growth: 1952-2010.”) 这篇文章现在颇引起一些人的注意。我曾在 1993 年写了一篇用生产函数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文章：〈中国的资本形成与经济成长〉 (“Capital form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后来我和香港城市大学的李巨威 (Kui-Wai Li) 合作，将这个模型更新资料，藉以说明和预测中国的经济发展。

(10) 《计量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 (*Contributions to Econometrics and Applied Economics*) ; 《经济动力学与控制》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邹恒甫是哈佛大学的博士，他非常活跃。多年前我在世界银行第一次见到他，他的名片上职称是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在世界银行做研究。我以为他是从中国出去访问研究，其实他的工作单位就在世界银行。邹恒甫也是武汉大学校友，他在中国各处设立经济研究中心，自兼主任，但是本人不在当地工作，可能一年只去几回。他用这种模式设立两四处地方，武汉有一处，同时也在北京大学的光华管理学院担任应用经济学系主任。就像过去台湾的情形，蒋硕杰是康乃尔大学的全职教授，同时担任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也是采取同样的模式。邹恒甫想集结一些比较著名的经济学家的论文出版，这两本书收录的是我过去发表的论文，在北京重新出版。

(11) 〈台湾的总生产函数与经济成长〉 (“Taiwan's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本文和林安乐合着，讨论台湾的生产函数。

(12) 〈当消费—投资者容许不利情势下的权益贴水与消费敏感度〉

(“Equity premium and consumption sensitivity when the consumer-investor allows for unfavorable circumstances.”) 在经济学里有两个谜题，第一个是权益贴水谜题 (equity premium puzzle)。在美国，股票的风险较大，按理平均利润应该比较高，而债券比较稳定，风险较小，报酬率应该比较低。但是两者之间的市场溢价 (premium) 差太多了，无法用经济学解释。按照经济理论或经济模型，两者应该相差一些，但不应该差这么多，为什么两者的实际差距这么大？消费敏感度 (consumption sensitivity) 是第二个谜题。依照恒常所得理论，消费决定于恒常所得而非当期所得，但是如果恒常所得加上当期所得，是否导致当期所得的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应该如何解释？这篇文章就是要解释这两个谜题。本文的共同作者郑立辉，是我在他到香港城市大学访问的时候认识的。我们用顽抗控制 (robust control) 的方法，不求最优的算法，牺牲一些稳定性。一般说来，如果模型完全正确的话，最优解是最理想的办法；但若模型不正确，则得出的结果就差很多。若使用顽抗控制的方法，万一所用的模型设定有错误时，结果还是相当不错，故我们用它来解释这两个谜题。

(13) 〈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比较分析〉 (“Accounting for economic growth i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本文和林安乐合着，比较台湾和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

(14)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于经济、法律、政治制度的冲击〉 (“The impact of joining WTO on China's economic, legal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课题。关于中国的保护主义，我认为中国在很多方面已经相当开放，如果不开放，就不会参加世贸组织。它的做法是在许多方面逐步开放，而不是一次性的全面开放。譬如减税，中国分阶段办理，一年减少一些，整个期间大约费时四、五年，也并未拖延很久。另外，开放金融让外国人来投资，也需要逐步进行。中国容许外国金融机构进驻，已经算是开放了，在没有准备好之前不可能立刻开放。大约 2003 年我和一位银行经理谈起，加入世贸的事进行得如何？他说：「这事情很严重，因为中国的银行很保守，金融垄断性很强，现在外国银行进来竞争，就惨了。我们准备将银行人才重新培训，以因应外国银行的进入。」因此，我认为加入世贸对中国的改革有正面影响。

(15) 〈上海和纽约股价指数的时间序列分析〉 (“A time-series analysis of the Shanghai and New York stock price indices.”) 2003年时我已经退休，但还教一门「中国经济」的课。原则上我不担任指导教授，但是如果有优秀的学生，我会和他合作。Caroline C. Lawler 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所以我们合写这篇文章，研究上海和纽约两个股市价格的关系。

要讨论中国经济是否已经全球化，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观察它的股市和全球股市的涨落是否一致。美国股市和欧洲股市的涨落虽然不是完全相同，但大致上差距不大，彼此有正相关，香港的股票市场也和全球一致。但是中国股市就不同了，别的股市上涨的时候，他们下跌，自成一格。所以我观察香港、中国和美国股市的数字，得出香港和美国的股市相关，中国股市则和美国没有什么关系，有时甚至呈现负相关。在那段时期香港受到中、美两国股市的影响，不过香港股市和中国股市的关系，不如它和美国股市的关系来得密切。

(16) 〈中国大陆和台湾政治统合的前景〉 (“Prospects of political integration of China mainland and Taiwan.”)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在香港科技大学举行「大中华经济圈的整合国际研讨会」，邀请我做主题演讲。

(17) 〈经济学家能否预测准确？〉 (“Can economists forecast accurately?”) 这是2002年我应李远哲院长之邀，于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举行的第一天，在许多院士和来宾之前发表的一场重要演讲。

(18) 〈中国的选择自由〉 (“Free to choose in China.”) 本文发表在2004年的一个会议(The Legacy of Milton and Rose Friedman's Free to Choose)上。《选择的自由》(*Free to Choose: A Personal Statement*, 或译作《自由选择：个人声明》)是经济学家Milton Friedman和夫人Rose Friedman合着的一本书，在美国很有影响力。书中讨论很多问题，诸如宏观经济学、教育等。我挑选了书中所提的八个问题，讨论在中国有没有选择的自由。

(19) 〈中国经济：最近的发展与深入研究〉 (“China's economy: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further study.”) 2003年我去日本爱知大学，它的中国研究中心举办一个会议，邀请我参加，希望我介绍中国。这个会议有数百人参加，包括中国的一批学者，会中不只讨论经济，也包括政治、法律、历史等。我才知道爱知大学的前身本来是在上海成立的(东亚同文书院)，预备日本征服中国之后要协助统治中国，不料后来日本败战，才将学校迁回日本。会中有一位中国科学院工程方面的院士，他

报告长江的三峡水坝。我问他中国考虑兴建长江三峡水坝，如何衡量利与弊？他回答说在中国这些重大的工程建设项目，领导人说一句话就决定了。他勇于说出这句话：「领导人说了算。」至于决策对不对，做了以后再说。

(20) 〈有顽抗控制之资产订价模型中的权益贴水〉 (“Equity premium in an asset pricing model with robust control.”) 本文根据前述的文章〈当消费—投资者容许不利情势下的权益贴水与消费敏感度〉，略做修改而成。

(21) 〈从历史上回顾 1840 年以来的中国与全球化〉 (“Globalization and China since 1840: A historical overview”) 《哈佛中国评论》 (*Harvard China Review*) 向我邀稿谈中国与全球化，我从 1840 年的中英鸦片战争强迫中国开放说起，大略介绍历史背景，不能算是重要文章。

(22) 〈中国市场经济中的计划角色〉 (“Role of planning in China’s market economy.”) 中国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在 1980 年代很有权力，也很重要。后来当改革进行得差不多之时，体改委不需要再做什么，也不再有权力。国务院将国家计划委员会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2003 年和体制改革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合并，再改名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取消「计划」的名称。2005 年他们举办一个会议，邀请我参加。我的文章说明中国现在是一个市场经济，此时「计划」在中国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23) 〈中国宏观经济中的货币、物价、产出〉 (“Money, price level and output in the Chinese macro-economy.”) 本文和沈艳合着。这篇文章很热门。2006 年六月三十日，我在上海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上发表讨论三农问题的文章，会议结束之后有记者访问我，谈现在正热门的人民币升值问题，也就是这篇文章的课题。

我曾研究如何解释通货膨胀，本文是从物价、产出、货币供给三个变数之间的关系来考虑。我为什么重新研究通货膨胀的问题？因为我在发表〈中国的选择自由〉一文之时，Ben Bernanke（他是麻州理工学院毕业的博士，该校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不同，虽然 Friedman 属于芝加哥学派，但是 Bernanke 对 Friedman 非常推崇。）在会议中介绍 Friedman 对现代自由市场经济学的贡献，其中提到 Friedman 有一个理论 (Friedman’s proposition)，货币供给增加时有两个影响，一是对总生产的影响，二是对物价的影响。对总生产很快发生正的影响，不过这是一种短期的影

响，而不是长期持续性的影响。如果生产可以不断增加，那么希望经济增长，只要不断印钞票就可以了。事实上货币供给增加无法促成生产长期持续的增加。至于货币供给对物价的影响比较慢，但是物价一旦上升以后就变成通货膨胀，不断上升。在会议结束之后我们讨论这个理论在中国能不能适用？我决定用中国的资料来验证 Friedman 的理论。Friedman 说在中国一定适用，可以解释中国的通货膨胀现象。他很有信心，根本连中国的资料都还没看过，就这么铁口直断的说。后来我就研究这个问题，发现他的推断果然是对的。

这篇文章对现在有何影响？因为现在中国人民币的汇率过低，引进很多外汇，这是出超使然，导致在中国投资很便宜。外汇引进之后，被转换成人民币，所以人民币的发行数量增加。中国经济在两三年前已经开始出现过热（overheating）现象，这是 Friedman 的理论早已说过的，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一定会发生通货膨胀。为了中国着想，我认为人民币一定要升值。这是本文和现在中国热门经济问题的关系。

（24）〈中国的官方统计数字可靠吗？〉（“Are Chinese official statistics reliable?”）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官方统计数字不可靠，我自己另有不同的看法。一方面因为我利用中国的官方统计进行很多研究，结果都很正确。如前所述，关于货币、物价、产出的资料，都是利用中国的官方统计数据，不是随便编造出来的数字。因此，我一方面肯定 Friedman 的理论成立，另一方面也认为这些官方统计数字不完全是假造的。

（25）〈中国的教育需求〉（“Demand for education in China.”）本文讨论中国的教育，其中有两个重点：一是现在中国的教育有很多是民间创办的，虽然教育政策由中国政府订定，但是私人兴学在中国很普遍；二是教育需求的成长。芝加哥大学有一位著名的计量经济学家 James J. Heckman，他得过诺贝尔奖，也对中国问题有兴趣。有一天他说中国在教育经费的支出不足，因为教育经费只占国内生产毛额（GDP）的 3.5%。我告诉他那是 2000 年前后的数据，最近已经增加为 5.3%。为什么中国的教育支出增加得这么快？我在文中用一个需求函数来解释教育支出的快速成长。

（26）〈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经济改革与贪腐〉（“Corruption and China's economic reform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关于中国的贪腐现象，我认为导致贪腐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公有财产制，由政府官员控制资源分配。要减少贪腐，就要减少公有财产。一旦财产私有化，就不再受政府的控制。而且贪腐的定义各有不同，例如一个在国有企业工作的政

府官员，如果他的待遇不高，收取金钱，就变成贪腐；但是如果在一个私人公司担任同样工作的人，收取一些佣金报酬，却是应得的。事实上两者是同一回事。

(27) 〈评论：中国资本的新估计〉“ (New capital estimates for China: comments. ”) 有一位作者花了很多时间，用了许多不同的资料，写成〈中国资本的新估计〉一文。我认为该文的结论并不可靠，因为作者对于资本 (capital) 的基本观念不正确，例如衡量资本时，并未将折旧因素纳入考虑。

直到 2007 年我还继续研究中国的医疗问题和能源暨环保问题。我发现十年来中国医疗服务的人均供给没有增加，关键在于只由政府提供医疗服务的公立医院政策。因此，要增加医疗供给的办法是鼓励广设民营医院。另外，我也开始研究中国的能源与环保问题及政策，并推动一个普大和中国科学院合作的项目来共同进行研究。在 2008 年的春季班，我将在普大的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School of Engineering and Applied Science) 开一门跨学科的讨论课，主题是能源与环境问题。

除了上述的研究成果和专题演讲等学术性著作之外，我也开始撰写一些通俗性的文章，希望发挥推广普及经济学知识的作用。例如中国人民银行创办的《金融博览》期刊，2006 年向我邀稿撰写卷首语，我认为长期累积之后应能发挥相当的影响，就答应下来。从 2007 年起，已陆续撰写四篇短文，分别是〈为什么看病贵，如何解决〉、〈佛利民：为学、为人与中国〉、〈汇率、货币供应与中国宏观经济的过热〉，〈从经济学角度论贪污〉。其中部分文章也发表在香港的《信报财经月刊》等刊物上。

(三) 教学相长

教学有助于研究，特别是教授研究所的课程。讲课的准备和公开的演讲类似，可以选择自己研究的题目，来讨论问题和方法，大家公认对

于做研究有正面作用。当然也不能完全讲授自己的研究，安排两三个星期的课程即可。Blinder担任普林斯顿经济系系主任时，主张大家的工作负担要均摊，按点数计算。所有的工作负担以 100 点计算，包括教学与行政义务在内。例如在大学部教一门课，以 30 点计；教一门一年级研究生的课，以 26 点计；二年级研究生的课则以 20 点计，依此类推。

我觉得教书很好，特别是教二年级的研究生，可以指导学生做开拓性的研究，有机会开始学写论文。但是教太多书也可能有负面效果，花太多时间准备自己没有兴趣的东西。不过有时候也有意外的收获，例如 1976 年我有一篇文章讨论回归式的残差项（“A note on the derivation of Theil's BLUS residuals.”）。这个题目原先并非我的研究领域，是准备讲课资料时产生一些想法，用了很简单的办法解决问题，后来写成文章。

我也和学生或朋友合作研究，例如 1996 年共有五篇论文和别人合作完成，运气很好。当时我有五个三年级的学生，每星期一中午他们到我的办公室来讨论。有问题则发问，如果研究没有进展，只听别人发表意见也可以。这是我教学工作的一部分。其中一个学生 Emily Johnson，极为聪明，可以做初级的独立研究。她想研究中国的法律问题，用计量方法来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律师数目成长的情形。于是写信向哥伦比亚大学的 Randy Edwards 教授索取资料，由于资料不足只好放弃。以后她改了题目，研究中国工资如何决定。我们有中国户口的电脑磁碟资料，包括分布在城市和乡村的成千上万笔样本。我建议她利用 Jacob Mincer 的公式（Mincer Equation），以教育程度、年龄、年龄的平方解释工资。这个公式放诸四海皆准，全世界各地都适用。她自己做出研究成果，写成初稿。我告诉她写研究论文，不要写自己学来的部分，而要写出别人不知道的部分。她立刻改写成令人满意的论文发表。

我从前觉得教书是一种负担，等到经验增加，想法也跟着改变。1996 年春季班我应系上要求教一门大学部的中国经济课程，因为很多人想学这一方面的知识。所以即使不是出于系上要求，我可能也会自愿教这门课。一星期上两次课，另外一次讲解习题。我不能整天做研究，教学上课即使只是和学生谈一谈、说一说故事，也有助于研究。我对于前述中国经济制度的四个论点，大学部的学生一听就懂。例如 1996 年年初我去欧洲开会，这是欧洲和亚洲合办有关技术进步的一个会议，各国主管科技的部会首长尽皆与会，中国、日本、韩国都派有代表。另外，也邀请学者演讲。我的讲题是〈中国经济发展 欧洲的挑战与机会〉（“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challenge and opportunity for Europe.”），我教他们如何应付在中国遭遇的问题，这篇文章大家都能理解。在中国做

事很困难，与对方打交道要留神注意，不然做不成事。这类文章属于一般性演讲，并非专门的经济学论文。

我认为理想的教学负担是一学期一门课，既非完全不教课，也不至超过五小时。例如 1997 学年度我开半学期的金融财务、一学期的计量经济学、一学期的中国经济三门课。尽管我在《动态经济学》的书中有一章专门讨论金融财务，也曾开过第二年的宏观经济学，但从未教过金融财务。虽然有时候教书可以多加入一些自己的研究，例如我对于景气循环的研究，可以算是宏观经济学或是应用计量经济学的一部分，但这种做法也不宜分量过多。我的同事 Joseph E. Stiglitz 教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有时共用同一个教材，有一天他到了课堂上才问学生：「今天上宏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这样随便不宜多做。

关于学制的问题，普大有一个做法很有意思。在 1997 年的时候，研究生的课程可以由不同的老师共同教授，例如金融财务学、宏观经济学，一门课由两个人合教，这样对学生、老师都有益。一个人教整个课程，不免有些问题缺乏深入研究，如果两个人分授，自己讲课的部分就会是有经验和有兴趣的课题。对学生也比较有利，这样一来，两位教师的方法、思想都学会了。所以共同开课对师生都有好处，现在有些课甚至由三个人合教。

1996 年七月我离开台湾之后，先去新加坡，再去津巴布韦（Zimbabwe，或译辛巴威）。我在新加坡理工学院讲授动态经济学，也在新加坡大学讲授最适动态理论，并参加研讨会，讨论有关中国经济制度对经济理论的挑战，我的四个论点引发了不少有趣的讨论。新加坡之旅让我首次了解，为什么许多香港朋友认为如果要离开香港，移居新加坡是他们的第一选择。根据美国报纸报导，新加坡政府采取压制性的强势统治作风，但事实上当地人民乐意接受这种做法以换取社会的安定。随后赴非洲访问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Harare）的大学。津巴布韦与普林斯顿大学有一个合作计划，由福特基金会资助，每年邀请普林斯顿教授去访问教学两周，每周上两次课，每次一个半小时。原定由我教计量经济学，另外再给一个公开的演讲。我不打算讲计量经济学，而改讲两次〈动态最适模型的估计与检定〉，再公开演讲〈最适经济成长模型〉，分别是我的《动态经济学》书中的第三章和第五章。虽然有点唬人，因为这些学生学过的计量经济学很少，可是我仍然这么做。校方希望我不要把津巴布韦的学生当成普林斯顿的学生。我知道津巴布韦的学生程度或许不高，可以少讲一些。对我而言，其实任何题目都可以讲，把最适化理论和计量经济学结合在一起，也是很有意思的新方向。有些学生用

计量经济学来研究经济结构的变动，不论是中国或外国的经济结构，就是例证。虽然辛巴威大学经济系的师生程度和普林斯顿大学有些差异，但我很高兴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东西。我利用 1990 年 Becker 等人所写的〈人力资本、生育率以及经济成长〉（“Human capital, fert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一文，讨论非洲的经济成长。对于影响非洲经济成长的因素，他们也提供了一些看法。这是一个双方合作的计划，主要是互派学者交换访问，他们派学者来普大，普大教授也可以访问对方学校。

七月是津巴布韦的冬天，在北美是夏天。我离开新加坡以后，就去那里住了十天。学校提供外国学者住宿，各国学者都有，包括非洲来的、英国来的，我们是从美国去的亚洲人。我看到居于统治地位的欧洲人和当地非洲人之间紧张的种族关系。我和太太 Paula 住在访问学人专用的宿舍，虽然没有种族之分，白人访问学者和黑人访问学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仍然明显存在。不同种族的人交会相处的时候，还保有对白人殖民非洲的反感和成见，大家一起用餐时，黑人就是不和白人讲话。虽然我们来自美国，可是身为黄种人颇占便宜，他们对我们没有偏见，因为我们不是殖民者。在许多场合，Paula 以她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国际中心主任办活动的经验，举办座谈会与联欢会等，使与会者都能尽欢。大家一起开个同乐会，她想邀请好友参加，就是英国来的学者和太太，结果当地人反对。也就是说，即使到了今天，非洲已经不再是殖民地，很多地方还有种族仇恨存在。尤其是在津巴布韦，从前的殖民帝国已经消失，从欧洲来的学者可能因为他们的亲戚受到政经改革的影响而丧失过去的特权，即使他们本人不是受害者，还是有许多种族摩擦。

例如罗德西亚（Rhodesia）的国名，原是根据英国商人罗德（Cecil John Rhodes）而命名，后来改名津巴布韦。英国著名的罗德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即由他资助设立。Rhodes 对英国来说是一个英雄，但是对当地人而言，因为他把该国的财富运往国外，对他很反感。非洲在这方面和印度的情形类似，因为民族情绪，民族主义在这些前殖民地很敏感。就如同韩国人和日本人，韩国人讨厌日本人，对日本人没有好感。不过日本人也认为韩国人是次等民族。中国人对日本人也是如此，不过中国人不会视日本人为次等民族。欧洲人到了非洲，是真正将他们视为次等民族。

我在津巴布韦的时候，有一个课题讨论文学。他们没有文字，所谓文学是指口述、说故事。非洲很多民族没有文字，但他们不承认自己没有文化，既然没有文字，于是说自己有口述文学，表示他们的文化水平

和别人一样高，只是形式不同而已。现在我自己也进行口述。后来我还访问过许多地方，中南美洲也邀请我演讲。

1996年以后我的教学和研究重点，在于金融经济学和中国经济研究。投入此一研究课题的缘起有三：一是我的《动态经济学》一书在1997年初出版，其中第七章曾讨论此一题目；二是普大经济系有发展金融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计划；三是1996年九月在北京参加金融国际会议，与朱镕基副总理会面，并获聘为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担任顾问，协助推动中国最重视的金融数学、金融经济学与金融工程的相关研究。

我从事金融经济学研究的理由之一，是因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要发展此一项目的教学与研究，却没有充分的师资，我决定在1997年春季首次担任该门研究生课程。为了准备春季的课程，我利用1997年一月去广州岭南（大学）学院开董事会的期间，从一月十七日至二十七日的在该学院讲授十次，每次两小时，做为二月初在普大开课的实习。这十讲可能是中国金融学开课的创始，邀请全国三十六位学者参加。授课之前，先由岭南（大学）学院的王则柯教授做准备工作，用我刚出版的《动态经济学》一书为教材向部分参加的学者授课，以便我到广州以后可以从较深的领域着手。他请广州中山大学数学系的司徒荣教授来讲授随机微分方程，这是金融学的主要数学工具。来参加的学者除了上述两位教授之外，有山东大学数学系的彭实戈教授（他是世界知名的中国金融数学的权威）、南开大学数学系的教授，以及来自上海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广州暨南大学、岭南（大学）学院等的青年教师与研究生。上述学者之中有些人的数学造诣更胜于我，想来听一听经济学家对金融数学的看法。

这次在广州岭南（大学）学院的讲学，对中国发展金融经济学、金融数学、金融工程均有影响，也影响我个人的研究方向，写成一些论文发表。例如〈用现值模型决定的上海股价〉和〈用拉氏方法估计认购权证价格〉。前者是和关任强教授合写〈理性预期在计量模型未必成立〉一文的后续研究，也是我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时和关教授利用香港股市资料写成的。有关认购权证订价的文章，是我在1998年一月访问山东大学及担任山东省经济顾问时，与山东大学的两位教授合写的。先是1997年七月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举办国际性的金融经济会议上，读了彭实戈教授的论文〈不完全市场下条件产权的订价〉，然后我用自己发明的拉氏方法求解他的问题。如果没有在香港科技大学兼任和在岭南学院推广金融经济学，就不会有这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我也曾在中央研究院经济所演讲过。

1997年六月二十三日，我去岭南（大学）学院开董事会，并继续推广金融学在中国的发展，组织一个国际会议，邀请大陆、香港、台湾、美国的学者发表论文。其中部分论文经修改之后，在1999年十月的《太平洋经济评论》发表，我和郎咸平（Larry Hsien Ping Lang）教授合写一篇序言〈金融经济专号编者导言〉（“Editorial note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Financial Economics.”），介绍内容。例如彭实戈教授的贡献是发现倒随机微分方程的解法，他说明这方法和它在估计认购权证价格上的应用，我则用拉氏方法来估计。他的第二篇论文也同意我应用的拉氏方法，并提出计算程序。另外，中山大学的司徒荣教授写了一篇论文，把拉氏方法加上数学的严谨证明和推演。所以这本金融专号至少有三篇来自中国的文章讨论拉氏方法，或许这个方法未来有可能在中国推广，因为中国的经济分析还没有使用数学方法上的偏见（例如只用动态规划求解）。1999年初新闻报导美国政府怀疑中国偷窃核武机密，《纽约时报》有一则报导，题目就是“Lagrange code.”（〈拉氏密码〉），偷窃的机密是电脑软体。可见拉氏方法的应用很广，例如工程方面很多问题的求解，为求精确，也用它来计算。

普大有一个新成立的金融研究中心 Bendheim Center for Finance，不久前得到一千万美元的补助。普大近年才比较重视金融问题的研究，连工学院也开设金融工程的课，Rene Carmona 教授邀请彭实戈去演讲，很多工学院的教授听过演讲后也很佩服。彭实戈是倒随机微分方程的专家，他的学术水平很高。他读了我的文章〈以拉氏方法复制条件产权〉之后，做了一些数学分析，并同意我的结论。他的观点对我很有启发，我很感谢他。他后来也根据我那篇文章，作计算程序，完成另一篇论文。

1999年一月我参加在纽约举行的中国金融工程年会。会议中首次有中国、台湾、香港、美国学者参加。彭实戈结束普大访问之后，我介绍他去麻州理工学院和芝加哥大学，会见罗闻全和刁锦寰，都是金融研究很有代表性的学者。因为他们两人打算合组一个团队，集合中国、香港、美国学者共同研究金融数学。我认为彭实戈是中国很重要的学者，可惜不能参加纽约的会议，所以先介绍他们见面。罗闻全和 John Y. Campbell、A. Craig MacKinlay 合写了一本《金融市场的计量经济学》（*The Econometrics of Financial Markets*）。这本书是他的成名作，有很重要的影响。

1997年与1998年春季，我首次在普大讲授金融经济学的研究生课程，被经济系聘任为该研究中心（Bendheim Center for Finance）的执行

委员。另外，也从事其他有关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研究的活动。我在《动态经济学》一书中说明拉氏方法比动态规划更具优势，有些人承认这个说法，但此一观点并未受到充分重视。这是因为一般人已经习惯动态规划的计算方法，很难再接受拉氏方法。好比法语的结构比英语更为严谨，但要求习惯讲英语的人去学法语，很不容易。如果我再年轻几岁，也许会努力去推动拉氏方法，现在只能得便趁机说明。例如 1999 年五月我访问欧洲，在德国和瑞士的几个大学介绍此一方法，特别是它可以和金融经济学的研究互相结合。在普大也是如此，我对动态经济学还是有很大的兴趣。

无论著作或讲学，我的活动有些属于非学术专业性质，与写专门性的学术著作不同，不过仍然担任很多的评审工作。从 1997 学年度开始，我改为半职教授（half-time professor），有很多时间做其他的工作，例如每星期固定参加三场研讨会，分别是宏观经济学、金融财务和计量经济学。参加这些研讨会，一方面使我得以了解学术的发展动向；另一方面也担任其他同仁的评论人，提供一些自己的观点。过去我的生活都是纯粹做学术研究，2000 年之后有些改变，常常有人找我去演讲，生活方式也随之调整，和过去不同。

（四）近年学术活动

2001 年我正式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现在我从事的工作很有弹性，自己想多做一些或少做一些都可以。在美国没有硬性退休的规定，但一般来说，当年纪渐长，人们自然会退休。否则年龄太大还不退休的话，会有压力，尤其在普大这种学校，校方很注意我们的研究质量与成果。例如现在我的研究比较轻松，工作量也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决定。如果不退休，我总觉得自己有压力。我的退休年龄比一般普大教授晚一两年，在七十一岁时退休，现在是七十五岁（虚岁七十六岁），一般人的退休年龄多在六十八到七十岁之间。不过每个系的情形不同，数学系多半比较晚。方闻和我年龄相同，但比我早一年退休，他也是自愿退休。余英时和我们同年，似乎也比我早一两年退休。方闻退休后，不在普林斯顿

大学任教。至于余英时退休后则是努力著述，写了很多书。

日本规定公立大学教授的退休年龄是六十三岁，在台湾是六十五岁。但美国没有退休年龄的规定，可能因为其中牵涉年龄歧视（age discrimination）的问题。退休本来就是认为年龄会影响工作表现，一个人上了年纪以后，能力的确差一些，年龄所造成差异是存在的。但是也有人主张不能用年龄来区隔能力差异，这是法律不容许的、不合法的。至于美国一般政府机关的公务人员是否有退休年龄的规定，我不太清楚。

没有退休之前，我自认为还可以胜任，后来我决定自己应该在什么时候退休。2001年我退休的时候，Paula对我说：「如果你在2001年退休，那么我也在2002年退休。」结果她不但2002年没有退休，一直到现在2007年也不退休。其实她这样做，我也很高兴，因为她现在对学校的贡献仍和过去一样，还可以做很多事，也乐在其中，所以继续工作也很好。唯一的缺点，就是我常常出国，她没有假期可以同行。例如我们的女儿小梅在2006年十二月生了第二个孩子，她去陪女儿一个月，几乎就把假期用完了。我参加一些学术活动时，Paula对某些课题也有兴趣，因为她是Princeton-In-Asia和Princeton-In-Africa的董事。这些机构将普林斯顿和其他长春藤盟校的学生或校友分别派往亚洲、非洲服务。2006年一月我们还一起去南韩访问。

1996年为了庆祝普林斯顿大学二百五十周年校庆，我曾向校长Shapiro建议捐款给计量经济研究中心（Econometric Research Program）和国际中心。普林斯顿大学的计量经济研究中心是Oskar Morgenstern在1948年发起成立的。他研究赛局理论（game theory），1944年和John von Neumann合写了《赛局理论和经济行为》（*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这本书影响很大。Morgenstern很有眼光，在1948年还没有多少人知道Econometrics这个字，因为计量经济学会是1930年前后，才由七位经济学家在一个座谈会上提议组成。因为喜欢数学，我在大学时代对这类问题就很感兴趣。我之所以选择念经济学，也是认为如果能够用数学来了解经济学，一定很有趣。我在1950年参加该学会。1950年时康乃尔大学根本没有计量经济学的课程，当时全美院校都没有此一课程。1951年我毕业之后，继续攻读研究生课程时，芝加哥大学是唯一设有计量经济学课程的大学。然而Morgenstern教授早在1948年就成立了普林斯顿大学计量经济研究中心。

当时计量经济学的定义比较广泛，现在则分成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两部分。从前“econometrics”一词就包含计量和数理，现在则把两者

分开。1948 年时普大没有人教这门课，Morgenstern 很有远见，邀请一位和他共事的 Clive W. J. Granger 来共同研究。Granger 现在任职圣地亚哥大学，也是 2003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960 年代 Morgenstern 希望 Granger 来计量经济研究中心任职，后来可能普林斯顿没有给 Granger 终身聘，他就去别处另有高就。Morgenstern 当时一定很气愤，因为他认为 Granger 在学术上很有希望。

后来Morgenstern退休时，我去普林斯顿接替他的教授一职，从 1970 年起担任中心主任。我在 2001 年退休时，普大把它命名为「邹至庄计量经济研究中心」（Gregory C. Chow Econometric Research Program），只是更改名字，计量经济研究还是延续下去。同时举行庆祝酒会，拍有照片留念。校方同意我在名义上捐赠一些，换成别人可能至少需要几百万美元。后来经济系主任Bernanke对我说：「用邹至庄计量经济研究中心命名，比用某个富翁命名强多了。」。我原本希望普大国际中心也能用 Paula 的名字命名。Paula 一手创办国际中心，对这个单位贡献非常多，即使没有任何捐赠，国际中心都应该命名为「邹陈国瑞国际中心」（Paula K. Chow International Center）。2007 年五月普大校友兼普林斯顿大学董事会的董事Shelby Davis捐赠五百万美元给国际中心，校方因此将该中心命名为The Kathryn W. and Shelby Cullom Davis '30 International Center，以纪念他的双亲。

我在 2001 年退休，当时的系主任Ben Bernanke特别撰写了〈邹至庄小传〉（“Biography of Gregory C. Chow.”）。按照普校的惯例，系主任要替退休的教授撰写简要的学术成就介绍，Bernanke从他的观点来说明我对经济学和其他各方面的贡献。这个小传可以参考我的网页（<http://www.princeton.edu/~gchow/>）。Bernanke 2006 年接替 Alan Greenspan担任美国联邦银行主席。

我帮助过一些普林斯顿的学生去中国访问或进行研究。不过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现在我不愿意随便写介绍信，必须慎重一些，因为自己的推荐信很有分量，不希望惊动别人。例如曾有一位女学生想去中国做研究，我说这件事很简单，随即写一封信介绍她去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三个月的暑期访问。她去中国之后，认识了一些人，透过她得知普林斯顿大学，有一个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想来普大访问。女学生回来以后，不敢告诉我，因为知道我不会推荐那个研究员，于是就和一位东亚系的教授联络。这位教授将事情原委转告经济系主任 Ben Bernanke，Bernanke 考虑既然是东亚系教授介绍的人，就答应了。一旦得到 Bernanke 的允许，社科院的研究员就可以来访。他到普林斯顿以后，进

出不应该去的场合，有时出席研讨会也无法了解内容，我认为不应该让没有经济学素养的人参加这些活动。这件事就是因为我介绍了一个学生去中国所引发的后遗症。

2006 年又有一位学生希望我介绍他去中国做研究，我现在一般的说法都是自己已经退休，不再管学生的事了。如果由我出面介绍一个学生，关系太大。不过这个学生研究金融政策，恰好人民银行的王毅博士要来普林斯顿访问研究，我便与他联络，但是措辞很小心，说明普大有一个研究生要来中国研究金融政策，问他是否有兴趣和学生见面。我的用意是因为他要来普大，或许和那个学生谈一谈，可以多了解普大一些，对双方都有好处。如果他有兴趣，可以和那个学生联络。如果不是透过这种间接的方式，原则上我不再介绍任何人去中国的机关单位。除了大学、研究机构以外，有些人想去政府机构收集中国的资料，或想去农村做田野调查，就希望我出面帮忙联络。这类的事情很复杂，牵连太大。

处理学生的事情麻烦，利弊得失兼而有之，中国人确实如此。例如不久前我在上海交通大学演讲，后来有一个学生写了一封电子邮件给我，表示他听了我的演讲，想请教一些问题。我原本不打算回信，因为恐怕一回复就麻烦了。但是因为他问了很具体的问题，加上当时我也有点时间，后来考虑一下，用两三句话简短答复他，这个问题可以如何思考，还告诉他原则上我不回复非普大学生的信函，这次答复他是一个例外。结果这个学生来了第二封信，说想要申请来普大进修。以往我还会回信说明应该自己设法申请，现在根本不回信。我也了解他们心里的想法，不外乎是希望多一点机会，但是我不回应这一类的要求。

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名义上是 2001 年正式退休了。对于未来的生活、工作等各方面，我从来不做计划，虽然不能说过一天算一天，大概是过一学期算一学期，至少也是过一个月算一个月。我写了许多本书，都不是按照计划写出来的。我觉得退休以后的生活比较惬意，唯一的课就是教「中国经济」，而我对中国经济随时什么题目都可以讲，感觉很轻松。

我在退休的前一年，教一门「中国经济」，退休后的第一年也教同一门课，但是后者得到学生的评价比从前高出很多。这是因为退休的缘故。我认为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压力很大，因为同事们都在努力写论文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非常杰出。我没有退休之前，就认为自己不能不继续做第一流的研究。可是退休之后就不再有这种压力，我可以写多

少就写多少，不写也没有关系，因为我已经退休，不能再要求我。因此，一般美国优秀的教授，认为教书不是他们的主要责任，最主要的责任还是做研究，因为必须教书才去上课。其实学生能够感觉到这点，他们知道我心不在焉。但是退休以后，我是因为有兴趣才教这门课。我从来没想到我的教学评比可以达到这么高。教学评比的满分是五，从一到五分为五等。被评为一分是不及格，过去我大概得三点六分，不算太好，可以视为中等或中上。退休以后，我的教学评比从三点六提高为四点七，接近五的满分，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从前那能得到四点五或四点六？直到退休那一年起才得到四点七。我从此深深感受到退休以后的生活总是比较愉快、轻松一些，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做研究也不太吃力，最近的研究不是太理论性的，对中国经济有兴趣，就研究一些，其他的空闲时间就打一打高尔夫球，也没有特别的计划。

除了教学之外，退休对于我处理事情的态度也可能有影响。退休之后我在时间支配上比较自由。例如 2006 年我赞助两个人从中国来普林斯顿大学访问，访问学者和研究生各一名。以前我从来不做这些事，我认为如果有时间，为什么不花在普林斯顿的学生身上？不过他们未必研究中国经济的问题，因为一般美国学生的研究很少对中国感兴趣。

2005 年九月我被人骗去北京，这是真实的故事。有一个人写了一封电子邮件给我，他说自己姓王，是美国律师，在相当有名的美国公司做事。他代表一个名义很好听的中美合作机构，要推动中美合作，将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举行一个很隆重的大会。他们邀请中国的高级官员和美国的的企业界人士去开会，请我担任会议主讲人，说得很动听。我问他待遇如何？他说会提供我商务舱的往返机票和报酬等。我想去一下也无妨，于是答应 2005 年九月去北京，然后我告诉一些朋友，包括清华的李稻葵、白重恩、和北大的林毅夫。同时我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联系，通知他们。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院设有一个管理学院，邀请我担任他们的荣誉教授。另外我还想去几个地方，包括人民大学等，加上探望朋友，顺道去拜访黄达教授。我打算花三个工作天去北京，这是一件小事情，只要排出时间即可。李稻葵和林毅夫邀请我演讲。我在北京时也往访黄华先生，他从前担任过副总理、外交部长，是位外交家。这一次三天的北京之行，我一共发表六次演讲，其中清华大学两次，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银行各一次。另外参与一个人民大学的座谈会，和几个教育部的老朋友聚在一起谈一谈。我们都是中美经济教育交流委员会的成员，我担任美方委员会的主席，黄达校长是中方委员会的主席。

我到北京之后，人们告诉我这种利用开会的名义从中牟利赚钱的骗局还不少，我倒是头一遭遇到。他们有两个人合伙，一个人在美国活动，找一些比较有名气的人来演讲，另外一个人在中国办事，联系一些中国的官员来参加。其实这是一种赚钱的生意，他可能告诉中国政府官员可以找到美国的企业家来投资；又对美国企业家说可以安排他们和中国官员见面，请他们担任联络人等，所以是一个骗局。在美国办事的那个人就透过上述的律师邀请我去演讲，其实是利用我来赚钱，刚开始的时候他可能以为人数足够，就在文件上写了答应付我的条件，后来他又希望成本可以降低。最后他打电话到办公室来找我，正好我不在，他留了一个口信，说话很不客气。如果他说话客气一些和我商量：「现在因为经费有限，能不能请你考虑？」可能我还会答应他的要求，只收四千元美金即可。可是他对我很不客气，我就不去了。那个人最后说只能付给我四千元美金，我说不行，四千块钱连支付飞机票都不够，所以我也不要了。不过这是意气用事，因为我已经决定要去北京。后来旅费就用我自己的研究费支付。因为他事先答应我的条件没有履行，我就不答应替他们演讲。我虽然没有答应他，但还是去了北京。他原先帮我安排住宿，我也不接受。

中间还有一段插曲。我到北京之后，安排三个工作天的行程，就是礼拜二、三、四，本来排定礼拜三早上去人民大会堂演讲。前一天晚上，负责在中国办事的合伙人知道我人在北京，就打电话联系我。他说：「邹先生，你既然已经到了，明天就请你来吧！成思危院长想要借此机会见你。」成思危在中国相当有名，是中国人大常委会的副主席，兼中国科学院管理学院院长，相当活跃。这个合伙人在开会的通告里，宣称主持大会的名誉主席有两人：一位是杨振宁，但我想杨振宁一定不知道这件事；另一位就是成思危。成思危曾和我写了电子邮件，他想邀请我去中国科学院，颁给我荣誉教授的头衔。所以我一听这个合伙人说成思危想在人民大会堂和我见面，认为这很可能。我本来告诉这个合伙人说不去，但他在电话里和我说了十分钟，于是我说：「算了，我就答应你去。」后来我打电话给成思危的办事处，结果得知说那个合伙人告诉成思危院长，邹先生想在人民大会堂和他见面。等于玩弄两面手法，但被我识破。我很生气，这完全是骗局，原先已答应他要去，结果就决定不去。第二天，他本来约好八点钟派汽车来旅馆接我，但我去游泳，不在房间里，派来的人根本接不着我。他大概想邀请我赴会，出席者共同拍照，大会开幕的时候邀我上台，我讲五分钟话即可，这样就算我已经参加。我不上他的当。不过我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他们设计骗局来赚钱。我从一开始就受骗，但拒绝接受条件较差的待遇。后来他已经不支付费用，我仍然去北京，他们知道我到北京以后，还想继续拐骗我。

这次北京之行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有一个单位安排我住在它附设的旅馆里。中国的政府机构多半可以经营企业，也有附设的旅馆。在台湾的政府机关也常设有招待所，可是基本上只招待自己的客人。中国政府机关附设的企业，对外开放营业获利，让员工大家都有好处。我这次在北京一共住了两个旅馆，由两个单位招待。因为我在北大、清华演讲，前两天是清华安排我的住宿，住在学校附近的旅馆。最后两天我住在另外一个旅馆，招待的人带我去住，然后交给我一张信用卡，并说：「这张卡片可以在旅馆的商店使用。」也就是说我可以用它来购物买东西。这个招待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一张没有额度的无限卡，端看我自己好不好意思花费。至于可买的东西，就限于旅馆附设的商店。通常邀请我演讲，都付给我一些报酬，但这次它没有付给我酬金，而是招待我住旅馆和购物。我第一次在中国接受这样的招待。我的解释是：「收费多少由你自己决定。」我第一次收到这种信用卡，不好意思消费太多，只买了一些东西。这算贪污吗？在中国招待客人，可以送他礼物，这个礼物当然是由业务费支付，很正当。可是用信用卡支付的方式，我也是头一次经验。

我没有消费多少，只用了三、四百元美金，比一般付给我的水准低。这可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有很多服务业没有规定价格，顾客无法判断应该付多少钱，而提供服务的人又不设定价格，只好用红包的方式。传统中国的红包，是消费者决定该项服务值多少钱，提供服务的人不能表示意见，因此有付费偏低的风险，不过一般习俗红包多属于丰厚的报酬。现在使用信用卡的办法更进一步，由提供服务的人自己决定价格，既保有传统的礼俗，又可以避免过去付费偏低的风险。台湾近年也有类似的例子，企业家送礼给权贵显要，不确定礼物是否得当，因此附上发票，收礼人可以凭票换购礼物，如果送礼人再补付差额，也等于收礼人自订服务价格的一种方式。不过一来我对他很客气，因为我没有这些想法。我从来没有收过这么低的费用。另外一个原因是我持有的人民币太多，因为其他演讲收到的人民币尚未用完，又不能兑换成美元，根本不需要再用信用卡。所以我就买一些东西，没有用掉多少钱。而且我也没有时间，购物买东西也需要花时间，没有时间的话，能买什么东西呢？我觉得这件事有意思，是我第一次的经验。

在中国，有些大学把经济学和管理学联合起来，设立经济管理学院；或是把经济学从管理学院里分立出来，成立经济学院；或是把管理学从经济学分立出来，甚至把管理学附属在自然科学之下，例如中国科学院除设有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之外，它的研究生院也设立管理

学院。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三个学门之间的区别，没有一定的规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要设立一个管理学院，没有人会反对，我也担任研究生院的名誉教授。中国的名誉教授并不是真正的教授。我在中国担任好几个名誉教授。例如 2000 年我去厦门演讲，再去海南岛。海南岛有一个海南大学，在海口市。我去海口市两天，第一天到达之后，校方马上说：「明天我们举行一个仪式，请您担任我们的名誉教授。」他们前一天才告诉我，第二天就办成了，我都可以配合。其实担任它的教授也不错。因为海南岛是个很有趣的地方，很多人说海南岛可以和台湾互相比较，它也是一个岛屿，面积比台湾小一些。它的海滩非常漂亮，很多香港人常去渡假。后来有一次我去香港的时候，事先和他们联系，因为我既然担任名誉教授，可以安排我去演讲。我本来想一方面去渡假，另一方面也顺道去海南大学演讲。殊不知他们安排设立名誉教授，根本没有预料到名誉教授会来教书演讲，那只是给个荣誉，不要再来麻烦他们。中国的名誉教授是一个虚衔，我从前不知道这一点，以为担任某个大学的教授，总是有些责任，如果经过当地至少也要给个演讲。其实根本没有这一回事。

再举一个实例。两年前厦门大学邀请我去参加一些活动，去厦门一定要先在某地转机，最方便的办法就是上海转机。我想反正要去上海，因为我是复旦大学的名誉教授，就写了一封信给校长，说我在某个日期会经过上海，愿意去该校做一次演讲。校长连信都不回。我以为是校方办事没有效率，一连写了两封信，还是没有回音。校长办公室可能不知道我是谁，也没有邀请名誉教授演讲的做法。也可能因为我用英文写信，我已经说明自己是复旦大学的名誉教授，但是学校的办事人员没有查清楚，我也不追究。我另外给上海交通大学写了一封信，交大马上邀请我。不过最后复旦和交大两个学校我都去做了演讲，事情的转折发生在明尼苏达。

岭南学院与明尼苏达大学合作的高阶企业管理硕士班，第一届学生即将毕业，毕业生要去美国领取毕业证书，顺道安排最后一个礼拜在明尼苏达大学上课，听该校教授的演讲，并参观美国的企业。所以学生在毕业之前可以来美国两个礼拜，进行一个短期的训练。结束之时，他们邀请我去参加毕业典礼，明尼苏达大学的高阶企业管理硕士班请我致词。经济系也请我演讲，前排坐了几个中国的留学生，其中有一个是复旦大学的毕业生。我提起自己是复旦大学的名誉教授，写了一封信给学校，说明自己路过上海想给个演讲，校方却连信也没回。那个留学生就表示这件事很不应该，他回去之后可能马上和学校联络，后来复旦大学寄来邀请函，结果我还是去了。

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复旦大学今非昔比，二十多年前我开始去中国，当时复旦大学在中国的大学排名可说是第一流的。按理说改革开放之后，上海经济再度繁荣起来，复旦大学在经济发展和中国近代史研究上具有很大的优势。现在学校的管理不行，这可能和校长人选有关系。我认为复旦大学在 1980 年代发展得很好，主要多归功于谢希德校长。她退休以后，继任的几个校长不一定有她的办事水平。

同理可知，从邮件处理效率也可能看出一个公司的经营管理。有一位在香港很成功的企业家，他经营的公司规模相当大，拥有几十亿的资产。2006 年四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去美国访问，需要安排行程，他帮忙安排胡锦涛在华盛顿的行程，另外还有一位社会活跃人士负责在华盛顿安排。我在纽约大学发表演讲时，他担任评论人，从华盛顿来参加。这次布希总统没有邀请胡锦涛晚宴，只有安排午宴，似乎有点没面子。其实以美国和中国的关系而言，胡锦涛是中国国家主席，既然来访问，就请他一场晚宴有什么关系，但美国就是不安排。这其中可能有政治考量，也可能是美国和中国的关系还有一些问题。因此，这位先生要来和我商量。他事先告诉我，几天后我们将一起开会，到时候再谈。我们在纽约见面之后，他问我如何补救。我说至少要求美国总统为胡锦涛举行公开欢迎仪式。后来他们果然办成了。

我曾写了一封邮件给这位香港企业家，寄到他的公司，上面注明「某某董事长收」（“forward to Chairman X”），结果花了很长时间才送到。比起来张忠谋就不同。好几年前，我有事要联络他，我们本来有电子邮件来往，但一时忘了他的邮件地址，就在网路上找到 TSMC（台湾积体电路公司，简称台积电）。该公司网站设有顾客服务项目，我把信寄去，并说：「请送张忠谋董事长收」（“Please forward to Chairman Morris Chang.”），第二天就收到张忠谋的回信。比较某董事长和张忠谋，从递送邮件这种小事情上面，就可以知道张忠谋很能干。所以后来我对他说：「你的公司经营管理得很好。」从台积电公司的警觉性就可以判断出来。其实这次 2006 年我来台北之前，又忘了他的邮件地址，还是透过同样的方式告知他，我将要来台湾，他也是马上收到。我们前两天还一起共进晚餐。可见台积电的经营效率很高，香港的某公司无法相比。我认为从小事情可以看大处，再回头谈复旦大学的校长办公室，处理事情过于草率，校长秘书收到电子邮件应该要看清楚如何处理，尤其我已经自我介绍是该校的名誉教授，至少应该查一下。但两封信都没有回音，可见他们办事没有效率。

这几年我和一些中国学者来往，除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之外，我也

参加海外中国青年团（Overseas Young Chinese Forum）的一些活动。我也曾在各大学演讲，包括位于密西根州的韦恩州立大学（Wayne State University）、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等。至于对中国的工作，我就顺其自然。如果国内有什么活动邀请我参加，我认为是一个好机会，就去参加，也用不着做什么计划。如果我有什么意见也可以直接写信给中国政府的高层领导，虽然我不常写信，不过有需要的话，还是可以写的。我在美国也很活跃，因为中国经济是一个热门的题目，常常有人邀请我去演讲。

南美对中国也有兴趣，2005 年巴西邀请我去演讲关于中国经济的议题。他们问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经济可以发展得这么快？为什么南美洲国家不能？这很不容易回答。其实我已有答案，但是说出口，答案很简单，就是中国人发展经济的能力比他们强。但我是客人，不能这么说。该机构每年都邀请有名的学者去演讲，我是 2005 年受邀前去，2004 年邀请 Bernanke，2003 年则是邀请 Olivier J. Blanchard。他是一个法国人，在美国教书，担任麻州理工学院经济系主任（1998-2003）。他写了一篇文章，解释为什么最近十来年美国国内生产毛额的成长率比欧洲高？他提出自己的解释。我借用他的说法，说：「你们还记得两年前来过的 Blanchard 教授吗？他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很好的答复。他比较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一样，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欧洲人的偏好和美国人不同，喜欢多花一些时间在休闲上。欧洲的假期长，暑假的时候都不工作，工作的时间也比较短。例如义大利人，他们吃完中饭、睡午觉，等到三、四点钟才开始工作。所以欧洲人偏好休闲，也就是人们对于休闲和工作的态度不一样，他们的经济发展就比美国慢一些了。」我回答的是欧洲的情形，地点虽有不同，在南美同样可能有些人比较喜欢在海滩上享受休闲。

中国人的认真、卖力，确实是部分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因。后来我发现 Arthur Lewis 也有类似的观点，但是他在书上没有说得很清楚，过去我从来没有注意到。我有一个同事 Burton G. Malkiel，最近造访中国，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印象非常深刻。他回到美国之后发表演讲，就引用 Arthur Lewis 的说法，说：「Arthur Lewis 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教授的时候，我还是助教授，他对我说自己研究为什么不同的国家有些经济发展成功，有些却不成功？最主要的关键还是取决于每个社会的人，也就是社会资本。」每个社会的人们对于经济发展的能力不同，导致结果不同，就是因为人的素质不同的缘故。我在《中国经济转型》一书中，提出一个主要的观点，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发展如此快速。这并不是一个奇迹，用一个很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就可以解释。经济发展有三个最重

要的因素，第一是人力资本或人力社会资本的素质；第二是市场经济制度；第三必须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因为一个先进的国家，本来就已经经历长久的发展，只有落后的国家才有机会利用别人已经发明的先进技术迅速发展。所以这三个条件是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中国的成功，并不是首创，日本在第二次大战前后的成功已有先例。因为日本有人力资本，也有市场经济制度，加上日本早期也是落后的国家，可以进步改善的空间很大。我认为台湾、南韩、新加坡、香港也都属于类似的例子，中国也不例外。各个社会拥有不同的人力资本，例如美国、台湾、德国、日本都有人力资本，但可能各自不同。有些国家没有这种高素质的人力资本，这就不说了。以中国人为例，看东南亚华人就能明白，很多华侨到了南洋的其他国家，相对于当地人懒洋洋的样子，他们都很勤奋工作，就可以发展成功。

我很佩服韩国的民族性，韩国人有些地方比中国人、日本人更优秀。韩国人很团结，做事也很坚决、认真。在东亚，韩国人如此，越南人也很厉害。越战的时候，美国的军事力量非常强大，其他的国家都甘拜下风，但越南人就是奋战到底。

2006年一月我去韩国访问，是应首尔大学（Seoul University）校长郑云灿（Un Chan Chung）的邀请。他是我在普大的研究生，并曾担任我的研究助理，后来取得普林斯顿的博士学位。他在韩国的地位很高，据说有人提名他做总理。我们已经多年不曾见面，一年多前他为了首尔大学和普林斯顿建立交流关系而来访，写信邀宴两位老师，我是其中之一，同时邀请我到韩国访问。我经常来往台湾、香港、中国大陆，但是从没去过韩国，这是第一次。

我去首尔只有两天，在郑云灿校长的安排之下，做了四次演讲，分别是首尔大学、大韩银行（Bank of Korea）和两个研究机构。一个是韩国很有名、很具影响力，专攻经济发展的智库；另一个是金融界企业家办的私人研究机构。前者是政府单位，后者是民间机构。至于韩国的经济情形，我所接触的人士都不是完全客观的人，他们多是相信市场经济的学者，因此对现任总统卢武铉有些不满意，认为他干预得太多，未能给予企业家充分发挥的机会。

当时韩国有一个科学家黄禹锡闹出大事，他宣称的研究发明被证实伪造。郑校长原本约了一些记者访问我，却因为黄禹锡前一天突然宣布要举行公开记者会，临时记者群都去参加。我就在校长办公室收看电视现场转播，我不懂韩语，郑校长替我翻译。黄禹锡很有政治敏感度，因

为很多人批评他，他就利用记者招待会和电视转播说明自己的立场，为自己辩护。这次的记者招待会对他很有利，他过去就像是一个国家英雄，如果还有很多人继续拥护他，主管单位就不敢过于严厉的惩处他。听完电视报导之后，郑校长摇头表示不同意这种做法，因为黄禹锡是首尔大学的教授，校方已经成立调查委员会，也有证据证明他做错事，他却用召开记者会的方式为自己辩解。

在韩国，人们认为首尔大学的教授地位崇高，比在美国担任哈佛大学教授还高得多，它可说是韩国唯一的最高学府，不像在中国有清华、北大等各大学并列。我和该校的经济学系也进行一些交流，他们问了很多关于中国的问题，我认为这个学校的水准相当不错。

2007 年一月香港城市大学邀请我去教书，上一次教计量经济学，这一次教中国经济。对我而言，教中国经济根本不需要准备，因为我在普林斯顿大学也教这门课。有关中国经济的问题我随时都可以讲授，内容都在我的脑海里，而且我对中国经济一向很感兴趣，等于一直在思考相关课题，因此讲课很轻松。不过 Paula 无法同行，我只得一个人去。

八、家庭生活

1951年我在芝加哥念书时结识Paula（陈国瑞）。我的中学同学沈培英当时在威斯康辛大学念书，邀我参加他的订婚宴会。事后他问我参加的众多女孩之中是否有中意人选？我告诉他Paula是第一人选。但是她在威斯康辛念书，两人分隔两地，也没有什么机会来往。直到1952年，她到芝加哥来念社会服务，两人都住在国际学舍（International House），才熟识起来。Paula的父亲是陈和铄。在国民政府时代，他曾担任江苏省教育厅长、司法厅长等职务，是个忠贞的国民政府官员。1961年国民党政府在台北阳明山开会（阳明山会谈），由蒋中正总统主持，邀请海外旅美学人参加，讨论台湾的前途。他以资深政要代表的身份参加。他有三男三女，Paula在家中排行第三，上有大哥、大姊，她是次女。

1948年Paula从上海去美国留学。1949年她的家人由大陆辗转到香港、台湾，1950年到1951年之间赴美。因为儿女都在威斯康辛大学念书，所以全家都住在那儿。1952年兄妹两人各转到芝加哥地区工作或在芝加哥大学念书，于是在芝加哥市的郊区买了房子，举家迁住于此。我们在1955年结婚，因为要等我毕业，她说不和尚未毕业的人结婚。Paula是1952年念研究所，1954年取得硕士学位，1955年她已经做事赚钱了。我们结婚之后的第一部车，就是她买的。我毕业之后，两个人开车去波士顿，到麻州理工学院赴任。到达之后，两个人身上现金不多，我去拜访副院长Eli Shapiro，向他说明情形。他说我的薪水可以追溯从七月一日起算。当时已是九月初，我们平空多出两个多月的薪水，帮忙解决了大难题。于是租了公寓，买些家具，安顿下来。我们住在波士顿时，Paula在儿童福利机构工作，她的办事能力很强，老板对她的评价都很满意。我们有一些中国朋友，如卞赵如兰、梅祖麟等人。其中卞赵如兰是大姊，她很照顾大家，每个月在她家里有一次聚会。我那时候很年轻，在麻州理工学院的朋友多是系上的同事，Paula常常在家里宴客。到了暑期的时候，我们就到鳕角去渡假。

1958年一月十一日长子善义（John Chow）出生。同年我取得在美居留工作权（绿卡），便想回家探亲，需要路费盘缠。Alexander Eckstein（他后来与刘大中合着一本关于中国经济的书*Economic Trends in Communist China*。）在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他介绍我去见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我向费正清说明我要回香港

一趟，需要经费。他答应给我两千美元，要我回香港之后，写一篇有关中国物价问题的文章。我们一起用餐，谈妥协议。我订了机票，临走之前两天他突然改变主意，打算只给我一千美元。本来双方谈好的条件，突然之间变卦未免没有信用，我决定即使没有钱还是要回去。回香港之后，我想一想还是气不过，几天之后写了一封信给他，说我不愿意接受那个研究案。那一次回香港变成纯粹探亲，我也因此对费正清印象不佳。

在香港时，Paula很努力学广东话。孩子出生之后，她不再上班，专心在家里带孩子，她为了家庭牺牲相当大。1963年十二月十二日老二善智、1969年十二月十四日老三小梅相继出生。小梅从医学院毕业之后，在波士顿担任医生。等小梅上学之后，Paula再出来做事。我们1970年去普林斯顿，1974年她成立普大国际中心，自任为主任，做一些志愿义务性的服务工作。在许多人的帮助之下，举办接待家庭、个别英语训练等多项活动。1978年学校将国际中心纳入正式编制，先是支付她四分之一的薪水，后来加成半薪，并提供办公室，再后来又改为全薪，还有秘书襄助。她在普林斯顿大学很受人欢迎，在学生中名气比谁都大。

Paula对于普林斯顿的影响极大，她改变了学校的风气。普林斯顿大学从前的作风比较势利、不友善，外来的访问学者，除非是客座教授，否则没人理睬。其实来自各国的访问学者、留学生，都是很有学养的饱学之士，只是因为英文能力较差、风俗习惯不同，而备受美国人的冷落歧视。她在普大每星期四中午举办餐会，每次约有一百人参加，给外国学者、学生提供机会结识新朋友。1996年四月十九至二十日普大在香港举办「二十一世纪的亚洲研讨会」，我们邀请一位密西根州立大学的讲座教授参加。他是一个韩国人，论文讨论韩国社会文化的问题。他在宣读论文之先，特别向Paula致谢，说初到普林斯顿大学之时，举目无亲，只好去国际中心求助，多亏Paula照顾等。

「二十一世纪的亚洲研讨会」是庆祝普林斯顿大学二百五十周年校庆的最大项目之一，邀请James Baker（美国财政部长，1985-1988）等人演讲，还有不少论文发表，会后编辑成书出版。这本书的编辑者是我们两人，由她领衔挂名，若没有她，这件事完全办不起来。在美国，校庆活动有时候会举办学术性的讨论会；在国外，就是联络校友，大家开个联欢会庆祝。我想既然是二百五十年的校庆，从普大国际中心的立场来说，应该举办比较学术性的讨论会，于是提出这个建议。不过他们认为举办五大洲的研讨会可能比较困难，就决定只办亚洲研讨会。后来我们把发表的十五篇文章编辑成一本书，书名是《二十一世纪的亚洲》（*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1997年出版。第二年欧洲也办了一个研讨会。办这种研讨会并不容易，必须找校友和学校的一些教授参加，不像一般的校友会。研讨会逐渐增加许多方面的课题，例如讨论印度、中国、日本、韩国等各国和美国的关系，就邀请前任的美国国务卿出席。这本来不是我份内应该做的事，当初我只是提了一个建议，不要只在美国国内举办，既然普大有许多校友对世界各方面都深具影响力，应该善加利用，在海外也办研讨会。但是这次找不到有份量的中国校友，就邀请普大的好友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她是麻州理工学院的物理博士。她曾来普大访问，希望复旦大学和普大建立合作关系，也和普大副校长Bob Durkee 共同签署两校合作的文件，可惜这种交流都没有落实。不过，后来我在复旦大学设立了经济学培训班。我们都很钦佩她，她和中国政府的高层官员保持很好的关系，学校的行政也做得很好，学生都喜欢她。我很佩服她。后来她也届龄退休了。

Paula在国际中心举办学生活动、连络校友等，卓有贡献。她和普林斯顿大学的香港校友会会长胡应湘、台湾校友会会长张安平等等都有联络，办事方便。另外，她每年举办国际节，从中午十二点至下午六点，内容包罗万象，吃、喝、玩、乐，有数千人参加，规模很庞大。她平日待人很好，大家都喜欢她，愿意来帮忙，因此能顺利举行。有时她邀请一些学者演讲，平日不轻易答应的人也会为她破例。我向她学了不少，譬如我讲话太直很容易得罪人，她则是很愿意热诚服务帮忙人家。例如1996年中央研究院举行院士会议，有位院士到旅馆后发觉掉了皮夹很着急，她也去帮忙，陪着他到处询问，幸而第二天找回了失物。

近年来普大国际中心的国际节，已经改由学生举办，他们的活动办得很成功。2007年五月十日，普林斯顿大学校友Shelby Davis先生捐赠五百万美元，成立国际中心的活动基金，中心也因此命名为The Kathryn W. and Shelby Cullom Davis '30 International Center，以祝贺他母亲Kathryn Davis 欢渡一百岁的寿辰。这么一来Paula 不但不得退休，工作反而更多了。

我们两个人互相合作，彼此商量，向对方学习。我们说话常互相开玩笑，女儿有一次批评我态度不好，对母亲不够尊重。偶尔双方也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但都没有什么恶意。有时候因为对人的看法不同，或是作风不同，或是沟通不良。例如她不长于看地图，为了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外买油条，我画图说明半天，还是白费力气。又如1996年李登辉总统宴请院士，散会之后我先走，她和马汉宝夫人殿后。双方的逻辑思考不同，结果等来等去捉迷藏，就是沟通没做好的缘故。这些都是小事，

在大事方面我们都能沟通，甚至我的研究方向、交友往来无所不谈。许多我没想到的地方，她能考虑到，提供我在经济本行以外的意见。当我去中国或和人们来往的时候，她常常有想法，提供我很多参考意见。对她举办的学生活动，我也会提出看法，彼此交换意见。她认识不少我的朋友，包括中国、台湾、香港、美国、欧洲的朋友。本书中提到的人物，百分之九十她都见过多次。每次旅游都是两个人同行。

Paula很活跃，常工作到晚上，工作时间比我还长。她不喜欢运动，平日每天花四、五十分钟走路去上班，当成运动。晚上下班时搭我的车一起回来。我们不常在家里开伙，常有学生邀请她，光是各国国庆就不少。我也有自己的社交活动，但不如她多。我们曾有连续两个星期不在家用餐的记录。有一次她安排密宗大师林云在普林斯顿大学演讲，他也顺道到我们的家里，看看风水，改良一下。我的二哥是建筑师，家里的格局布置由他设计。林云说厨房盖在大门直线之外，所以常外食，不在家里吃饭。除非把厨房位置改动或变更设计，才能改成常常在家吃饭。

Paula给我带来不少的好影响，她学过心理学，又从事社会服务工作，正好矫正我性格刚猛、做事很冲的毛病。1966年我第一次回台湾，在请客场合她有时在桌子底下踢我，因为我说话的习惯很直，想到什么说什么，往往出言不逊。我对子女教育，一方面采美式的平等待遇，尊重小孩，中国人看了很不习惯，自觉不是传统中国的严父型；另一方面，Paula说我是个严父，孩子们毕业之后，我一律平等对待，无论就业、交友，我从不主动表示意见。除非孩子们问我的意见，我才提供建议。Paula和我不同，她若觉得孩子为人行事有不妥的地方，即使他们不问，她也会主动和他们谈，提供意见。身为母亲，她永不放弃自己的责任。

小梅是2004年一月结婚，2005年第一个孩子出生，2006年底再生了一个女儿；善智则是2003年结婚，2006年四月收养了一个女儿。我非常高兴，也很满意。善智的妻子林雪莉（Shirley Lin）是台南人，父亲毕业于成功大学，本来在台湾工作，有一次去美国探望弟弟，没想到在纽约市有个工作机会就留下来，直到六十五岁退休，比我年轻一些。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其中两个在台湾出生，林雪莉大约五、六岁时来美国。他们家里讲闽南话，林姓家族应该是从闽南移民到台湾，还保留很传统的习俗，家教真好。我不知道台湾保存中国人的礼教传统，比我小时候还要好。她对我们长辈应尽的中国礼数，连香港也看不到。从订婚那天起，她的母亲就要她改口称Paula为妈妈等，不胜枚举。雪莉非常能干，她出生在台湾，在美国长大，他们两人在美国认识。和我们的情形

稍有不同，她的家里完全保留台湾的生活习惯。她的母亲是非常传统的中国妇女，不说英文，完全中国式，并不是因为她对东方文化有兴趣，而是保留自己的文化。

来自各国的移民，既要融入美国社会，也要保留自己的文化，这是很好的想法。通婚所带来的文化融合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例如小梅的先生 Edgar Carsado，他的父母亲从哥伦比亚移民到美国，也和我们一样是专业人士，父亲是心脏科医生。他们家里也保有拉丁裔美洲人的生活习惯，保留说西班牙语的传统。我们的家庭也保有自己的传统，经常每一两年就带孩子回到中国、香港、台湾。小梅和哥哥在学校说英文，很融入同学之中，在小学时回到家里还说中文，只是我们家里不是完全中国化。这不是语言选择的问题，而是生活方式的问题。善智的岳母持家完全是中文环境，我们则因为工作需要必须跟着潮流走，虽然坚持小孩要先学中文，只是我们来往的朋友很多都是外国人，自己下意识里就已经有一部分不是完全的中国人。可是雪莉的母亲是完完全全的中国妇女，在家主持家务，就是最好的太太，也是最好的母亲，无论在台湾或到美国来都是一样，要把小孩教养成最好的学生、最好的人才，这样一点一滴的培养出来。家里每个孩子都学会弹钢琴、拉小提琴，参加字母拼音比赛也是全州第一名，参加任何比赛都能得奖。这是中国的传统，非常注重教育。当然我们也很重视教育，只是能放松的话，也给孩子们放松。除了英文之外，在家里没有太多机会讲广东话，当然也因为孩子们不太会说，只有回香港的时候例外。从前我的父亲还健在，我每年带孩子们去香港探望他，或是他来美国探望我们，孩子们就用广东话和他沟通。此外我没有要求他们一定要说广东话，现在越长大越不行了。

在美国，就连结婚也是年轻人自己去筹备。这两个孩子结婚时，我们做父母的好像是客人一样，他们自己发请帖，不是父母发的，我们等于坐享其成，只是去参加现成的婚礼。女儿也是如此，完全都是他们自己筹备。本来在中国，儿女结婚是大事，现在在美国都不用管，只要去参加即可，对我们来说举行婚礼很轻松。我们儿子的婚礼在加州举行。女儿的婚礼则利用冬天的假期去牙买加举行，因为他们两人都是医生。美国医生工作的时候很认真，但也有不少休假可以到处旅行，例如利用周末去巴黎度假。她的朋友都是医生，趁着参加婚礼的机会，大家就去牙买加度假。我们做父母的也等于去渡个假。

有一次我主办香港前途研究会的会议，会后的宴席我让每个人各自付帐。在美国，聚餐时一个人一份餐点，费用由每个人均分，但是在香港却不能这么做。每一次香港前途研究会都是我去香港时才开会，我在

一次开会时对研究会的会员说明，参加者每个人负担一份费用。后来我自己考虑了一下，这种做法在香港完全行不通。在香港社会，众人一起吃饭根本不会平分摊帐，而是由某一个人付钱请客。后来当然没付成，对他们来说这根本行不通。我现在好一些了，已经不会做这种提议。不过这也反应出我在美国住得太久的缘故。

对香港人而言，我还做了一件欠妥的事。香港前途研究会第一次开会的时候，我的太太 Paula 不在香港，女儿小梅当时大约 17 岁，她很聪明伶俐，处理人际应酬很得体，我就让女儿当宴席的女主人。受邀参加的人都是香港最有地位的人物，我们谈的是非常重要的事，对香港人来说，小孩子根本不能参加。我自认为没有关系，因为在美国我女儿的表现已经够成熟了。因为我是主人，当天他们没有表示反对，但是我请女儿主持不恰当。在中国，餐会的场合没有女主人也不成问题。

我认为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尽管相对于年轻人，我们年纪比较大，经验比较多，但不会认为他们是晚辈。在中国，受到儒家规范的影响，一个后生晚辈连和长辈说话的资格都没有。例如在美国，教授与学生相处，我们教授的学问可能比学生多一些，师生彼此交谈的时候态度平等。我在美国习惯了这种文化，因此不论是在中国或美国，见了地位最高的领导人，也不觉得彼此有什么不同，大家的地位都平等。我和中国领导人的接触，始于赵紫阳。我认为和他来往，双方平等，或许他的地位比我高，但是我和他谈话不过是彼此交换意见，我觉得这种态度很自然。

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得很快，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已经不一样，虽然有些人还没有这种认识，也已经逐渐体认到中国的力量。我在《认识中国》一书中介绍中国，用意并不是强调中国文化比别人优越，而是说明中国文化有各种特色，希望促进别人的了解。我也提到环境对于人们道德的负面影响，处理事情要比较小心谨慎。很多经历过文革的人，在大环境好转之后，也有杰出的成就。谢宇是中央研究院 2004 年选出的院士之一，他在 1980 年代出国留学，现在担任密西根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也是第一位当选院士的中国大陆人士。他在文革的时候，连中学都没有读过，后来通过全国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简称高考）进入大学，一路凭着自己的能力努力上进。聪明的人总是有办法成功。

童年时我在中国所受的教育，对我有很重要的影响。我从 1960 年代起往返台湾，从 1980 年开始频繁地回去中国大陆，花了很多时间，不求任何报酬。如果没有认同，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就不会做这些事，因

为我也可以去非洲或其他地方做同样的事，关键就在于我自认为是中国人，希望帮助中国发展。以我个人来说，我在美国生活很适应，但是我在香港、台湾、中国也都是如此。我在这几个地方就像在家里一样。

附录一：邹陈国瑞女士访问纪录

我在普大国际中心服务，经常看到各国人士进出来往。我学到在美国，亚洲人并不占便宜；而在非洲的黄种人、亚洲人，处于黑白种族纠纷之间，才较占便宜。在 1970 年代之前普大很少非白人，后来有非洲裔黑人入学，他们认为需要拥有自己的组织，因为缺乏家里的奥援；还有很多第二代的华裔学生，跟着父母来到美国，他们念大学也需要自己的组织做为后援。从学校的角度而言，可能认为不需要这些学生组织。然而年轻人认为他们需要支援，因为有来自外面的压力，别人不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黑人甚至认为白人歧视他们，需要团体力量来极力自我表白。我们应该鼓励他们，让别人知道在那一方面加强彼此的融合，理由何在。种族问题从理性上来说比较简单，实行起来却很困难，症结在于情绪反应，因此校方鼓励学生自我表达。在种族问题方面，普大就是一个美国小社会的缩影。我们希望年轻人透过普大国际中心，对社会多一点了解，因为种族问题无所不在。

普大国际中心举办很多活动，对象不只限于外国学者，外国人反而比较单纯。国际中心主要促进种族或宗教之间的交流，鼓励他们成立自己的组织。国际中心设有一个办公室，进行各种宗教组织的交流，每次找一个宗教代表来演讲，或是介绍该宗教的想法。至于外国学生，刚来美国的时候要注意他们的语言能力，协助安定生活，以后就参加两个礼拜或一个月的定期交流，一面聚餐，一面安排专题演讲或介绍各人在自己国内的经历或宗教经验。参加聚餐听讲的人，有美国人，也有外国人或访问学者，让他们有机会介绍自己，也让大家互相认识。至于效果如何，很难说。演讲的内容大家听不听，或参加的人多不多，很难评估。有时候我们认为大家应该知道的事，人们不见得愿意参加。例如印地安人被歧视，国际中心邀请他们来演讲，可是来听讲的人很少，效果就有限。对年轻人而言，要他听一些与当下切身利益无关的事，很难吸引他们，有时候要用各种文化节目、艺文活动吸引他们，例如观赏表演，来达到不同种族的人互相认识交流的目的。

2001 年九一一事件发生之后，普大和学生联合商量，三、四天之后就决定举办演讲，主题是外国学生对九一一事件的反应，也包括一些具有伊斯兰教背景的美国学生，校长也来参加。我们在普大的活动中心设了九张公告栏，张贴各国报纸关于九一一的报导，给外国学生表达他们的心声；也和学校方面商请校外伊斯兰教的教长（Imam，类似基督教的

牧师角色)来谈一谈。普大国际中心的角色就是设法提供大家一些非美国、非正统、非主流的思想,也就是全球各地的反应。很多国际文化的交流都在普大国际中心进行,学校的相关科系可以好好加以利用,例如普大有东亚研究系、欧洲研究、非洲研究、中东或近东研究等。如果有和他们相关的活动就邀请该系教授来演讲,教授上课的时候学生不见得都能去听讲,不过在普大国际中心演讲,别系的学生可能来听讲。至于真正从事研究工作时,该系的学生自己会参加,不必透过我们。

至庄做事很有效率,有时候我觉得他脾气较硬。在学校里,他帮了很大的忙。例如我办理普大国际中心的事务,他的朋友很多,这时他的朋友也成为我的朋友。国际中心举办活动的时候,尤其是研究讨论,他都会参与,并且热心地表达许多意见,有时候我也邀请他来演讲。我们在很多事情上互相沟通,彼此交换意见。

就个性而言,在一些场合里,我比较容易与人相处。有时候他也觉得我不必做那么多,这话也很诚恳,为了让我节制一点。譬如在对待孩子、家庭的态度上,当孩子们毕业出社会做事以后,我在情感上觉得很失落,他就会劝慰我,这个时候应该要调整心态,淡化些、冷静些。我们能够从彼此不同的层面来思考互相平衡。

现在我们的家庭成员包括中国文化、台湾文化,还有中南美洲的拉丁文化,我们相处得很好,十分融洽。在美国,这样的多元文化家庭很普遍,我们的朋友之中就很多这种情形。在美国社会中,不同文化的人交错混杂地生活在一起,就算想要严格限制自己的文化范围也无法做到。我的父母后来也到了美国,他们这一辈还可以严格限制我们,但是我们教育下一代,即使想要限制自己的儿女,也不可能做到,而且我们认为既不必要,也不应该这样做。我们的儿女身处在一个大社会之中,我们不能让他们局限在一个小社会里。过去有一段时期,中国人与外国人结婚,对双方的亲友而言都有些不适应。对中国人而言,儿女和外国人结婚,似乎有些奇怪。即使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还有这种想法,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异族通婚,不过我们已经没有这种心态。我们并不是鼓励儿女和外国人结婚,而是在态度上不预设立场。女儿小梅曾交往过中国男友,我们还是认为她现在的选择最好。在我经常接触的中国学生里,仍然有不少家庭认为应该和中国人结婚,无论是从中国来的或是台湾来的,甚至有些在美国当地的中国家庭,都是如此。中国人还是比较保守。

在美国成长的华人下一代,他们认为自己是美国人。有机会的话,

他们可能会回中国去工作，但是会回去长住的人可能不多。有些外国人喜欢在中国居住，但毕竟是少数。有一次我和小梅回上海，她接触上海之后说：「我可以在上海生活。」但她不是抱着回去祖国的心情，而是以全世界的城市互相比较，认为上海可以居住。如果他们去中国工作，可能没有「回国」的想法，而是认为自己在语言上比别人占优势，如果因为工作需要派到中国，他们可能会去。

我们这一代人的国家认同很复杂。当年我们出国的时候，大陆还没有成为共产中国，后来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到了台湾，我们认为中华民国就是中国，从那时候起一直到现在都是认同台湾，虽然我们没有在台湾居住过，但是因为常回来，很有认同感。不过大陆开放以后，因为我们生长在中国，有很多亲戚还在那里，所以对中国的认同感和台湾差不多，无法说那一边较强或较弱。香港也是如此，因为至庄的父亲住在香港，我们常回去探亲。我们觉得认同中国、香港、台湾三个地方都很自然。虽然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当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的时候，我们这些在国外的华人仍觉得很骄傲。从前中国的国际地位比较低落，现在已经不同了，虽然有些美国人敌视中国，认为中国发展得太快，抢走他们的市场等等。可是做为一个中国人，心理上仍然觉得很骄傲。这是我的想法。

我们一向的立场就是介绍中国。譬如和外国朋友在一起，我认为他们应该了解中国，而且由我们来介绍比较有利，因为带有自豪的感觉。我从进大学开始，到后来长住美国，一直都是抱持这种态度。五十年前我介绍中国的时候，都说中国是礼义之邦。现在的中国，因为经过文革等影响，自己的亲友之间还保有比较真实的感情，可是一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和过去不同。这种历史文化的转变很难说清楚，比较需要解释。

认同是一种感情，很难说明。因为自己是从中国来的，认同就是中国。自己的表现好是一回事，同时也希望自己的祖国表现良好，在国际上有地位。即使国际地位不高，至少政府做事不要太荒唐。我自己心里真正的认同是中国人，可是这种事很难向子女们解释，因为他们不是在中国长大的。他们也是中国人，只是他们对中国的认同恐怕和我们不同了。我们真心地认为，不论环境如何优越，如何适应美国社会，或在美国做了一番或大或小的事业，可是心里依然觉得自己是中国人。身为中国人的认同，不会去区分台湾、大陆的差别。（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年七月七日）

附录二：邹至庄先生年表

- 1930 出生于广州。
- 1936 与诸姊共同受教于家庭教师。
- 1937-1938 插班香港圣保罗小学二年级。
- 1938-1942 转入香港岭南小学二年级；太平洋战争爆发，转念华仁小学六年级。
- 1943-1944 跳读澳门岭南中学（初中部）二年级。
- 1944 考入澳门培正高中，跳读高一上学期。
- 1944-1945 转入澳门岭南中学（高中部）。
- 1945-1947 抗战胜利，岭南中学迁回广州。
- 1947-1948 考入岭南大学，就读一年级。
- 1948-1949 就读于康乃尔大学政治系。
- 1949-1951 转入经济系。1951年获康乃尔大学学士。
- 1951-1955 转往芝加哥大学进修，1952年获硕士学位，1955年获博士学位。
- 1955 与陈国瑞女士结婚。
- 1955-1959 任教麻州理工学院，1957年博士论文出版。
- 1957 *Demand for Automobiles in the United States* 一书出版。
- 1959-1962 任教康乃尔大学副教授。
- 1960 发表成名作“Tests of Equality Between Sets of Coefficients in Two Linear Regressions”，后以「邹氏检定」、「邹检验」（Chow Test）著称。
- 1962-1970 任职 IBM 公司。
- 1965-1971 哥伦比亚大学兼任教授。
- 1966 与刘大中先生回台湾讲学并担任经济顾问。
- 1967 当选计量经济学会荣誉会员。
- 1970 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开始用控制理论研究宏观经济与政策。
- 1970-2001 任教普林斯顿大学，并于 1970 年至 1997 年担任计量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 1974 当选美国统计学会荣誉会员；与刘大中等五位院士联合发表〈今后台湾财经政策的检讨〉。

- 1975 *Analysis and Control of Dynamic Economic Systems* 一书出版。
- 1978 与蒋硕杰、邢慕寰、顾应昌、费景汉四位院士合撰〈经济计划与资源有效利用〉（刘大中先生已于 1975 年逝世）。
- 1979 动态经济与控制学会成立，担任首届会长。
- 1980 首次赴中国大陆讲学。
- 1981 *Econometric Analysis by Control Methods* 一书出版。
- 1981-1994 担任美国经济学会的美中经济学交流委员会主席。
- 1982 再赴中国讲学； *Evaluating the Reliability of Macroeconomics Models* 一书出版。
- 1983 研究中国经济， *The Chinese Economy* 一书完稿。与大陆教育部高教司合作推广现代经济学教育。 *Econometrics* 一书出版。
- 1984 与中国教育部合作主办微观经济暑期讲学班。首次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谈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经济改革。
- 1985 主办宏观经济暑期讲学班。赵紫阳建议邀请海外经济学者担任经济改革顾问。 *The Chinese Economy* 一书出版，南开大学出版社中译本《中国经济》。获聘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名誉教授。
- 1985-1988 安排中国留学生赴美就读各大学经济研究院。
- 1985-1994 与福特基金会合作，组成美中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委员会，担任美方委员会主席，推广中国经济学教育。
- 1986 主办计量经济暑期讲学班。和海外经济学者先后在香港、北京与体改委会谈中国经济改革问题。获中山大学颁赠名誉博士学位。担任香港岭南学院六人顾问团主席，协助改善该校课程。
- 1987-1991 担任美国与香港经济合作委员会委员。
- 1988 广州岭南学院复校，担任名誉院长。参加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经济改革十年回顾研讨会」。与赵紫阳、许家屯谈香港问题。
- 1989 筹组香港前途研究会。与蒋硕杰、顾应昌、费景汉、刘遵义、于宗先等人在香港和体改委会谈。安排香港前途研究会会员与赵紫阳会谈。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和江泽民会谈。
- 1990 重拾动态经济学研究，并在 1991 年有新突破。
- 1992 当选美国哲学院（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院士。
- 1993-1996 香港科技大学兼任教授。
- 1994 *Understanding China's Economy* 一书出版。获香港岭南学院颁赠名誉法学博士学位。获聘人民大学名誉教授。

- 1996 倡议成立香港发展议事会。
- 1997 *Dynamic Economics: Optimization by the Lagrange Method*一书出版；口述访问《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播种者：邹至庄先生访问纪录》出版；*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出版，与夫人邹陈国瑞女士合编。受邀参加香港回归交接仪式。受聘担任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顾问、山东省人民政府经济咨询顾问、山东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名誉教授。
- 1998- 香港城市大学兼任教授。
- 1999 主持和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科教兴国国际研讨会」。
- 2000 获聘海南大学名誉教授。
- 2001 退休；普林斯顿大学计量经济研究中心改名为邹至庄计量经济研究中心，以表扬其贡献。
- 2002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一书出版。获聘南开大学名誉教授。
- 2004 *Knowing China* 一书出版。
- 2005 获聘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名誉教授。《中国经济转型》中文版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 2007 会见广东省副省长雷于蓝，谈医疗体制改革问题，建议扩大私有化；获聘华中科技大学名誉教授；担任香港城市大学短期客座教授。应邀参加「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南方论坛」，在厦门大学发表开幕专题演讲；应邀参加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年会，在长沙举行，并颁发「邹至庄最佳经济学论文奖」。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一书修订再版。

附录三：邹至庄先生著作

1956

The demand for automobiles in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etrica* 24 (July), 342.

1957

Demand for Automobil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Study in Consumer Durables.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Spanish translation, 1965).

Review of A. M. Tuttle: Elementary business and economic statistics. *The Journal of Business* 30 (October), 286-287.

1958

The formation of stock prices. *Econometrica* 26 (October), 604-605.

Statement of Gregory Chow. In Administered Prices: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in Antitrust and Monopoly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United States Senate Eighty-Fif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3167-3195.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9

Review of J. Morice: La demande d'automobiles en France. *Econometrica* 27 (July), 528-530.

The selection of variates for use in prediction: A generalization of Hotelling's solution. Presented at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Meetings in Washington, D.C., December. In L. Klein, M. Nerlove & S. C. Tsiang (eds.), *Quantitative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s*, 105-114.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0.

1960

Statistical demand functions for automobiles and their use for forecasting. In A. C. Harberger (ed.), *The Demand for Durable Goods*, 147-178.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ests of equality between sets of coefficients in two linear regressions. *Econometrica* 28 (July), 591-605.

1961

Review of William Warntz: Toward a geography of pric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56 (March), 209-210.

1964

A comparison of alternative estimators for simultaneous equations. *Econometrica* 32 (October), 532-553.

1965

Review of A. D. Bains: The growth of television ownership in the United Kingdom. *Econometrica* 33 (July), 657-659.

1966

On the long-run and short-run demand for money.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4 (April), 111-131.

A theorem on least squares and vector correlation in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61 (June), 413-414.

1967

An alternative proof of Hannan's theorem in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d multiple equation systems. *Econometrica* 35, 139-142.

Review of D. S. Huang: A microanalytic model of automobile purchase. *Econometrica* 35 (January), 164-165.

Multiplier, accelerator, and liquidity preference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national incom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XLIV (February), 1-15. Also in M. G. Mueller (ed.), *Readings in Macroeconomics*, 411-429.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1.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the demand for compute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LVII (December), 1118-1130.

1968

Two methods of computing full-information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es in simultaneous stochastic equation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9 (February), 100-112.

The acceleration principle and the nature of business cycl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LXXXII (August), 403-418.

Long-run and short-run demand for money: Reply and further not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6 (November/December), 1240-1243.

Statement of G. C. Chow. In *Compendium on Monetary Policy Guide-lines and Federal Reserve Structure: Pursuant to H. R. II*, 106-109.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December.

1969

- Review of Gerhard Tintner: Methodology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 and econometrics. *Zentralblatt für Mathematik* 164 (May), 203.
- Spectral properties of non-stationary systems of linear stochastic difference equations (co-authored with R. E. Levita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64 (June), 581-590.
- Nature of business cycles implicit in a linear economic model (co-authored with R. E. Levita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LXXXIII (August), 504-517.
- Note on the estimation of long-run relationships in stock adjustment model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7 (November/December), 932-936.
- An econometric model of business cycles (co-authored with G. H. Moore). IBM Research Center, January. Also in B. G. Hickman (ed.), *Econometric Models of Cyclical Behavior*, vol. 2, 1972, 739-812.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 Friedman on money: A review article. *Journal of Finance* 25 (June), 687-689.
- Optimal stochastic control of linear economic systems.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2, 291-302.

1971

- Review of L. R. Klein, M. K. Evans and M. Hartley: Econometric gaming: A kit for computer analysis of macroeconomic models. *Econometrica* 39 (September), 868.
- Best linear unbiased interpolation, distribution, and extrapolation of time series by related series (co-authored with An-loh Li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LII (November), 372-375.

1972

- Optimal control of linear econometric systems with finite time horiz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3 (February), 16-25.
- Review of Aaron Strauss: An introduction to optimal control theory. *Econometrica* 40 (March), 408-409.
- Optimal control program: User's guide (co-authored with D. R. Chapman). Research Memorandum No.141, Princeton University, Econometric Research Program, May.
- Review of Phoebus Dhrymes: Econometrics: Statistical foundations and applications. *Econometrica* 40 (July), 786-787.
- How much could be gained by optimal stochastic control policies. *Annal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Measurement 1 (October), 391-406.

Introduction to stochastic control theory and economic systems (co-authored with Michael Athans). *Annal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Measurement* 1 (October), 375-383.

1973

Multiperiod predictions from stochastic difference equations by Bay-esian methods. *Econometrica* 41, 109-118. Also in Fienberg and Zellner (eds.), *Studies in Bayesian Econometrics and Statistics*, 313-324.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1975.

Effects of uncertainty on optimal control policie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4 (October), 631-644.

Problems of economic policy from the viewpoint of optimal contro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LXIII (December), 825-837.

On the computation of full-information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es for nonlinear equations system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LV (February).

1974

Introduction to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Second NBER Stochastic Control Conference (co-authored with Michael Athans). *Annal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Measurement* 3, 1-9.

Report on a joint study and discussion of the future fiscal and economic policies of Taiwan. Jointly prepared and submitted by six academicians of Academia Sinica and The Central Bank, Republic of China, August.

A family of estimators for simultaneous equation system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5 (October), 654-666.

Review of R. S. Pindyck: Optimal planning for economic stabilization: The application of control theory to stabilization policy.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 195-198.

Identification and estimation in econometric systems: A survey. *IEEE Transactions on Automatic Control* AC-19 (December), 855-862.

1975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of linear equation systems with auto-regressive residuals (co-authored with R. C. Fair). *Annal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Measurement* 4 (January), 17-28.

Analysis and Control of Dynamic Economic System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中译本《动态经济系统的分析与控制》（司春林、侯先荣译，北京：中国

友谊出版社，1983年。)

Introduction to stochastic control applications. *Annal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Measurement* 4 (April), 207-214.

A solution to optimal control of linear systems with unknown parameter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57 (August), 338-345.

Introduction to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Third NBER Stochastic Control Conference. Research memorandum No. 172, Princeton University, Econometric Research Program, February.

Review of K. P. Vishwakarma: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IEEE Transactions on Automatic Control* AC-20 (October), 721-722.

1976

Review of R. P. Smith: Consumer demand for cars in the USA.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4 (March), 114-115.

A note on the derivation of Theil's BLUS residuals. *Econometrica* 44 (May), 609-610.

Control methods for macro-economic policy analysi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6 (May), 340-345.

The control of nonlinear econometric systems with unknown parameters. *Econometrica* 44 (July), 609-610.

Best linear unbiased estimation of missing observations in an economic time series (co-authored with An-loh L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7 (September), 719-721.

An approach to the feedback control of nonlinear econometric systems. *Annal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Measurement* 5 (summer), 297-309.

Discussion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aiwan. In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aiwan*, 555-556, 651-654, 675-677. Republic of China: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a Sinica.

Review of G. Fromm and L. R. Klein (eds.): The Brookings Model: Perspective and recent development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71 (September), 771.

1977

Usefulness of imperfect models for the formulation of stabilization policies. *Annal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Measurement* 6 (spring), 175-188.

Review of M. Aoki: Optimal control and system theory in dynamic economic analysi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6, 143-144.

A reformulation of simultaneous equations models for markets in disequilibrium. Research memorandum No. 213, Princeton University, Econometric Research

Program, August.

Regression with one-sided errors in the dependent variable. Research memorandum No. 214, Princeton University, Econometric Research Program, August.

The computer and economics.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21 (September), 350-354.

1978

Evaluation of macroeconomic policies by stochastic control technique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 (June), 311-319.

Comment on "A time series analysis of seasonality in econometric models" by Charles Plosser. In Arnold Zellner (ed.), *Seasonal Analysis of Econometric Time Series*,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December, 398-401.

The control of large-scale nonlinear econometric systems (co-authored with S. Bernstein-Megdal). *IEEE Transactions on Automatic Control*, AC-23 (April 1978), 344-349.

An econometric definition of the inflation-unemployment trade-off (co-authored with S. Bernstein Megda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8 (June), 446-453.

Are econometric models useful for forecasting? *Journal of Business* 51 (October), 565-568.

The estimation of total investable resources. Research memorandum No. 236, Princeton University, Econometric Research Program, October.

Economic Planning and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co-authored in Chinese with S. C. Tsiang, M. H. Hsing, John Fei, & Anthony Koo). Taiwan: Economic Planning Council.

1979

Effective use of econometric models in macroeconomic policy formulation. In S. Holly, B. Rustem, & M. Zarrop (eds.), *Optimal Control for Econometric Models*, 31-39.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Optimal control of stochastic differential equation systems.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1 (May), 143-175.

The econom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ast performance and future prospects. Research memorandum No. 257, Princeton University, Econometric Research Program, December.

Comments on four papers concerning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changes in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aiwan (in Chinese). In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aiwan*, 593-595. Taipei: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a

Sinica.

1980

- Comparison of econometric models by optimal control techniques, in J. Kmenta, & J. Ramsey (eds.), *Evaluation of Econometric Models*, 229-243.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Econometric policy evaluation and optimization under rational expecta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2 (February), 47-59.
- Review of Practical Experiences with Modelling and Forecasting Time Series by Gwilym M. Jenkins.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2 (June), 209-212
- Estimation of rational expectations models.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2 (August), 241-255.
- Estimation and optimal control of econometric models under rational expectations. In R. Lucas, & T. Sargent (eds.), *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Econometric Practice*, 681-689.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Ten economic problems fac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Chinese). *China Times* (Taipei, Taiwan), 4 February 1980, 2.

1981

- A model of Chinese national income determin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3 (August), 782-792.
- Optimal control of nonlinear systems program: User's guide (co-authored with E. H. Butters). In G. C. Chow (ed.), *Econometric Analysis by Control Methods*, 57-84.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Evaluation of econometric models by decomposition and aggregation. In J. Kmenta, & J. Ramsey (eds.), *Large-Scale Macro-Economic Models: Theory and Practice*, 423-444.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 Selection of econometric models by the information criterion. In G. E. Charatsis (ed.), *Proceedings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European Meeting 1979*, 199-214.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 On the control of structural models: Comment.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5, 25-28.
- A comparison of the information and posterior probability criteria for model selection.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6, 21-33.
- Estimation and control of rational expectations model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71 (May), 211-216.
- Estimation and control of rational expectations model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71 (May), 211-216.

Has government policy contributed to economic instability? (co-authored with S. Heller). In G. C. Chow (ed.), *Econometric Analysis by Control Methods*, 131-148.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Soviet economic planning by optimal control (co-authored with D. W. Green). In G. C. Chow (ed.), *Econometric Analysis by Control Methods*, 177-206.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Review of Pan-tai Liu, ed.: Dynamic optimization and mathematical economics. *Optimal Control Applications and Methods 2*, 204-205.

Solution and estimation of simultaneous equations under rational expectations. Research memorandum No. 291, Princeton University, Econometric Research Program, October.

Econometric Analysis by Control Method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中译本《用控制方法进行计量经济分析》（侯先荣等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

1982

Estimation and optimal control of models of dynamic games. In M. Deistler, E. Fürst, & G. Schwödiauer (eds.), *Games, Economic Dynamics, and Time Series Analysis*, 279-290. Wien Würzburg: Physica Verlag.

Outline of an econometric model for Chinese economic planning.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4*, 171-190.

Analyzing econometric models by control methods. In G. Chow, & P. Corsi (eds.), *Evaluating the Reliability of Macro-Economic Models*, pp. 149-162. London: John Wiley & Sons.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U.S.-China Exchang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72 (May), 429.

Evaluating the Reliability of Macro-Economic Models. G. Chow, & P. Corsi (eds.), London: John Wiley & Sons.

1983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U.S.-China Exchang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73 (May), 417.

Econometrics.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中译本《计量经济学》（郑宗成等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8年）。

1984

Random and changing coefficients models. In Z. Griliches, & M. Intriligator (eds.), *Handbook of Econometrics*, vol. II, chapter 21, 1213-1245.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Note on maximum-likelihood estimation of misspecified models. *Economic Modelling* 1 (April), 134-138.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U.S.-China Exchang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74 (May), 464-465.

Economic research in China. Mimeo, Princeton University, December.

1985

On the efficiency of enterprises and the price mechanism (in Chinese). *Economic Research*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hinese Economy.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1987) 中译本《中国经济》（天津：南开大学，1985年）（香港：中文大学，1986年；1987年）

Chinese statistics. *The American Statistician* 40 (August), 191-196.

On two methods for solving and estimating linear simultaneous equations under rational expectations (co-authored with Philip J. Reny).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9, 63-75.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U.S.-China Exchang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75 (May), 454.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Some proposals. Mimeo, Princeton University, November. Published in Chinese in *Economic Reporter* 6 (2, February), 507 (1986).

1986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U.S.-China Exchang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76 (May), 450.

1987

Development of control theory in macroeconomics. In C. Carraro, & D. Sartore (eds.), *Development of Control Theory for Economic Analysis*, 3-20. 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Hypothesis testing. J. Eatwell, M. Milgate, & P. Newman (eds.), *The New Palgrave*.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Also in J. Eatwell, M. Milgate, & P. Newman (eds.), *Time Series and Statistics*, 109-117.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0.

Development of a more market-oriented economy in China. *Science*, 16 (January), 295-299. Also in Y. C. Jao, V. Mok, & L. Ho (ed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ese Societ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9, 39-48.

Money and price level determin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1, 319-333. Also in B. Reynolds (ed.),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How Far, How*

Fast?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1988, pp. 29-43.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U.S.-China Exchanges in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77 (May), 399.

1988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Presented at the China Institute of America, Symposium on Chinese Culture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April.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U.S.-China Exchanges in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78 (May), 523-524.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Education* 19 (Winter), 53-64.

Market social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Research memorandum No. 340, Princeton University, Econometric Research Program. Presented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1979-1988, Shenzhen, November 7-13. Also in *Wen Wei Po* (Hong Kong), November 11, 13 (in Chines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Hong Kong. Mimeo, Princeton University, Econometric Research Program. Presented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1979-1988, Shenzhen, November 7-13.

1989

Economics education and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33, 64-74 .

Teaching economics and studying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1. Chinese translations published in *Commercial Times* (Taiwan), March 7, 8, 9, 10, 11, 12, 13, and 14, and in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Monthly* 144 (March), 40-47.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U.S.-China Exchanges in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79 (May), 426-427.

Rational versus adaptive expectations in present value model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71 (August), 376-384.

Prospects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and cultural exchanges with the U.S. *Princeton Alumni Weekly*, September 27, 16-17. Also in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Monthly* 151 (October), 22-24 (in Chinese), and *The Future of China: The Scholar's Views*, 71-75. Teaneck, NJ: Global Publishing Company 1990 (in Chinese).

Preface/introduction, in T. Min (ed.), *Essays on Modern Economics*, vol. 1, 1-3.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1990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U.S.-China Exchanges in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80 (May), 490-491.

The multiplier-accelerator model in the light of cointegration. Research memorandum No. 357, Princeton University, Econometric Research Program, November.

Econometrics, dynamic analysis and control theory, in Chinese Quantitative Economics Association, *Jingji Jiliangxue Jiangyi (Lectures on Econometrics)*, ch. IV, 189-226. Beijing: Aerospace Industry Publishers.

1991

Review of C. Davis and W. Charemza, eds.: Models of disequilibrium and shortage in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c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858 (April), 392-394.

The Chinese economy: Substantial growth in the 1990's. *Economic Insights* (May/June), 32-34.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U.S.-China Exchanges in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81 (May), 413.

Rights to assets and economic behavior under Chinese socialism.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the Economic Contest between Communism and Capitalism: What's Ahead? SUNY, Buffalo, May 10. Also in *Academia Economic Papers* 20 (2, September), 267-290 (1992).

Note on equilibrium business cycles with technical innovations. Mimeo, Princeton University, Econometric Research Program, November.

1992

Dynamic optimization without dynamic programming. *Economic Modelling* 9 (January), 3-9.

Statistical estimation and testing of a real business cycle model. Research memorandum No. 365, Princeton University, Econometric Research Program, March.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U.S.-China Exchanges in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82 (2, May), 615.

The integration of China and other Asian countries into the world economy. Mimeo, Princeton University, Econometric Research Program. Invite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ont Pèlerin Society general meetings, September, in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1993

- Capital form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CVIII (August), 809-842.
- Simulations in economics and business. In D. Greenwald (ed.), *The McGraw-Hill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s*, 2nd ed., pp. 909-911. New York: McGraw-Hill.
- A two-step procedure for estimating linear simultaneous equations with unit root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LXXV (February), 107-111.
- Solving optimal control problems by locally quadratic approximations to the Lagrangean func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Econometric Research Program Seminar, March 15.
-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U.S.-China Exchanges in Economic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83 (2, May), 512.
- Optimal control without solving the Bellman equ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17 (July), 621-630.
- How and why China succeeded in her economic reform. *China Economic Review* 4 (Fall), 117-128.

1994

- Computations of optimum control functions by Lagrange multipliers. In D. A. Belsley (ed.), *Computational Techniques for Econometrics and Economic Analysis*, 65-72.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Understanding China's Economy*.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1995

- Multiperiod competition with switching costs: Solution by Lagrange multipliers.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19 (January / February), 51-57.
- S. C. Tsiang's finance constraint in a dynamic model of money and interest. In Tzongshian Yu and Joseph S. Lee (eds.), S. C. Tsiang: *His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Theory*, 83-98. Taipei: Chung-hua Institution for Economic Research.
- Ekonometria* (Wydawnictwo Naukowe PWN), Polish edition of Econometrics.

1996

- The Lagrange method of optimization with applications to portfolio and investment decis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20 (January-March), 1-18.
- Statistical estimation and testing of a real business cycle model (co-authored with Y. K. Kwan). Mimeo. Princeton University, Econometric Research Program, January.

U.S.-China trade relations. *Sunday Star Ledger*, June 2.

Estimating economic effects of political movements in China (co-authored with Y. K. Kw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3, 192-208.

Economic effects of political movements in China: Lower bound estimates (co-authored with Y. K. Kwan).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1: 1 (June), 13-26.

Comment on "The irreducible role of derived marginal utility in dynamic stochastic programming" by Paul A. Samuelson.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1:3 (December), 251-252.

How well does the Chinese banking system function?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a: Toward a Modern Financial System, sponsored by Committee on Economics Education and Exchange with the U. S., Beijing, August.

1997

Dynamic Economics: Optimization by the Lagrange Metho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ow's method of optimal control: A numerical solution (co-authored with Y. K. Kwan).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vol. 21, 4-5, 739-752.

Rates of return to schooling in China (co-authored with Emily N. Johnson).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2:2(June), 101-113.

Review of Susumu Yabuki (translated by Stephen M. Harner). China's New Political Economy: The Giant Awakens. *China Economic Review* 7(2).

Challenges of China's economic system for economic theo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aula Chow and Gregory C. Chow, eds.,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China's reform proces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housing. Chapter 1 in Tolley, George, Shou-yi Hao and Macia Ocomy, ed., *Urban Land' and Housing Reform in Socialist and Former Socialist Countries*, Mount Pleasant, MI: The Blackstone Co.

《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播种者：邹至庄先生访问纪录》，刘素芬、樊沁萍访问，NJ: Global Publishing Co.

Rational expectations is not necessarily valid for econometric models, (co-authored with Y. K. Kwan).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2 (October), 149-163.

1998

How the basic RBC model fails to explain US time series (co-authored with Y. K. Kwan).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 41:2 (April), 301-318.

The free market system, *Bulletin of the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December.
China's economic policy in the context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in Chinese).
August 20-22, 1998 issues of *Commercial Times*, Taiwan;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Monthly*, December;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January 1999 (2), Beijing.

1999

China's economy: Reform and perspectives. Presented before the Symposium on Asian Financial Crisis, sponsored by the Korean-American Society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in February 199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 vol. III, no. 1 (Spring/Summer), 136-147.
Shanghai stock prices as determined by the present value mode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September, 553-561.
Duplicating contingent claims by the Lagrange method.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3 (October), 277-284.
Editorial note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Financial Economics (co-authored with Larry Hsien Ping Lang).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3 (October), 233-235.
Educating and effectively utilizing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in China. Paper presented befor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cience and Education Policies for the Betterment of China's Economy, Beijing, August, 18-20.

2000

China's economic policy in the context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5 (February), 97-107.
Teaching modern economics in China.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vol. XLII, no. 2 (Summer), 51-60.
China's economic reform and polici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11, no. 4, 427-431.

2001

Econometrics and Economic Policy. *Statistica Sinica*, vol. 11, no. 3 (July), 631-650.
《计量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Contributions to Econometrics and Applied Economics），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经济动力学与控制》（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2002

China's economic growth: 1952-2010 (co-authored with Kui-Wai Li).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51, no. 1 (October), 247-256.

Taiwan's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co-authored with Lin An-loh). In Sheng-cheng Hu and Chu-Tan Fu, eds., *Essay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emory of Academician Hsing Mo-huan*, Taipei: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a Sinica, 21-43.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Malden,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2nd ed., 2007). 中译本《中国经济转型》（曹祖平、韩玉军、刘元春、徐小云等译，黄卫平、曹祖平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Equity premium and consumption sensitivity when the consumer-investor allows for unfavorable circumstances (co-authored with Lihui Zheng).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vol. 26, no. 9-10 (August), 1417-1429.

Accounting for economic growth i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co-authored with Anloh Li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September, 507-530.

Prospects of political integration of China mainland and Taiwan. Presented as a keynote addres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gration of the Greater China Economies organized by the Chinese Economists Society held in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une 28.

2003

The impact of joining WTO on China's economic, legal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vol. 9, no. 2 (June), 105-115.

A time-series analysis of the Shanghai and New York stock price indices (co-authored with Caroline C. Lawler).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May, 17-35.

Can economists forecast accurately? A keynote address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of Academia Sinica in Taipei, July 1; also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Bulletin* (July), 28-36.

China's economy: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further study. Paper presented before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at Aichi University, Nagoya Japan, to celebr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its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on November 1.

Equity premium in an asset pricing model with robust control. working paper, Princeto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ugust.

Globalization and China since 1840: A historical overview. *Harvard China Review*, vol. IV, no.1 (Fall), 6-9.

2004

Knowing China.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中译本《认识中国》（廖美香译，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04年。）

Economic reform and growth in China.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vol. 5, no. 1 (May), 93-118.

Free to choose in China. In Wynne, Mark A., Harvey Rosenblum and Robert L. Formainai, eds., *The Legacy of Milton and Rose Friedman's Free to Choose: Economic Liberalism at the Turn of the 21st Century*. Dallas, Texa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 153-71.

Review of how far across the river? Chinese policy reform at the millennium. Edited by Nicholas C. Hope, Dennis Tao Yang, and Mu Yang Li.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XLII (June), 884-885.

2005

Role of planning in China's market economy.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vol. 3, no. 3 (November), 193-203.

Money, price level and output in the Chinese macro-economy (co-authored with Yan Shen). *Asia-Pacific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vol. 12, no. 2 (December), 91-111.

Can economists forecast accurately?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s* (in Chinese), June, 1-10.

2006

Are Chinese official statistics reliable? *CESifo Economic Studies*, June.

Demand for education in China. *International Economic Journal*, 20:2 (June), 129-147.

Globalization and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11: 3 (October), 271-285.

Corruption and China's economic reform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11, 263-80.

New capitol estimates for China: Comments. *China economic review* 17, 186-192.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health care in China.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Studies Discussion Paper No. 132 (August).

Rural poverty in China: Problem and polic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Studies Discussion Paper No. 134 (September).

China's healthcare supply and policy (in Chinese). *Management Review*, Beijing: Graduate School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ovember.

2007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second edition. Blackwell Publishing Company.

附录四：经济学留学生名单（CHOW TESTERS, 1985-1988）

（一）1985 至 1986 学年度

艾春荣	白聚山	蔡永新	曹景彬	岑成德	查 涛	陈百助	陈雪明
陈云辉	陈智琦	代 昭	范延琴	符育明	葛正羽	顾新一	韩晓跃
和金生	何 治	洪 露	黄维洪	黄中核	姜长富	金甫春	孔卫红
李稻葵	李华刚	李玉明	林寿康	刘安平	毛世梁	牟小华	倪晓光
钱 鹰	丘春福	丘东晓	沙 石	沈 璞	宋 敏	宋晓江	孙黎明
谭国富	王洪涛	王建新	王家卓	王汝渠	王苏生	王为人	王文铁
魏 红	卫小英	吴 康	夏宁江	项保华	向平贵	谢丹阳	谢小娣
谢 新	徐 改	许小年	许 洋	徐永胜	杨则徐	余 钢	于维秋
张 处	张殿军	张 峰	张 皓	张俊森	张鹏飞	张 平	张树斤
张 维	张霄龙	张 欣	张 铮	郑康彬	郑 彤	周建萍	周 林
周 欣	周志远	诸 宁	朱延光	邹绍明			

（二）1986 至 1987 学年度

包卫航	陈海淳	陈坚定	陈继文	陈松年	褚浩全	方星海	龚 宁
龚秀国	关兆泉	韩廷春	胡世林	胡祖六	康 乐	李 兵	李 铭
李 山	李 颖	梁雪峰	林 平	罗迎春	梅建平	牟小华	潘 瑜
全 竟	沈 企	沈企平	宋顺峰	孙永红	陶志刚	万 浩	王宏海
王 凯	王启南	王宪富	魏国鸣	魏尚进	魏向东	吴智琴	许定波
徐康康	杨旭峰	尹冬平	张光平	张金生	张俊喜	张命良	张小弦
张月明	赵海英	郑 伟	郑艺娟	周华山	周忠全	朱达书	朱 毅

（三）1987 至 1988 学年度

褚雪浩	崔中庆	范文杰	费虎臣	韩廷春	柯祖耀	栗树和	李天友
刘 楠	陆晓华	骆红云	马成虎	曲和磊	吴延瑞	谢 新	徐安林
徐 晟	许志怀	杨 健	杨克坚	杨自立	张建波	张 铮	赵清华
郑步弘	郑 旭	周瑞林					

（以上按姓氏英文字母顺序排列）

附录五：留学生申请入学推荐信

Princeton University

Econometric Research Program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207 Dickinson Hall, Princeton, New Jersey 08544
Telephone (609) 452-4031
Telex 4991258

September 5, 1984


Dear Colleag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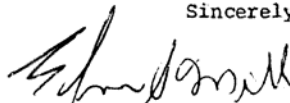
A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modernizing its economics education, we are cooperating with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o select the best candidates from China to pursue graduate study in econom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Each candidate will take a Toefl to indicate proficiency in English, a mathematics examination covering advanced calculus, modern algebra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to be administer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a test in economics provided by us. The best qualified candidates will be recommended by us to the departments of economics willing to consider them.

Would your Department be interested in receiving applications from such candidates? If so, please fill out the form below. We will recommend to you only those candidates whom we consider well qualified. You will receive all necessary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candidates, including the results of the above-mentioned three examinations.

At Princeton, one of the top graduate students in economics is from China, originally majoring in physics.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s encouraging students majoring in mathematics, natur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to transfer to economics by taking the above examinations. The applicants will start applying in December 1984. Your prompt response would be much appreciated.

Sincerely,


Gregory C. Chow


Edwin S. Mills


Sherwin Rosen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t _____ University
is interested in considering approximately _____ qualified applicants from the
PRC and might be able to give full financial support to _____ and partial
(half or more) support to _____ of them.

Signed _____

Typed _____, Chairman

Please return to Gregory Chow,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NJ 08544, U.S.A.

索引

- Anderson, Theodore Wilbur
Ando, Albert
Arrow, Kenneth J.
Baker, James
Baumol, William
Becker, Gary S.
Bellman, Richard Ernest
Bernanke, Ben
Blanchard, Olivier J.
Blatt, Dan
Blinder, Alan
Blumenthal, Daniel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联邦准备理事会
Bowen, William
Branson, William
Brooks, Pan
Bullock, Mary
Burns, Arthur
Burton, Robert
Campbell, John Y.
Carmona, Rene
Carsado, Edgar
Chow test, 邹氏检定, 邹检验
Committee on Economics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China, 美中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委员会
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SCPRC, 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
Deaton, Angus
Dernberger, Robert
Dixit, Avinash
Durkee, Bob
Dutta, Jan
Eckstein, Alexander
Edwards, Randy
Engle, Robert
Fairbank, John King, 费正清
Feldstein, Martin
Fleisher, Belton
Ford Foundation, 福特基金会
Friedman, Milton, 傅利曼, 佛利民, 弗里德曼
Friedman, Rose
Galenson, Walter
Geithner, Peter
Gomory, Ralph E.
Goodman, Jerry
Gordenker, Leon
Gordon, Don
Gordon, Roger
Greenspan, Alan
Harberger, Arnold C.
Hayek, Friedrich August von, 海耶克
Heckman, James J.
Hoffman, Alan
Hong Kong-U.S. Economic Cooperation Committee, 香港与美国经济合作委员会
Horwitz, Bert
Houthakker, Hendrik S.
Hurwicz, Leoni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 IBM, 国际商业机器有限公司
International Center, 国际中心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
Jaffee, Dwight
Johnson, D. Gale
Johnson, Emily
Johnson, Harry
Johnson, Howard

Jorgenson, Dale W.
 Bullitt, Judy
 Kahn, Alfred
 Kamsky, Jinny
 Katz, Stanley
 Keynes, John M., 凯因斯
 King, R.
 Klein, Lawrence
 Kuznets, Simon
 Lagrange Method, 拉氏方法
 Lampton, David
 Lawler, Caroline C.
 Lewis, Arthur
 Lord, Winston, 罗德
 Lucas, Robert E., Jr.
 MacKinlay, A. Craig
 Malkiel, Burton G.
 Marschak, Jacob
 Marx, Karl Heinrich, 马克思
 Meisselmen, David
 Meyer, John
 Miller, Merton
 Mills, Edwin
 Mincer, Jacob
 Morgenstern, Oscar
 Mundell, Robert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BER, 国家经济研究局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US NSF, 美
 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erlove, Marc
 Neumann, John von
 Paxson, Christina H.
 Perkins, Dwight
 Pindyck, Robert
 Portes, Richard
 Press, Frank
 Quandt, Richard
 Rosen, Harvey
 Rosen, Sherwin
 Rosett, Richard
 Sachs, Jeffrey
 Samuelson, Paul
 Sargent, Thomas J.
 Savage, Leonard Jimmie
 Schultz, Theodore
 Shapiro, Eli
 Shapiro, Harold T.
 Shimer, Robert
 Shultz, George P., 舒兹
 Simon, Herbert A.
 Smale, Steven
 Smith, Adam, 亚当斯密
 Solow, Robert
 Stigler, George Joseph
 Stiglitz, Joseph E.
 Stokey, Nancy L.
 Suits, Daniel B.
 Tarshis, Lorie
 Taylor, John
 Theil, Henri
 Tinbergen, Jan
 Tolley, George
 U.S.-Hong Kong Economic Cooperation
 Committee, 美国与香港经济合作委
 员会
 Venturi, Robert
 Viner, Jacob
 Volcker, Paul
 Wallis, Allen
 White, Alan F.
 White, Michelle J.
 Wilson, David, 卫奕信
 Woodford, Michael
 丁石孙
 丁肇中
 刁锦寰
 于大海
 于光远
 于宗先
 中美经济教育交流委员会, Committee on
 Economics Education and Exchange

with U.S.
中国青年经济学会, Chinese Young
Economist Society, CYES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 Chinese Economist
Society, CES

尹仲容
卞赵如兰
方闻
毛泽东
王世杰, 王雪艇
王亚南
王则柯
王屏山
王复孙
王毅
王泽农
司徒荣
田国强
白重恩
白聚山
伍沾德
伍淑清
伍舜德
安志文
朱民
朱镕基
江泽民
何东昌
余英时
利荣康, J. K. Lee
吴家玮
李山
李文和
李光耀
李京文
李岳生
李政道
李柱铭, Martin Lee
李国鼎
李绍
李胜彦

李登辉
李嘉诚
李福兆
李剑阁
李稻葵
李龙飞
李济之
李鸿章
李鹏
李鹏飞, Allen Lee
李灏
李巨威, Kui-Wai Li
杜鹰
沈培英
沈艳
汪兆铭
汪道涵
邢慕寰
周小川
周光召
周宏涛
周叔莲
周林
招显洸
易纲
林少宫
林正甫
林安乐, An-loh Lin
林思齐
林雪莉, Shirley Lin
林云
林寿海
林毅夫
邱晓华
金应熙
俞国华
姚依林
姚期智, Andrew Yao
洪永淼
胡汉民
胡锦涛

胡应湘
郎咸平, Larry Hsien Ping Lang
韦基尧
香港发展议事会, Council for Hong
Kong's Development
倪少杰
夏自强
孙中山
孙运璇
宫着铭
徐柏园
柴玲
海外中国青年团, Overseas Young
Chinese Forum
袁木
马洪
高剑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SFC
张幼峰
张安平
张欣
张信刚
张兹闯
张培刚
张导民
梁士诒, 梁燕孙
梅祖麟
许信良
许家屯
许涤新
郭婉容
陈一谘
陈方安生
陈平
陈立
陈汝锐
陈佳洱
陈和铤
陈坤耀, Edward Chen

陈岱孙
陈松年
陈国瑞, Paula K. Chow
陈启宗, Ronnie C. Chan
陈晓红
陈锡文
劳干
彭实戈
曾荫权
粟庆雄
舒元
费景汉
费骅
辜振甫
项武忠
冯国经
黄宜弘, Philip Wong
黄炳礼
黄禹锡
黄华
黄达
黄卫平
杨小凯
杨振宁
杨培新
温志泽
温家宝
叶公超
叶选平
董建华
邹小梅, Jeanne Mei Mei Chow
邹令昭
邹令华
邹令辉
邹令宪
邹至强
邹至毅
邹恒甫
邹善智, James Chow
邹善义, John Chow
邹殿邦

邹剑秋
邹静存
廖仲恺
台湾积体电路公司, 台积电, TSMC
赵复三
赵紫阳
刘大中
刘尚志
刘国光
刘培英
刘遵义, Lawrence Lau
刘鸿儒
楼继伟
樊纲
滕维藻
蒋中正, 蒋介石
蒋经国
蒋硕杰
郑立辉
郑云灿, Un Chan Chung
邓小平
邓炽康
卢武铉
萧政
钱果丰, Raymond Chien
钱思亮
钱宁
钱颖一

霍英东
鲍彤
戴相龙
薄熙来
谢宇
谢希德
钟皎光
韩正
罗仁伯
罗佩莲
罗闻全, Andrew W. Lo
谭惠珠
关任强, Y. K. Kwan
严家淦
顾应昌
郭志权, Philip Kwok
宋敏
陶志刚
张俊喜
丘东晓
王苏生
张处
海闻
梅建平
薛驹
梁晶
熊伟